一看就停不下来的三国史

李浩白 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一看就停不下来的三国史

李浩白 著

一看就停不下来的三国史

李浩白 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看就停不下来的三国史 / 李浩白著 . --北京：台海出版社，2020.9

ISBN 978-7-5168-2744-4

I. ①一…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历史 - 三国时代 - 通俗读物 IV. ①K23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175481 号

一看就停不下来的三国史

著 者：李浩白

出 版 人：蔡 旭 封面设计：杨 龙

责任编辑：戴 晨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100009

电 话：010-64041652（发行，邮购）

传 真：010-84045799（总编室）

网 址：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thcbs@126.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天津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344 千字 印 张：20

版 次：2020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2020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8-2744-4

定 价：5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序言 旁敲侧击掘真知，融会贯通铸汗青
第一篇 大幕拉开
第一章 三国里董卓为什么那么厉害
董卓：一位被“黑化”了的末代周公
董卓的个性行事及对后世的政治影响
第二章 西凉武人集团：东汉末年大乱的揭幕者
“凉州三明”时期的成形阶段
“关陇双高”时期的巅峰阶段
“乱国三凶”时期的衰亡阶段
第三章 王允不“允”：志大才疏的救时宰相
第四章 汝南袁氏：“化家为国”的野望
袁安时期之固本培基
袁京、袁敞时期之“清浊分流”
袁汤父子时期之绸缪布局
袁隗兄弟于灵帝朝之“翻云覆雨”
袁隗、袁绍叔侄时期之“鹰扬虎视”
汝南袁氏之“袅袅余音”
袁绍的门户集团及官渡战败缘由之浅探
第五章 中原名门世族的崛起：左右历史走向的强暗流
东汉末年的高层权力格局
初平、兴平年间世族集团的“独大”
建安年间早期：世族集团助曹与攻袁
建安年间中后期：世族集团的易汉入魏
曹丕称帝时期：世族集团的全面复兴
曹叡在位时期：世族集团的“异峰突起”
魏末时期：世族集团的改天换地
第二篇 代汉之争
第六章 谁是真正的“代汉者”
第七章 曹家父子之谋
曹操“借天子以纳人心”之战略浅析
曹丕的“分权制衡术”及其政治影响
第八章 曹操为什么不做开国皇帝
建安年间荀彧及拥汉派的“反曹暗斗”
董昭：曹魏幕后的真正“孤臣”
贾诩：三国时期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官渡之战幕后的“无间道”
第九章 “天下之定，彧之功也”—— 儒圣荀彧
知人料事，洞若观火
算无遗策、功济于时
求贤若渴，树人自补
兴文倡学，重铸太平

卓然立节，身后渊流
光耀千秋，万古流芳
第三篇 英雄莫问出处
第十章 刘备创业史
刘备集团“帮派化”特征及其转轨之浅述
“侠帝”刘备
关羽之骄，蜀汉之殇
第十一章 陈登：以武立业的名士先驱者
第十二章 承父兄之业的东吴之主孙权
孙权用人立国的“得”与“失”
孙权晚年立嗣顾命问题之探隐
第十三章 三国时期的官场选任特点
“九品中正制”的正反面
“以行而求名，以名而立身”的真相
不贿不礼，官路不顺
上虽伪饰，下必投机
两面下注，长线投资
“有权就能任性”
“知恩图报”背后的权权交易
高官们的必学绝技：“爱士养名”
“权二代”的成才捷径
第四篇 三分归晋
第十四章 揭司马懿为什么会是最后的赢家
真实的司马懿：儒枭·隐雄·全才
司马懿的登顶之路
司马懿早年的“多岗位”锻炼及成效
第十五章 开启西晋的司马家族
“奸雄”司马昭的另一面
“战神”司马昭是怎样炼成的
司马兄弟凭何驾驭宿将旧臣
司马氏发动“高平陵事变”的底气
司马氏的“姻亲网”及其政治作用
第十六章 魏晋嬗代背后的“制度之争”
司马氏选贤用人更加精细化
律令施政“副众心之所求”
废除屯田制，解放屯田客
五等封爵，收服士心
结语
第十七章 寿春之役：三国归一的前奏曲
“寿春之役”的起因
司马昭的全盘谋划
孙吴君臣的内外谋算
蜀汉集团的呼应及受挫
司马昭挑起寿春之役的深层次用意

司马昭集团在战役中“亮点纷呈”
司马昭的战后安置及其深远影响
第十八章 文立：由蜀入晋之“第一智臣”

序言

旁敲侧击掘真知，融会贯通铸汗青

汉末三国历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林中一座庞大的“宝库”。在文艺创作方面，有罗贯中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及其多部影视剧广为宣扬，而致东亚民众耳熟能详；在史实典籍方面，亦有《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巨著交相辉映，令人得其精华之涵泽而深以为益。

我于十八年前确定写作《司马懿吃三国》《三国终结者司马昭》两部贯穿整个汉末三国时期近百年的长篇历史小说，从那时候起便与魏晋三国的历史研究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再优秀的历史小说，也必须有丰富而准确的史料以为骨干支撑，否则写出来只会谬误横生、贻笑大方。

当时，我直接从史学原典入手，以《后汉书》《三国志》《晋书》《资治通鉴》这四本书为基础性资料。然后，再找到田余庆老师的《秦汉魏晋史探微》《东晋门阀政治》，王夫之大师的《读通鉴论》，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钱穆大师的《国史大纲》《秦汉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及多位现当代史学家的三国论文集为参考书，借为龟鉴，边研边写。同时，我在网上还加入二十余个三国迷QQ群，随时从中汲取三国史的前沿研究新知识，并将自己的心得体悟放到QQ群里与网友们切磋交流，取长补短。

记得我在《司马懿吃三国》小说初稿中曾把时人的坐具写成了“红木椅”，立即被网友们指出了谬误：那时的坐具是榻和席，椅子要到唐宋之际才会出现。我又写到书中的人物角色吃红薯，其实这也错了：红薯是在明代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我还把荆州刺史的官阶写成了“三品大员”，后来才知道刺史一职在三国时期的别称是“州牧”，其官秩为二千石，而不是用品级来划分的。这些细节方面的锤炼，促使我在探史洞幽之际愈

发严谨求实，丝毫不敢虚妄。

而且，在写司马懿、司马昭系列历史小说的同时，我也渐渐对三国历史中云遮雾罩的各种问题产生出了不少随想和受到不少启发，也探索出点点滴滴的新颖见解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整整做了四大本的心得笔记。而这些记录下来的随笔感悟，便成了今天这部《一看就停不下来的三国史》的雏形和蓝本。

写这些史籍心得见解之时，我牢牢坚持了三个原则：别人写透写烂了的题材，无论多么热门，我绝不会跟风再写；别人窥而不深或探而不入的重要论题，我可以写得更深更新；自出心裁而又有据可证的题材，我便紧抓不放、深耕细作。例如“西凉武人集团”，这个历史名词被不少史学家提起，但此前并没有一个史学家将它的来龙去脉写深写透。我自己就在史书中多方查找资料、整理线索，终于把这个题材尽量写了个明白透彻。又如“中原名门世族集团”，陈寅恪和田余庆二人只是一笔带过，其他史学家也对此语焉不详。我便抓住“党锢之士”“汝南袁氏”“弘农杨氏”和颍川系世族集团等关键角色，一路纵深追踪，直到还原了他们的历史面貌与命运走向。

在这三个原则之上，我反复咀嚼消化各种史料，多次修改自己的历史论文。以我的创作经验而论，我觉得写历史小说其实更加容易一些，因为它可以允许“自圆其说”的适度虚构。但写历史论文不行。它必须要百分之百的求真求实，它必须要逻辑严密、持之有据，而不能无的放矢、凭空捏造。这本《一看就停不下来的三国史》，我总共创作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凝聚了我大量的汗水和心血。在完稿之日，我将自己的历史论文写作经验总结成了一首小诗：“觅史探幽溯本源，每有会意辄细评。丝丝入扣巧推理，寻章摘句来证明。”

我个人认为，要写好一部史学著作，我们应该做好三个角色：一是历史资料的“采矿者”，二是历史推演的“福尔摩斯”，三是历史叙述的“还原师”。

首先，如何做好历史资料的“采矿者”呢？我们知道，历史的真相永远是“碎片化”“多面化”“多维度”的，绝对的真实几乎是不存在的。它散落在冠冕堂皇的正史中，也隐藏在光怪陆离的野史里。我们就应该从各

种资料中，把大大小小的历史真相之“碎片”尽可能地找全、拼好。实际上，像陈寿、范晔、房玄龄、司马光等这些古代历史学家是非常聪明睿智的。他们在史书中既有旁敲侧击的“曲笔”，又有蜻蜓点水的“简笔”，用以规避某些不可抗之因素。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也不会刻意编造或扭曲真相，而是把真相写得很简略、很含蓄、很巧妙，留待有识之士的用心发掘。这就需要我们炼成一双“火眼金睛”去洞察和剖析。我们要特别注意寻觅史籍之中的那些反常与蹊跷之处。越是蹊跷越是不合常理的史料，无论它多么新奇多么耀眼，就越是值得我们大挖深挖的“金矿”，就越是能够帮我们找到真知灼见的“钥匙”。

其次，如何做好历史推演的“福尔摩斯”呢？在找到一串串“吉光片羽”式的历史真相资料后，我们应该学会由此及彼、举一反三的联动推理，力求抓准真相的主干。在这里，我愿现身说法，举出一个我在深研三国历史过程中严谨推论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我研究曹魏开国之初的政治权力格局版图时，发现除了颍川系世族集团独占鳌头之外，青州系、兖州系、河北系、关中系等各大世族集团也各自据有“一席之地”。然而，唯独荆州系世族集团却似乎“整体缺席”了。在《三国志》的正传记载中，荆州系世族名士代表有两位：一是魏国首任尚书令桓阶，他是荆州长沙郡人氏；二是韩暨，他是荆州南阳郡人氏。桓阶晚年深得曹丕宠信，又身居“百官总领”尚书令之高位，显然为荆州系世族集团之首脑而无疑。但他逝世之后，竟被陈群、司马懿两个豫州系的世族首领分别“瓜分”了尚书台。以桓阶之权势威望，竟然至死也未能安插一个荆州系的名士进入尚书台担任要职。这是何等吊诡的一幕？即使是与桓阶同出荆州系一脉而唯一冒出头来的韩暨也是一直到魏文帝曹丕黄初七年才勉强做到了太常之官的虚职，而且直至临终仍只是太中大夫，官秩始终停留在二千石。荆州系世族集团在魏国政坛居然遭到如此冷遇，实为大大的反常。

后来，我忽然翻阅到了东汉建安末年那一场牵涉数千人的“魏讽之乱”一案时，方才有所启发。在《三国志》《资治通鉴》里明文记载了魏讽之案所牵涉到的部分人员：张绣之子张泉、文钦、刘廙之弟刘伟、宋忠之子、王粲之二子。观阅这份名单，除去文钦之外，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刘廙之弟刘伟、宋忠之子、王粲之二子及张泉（张绣、张泉之籍贯本为凉州，但他们都曾在刘表治下的荆州驻居过）等人都具有

原刘表旗下荆州系世族集团的门户背景，他们都是以降臣身份入魏从仕的。在建安十三年降曹前后，他们都和刘备集团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和联系。例如宋忠，在刘琮决定降曹后才被派往刘备处说明情况，后为刘备大度地释放而去。“（刘）琮令其官属宋忠诣（刘）备宣旨。时曹操已在宛，备乃大惊骇，谓忠曰：‘卿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语，今祸至方告我，不亦太剧乎！’引刀向忠曰：‘今断卿头，不足以解忿，亦耻丈夫临别复杀卿辈！’遣忠去。”（摘自《资治通鉴·卷六十五》）宋忠受此宽待，他的儿子自然难免亦对刘备集团有所好感。王粲之子的心态也可能如此。而建安二十四年秋季关羽自江陵发兵北伐曹操之际，他们遂同时追随魏讽在邺城掀起反曹之暗战。这样的巧合，只能证明这些原属于刘表旗下的荆州系世族不甘魏室之冷遇或歧视，与关羽暗中通气、遥相呼应、合力抗曹，确是历史的真相。而留守邺城的曹丕则一手镇压了这场“魏讽之乱”，并以此作为自己立嗣之争的政治资本，赢得了曹操的青睐。正是由于“魏讽之乱”是曹丕亲力亲为的钦案，所以后来才会牵连到魏国内部几乎所有出身于荆州系的官员、士人被打压和冷遇。故而，以桓阶之圆融练达、位高权重，也无力为荆州系世族集团的政治前途“解冻”。

这个结论，便是我以“福尔摩斯”式的历史推演法而得出的。至于怎样开展环环相扣的推演，我所举的这个例子应该便是“活标本”。

最后，如何做好历史叙述的“还原师”呢？我个人认为，把历史的真相深入浅出、明白晓畅地摆到读者的面前，其实很不容易。在这方面，田余庆先生、王夫之大师是做得极好的：他们的文章清澈如水、开阔似川，脉脉长流，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而欲罢不能。我们正确的笔法，应当如朱光潜先生所言：“思想条理必须清楚，情致必须真切，境界必须新鲜，文字必须表现得恰到好处，谨严而生动，简朴不致枯涩，高华不至浮杂。”又如王夫之大师所言：“文章之用，以显道义之殊途，宣生人之情理，简则难喻，重则增疑。故工文之士，必务推汤宛折，畅快宣通，而后可以上动君听，下感民悦。于是游逸其心于四维上下，古今巨细，随触而引伸，一如其不容已之藏，乃为当世之所不能舍。”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尽量还原真实的历史，让读者在“曲径通幽、山重水复”的文字美景中流连忘返。

历史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要学会在自己的头脑中展开“虚拟辩论赛”，不断地寻找反方的证据、证言来考验自己作为正方立论、叙述的正确性与真实性，要让自己的推论在千锤百炼之后依然能够站得住脚。唯有经得起怀疑、经得起反驳、经得起拷问，我们的知识才是正确而坚实的。

第一篇

大幕拉开

第一章 三国里董卓为什么那么厉害

董卓：一位被“黑化”了的末代周公

东汉末年，皇权衰弱，宦官作乱，外戚生事，而地方割据势力也在平定“黄巾之祸”后得到了极大的膨胀。一个旧时代，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大转折关头。

正是在这样混乱而复杂的时势背景之下，汉末第一枭雄—董卓，带着他背后的西凉武人集团，似飓风般应运登场了。他和他的部下，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铁与火、血与矛的大剧，令人眼花缭乱。而且，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很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历史的未来走向。

> 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以来，殆未之有也。

一般而言，史学界对董卓的评价大多倾向于负面。陈寿在《三国志》里就是这样贬斥董卓的：“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裴松之也称：“其残贼之性，实豺狼不若。”依他们的说法，董卓之祸国殃民，甚至超过了当年的“窃汉大盗”王莽。

> 董卓自窃权柄，至于陨毙，计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祸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残贼之性，实豺狼不若。“书契未有”，斯言为当。

不过，史学界也有摒除唯道德论而中立评价董卓的。范晔在《后汉书·董卓列传》里如此称他："董卓初以虓阚为情，因遭崩剥之势，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认为董卓优待名士大夫，并且也未有谋朝篡位之明显举动，不应该被一棒子打死。

董卓初以虓阚为情，因遭崩剥之势，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夫以刳肝斫趾之性，则群生不足以厌其快，然犹折意缙绅，迟疑陵夺，尚有盗窃之道焉。

在这两种观点之外，笔者以为：董卓其实是汉末被抹黑得最严重的一个"治国之权臣"。他的带兵入京，也是被大将军何进、太傅袁隗叔侄招来协助"清君侧、诛阉宦、正朝纲"的。入京之后，他亦曾煞费苦心地平衡各方势力，尽力拨乱反正，想为汉室再续一股气劲的。可是，在名门世族集团和关东诸侯的歧视下，他身为边将而入主中枢、他粗通文墨而执掌大权，就成了他的"原罪"—从此，他便被"黑化"成了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

具体说来，名士大夫们和关东诸侯对董卓的抨击，主要体现在这四个方面：一是他鸩杀少帝刘辩，草率行事，废帝立威；二是他独断专权，压制各方异己势力；三是他倒行逆施，盗墓铸钱，恶政多多；四是他纵兵施暴，对西凉武人集团约束不力。

针对施加在董卓身上的四大"罪状"，我们结合史书记载，来逐条剖析其中的真伪虚实，力争还董卓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第一，在废帝立威这个问题上，董卓以一臣之力而改易天下之共主，挑战了儒家正统的礼法秩序，确实称得上是犯上作乱。他本是西凉边疆的一个外臣，既无顾命辅政之责，又无三公枢机论道之职，一入洛阳便直接依仗武力强行废掉少帝，自然令朝中的名门世族集团望而生畏、闻而生忌。他连天子都敢废黜，那么，再罢掉这些三公九卿又岂在话下？如此一来，那些名士大夫当然是人人自危。董卓身处纷纭复杂的枢机之地，行事却是这般简单粗暴，自然是不妥的。这一点无须讳言。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献帝纪》里记载："董卓与帝

（刘辩）语，语不可了。乃更与陈留王（刘协）语，问祸乱由起；王答，自初至终，无所遗失。卓大喜，乃有废立意。”

然而，从废帝立新这件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去评论董卓是对是错，我们却可发现：董卓其实真的是做到了“废昏立明”；他改立新帝刘协，确实符合汉室正统的整体利益。

再加上立刘协为太子，本就是汉灵帝的遗愿。董卓执行这一大事，也是有法统依据的。尽管董卓实际上是借自己与汉灵帝之母董太后同姓的缘故，极为牵强地冒充董氏外戚的身份，来辅佐与董太后一脉渊源深厚的刘协的。

返转过来，我们也可以试想：如果董卓真的怀有篡逆之心，他必定会和后世的大权臣司马昭选立曹奂一般，用一个平庸无能的少帝作为自己的傀儡。这样做，更有利于他独揽大权啊！当时，何进兄弟已死，何太后不足为患，少帝刘辩又是庸人之材，董卓完全可以对他们威逼利诱而操纵之。但实际上，他并未依此而为。恰恰相反，他选立了比少帝刘辩更聪明更睿智的陈留王刘协为新君，认认真真当起了辅政之臣。而刘协以他的聪睿之资，在风起云涌的乱世中为东汉王朝再行续命了二十多年，已是公认的合格之主。这不正好证明董卓当年的“废昏立明”并没有做错吗？

第二，在独断专权、打压异己这个问题上，董卓亦是另有殊词的。纵观史书，董卓只有在两件大事上“独断专行”过：一是废帝立新；二是迁都长安。废帝立新的是非功过，我们已经在上边分析了，这里不再赘言。迁都长安，是董卓感到关东诸侯的军事压力急剧增大，不得已而退回关中背靠陇凉以对抗之。那个时候的京都洛阳，已被关东联军三面包抄：东边，曹操已经带兵杀到了成皋；北边，袁绍大军直逼河内，先锋王匡已进驻河阳；南边，袁术和孙坚也打到了鲁阳。在这三面受敌的情形下，董卓决定迁都避危，从军事谋略角度而言，并无多大的谬误。可以说，他当时的“独断专行”，其实是正确的。只不过名门世族集团舍不得在洛阳的既得利益，所以对董卓进行多方抹黑罢了。

除了这两件大事之外，董卓在用人行政的具体事务上都是竭诚与列

位名士大夫友善合作的。《后汉书·王允列传》里写道：

时董卓尚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王允。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

甚至董卓想在用人提拔上插手施为，也因名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而罢休。《后汉书·王允列传》里记载：

赵戬字叔茂，长陵人，性质正多谋。初平中，为尚书，典选举。董卓数欲有所私授，戬辄坚拒不听，言色强厉。卓怒，召将杀之，众人悚栗，而戬辞貌自若。卓悔，谢释之。

所以，《后汉书·董卓列传》里又称：

（董）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

试想，连用人选举这样的核心事务，董卓都不得不俯从于名士大夫之公议，他平日里又能如何“独断专权”得起来？

即使是在与董卓本人切身利益相关的重大问题上，他亦从来不是一意孤行的。《后汉书·献帝纪》里写道：

（董）卓既为太师，复欲称尚父，以问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为师，辅佐周室，以伐无道，是以天下尊之，称为尚父。今公之功德诚为巍巍，宜须关东悉定，车驾东还，然后议之。”乃止。京师地震，卓又问邕。邕对曰：“地动阴盛，大臣逾制之所致也。公乘青盖车，远近以为非宜。”卓从之，更乘金华皂盖车也。

后世的曹操在晋位魏公之前，也是装模作样地咨询过荀彧的意见。荀彧公开表示反对后，曹操又岂有雅量而容之？还不是明催暗逼，不得魏公而不止？他的“独断专行”，可是远远胜过董卓了。

第三，在倒行逆施、恶政多多这个问题上，董卓也是不甘“背锅”的。《后汉书·王允列传》里写了，董卓将“朝政大小，悉委之于王允”。那么，名士大夫集团的首领—司徒王允，就是董卓的政务代行者。董卓高踞垂拱，极少插手干预过朝廷的具体事务，他又何来的“倒行逆施”？至于“盗墓取财”，他也是拿来充实国库以为军用罢了。这种事情，

后世的曹操不也干过？曹操还专门设立了“摸金校尉”这个职位来做呐！

其实，在治国方略上，董卓也是极力向名门世族靠拢的，极力做到以儒为本、以礼法治民的。《三国志·魏书》里写：

（董）卓使司隶校尉刘嚣籍吏民有为子不孝，为臣不忠，为吏不清，为弟不顺，有应此者皆身诛，财物没官。

我们再来看出身儒家的晋武帝司马炎开国施政，也是同样下令：

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

这不正与董卓之所为有异曲同工之妙吗？为何世人对晋武帝此举便大加赞赏，而对董卓同样之所为则视而不见？

第四，在纵兵施暴、流毒四方这个问题上，董卓确实是责无旁贷的。这也是他最为人诟病的地方。《三国志·魏书·董卓传》里写道（董卓）曾派兵劫掠阳城，“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奸乱宫人公主”。

西凉武人集团因粗犷悍猛而致军纪紊乱，这个责任自然该由董卓来担负。但平心而论，他虽束下不严、扰民不安，但还能将乱军的危害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不至于酿成大规模的暴乱。待他遇刺身亡之后，王允不能收抚西凉武人集团，那时候才真是悍将四起、军卒横行、纲纪大乱、民不聊生了！

（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奸乱宫人公主。

综上所述，董卓之四大“罪状”，有三项难以成立，有一项确有其事。整体而言，他毕竟还是功过相参的。至于朝野上下对他的种种抹黑，不过是他和他背后的西凉武人集团在彻底覆没后丧失了历史的“话语

权”所致。

归根到底，董卓作为一个依靠军功和武力起家的“政治暴发户”，始终是被汉末占据主流阶层的名门世族们所歧视和排斥的。他们认可的是曹操、司马懿、诸葛亮那样文武双全的精英，而绝非董卓这样的“异类”。

然而，当后来的关东诸侯中袁绍、袁术等出身名门世族的军阀纷纷割据自立之际，当后来的曹操挟天子而代汉立魏之际，当后来的司马懿父子积威势而亡魏成晋之际，人们会不会想起这个一心想以“周公”“尚父”之政治面貌而首登皇权中心的大枭雄董卓？

他独居高位却并不揽权于私，他身负骂名却并无篡逆之实，比起后世的魏武帝曹操、晋文帝司马昭来，他临死前的职务也仍是大汉朝的最后一任太师。即使是另一位著名的权臣桓温，在咽气之时还念忘不忘向朝廷索求九锡之殊遇呐！孰忠孰奸，岂非不言自明？

公元192年5月，东汉初平三年四月，董卓死了，压制各路野心家、阴谋家的最后一座“大山”崩倒了，东汉王朝从此真正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董卓的个性行事及对后世的政治影响

清代名臣曾国藩曾在给自己兄弟的家书中这样评价董卓：“其智力横绝一世。”在这样一位理学大师的心目中，他至少认为董卓是一个才能超群的强者。

确实，董卓身为一代枭雄，以其鲜明的个性特色和行事风格，在东汉末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异彩，令后人寻味不已。

《后汉书·董卓列传》里描写他的个性为“粗猛有谋”。这实在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评语—既然是“粗猛”了，又怎会谈得上“有谋”呢？难道在他那张“黑脸张飞”似的面孔下，竟还隐藏着满腔诸葛亮一般聪慧缜密的心思？

而《三国志·魏书·董卓传》就对董卓的性格描绘得更为中和一些："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

由此可见，"粗猛""好侠"这两个词语构成了董卓的个性底色。显然，他这种个性的形成与他的家庭背景大有关系：他的父亲是一个县尉，专管捕盗治安之事，多与三教九流交游。而他从小随父亲耳濡目染，自然也和那位著名的"亭长"刘邦一样养成了豪侠之气。而且这种豪侠之气，还体现在他的日常行为上：

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

董卓以心换心，以侠举而获大利，自然更加坚定了他对自己这种"千金散尽还复来"之个性行事风格的坚持和固化。这一切，在他以后的人生历程之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汉桓帝末年，董卓以六郡良家子的身份参军入仕，很快就做到了军司马一职。他随西凉名将张奂出征立下了战功，朝廷奖赏了他九千匹布绢。他却十分大方，"乃悉分与吏兵，无所留"。而且，还引用了一段兵书典籍《黄石公·三略》里的名言为自己大做宣传："得而勿有，立而勿取；为者则己，有者则士。"《后汉书》诠释道："为功者虽己，共有者乃士。"可见，董卓并非不通文墨之士，还能借鉴兵书将策来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所以，他的"将星"之路必定会走得十分顺畅。

也许，那个时候的董卓，心中最高的志向也不过是像樊哙、灌婴一样以勇作战、以功扬名，成就一番登坛封侯的事业。

在动荡不休、战火纷飞的东汉末年，董卓的一身武艺和将略，得到了最佳的"用武之地"。短短十余年间，他以羽林郎为起点，由军司马、郎中、西域戊己校尉，并州刺史、东中郎将一路做到东汉的前将军。后世的关羽，那个所谓的"武圣"，在蜀汉的最高职务也就是"前将军"。这些成就和殊荣，都是董卓依仗着自己实打实的军功一步一步奋斗而来的。

面对董卓在西凉一域渐渐坐大成势，朝廷越来越不放心了。《后汉书》里写："朝廷不能制，颇以为虑。"于是，汉灵帝开始"出招"了：以

明迁暗降之法，征召董卓入京担任少府卿。少府卿可是一个专管钱粮财货的“肥差”。素来以吝啬闻名的汉灵帝能够拿出这样一个“肥得流油”的职位来“钓”走董卓，也真算是下了一番血本。

然而，此刻的董卓却已是“胸中有谋”了。他深知“鱼不可脱于渊”，在乱世之中，唯有兵权才是有效的立身之本。他万一傻傻地去了京城，那可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少府卿这个职位的“油水”再多，自己手头无兵无势，分分钟便会遭人毒手！

于是，面对这巨大的诱惑，董卓硬是一口拒绝了，还上书宣称自己是被治下的胡兵、义从们强行拦住了车驾而无法赴京。

但汉灵帝已经将他视为尾大不掉的割据之患，在临终前再下玺书，调董卓为并州牧，并将所有兵权转付与忠臣皇甫嵩。这一次董卓仍然是大耍无赖，带着自己的大队兵马开到河内郡境内便停驻下来，静观朝中的时局之变。同时，他的胞弟董旻也以奉车都尉之职潜伏在京师之中，和他随时互通声气。

果然，他的机会来了：

及（灵）帝崩，大将军何进、司隶校尉袁绍谋诛阉宦，而太后不许，乃私呼（董）卓将兵入朝，以胁太后。（摘自《后汉书·董卓列传》）

董卓这时如狐捕兔，抓住了这个机会，火速入京，与董旻遥相呼应，趁乱夺得权柄，以武力为后盾而成为当朝第一权臣。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意这一点：董卓初时进京平乱，所带的兵马只有三千人。他这三千兵马，原本就是拿来“清君侧、诛阉宦”的。如果他当时有谋逆篡位之心，根本就不会只带领三千兵马，而应该换成三万兵马！

到了京城之后，董卓施展种种手段，造声势、除丁原、控禁军，来了个“反客为主”，以一介边将之身而骤登首辅之位，确实是占尽先机、高人一筹。

他的突然崛起，完全出乎名门世家出身的袁隗、袁绍、袁术、杨彪、王允等中枢之臣的意料。对这样一个“异类”的发迹，他们岂肯甘居其下？于是，这些名士豪杰兵分两路，各出其招予以应对：袁绍、袁术等遁往关东，到处游说，组织十八路联军前来公开讨伐董卓；袁隗、杨彪、王允等则在京都沉潜下来，韬光养晦，隐忍伺机，施展阴谋诡计暗中狙击董卓。

董卓也毫不示弱，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调动自己麾下的西凉劲旅，全力阻击关东联军；另一方面，在后方以严刑重典立威，借此震慑朝廷内外潜在的政敌。他虽然“粗猛”成性，但此时此刻确实还是“有谋”的。

不过，董卓的对敌手法，依然偏重于生硬粗暴，缺乏必要的柔韧和灵活。

（董）卓豫施帐幔饮，诱降北地反者数百人，于坐中先断其舌，或斩手足，或凿眼，或镬煮之，未死，偃转杯案间，会者皆战栗亡失匕箸，而卓饮食自若。（摘自《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可惜，他实在低估了名士大夫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他越是这样简单粗暴地威胁他们，其效果就越是适得其反。

《后汉书·盖勋列传》里记载：

时河南尹朱儁为（董）卓陈军事，卓折儁曰：“我百战百胜，决之于心，卿勿妄说，且污我刀。”（盖）勋曰：“昔武丁之明，犹求箴谏，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戏之耳。”勋曰：“不闻怒言可以为戏？”卓乃谢儁。

以董卓粗猛刚毅之性，遇上盖勋这样理直气壮的名士大夫，他也只能折节而应之。

其实，在董卓之前，另有枭雄王莽是通过博学好文、沽名钓誉、广揽士心而夺权成功的。他本是董卓的一面龟鉴。但董卓显然没有从他身上汲取经验，仍以“粗猛”之风一意孤行。所以，他到死也只拉拢到了蔡邕等少数名士大夫的理解和有限的支持。从这一点来说，董卓的失败可

谓早已注定。

当后来董卓退守长安，大筑“万年坞”，积谷为三十年之储而自保时，他已是锐气潜消而意趋保守，不再有开山辟地之魄力和吞吐四海的气象了。

对枭雄而言，失志则必亡。果然，没多久，董卓中了王允的“内应连环计”，一时粗疏之下，被义子吕布刺杀于道旁。他的功业，也随之烟消云散。

董卓死了。但他以一介边将而雄踞高位、夺权成功的经验，无论是正面的胜利还是反面的教训，都被后世纷纭而起的各路枭雄们借鉴。

他“挟天子以揽大权”的手法，完全被曹操、司马昭照搬照抄了过去。

他“以武力为立身制胜之本”的理念，也在曹操、司马懿父子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他以废帝立新而示威四方，更是被司马师学得有模有样。

同时，他乏计谋以防身、无学识以广交的缺点，也被曹操、司马懿等人所扬弃。故而，曹操才会喜文乐赋、笔耕不辍，并严格要求其子曹丕、曹植等人以文武双全为根基。他这么做，是不想再步董卓之覆辙，极力让沛郡曹氏融入名门世族集团的“文化圈”，以共同的文化纽带形成固定的利益纽带。而司马懿父子更是以鸿儒而自居，牢牢执掌礼法大旗，拼命追求成为天下名门世家的领头人，为自己一族独揽朝纲而夯实政治基础。

可以这么说，死去的董卓成了一面永恒的镜子。三国时期几乎所有的枭雄，都从他身上汲取到了或多或少的一些东西。

当然，对这一点，几乎所有的枭雄又都是秘而不宣、只做不说的。

第二章 西凉武人集团：东汉末年大乱的揭幕者

在中国的历朝历代中，东汉王朝比较奇特：像北宋、南宋甚至明朝都是亡于国力衰弱，挡不住外夷，压不平内乱。而东汉王朝直到灭亡的前夕，还能内平黄巾之乱，外除羌戎之患，武功彪炳，难与争锋。但它终是亡了。它并不是亡于敌国民变，溯本究源，居然是被它内部的各大割据势力瓜分而亡的。

在这各大割据势力当中，西凉武人集团是起家最早、实力最强的先行者。是他们点燃了东汉王朝走向崩溃的导火索。但在风云际会之下，长江后浪推前浪，一山更比一山高—他们并未成为这场乱世的终结者和最大获利者。

从某种角度来看，西凉武人集团本是东汉的“国之藩屏”：他们是伴随着东汉王朝的征羌之役而逐渐成长壮大的。这就如同西方世界的一则寓言：一位屠龙者在不断斩杀恶龙的过程中，最终却变成了那条最大的“恶龙”。

“凉州三明”时期的成形阶段

凉州羌乱，一直是困扰东汉王朝中后期的严重边患。汉安帝年间，东汉朝廷本想征发内附的羌人远屯西域，没料到羌人们行至半途却纷纷起来叛变反抗。羌人一乱而难以平息，竟与洛阳朝廷缠斗了百余年。这期间，汉廷调遣了重兵良将进行了多次镇压。后世晋宣帝司马懿的高祖司马钧就曾经担任过以平羌为己任的征西将军，亲率劲旅出击，结果由于与友军配合不力，初获小胜而终遭大败，他自己也在狱中自刎以谢罪了。

羌乱既是如此难以底定，朝廷便不惜拿出高官厚禄来号召天下士民入伍平羌。持节雍凉、立功西疆，成为当时东汉热血男儿的最大追求。后世的魏武帝曹操在那篇理明词畅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就写道：

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看到了吗？这位权倾朝野的大枭雄，当年也只是想在西凉找到“用武之地”，然后讨羌立功而拜将封侯！

东汉朝廷为了平定羌乱，初时都是从关东地域选将调兵赴西征讨，例如邓骘、司马钧、庞参等，然而均不能彻底荡定。这其中有三个原因：一是凉州当地官员“太守、令、长，畏恶军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着身”，既不擅用兵，又敷衍塞责；二是当时的朝廷对凉州本地的豪强势力存有一定的防范心理，不愿起用他们；三是凉州羌人确实战力不俗。郎中虞诩就很有远见地指出，若有不轨之士“驱氐羌以为前锋，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不能当”（摘自《后汉纪》）。

直到汉顺帝永和六年，羌人进围关中三辅之地，征西将军马贤率军作战，竟与其子俱败殁于战场。此事大大震动了东汉朝廷。朝廷开始改弦易辙，启动了“以凉制凉”的灭寇方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皇甫规、张奂、段颎三位凉州籍的名将终于脱颖而出，为西凉武人集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皇甫规的表字为“威明”，张奂的表字为“然明”，段颎的表字为“纪明”，他们三人的表字中都有一个“明”字，所以被朝士们称呼为“凉州三明”。

段颎是最先被汉廷起用主持征羌事宜的。他在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就带领“湟中义从”与本部兵马共一万二千骑，击败了烧当、烧何、当煎等八股叛羌。但他在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冬征讨陇西叛羌时，因凉州刺史郭闳故意拖延，导致旗下的“湟中义从”叛乱而散。段颎反被郭闳诬告去职，而后羌乱愈炽。

这时，皇甫规以泰山郡太守之身，因自己“素悉羌事，志自奋效”（摘自《后汉书》），遂上书请缨出战。朝廷只得任他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先是一战而破叛羌之胆，后又施行怀柔招降之策。在软硬兼施之下，短短数年间，皇甫规在西凉一带竟招降了二十余万叛羌，然后得胜回朝。

不料他前脚刚走，叛羌又起，他便力荐同州好友张奂出任武威郡太守而镇抚之。张奂正身洁己，不受诸羌之贿，威化大行，政绩跃居诸郡之冠，凉州人氏甚至为他立了生人祠。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东羌与鲜卑联合作乱，凉州又生动荡。张奂升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鲜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逃去了塞外，不敢助羌作乱。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张奂率本部司马董卓、尹端等大破东羌，斩其酋豪，俘虏一万余人，从此幽、并、凉三州清定。而他的部下董卓也崭露头角，渐渐接替了他的职位。

在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段颎也再次被朝廷起用，复为破羌将军，与戊己校尉董卓等人东西呼应，大兴重兵，搜山清野，历经大大小小一百八十次战役，把为患西疆多年的叛羌之患彻底压平，共斩三万八千余首级，缴得牛、马、羊、骡、驴、骆驼合计四十二万七千余头，大获全胜。

就这样，在“凉州三明”的共同带动下，一个在与叛羌的长期血战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西凉武人集团终于浮出水面，初显峥嵘。笔者认为，这个西凉武人集团的势力来源有三：一是朝廷在当地征募的凉州壮士。例如董卓，他就是“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后来“胡尝出抄，多虏民人，凉州刺史成就辟董卓为从事，使领兵骑讨捕”（摘自《三国志·魏书·董卓传》）。二是河湟之间各族应聘而来的“义从”。他们实际上是朝廷用以镇压羌乱的外族雇佣兵。三是“凉州三明”及其他汉将在讨灭羌乱后招降过来的那些胡兵羌众。

这个西凉武士集团还呈现出了三大特征：它身经百战，所以威震四方；它兵精马壮，所以鲜有败绩；它彪悍成风，所以桀骜难驯。而且，有着“私家兵”化的严重倾向。

但是，在皇甫规、张奂、段颎三人的带领、支配下，西凉武人集团于这一阶段尚还忠于汉室、遵纪守法。皇甫规、张奂、段颎三人原本就是由汉朝察举制度遴选出来的精英：皇甫规“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摘自《后汉书·皇甫规传》）；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举贤良，对策第一，擢拜议郎”（摘自《后汉书·张奂传》）；段颎“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摘自《后汉书·段颎传》）。他们的儒生化形态已经非常明显，不然汉廷也不会这么放心地把“以凉制凉”的重任交付给他们。

反过来，“凉州三明”以文吏而为武将，其儒雅明道之风也不可避免地熏陶了旗下的西凉武人集团。例如皇甫规，他就影响了侄儿皇甫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诗》《书》”。又如张奂，他拒纳羌人之贿赂，廉洁持重，风化一郡，令人生敬。他的军司马董卓出于倾慕之心向他赠送了一百匹布绢，也被他严词拒绝。后来，董卓能够对清流名士折节礼敬，其实就是在他这里受到了影响。

然而，在时局的大震荡中，皇甫规、张奂、段颎三人都因为被卷入朝中党争而先后退出了历史舞台。宦官集团甚至还利用皇诏欺蒙了张奂、段颎作为政治助力与清流名士们对抗。“凉州三明”是随波逐流的，是被动应付的，还不能自觉地成为左右政局的主导者。他们虽然背靠实力强大的西凉武人集团，却从未有过恃强而骄之态，更谈不上借用身后的西凉武人集团为自己谋权夺利了。

他们是西凉武人集团当中最为可敬的第一代首领。

“凉州三明”谢幕之后，他们在西凉武人集团中留下的权力真空很快就被董卓、皇甫嵩等后起之秀填补了。而这些后起之秀们的政治取向，就未必如老一辈首领那般“食古不化”了。

他们将带着西凉武人集团趾高气扬地迈入历史舞台的中心，“求变、求新、求进”，更上一层楼，再闯一片天！

“关陇双高”时期的巅峰阶段

东汉王朝临近末世之时，确实是多灾多难：好不容易刚刚平定了西凉羌乱，声势浩大的“黄巾之乱”又爆发了。随着这场席卷半个中原的大动乱，西凉武人集团在第二代核心人物皇甫嵩、董卓的带领下，登上了比从前更为广阔的时代大舞台，将其巨大的影响力从边疆之域投放到了王朝腹地。

皇甫嵩是皇甫规的侄儿，是皇甫一系西凉势力的天然接班人。董卓则是张奂一手栽培出来的，是张奂一系西凉势力的实际继承者。《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记载：“并州刺史段颎荐（董）卓公府，司徒袁隗辟为掾。”说明董卓与段颎一脉亦是渊源颇深。

他俩能谋善战，都是西凉武人集团新一代的掌舵者。皇甫嵩的名字“嵩”里具有“高”之寓意，而董卓的名字“卓”字也具有“高”之寓意。皇甫嵩的家乡凉州安定郡和董卓的家乡凉州陇西郡之间只隔着一个天水郡的距离。所以，笔者称他俩为“关陇双高”。但他俩在政治取向上却是完全不同的，也代表着西凉武人集团里的两股分流，各自有其命运和轨迹。

“黄巾之乱”骤起，《后汉书·皇甫嵩列传》里记载：

（灵帝）召群臣会议。（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灵）帝从之。

一向刚愎自用的汉灵帝竟能听取皇甫嵩的建议，恐怕是出于借重皇甫嵩身后的西凉武人集团之势力以平贼定乱而不得不赏他“金面”的。这一事件，代表了西凉武人集团已有改写朝廷“话语权”的重大实力。

在后面平定“黄巾之乱”中，皇甫嵩和董卓各显身手，各立其功，各扬其名。他俩麾下的西凉武士精于骑射、长于戈矛，骁猛出众，哪里是少经沙场的黄巾军等所能硬抗的？汉廷主要就是凭借西凉武人集团和中原应募义军这两股力量而最终荡平黄巾乱军的。在此之中，皇甫嵩以其兵谋之长，甚至获得了比董卓更大的战功。是他用计攻破了“黄巾军”首领张梁、张宝，“首获十余万人，筑京观于城南”。他的功勋名望，达到了当世诸将之巅峰。

可以说，在具体的军事才能上，“关陇双高”之中的皇甫嵩确是远远超过了董卓。然而，在政治野心、招揽人心等其他方面，董卓就远远胜过了皇甫嵩。从后面二人各自的人生历程可以看出，皇甫嵩始终只是良将之材，而董卓则是真正的雄霸之器。

黄巾之乱扫平之后，皇甫嵩、董卓和他俩身后的西凉武人集团从此为天下士民所瞩目，堪称一股几乎可以左右朝局的强大势力。

第一个预判出西凉武人集团之重大价值的，是西凉首席谋士阎忠。虽然他仅居县令之卑职，但目光之远大、谋略之宏伟，在当时全天下的名士能臣之中也是鲜有人及的。他径自找到皇甫嵩，毛遂自荐，游说他“建非常之功，移神器于己家”。《后汉书·皇甫嵩列传》对这一幕做了

精彩描述。

（皇甫）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故信都令汉阳阎忠干说嵩曰：“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不旋踵者，几也。故圣人顺时以动，智者因几以发。今将军遭难得之运，蹈易骇之机，而践运不抚，临机不发，将何以保大名乎？”

嵩曰：“何谓也？”

忠曰：“天道无亲，百姓与能。今将军受钺于暮春，收功于末冬。兵动若神，谋不再计，摧强易于折枯，消坚甚于汤雪，旬月之间，神兵电埽，封尸刻石，南向以报，威德震本朝，风声驰海外，虽汤武之举，未有高将军者也。今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

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

忠曰：“不然。昔韩信不忍一餐之遇，而弃三分之业，利剑已揣其喉，方发悔毒之叹者，机失而谋乖也。今主上势弱于刘、项，将军权重于淮阴，指麾足以振风云，叱咤可以兴雷电。崇恩以绥先附，振武以临后服，征冀方之士，动七州之众，羽檄先驰于前，大军响振于后，蹈流漳河，饮马孟津，诛阉官之罪，除群凶之积，虽僮儿可使奋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厉熊罴之卒，因迅风之势哉！功业已就，天下已顺，然后请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齐六合，南面称制，移宝器于将兴，推亡汉于已坠，实神机之至会，风发之良时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难佐。若欲辅难佐之朝，雕朽败之木，是犹逆坂走丸，迎风纵棹，岂云易哉？且今竖宦群居，同恶如市，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

嵩惧曰：“非常之谋，不施于有常之势。创图大功，岂庸才所致。黄巾细孽，敌非秦、项，新结易散，难以济业。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不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论，所不敢闻。”忠知计不用，因亡去。

皇甫嵩深受其叔父皇甫规的影响，个性行事偏重于清流名士之风，

而少有刚猛雄劲之气，不贪权势，“不居不伐”，所以他不可能听从阎忠之谋而坐拥西凉武人集团犯上作乱。礼法和名教，成为他内心深处的“雷池”。

阎忠的进言，其实也不是孤立的。他代表了西凉武人集团里正在膨胀的一股恃强而骄、敢为大事的激进派势力。但这股势力要想“行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还需要另觅他人为“操盘手”。

当时，洞察出西凉武人集团所潜藏之巨大实力的，并非阎忠一人。

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羌人北宫伯玉、边章、韩遂等在三辅一带兴兵作乱。朝廷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假节，率破虏将军董卓、荡寇将军周慎，共诸郡兵马十余万前去征讨。

张温临行之前，其友人张玄前来游说，也劝张温挟董卓及西凉武人集团而“行非常之事”。《后汉书·张玄列传》里这样写道：

（张）玄自田庐被褐带索，要说（张）温曰：“天下寇贼云起，岂不以黄门常侍无道故乎？闻中贵人、公卿以下当出祖道于平乐观，明公总天下威重，握六师之要，若于中坐酒酣，鸣金鼓，整行阵，召军正执有罪者诛之，引兵还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悬，报海内之怨毒，然后显用隐逸忠正之士，则边章之徒宛转股掌之上矣。”

温闻大震，不能对，良久谓玄曰：“处虚，非不悦子之言，顾吾不能行，如何！”

玄乃叹曰：“事行则为福，不行则为贼。今与公长辞矣。”即仰药欲饮之。

温前执其手曰：“子忠于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为当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谁今知之！”玄遂去，隐居鲁阳山中。

张温的拒绝是有道理的，他出身于关东南阳人氏，仅以一纸诏书而任董卓及西凉军团之主帅，怎么可能将他们收为己用？西凉武人集团已有“私家军”的征兆，任何外来将帅都未必驾驭得了。

不过，连身在蜀郡的名士张玄都看出了西凉武人集团“奇货可居”，

那些朝廷的中枢之臣显然也会逐渐反应过来，对这样一股强大势力不得不妥为制衡。

汉灵帝在末年时，就对西凉武人集团深以为虑。如果西凉武人集团掌握在皇甫嵩这样的忠臣良将手里还好说，万一他们被别有用心之人操纵了呢？

他的忧虑不是凭空而来的。西凉武人集团现阶段确实落到了“别有用心之人”的手里，而这个“别有用心之人”正是董卓。

董卓在协助张温平定边章、韩遂之乱时，于用兵方略上自作主张、我行我素，对主将张温颇有不恭。而张温是代表洛阳朝廷来统领西凉武人集团的。董卓不把他放在眼里，就等于是把朝廷也不放在眼里了。所以，汉灵帝和东汉朝廷不得不对董卓暗生疑忌。

当然，我们从后边的史实来看，董卓其实是和时任大将军的国舅何进、太傅袁隗叔侄等在同一阵营的。何进、袁绍还召他带兵进京就铲除宦官一事向何太后施压。那么，与他敌对的，自然是以张让、段圭为首的宦官集团势力。于是，宦官们想通过汉灵帝之手把董卓和他的西凉武人集团抽离出来，亦是符合历史之逻辑的。故而，在那样的时势下，只有宦官集团是支持汉灵帝对付董卓的主要力量。但也正是宦官集团，他们缺乏足够的军事实力，又怎能硬斗得过董卓和西凉武人集团？

果然，朝廷颁下一道圣旨，要调董卓入京担任少府卿。少府卿专管钱粮财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对普通官僚的吸引力亦是非常之大。然而，董卓却硬是一口拒绝了。他上书答复时明面上的理由是“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辄将顺安慰”（摘自《后汉书·董卓列传》）。但这些言语背后深层次的寓意是：西凉武人集团离不开他，如果他被强行调走，西凉武人集团便会生事作乱，其后果朝廷务必三思。当然，他这个理由也是有前例可据的。当年段颎就是有几次突然遭到临阵调换，而致部下的“湟中义从”叛而生乱。

他这暗含威胁的答复，显然激怒了汉灵帝和朝廷中的反董人士。汉灵帝再次亲笔写下玺书，强征董卓调防并州的同时，使出了一招“撤手

锏”：由同为凉州籍的皇甫嵩来接收董卓旗下的西凉武人集团！你不是担心你调离后西凉武夫们会生事作乱吗？好，朕“以凉制凉”，用皇甫嵩这样不亚于你的“西州豪杰”，应该能够镇得住那些西凉武夫了吧？

纵观汉末历史，可以说只有汉灵帝这一次的玺书算是真正抓住了制服西凉武人集团的关键。只有皇甫嵩的威望才能与董卓旗鼓相当，所以只有他才是制衡董卓的最佳人选。换了谁去，几乎都很难。如果这道玺书能够彻底贯彻下去，西凉武人集团就根本不会得到威胁皇权、扰乱中原的机会。

可惜，那个时候的汉灵帝已是风烛残年，朝中也正面临着外戚、世族和宦官三方势力的决战时刻，“山雨欲来风满楼”，朝廷对地方实力派的约束力大不如前。而没有武力作为后盾的诏书，几乎就等同于一张废纸。加之董卓从自己布设在洛阳的“内线”（他的胞弟董旻此时在禁军中担任奉车都尉之职）那里肯定也清楚地知道了京中形势，所以他再一次抗旨不从，拒绝将自己部下的西凉人马转交给皇甫嵩，反而强调自己到哪里也离不开西凉人马，要带着他们一起到并州上任。

董卓这一次和朝廷“摊牌”式的举动，本已大大违犯了律法，身为此次事件的第三位当事方皇甫嵩竟未主动响应玺书而不追逼董卓，这是很令人费解的。笔者认为，皇甫嵩应该没能等来汉灵帝的下一道诏命，可能那个时候汉灵帝已经死了。而新执政的大将军何进、太傅袁隗叔侄又与董卓关系不错，不会追究董卓的责任，所以皇甫嵩又一次失去了全面掌控西凉武人集团的机会。他的错失良机，其实便等同于东汉王朝的错失良机。

此时此刻的董卓，亦未必有阎忠所游说的那样“行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之野心，但他和一切唯皇命是从的皇甫嵩不同，他一直坚持要将西凉武人集团这样的“国之利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退则可自保雍凉，进则可逐鹿中原。他也预料到：在朝廷中枢外戚、世族和宦官三股势力的激烈交战之中，他和他背后的西凉武人集团可谓举足轻重，左投则左胜，右投则右胜。甚至，他还更想进一步：坐收渔翁之利，独揽天下大权。于是，他在赴任并州牧时，带了五千亲兵同行，走走停停，“忽驻河东，以观其变”。

他的这些想法和做法，确实是“忠而近乎愚”的皇甫嵩从来也不敢有的。董卓始终不甘成为别人的附庸，他要凭借西凉武人集团的势力开创一番大事业。

后来东汉政局的发展完全如他所料，何进把张让、段圭等宦官逼得太紧，宦官们不甘束手就擒，反将何进诱杀。袁绍、袁术等人以替何进复仇为名，“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张让、段圭等挟少帝刘辩、陈留王刘协逃出宫外，被卢植、闵贡追杀而亡。就在这时，董卓率三千兵马伺机而动，乘夜在半途截住少帝、陈留王，趁外戚、世族与宦官斗得两败俱伤之际，他一举夺取了何进兄弟所领的部曲，又收买吕布杀掉了执金吾丁原而吞并其部众，手法干净利落，反客为主，成了洛阳城中兵权最大的强者。

袁隗、袁绍、袁术、杨彪、王允等名士大夫虽然心有不甘，但董卓身后的西凉劲旅陆续开进京城，他们被压制得死死的，一时也发作不得。

董卓在西凉武人集团的强力支持下，大刀阔斧地施行新政：一是废帝立新；二是肃清外戚、宦官两大派系的残余势力；三是彻底废除党锢之令，对“幽滞之士”多所显拔，颍川鸿儒荀爽便是被他征召入朝而位列三公的；四是以礼法为本，以严刑重典治国理政。同时，董卓亦借此由太尉、相国而至太师，权倾朝野，不可一世。而当年与他同出凉州的皇甫嵩从此亦是屈居于下，对他折腰称服。

他的位高权重、他的威震四方，象征西凉武人集团终于从地方性割据势力跃升为全天下权力最大的当政集团。

然而，西凉武人集团固然兵强马壮，但在文治内政上却并不擅长。饶是董卓大权在握，也不得不与名门世族集团共治天下，将政事权力、人事权力与他们共享。

名门世族集团借机在关东绸缪布局，让袁绍出任渤海太守、韩馥出任冀州刺史、刘岱出任兖州刺史、孔伷出任豫州刺史等，各兴义兵，组成讨董联军，反戈一击。

董卓只得见招拆招，先杀了汝南袁氏一族的首领人物、袁绍的叔父

袁隗以震慑天下，然后调遣徐荣、李傕、吕布等部下大将东进而敌之。《资治通鉴》里记载名士郑泰评论董卓、西凉武人集团：“关西顷遭羌寇，妇女皆能挟弓而斗；天下所畏者，无若并、凉之人与羌胡义从，而明公（指董卓）拥之以为爪牙，譬犹驱虎兕以赴犬羊、鼓烈风以扫枯叶，谁敢御之？”果然，关东联军与西凉武人集团交战之下，败多胜少，连袁绍都起了作壁上观之念。若非孙坚、曹操之拼死力战，关东联军说不定早被西凉武人集团打散了。

后来，董卓见战局陷入胶着，自以为关中、陇西、凉州等地才是自己的发迹之处，是西凉武人集团的根本之地，便力排众议，迁都长安，以待后图。

到了长安之后，他以女婿牛辅屯安邑，以东中郎将董越屯渑池，以中郎将段煨屯华阴，李傕、郭汜、张济等将领布防各县要塞，封住了关东联军的西进之路。董卓终于感到自己安全了。

其实，这个时候的董卓还是一直想与名门世族集团好好合作，共治天下的。他对王允、蔡邕、杨彪、荀爽、郑泰等名士极尽笼络优容之能事。为了防止名门世族集团滋生嫌隙，董卓甚至只是把西凉武人集团内的中层人员全部安插到将校之职上，一个也没有出任公卿之位。即使是被西凉著名谋士阎忠盛赞为“（张）良、（陈）平之奇”的贾诩，亦仅被董卓封为讨虏校尉，留在牛辅身边辅佐他。

笔者在此设想：倘若董卓能够不拘一格将贾诩提升为自己的长史在身边出谋划策，他后来还会陷入王允、吕布联手布下的“内应连环计”而遇刺身亡吗？可惜，历史没有假设。董卓和他的西凉武人集团虽然称霸一时，却不能成为未来历史大舞台上的主角。那个主角，是属于目前方兴未艾、蓬勃而起的名门世族集团的。

一般而言，攀到巅峰之后，面临的便是急转直下的悬崖峭壁。董卓在长安城尚立足未稳，刚刚劝降了马腾和韩遂，正准备着谋划突击关东联军，就死在了吕布猝然刺来的那一记长戟之下！

西凉武人集团骤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主帅暴毙，群龙无首，近三十万西凉儿郎顿感昏天黑地，他们究竟是战是降、何去何从，

一切都很茫然。

“乱国三凶”时期的衰亡阶段

东汉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朝中拥汉派的首领王允联合吕布刺死了一直压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权相”董卓，终于直起腰杆来扬眉吐气了。

在王允的想象中，俗话说得好：“蛇无头不行。”董卓一死，以前令人生畏的西凉武人集团从此就会分崩离析，直至烟消云散。《后汉书》里写他：“（董）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

这种极度轻敌的错误思想，使王允代表东汉朝廷在善后事宜的处置上显得忽左忽右、杂乱无章。

其间，还是有明智之士向王允指出：“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东。今若一旦解兵，则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义真（指皇甫嵩）为将军，就领其众，因使留陕以安抚之，而徐与关东通谋，以观其变。”

董卓的强大，不是在他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有多么卓越非凡，而在于他身后的西凉武人集团实力强大。在此时此刻之下，西凉武人集团这头“巨兽”，或许也只有与董卓并列“关陇双高”的皇甫嵩镇压得住。

然而，器宇偏狭的王允可能是害怕皇甫嵩在收服西凉武人集团之后而不可制衡，又或是不相信皇甫嵩的赤胆忠心，竟然拒绝让皇甫嵩出任西凉武人集团的主帅。

这时，因董卓身亡，西凉武人集团根据政治取向的不同也分裂成了两派：一是董承、段煨、徐荣等人为首的拥汉派。其中董承的女儿进宫成了汉献帝的贵人，而杨彪、赵温等名士曾经公开保奏：“段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摘自《资治通鉴》）董、段、徐等人在董卓死后归降了汉室，并保持了对汉室应有的礼敬。二是以牛辅、李傕、郭汜、张济等人为首的独立派，他们暂时既不降汉，也不反汉，而是在观察东汉小朝廷对他们的态度来决定行止。

假如这时王允能够尽快拿出“首恶既除，协从不问”的态度来安抚西

凉武人集团中的独立派成员，也许还能稳住大局。但他在颁发这道“特赦令”时，却拖拖拉拉、含含糊糊、摇摇摆摆，反而造成“朝廷欲尽诛凉州人氐”这一政治谣言似雪球般越滚越大，弄得西凉武人集团骨干成员们人人自危。

自董卓的女婿牛辅遭人刺杀之后，他麾下的李傕、郭汜、张济等西凉猛将当时都已惶惶无主，准备各自解散而逃归乡里。不料，这时，西凉武人集团当中唯一的“（张）良、（陈）平之奇”贾诩却越众而出，慨然劝言道：

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摘自《三国志》）

李傕、郭汜、张济等三人闻言称善，从而行之，以替董卓报仇为名，一路杀回长安。王允派来了徐荣、胡轸等在半途截击，双方一战之下，徐荣兵败身死，而胡轸则投降了李傕等人。

收编胡轸之后，李傕、郭汜、张济等继续挥戈西进，从此再无阻力。他们沿途收纳西凉残部，待得逼近长安城之下时，已然拥众十余万。

名门世族集团当时唯一依靠的就只有吕布和他旗下的并州军。经过十日左右的拉锯战，吕布终究没能守住长安城—李傕、郭汜、张济等破关而入，纵兵屠城，“略长安老少，杀之悉尽，死者狼籍”（摘自《三国志》）。吕布仓皇东逃，而王允也被李傕等人逼而杀之。东汉小朝廷再次落入西凉武人集团的掌控之中。素负盛名的皇甫嵩被李傕等人送了一顶“太尉”的虚衔后便不可逆转地淡出了政坛。李傕、郭汜、张济等人开始崭露头角。

李傕自封为车骑将军、池阳侯，领司隶校尉、假节；郭汜自封为后将军、美阳侯。他二人留在长安专擅朝政。而张济自封为骠骑将军、平阳侯，外出屯兵于京郊的弘农郡，震慑外敌。笔者认为他们三人就是西凉武人集团的第三代首领人物，与“凉州三明”“关陇双高”相对应，可以称为“乱国三凶”。他们之所以被冠以“凶”名，是因为他们三人在掌权成

功后于国于民毫无建设性的举措，只有破坏性的暴行。

这三人对名门世族集团是又恨又惧：他们因董卓遇刺事件而不敢再亲近名门世族集团，代之而为的是严防密备；但西凉武人集团中长于文治庶务的得力人士又太少太少，故他们不得不对名门世族集团加以利用和驱使。而要驱使他们，李傕、郭汜只能依靠武力为后盾。控制皇权，成为他们的第一要务。至于安民理国等文治庶务，几乎全被“乱国三凶”漠然置之。

汉献帝幸得有董承居中调护，加之贾诩在幕后的暗助，他终于保住了天子之位。而李傕、郭汜也没有董卓那样的魄力再来一次“废帝立新”。况且，他们也不敢废了汉献帝这位在西凉武人集团扶持下御极登基的天子来自毁长安小朝廷的合法性与正统性。于是，汉室和西凉武人集团暂时恢复了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关系。

西凉武人集团核心层这种“三头之鹰”的掌权模式注定是长久不了的。他们在对外无力扩张的情况下，把破坏性蔓延到了内部：李傕、郭汜二人很快陷入了“窝里斗”。导火索是李傕点燃的：他认为董卓先前的部曲头领樊稠和郭汜结成了同党来排挤自己，便先行下手除掉了樊稠。郭汜也不甘雌伏，奋力还击。在混战中，李傕劫走了汉献帝，并把各官署的公物全部扣留。而郭汜则扣押了多位公卿为人质，让李傕那边成了“空壳朝廷”。双方连斗数月，死者万数。这一场乱战，连素有“当世张良、陈平”之誉的贾诩也无法从中化解，唯有徒叹奈何。

后来，在黄巾军余部“白波军”首领杨奉、韩暹的外力介入下，汉献帝带领公卿大夫们东奔洛阳以求安。太尉杨彪、黄门侍郎钟繇、将军董承等护送以从。

在这乱局之中，钟繇和曹操首席谋士、同出颍川系世族的荀彧暗通声气，再经名门世族集团达成共识，决定由关东那位自领兖州牧的庶族首领曹操为汉室东迁的“接盘侠”。钟繇顺势劝说汉献帝授予曹操“建德将军”之职位而留为后图。曹操亦立即响应，亲率劲旅赴洛阳迎接汉献帝。

汉献帝和残余的汉室公卿们费尽周折，终于逃出李傕、郭汜、张济等人的掌握，安全抵达了洛阳。在那里，曹操、荀彧等人早已恭候。他

们的兵力当时在群雄林立的关东诸侯内只能算是中等而已，却代表着一股生机勃勃的新兴势力取代了西凉武人集团而开始实施真正的“挟天子以定四海”之大略。

曹操先是赶走了杨奉、韩暹，将东汉小朝廷从四面受敌的洛阳迁到了自己掌控下的许县，改元为“建安”，然后以谒者仆射裴茂率西凉军中的拥汉派段煨等征讨李傕、郭汜等乱汉派。其间，郭汜被部将伍习刺死于郿县，余众为李傕所吞并。张济因缺粮而外出抄掠，在南阳穰城为刘表部卒所杀。而没过多久，李傕也被裴茂、段煨等所破，死于战中，三族俱夷，传首许都，被汉献帝下令在城头悬示十日。

至此，西凉武人集团中的乱汉派势力彻底覆灭，再无余徒。

不过，西凉武人集团内剩余下来的拥汉派也未能久存。段煨很快被曹操解除兵权，以大鸿胪、光禄大夫等虚职而闲置之，于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寿终正寝。董承则在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欲奉“衣带诏”而狙杀曹操，谋泄被斩，其女董贵人亦随之身死，汉献帝不能有救。

西凉武人集团还有最后一人彻底投靠了曹操，并以其足智多谋而被曹操倚为智囊，他就是贾诩。贾诩是西凉武人集团诸雄之中结局最好的：他一直做到了曹魏帝国的太尉之职，位冠百僚，并受封为寿乡侯，享寿七十七岁，在他的第一位主君董卓死后于世间又活了三十一年。

这三十一年里，他看尽了被西凉武人集团搞乱的汉末时局如何在曹操、荀彧、刘备、诸葛亮、孙权等人手中拨乱反正，渐趋澄定，并进入三国争霸之新时代的。而这一切，都是当年董卓他们雄赳赳地第一次闯进洛阳城大张旗鼓之时完全始料而未及的。

第三章 王允不“允”：志大才疏的救时宰相

董卓的猝然陨落，是完全出乎天下士民之预料的。他坐拥二十万西凉劲卒，麾下又有徐荣、李傕、张济等一大堆猛将，关东十余路诸侯组成的联军也难以匹敌。

然而，一夕之间，他便被吕布一戟刺于车下，成了汉末政坛上最大的一颗“流星”！

促成这一事件发生的“幕后推手”，正是当朝司徒兼尚书令王允。王允出身并州豪门，“世仕州郡为冠盖”，又得名士郭林宗之“王佐才”的佳评，是汉末杰出的名士大夫。

他本是汉末朝中名门世族集团的政治代言人，在少帝刘辩期间，他和袁绍、袁术联手，以河南尹之权调遣部尉闵贡逼死了张让、铲除了宦党。那时的王允，意气风发，杀伐果断，确然显出王佐之逸才。

后来董卓入京掌权，王允自是不甘屈居于这边将枭雄之下，但己方又力不如人，只得“矫情屈意”，表面上伪奉董卓为尊，暗伺其隙而图之。在这韬光养晦的“演技”方面，后世的著名“影帝”司马懿也要以他为楷模。他在董卓面前表现得太恭顺太诚敬，“每相承附”，唯唯诺诺，令雄猜成性的董卓也“不生乖疑”，将“朝政大小，悉委之于（王）允”。如此的深谋潜伏之术，司马懿之流亦当引为比肩。

其实，隐忍伺机而暗杀董卓，此前曾有许多名士精英做过：曹操以献刀之名刺杀过，失败了；郑泰和荀攸也暗中绸缪过，被发觉了，终无所成，甚至何颙还被董卓系狱忧惧而死！董卓为人“粗猛”而又“有谋”，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最后，这桩震天动地的大事，只有王允做成了：他施展连环计，潜结董卓的心腹大将吕布为内应，终于乘董卓不备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杀了他。大汉的至高权柄，终于又从边将枭雄那里回到了以王允为首的名门世族集团手中。

这一经典案例，在数十年后被吴国的孙峻完全复制了过来。那一

年，孙峻在少帝孙亮的支持下，以顾命次辅佐大臣的身份，刺杀了顾命首辅大臣诸葛恪，然后紧紧抓住军权，从而稳固了自己的权位，镇住了吴国的政局。他的“暗杀式斩首行动”算是完全成功，并取得了长远实效的。

返而观之，当年王允对董卓的这一场暗杀呢？王允暗杀董卓成功之后的状况又如何了呢？

王允在对董卓一击得手之后，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再有当初的精明缜密了。《后汉书》是这样描写他的：

（董）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

他若真正具有救时匡难之才，就应该明白杀死董卓仅仅是拨乱反正、重塑汉室皇权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几件大事要做到位，才能使汉室真正转危为安：一是安抚住“群龙无首”的西凉武人集团，令其无株连之忧，同时将它纳入汉室的直属部队；二是以归附汉室的西凉武人集团为依托，震慑关东各路军阀，消除袁绍、袁术等人的不逞之志，还天下一个安宁；三是重塑东汉政局的势力平衡，以名门世族集团为主体来捍卫汉室。

而实际上，王允在第一招应对上就搞砸了。要安抚住“群龙无首”的西凉武人集团，他切实而具体的方法只能是与皇甫嵩、徐荣、董承、段煨等西凉武人集团中的“拥汉派”精诚合作、共赴时艰。可惜，他对凉州人氏的极端疏离心理，使他拒绝做出这一关键性的布置措施，对董卓的余党“不赦不理、不抚不问”，任由西凉武人集团在人人自危的状态中走向激烈的对抗和“反噬”。从这一点上讲，王允的政治成熟度实在远远不及后世崛起的司马懿。司马懿以狙击突袭的手段除掉了曹爽兄弟，却能及时对曹爽集团的中下级成员示以宽宏大度，重用鲁芝、杨综等骨干分子以安定其余曹氏部曲之异心，于是把一场惊天动地的政变做得是无风无波而又毫无后患，确实要比王允高明得太多了。

由此可见，王允虽取名为“允”，但施政行事哪有“平允”之衡准、“公允”之器量？谚语有“爱屋及乌”之说，他反过来却是“恨乌及屋”，不分青

红皂白，连皇甫嵩这样的耿耿忠臣，只因出身凉州也被他闲置不用！他这一偏狭孤陋之举，可谓误人误国、遗祸无穷！

从此，乱兵四起、烽火熊熊，王允刺杀董卓后换来的短暂和平局面，也就化为了“昙花一现”。

同时，滥杀名士蔡邕，更是坐实了他“偏狭孤陋”的病根。南朝人士殷芸在《小说》里写道：

初，司徒王允数与蔡邕会议，允词常屈，由是衔邕。及允诛董卓，并收邕，众人争之，不能得。

蔡邕，一介文士而已，就有董卓私遇之叹，况已知罪求饶，贬之即可，何足挂齿？也许，王允诛杀蔡邕，是向天下士民公开示威：你看，连董卓都不敢招惹的名士鸿儒，我王允都敢一刀砍下！今后朝中，谁不服我？

但他终是大大的失策了：后世的曹操杀孔融以立威，反而使自己失去了包括颍川荀氏在内的不少名门世族之支持；司马昭杀嵇康以树权，更是给自己“乐善好士”的金字招牌抹了个污黑！更何况此时此刻的王允手中权柄之集中和强大，尚还远远不如曹操、司马昭？！他滥杀蔡邕，只能引起同僚们的侧目而视与割席断袍。

当时，太尉马日磾向王允求救蔡邕而不得，退而叹曰：

王公其无后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

他一语成谶，不到两个月，王允便身死于西凉乱兵之手。

著名史学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曾言：

（王允）智尽于密谋，而量不足以包英雄而驯扰之，加以骄逸，而忘无穷之隐祸，其周章失纪而死于逆臣，不能免矣。

这段犀利之语，堪称王允毕生作为之定评。

第四章 汝南袁氏：“化家为国”的野望

据闻天下各地之袁氏宗祠的堂联上，通常都镌刻着这样八个字：“卧雪清操，扬风惠政”。可见，千百年来，袁姓一族对他们的先祖、东汉名相袁安当年“节高卧雪对梅花”的高尚事迹一直是心驰神往、奉为圭臬的，甚至还将这一事迹融入了整个宗族代代相传的佳话之中。

在真实的历史上，袁安留下的可不仅仅是“卧雪清操”的美誉，他以德行而举孝廉、以风骨而立朝堂，开创了东汉一朝“四世公辅”之大族—汝南郡袁氏，终至成为中原名门世族集团的“执牛耳者”。他和他的子孙们曾经显赫之极，甚至距离龙床御座也仅有一步之遥。可惜，在群雄竞起的三国时期，汝南袁氏这艘百年巨船到底还是搁浅了，没能顺应时代的潮流而成功“晋级”，并就此衰亡下去。

更多好书分享关注公众号：sanqiujun

但不可置疑的是：汝南袁氏曾经是中原名门世族集团上升期的开拓者和先驱者，他们领头铲除了中原名门世族集团的大敌—宦官集团，为沛郡曹氏、颍川荀氏、江东孙氏等后起之秀逐鹿天下而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只可惜，袁氏宗族人才储备终究不够全面而完善，既无曹操一流的能征善战之辈，又无司马懿一流的文武双全之士，始终没能成为中原名门世族集团的主导者和集大成者。

即使如此，笔者认为：探溯东汉汝南袁氏直至前三国时期百余年的潮起潮落之历程，于后世依然不乏借为龟鉴之意义。

袁安时期之固本培基

《后汉书》记载，汝南袁氏一族在两汉时期是以学术传家为政的。其先祖袁良精习《孟氏易》之学，深通易理之术，于西汉平帝时官居太子舍人，又于东汉光武帝时出任成武县令。这是正史里对袁良的简介。

在宋代欧阳修编撰整理的《集古录》中，有一篇名为《汉故国三老袁君碑》的碑文拓本，因其碑主为袁良，所以又称为《袁良碑文》，应该是袁氏后人为袁良所立的。在这篇碑文中写道：袁良后来还做到了将

作大匠、广陵郡太守等二千石官秩的职位，并曾因讨平清水贼张路等而威震徐州。由此可见，正是袁良此人，为其后世子孙奠定了名门世族的坚实起点。

他的孙子袁安自幼家学深厚，个性为“严重有威，见敬于乡里”。他“节高卧雪对梅花”之故事来源于《后汉书》所注引的《汝南先贤传》。

时大雪，积地丈余。洛阳令身出案行，见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门，无有行路。谓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见安僵卧。问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令以为贤，举为孝廉。

袁安因孝廉出任阴平县长、任城县令，直至做到楚郡太守一职。在楚郡太守一职上，他做了一件“大有阴德”的好事，为世人所称道。华峤《汉后书》记载：

（袁安）明帝时为楚郡太守，治楚王狱，所申理者四百余家，皆蒙全济，（袁）安遂为名臣。

袁安能抗上明法、以宽雪冤，确实是铁骨铮铮。汉明帝嘉其风骨，提拔他为河南尹。

抚理京师之际，袁安表现卓异，甚有宽和得众之誉。《后汉书·袁安列传》记载：

（袁安）政号严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常称曰：“凡学仕者，高则望宰相，下则希牧守。锢人于圣世，尹所不忍为也。”闻之者皆感激自励。在职十年，京师肃然，名重朝廷。

显然，汉明帝、汉章帝两代明君对袁安可谓深为器重。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袁安升为司空；一年之后，袁安再进为司徒，终于做到了位极人臣。

当了司徒之后的袁安，其立身行事之风渐有改变。《资治通鉴》记载：

壬戌，诏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是时，京师四方屡有嘉瑞，前后

数百千，言事者咸以为美。而太尉掾平陵何敞独恶之，谓宋由、袁安曰："夫瑞应依德而至，灾异缘政而生。今异乌翔于殿屋，怪草生于庭际，不可不察！"由、安惧不敢答。

此时的袁安，已然拥有了两张可以改换自如的政治面孔：临民治下之时，他显有"清直"之容；奉上奏对之际，他又是"圆融"之貌。以"清直"而收名誉，以"圆融"而保权位，成了袁安立足政争的惯用方略，并为他的后人所继承。

汉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以车骑将军窦宪为首的窦氏外戚集团日渐坐大。窦宪为谋夺大权，意图远征匈奴而立威天下。这时，袁安和其他三公、九卿一道上奏反对他。

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摘自《后汉书·袁安列传》）

袁安此刻是站在汉室皇权这一边的，对膨胀异化的外戚势力予以制衡。

依附皇权、抗击外戚是袁安在三公位上所作所为的政治主旋律。《后汉书·袁安列传》写道：

（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权，每朝会进见，及与公卿言国家事，未尝不噫呜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赖之。

他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他通过这些维护皇权的举动，赢得了朝廷从上到下的一片美誉，既积攒了人脉、人气，又积累了政治资本。果然，他去世之后，汉和帝亲政掌权，一举肃清窦氏外戚集团，同时追念他的功劳，将他的儿子袁赏征召为郎官。

袁安的一生，德才兼备，进退自如，为汝南袁氏夯实了雄厚根基。而他的后代，继承着他的政治资本和人脉背景，与时俱进，将会大有所为。

袁京、袁敞时期之"清浊分流"

袁安死后，其后嗣中成就最大的是袁京、袁敞二子。

袁京对家传的孟喜系易学十分精通，亲做解释文章达三十万字。他由侍中之官而出任蜀郡太守，后又效仿严子陵养志自高。明初大儒方孝孺就写过一篇《高士袁京赞》的诗：

紧袁之山，富春并峻；紧袁之水，严滩比清；严袁两公，东汉齐名。

袁京虽然在官位上不及其父袁安，但他的家教却十分到位：长子袁彭享光禄勋之高位而清廉自持，“粗袍粝食”。次子袁汤“少传家学，诸儒称其节”，多历显位。他俩在东汉政界和光同尘，并无过激之行立身。

而袁敞一脉就不同了。袁敞“廉劲不阿权贵”，贵为汉安帝时的司空。他和他的父亲袁安一样以汉室皇权维护者而自命，极力反对邓氏外戚集团专权，最终被迫自杀。

他的儿子袁盱以袁敞为楷模：

时大将军梁冀擅朝，内外莫不阿附，惟（袁）盱与廷尉邯郸义正身自守。（摘自《后汉书·袁敞传》）

不过，袁敞被邓太后外戚集团迫害致死，给了汝南袁氏一族极大的震动。他的侄儿袁汤便于晚年之际走上了一条与其父祖两辈完全不同的从政之路。汝南袁氏这一代自他领头而起，不再以皇权为唯一之依恃，也不再固守“忠君廉政”之空名，而争取在外戚集团、宦官集团之间“多方下注、左右逢迎”。

袁汤父子时期之绸缪布局

袁汤在汉桓帝继嗣即位之际可谓骤升而起。《后汉书·袁汤传》记载：

（袁汤）桓帝初为司空，以豫议定策封安国亭侯，食邑五百户。累迁司徒、太尉。

他于汉桓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由太仆升为司空，又于汉桓帝建和三年（公元149年）为太尉，直到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退位，整整当了为期八年的三公之官。从史简中溯本探源，袁汤的崛起历

程，其实自有其明确的脉络可寻。

在《资治通鉴》的记载中能够看出，当时幼帝汉质帝暴毙，关于拥立谁为新君的问题，朝中百官分为两派。以大将军梁冀为首的外戚集团倾向于拥立蠡吾侯刘志，太尉李固、司徒胡广等士大夫集团倾向于拥立清河王刘蒜。而袁安当时以太仆之职参与立嗣廷议大会，游移其间，见风使舵，最终投向了梁冀，支持拥立刘志为新君，即为汉桓帝。所以，他随后便升任司空，权重一时。

袁汤在政治投机大获成功而尝到甜头后，决定以当时朝中权势最大的梁氏外戚集团为后台，力保袁氏一族长盛不衰。他的长子袁成在他的指示之下，出任左中郎将，与梁冀打得火热，关系甚密。《后汉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写道：

（袁）成字文开，与梁冀结好，言无不从，京师谚曰："事不谐，问文开。"

而且，袁成身任将校之职，也代表着汝南袁氏对军界势力渐有染指。《资治通鉴》记载，袁汤的次子、袁成的弟弟袁逢在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出任司空之前的最后一个职位亦是禁军序列的屯骑校尉。看来，袁成早卒之后，袁逢继续接替他进入军界任职，是为了袁氏家族在军界始终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而以备万一。

另外，袁汤对另一个儿子袁隗的安排也是煞费苦心。袁隗代表袁氏一族在文官界摸爬滚打，一直在大鸿胪等卿官职位上深耕细作。

然而，袁汤终究老了，年过八旬，虽然位居三公，拥有开府辟召之实权，但他亦只能荫庇儿子们八九年的时间。他退位之后，袁逢、袁隗还能抱着梁氏外戚集团这根"大柱"多久呢？

而且，他们洞察到汉桓帝所代表的皇权迟早会与梁氏外戚集团一决雌雄。梁冀一族专横跋扈、胡作非为、民心尽失，是不可能斗得过汉室皇权的。那么，梁氏外戚集团一旦覆灭之后，汝南袁氏又将以何为靠山呢？

恰在此时，外人中谁也不会料到，袁氏一族在内廷禁省之中内安插

的另一个“暗棋”便开始发挥妙用了。这个“暗棋”就是汉桓帝身边的中常侍、宦官集团的首领之一：袁赦。同时，他的身份也是袁氏宗族中肩负复兴使命的庶子。《后汉书·袁隗传》写得很清楚：

时中常侍袁赦，（袁）隗之宗也，用事于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惟崇以为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它公族同。

汝南袁氏的这一步“暗棋”其实已经突破了东汉士人集团内部的政治底线：宦官集团本是士人集团的公敌，人人得而远之。而袁氏一族竟能与之联成一气内外呼应，也确实是苦心孤诣，令人深为不齿之余又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深谋远虑。

就这样，袁隗、袁逢二人在梁氏外戚集团垮掉之后又攀上了日渐强大的宦官集团之“高枝”，终于化险为夷。在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之秋梁氏外戚集团被一网打尽之时，素与梁家交好的袁隗、袁逢兄弟居然全身而退、毫发无伤，这便是袁赦隐在幕后的暗助之功了。

但是，袁隗、袁逢、袁赦等人企图在汉桓帝一朝独揽大权，则难以实现。在日渐隆盛的士大夫阶层中，朝廷中枢有弘农郡杨氏一族、西凉武将派等势力集团，外方州郡有颍川荀氏、颍川陈氏、太原王氏等新兴清流名门，各个派系势力纵横交错，袁隗、袁逢并不能力压群雄、一枝独秀。而汉桓帝时期宦官集团势力庞大，袁赦只是其中一名“要员”而已，根本没有达到徐璜、左绾、具瑗、唐衡等那些大权阉的地位，也号令不了大多数宦官为己所用。加之汉桓帝亦非昏弱之主，袁隗、袁逢也操纵不了他。

所以，在汉桓帝御政期间，袁隗、袁逢兄弟不断地腾挪运转，仍只是做到了中二千石官秩的九卿之职，没有独立的人事辟召之权，自然难以铺设人脉。他俩的资历也不够担任三公，只能是养望待机。

不过，他俩在养望待机的同时，却并未停止利用内廷袁赦替本族谋取私利。身为宦官集团首脑之一的袁赦，可以“擅操王命，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书出门，高获千金”（摘自《后汉书·董卓列传》），确实是袁隗兄弟在朝中路路亨通、中饱私囊的“王牌”。

说直白一些，他俩可以通过袁赦来卖官牟利，而他俩所充当的就是

袁赦的“政治掮客”之角色。其实在先前，袁氏家族内部是由身为“三公”的袁安、袁汤利用自己的开府辟召之权来卖官牟利的，而现在是换成了由袁赦所握的禁省之权来顺势而为罢了。《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魏书》道：

自（袁）安以下，皆博爱容众，无所拣择；宾客入其门，无贤愚皆得所欲，为天下所归。

这段话其实就非常隐晦地指出了袁氏一族擅长于利用职权卖官鬻爵。试想：这句“无贤愚皆得所欲”，实是大有深意—贤者尚可由袁氏以“任人唯贤”为托词，那愚者“得其所欲”又如何解释呢？归根到底是通过“权钱交易”而达成罢了。原来，汝南袁氏一族的人脉、人气，在历朝历代便是这样维持的。这亦是汝南袁氏所谓“门生故吏遍于天下”的真相。

袁隗、袁逢兄弟始终拥有满满的自信，只要积足了资历和人望之后，他俩像父亲一样身登“三公”只是顺理成章。到了那时候，他俩便可以大展宏图、更上层楼了！

袁隗兄弟于灵帝朝之“翻云覆雨”

汉末建宁元年（公元168年），解渎亭侯刘宏入继大统，登基为汉灵帝。

当时，清流名士集团的首领是太傅陈蕃，外戚集团的首领是窦武。陈蕃和窦武决定联手“清君侧、除阉宦”，把整个宦官集团一扫而尽。

但袁氏一族所有的骨干分子却按兵不动，隐在幕后作壁上观。

陈蕃、窦武行事不密，走漏风声，反为宦官集团所乘，终于一败涂地。宦官集团彻底占据了上风，并掀起第二次“党锢之祸”，追杀张俭、李膺、范滂等清流名士，全国上下共波及七八百家世家名门。

汝南袁氏的首领袁隗、袁逢二人对此安之若素，静默无言。他们背后有袁赦撑腰，是落不到“党锢之网”的黑名单上的。或许，他们还在暗暗庆喜：宦官集团如此扫荡那些清流名士，岂非“为丛驱雀”“为渊驱

鱼”？实际上是在帮助袁家清除政敌和收揽人心！这么多清流名门被削弱以后，我汝南袁氏借机坐大成势，岂非最后的胜利者？

这个时候，袁家第五代新秀人物袁绍、袁术兄弟便冒出头来，在袁隗、袁逢的暗中授意下，去大力救助那些“党锢之士”，替汝南袁氏坐收名利。《后汉书·何颙传》记载：

及陈蕃、李膺之败，（何）颙以与蕃、膺善，遂为宦官所陷，乃变姓名，亡匿汝南间。所至皆亲其豪杰，有声荆豫之域。袁绍慕之，私与往来，结为奔走之友。是时，党事起，天下多离其难，颙常私入洛阳，从绍计议。其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

汝南袁氏此刻仍在“两面下注”，极力在那些“党锢之士”身上实施“长线投资”。而袁隗也终于迎来了自己仕途的高峰期。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之冬，他升任为司徒，执掌天下人事之任免进退。在这个位置上，他完全可以和宦官头目们实现“权权交易”及利益交换，利用司徒府的人事辟召之权替宦官们的卖官鬻爵之行“洗白”并合法化，同时亦为袁氏一族广树朋党。

时间一长，再厚的纸巾也包不住火焰。汉灵帝渐渐意识到袁隗的司徒府在人事选任方面上下其手、大有文章，遂十分疑忌，于五年之后忍无可忍，起用著名的清官廉臣、弘农杨氏的族长杨赐来取代了袁隗的司徒之位。《后汉书·杨震列传》记载：

（汉灵帝熹平）五年，（杨赐）代袁隗为司徒。是时朝廷爵授，多不以次。

这个“是时”指的就是袁隗在司徒之位上的时候。而且，杨赐对以袁隗为代表的司徒府之所作所为在给汉灵帝的密奏中写得更为具体：

而今所序用无它德：有形势者，旬日累迁；守真之徒，历载不转；劳逸无别，善恶同流。

这说明袁隗正是靠着担任宦官集团的政治“黑手套”到处卖官、腐败成风。而他被杨赐取代，也算是汉灵帝对汝南袁氏一个不大不小的打

击。

但仅仅过了一年多，袁隗的哥哥袁逢便在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十月出任司空之职，依然拥有人事辟召之权。这标志着袁氏一族又回到了汉室权力核心圈。而这一切，显然都是他们的宗亲、中常侍袁赦在幕后运作而来的。

不过，好景不长。汝南袁氏很快又一次走到了家族命运大转折的关头：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四月，司隶校尉阳球借着杨赐之子杨彪的举报，对王甫、淳于登、袁赦、朱瑀、刘毅、庞训等一批宦官的贪腐行为进行问罪追究。其中，王甫父子竟被阳球拷问而死。此举大大震动了宦官集团。他们的联手反扑，将阳球以“谋议不轨”之罪陷害身亡。虽然宦官集团终是大获全胜，但袁赦毕竟被阳球奏议所波及，从此退出禁省，淡出政坛。汝南袁氏在内廷最大的政治靠山就此崩塌。他们又一次直面未来将何去何从的核心问题。

然而，袁隗、袁逢、袁绍、袁术等人早就看透宦官集团已成众矢之的，日趋衰弱，他们决定从“党锢之士”集团和外戚集团双管齐下，重新获取政治助力。而袁绍、袁术兄弟当年在“党锢之祸”中的“重义救助”之行也终于可以收取回报了。

四年之后，“黄巾之乱”爆发，汉灵帝畏惧“党锢之士”们与黄巾军合流反汉，不得已公开宣布废除“党锢之禁”，大赦天下党人，并征召他们入伍助汉。那些“党锢之士”终于卷土重来，再次登上历史前台，成为左右汉室历史走向的巨大势力。而汝南袁氏这一次也公然站到了他们中间，拉开大旗招贤聚士，以求独占鳌头、引领风潮。

袁隗、袁绍叔侄时期之“鹰扬虎视”

汉灵帝末年，天下动荡，风云际会，正是历史的大转折关头：中原名门世族集团勃然而兴，激烈地冲击着汉室的权力格局。汝南袁氏凭借“累叶台辅”之资，也想在这一池浑水中大有所为。

然而，袁隗、袁逢兄弟个性阴柔、行事持重，同时却缺乏魄力和锐气。他们只是善于幕后谋划，却难以大刀阔斧地推陈出新。

而这个“继往开来”的家族使命，就落到了袁绍、袁术两兄弟肩上。他俩同为袁逢之子，而其母各异，袁绍又出继给其伯父袁成为嗣。所以，袁绍和袁术的关系又显得十分微妙，既竞争又合作，既联合又疏离。

《后汉书·袁绍列传》记载：

（袁）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軿柴毂，填接街陌。

《后汉书·袁术列传》又写道：

（袁术）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

这说明袁绍、袁术兄弟少年时起便广为交际，呼朋引伴，积累人脉。他俩是汝南袁氏一族培养出来的“屠龙之剑”，锋芒闪耀，只为伺机出动。

也许，袁隗、袁逢兄弟的野心只是依附大权而永保三公。但袁绍、袁术兄弟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俩的野心应该是“操控皇权、化家为国”。首先，以袁绍、袁术之好高自负，已然看出三公之位是无法永保的。汉室的三公，虽然地位崇高，也具有人事辟召之权，而其实就是汉帝施政不力时抛出来的“替罪羊”，时常会因所谓的“天灾异象”而就地策免。袁绍、袁术显然是不会满足于这种流动性权位的。夺得大将军之权或重设丞相之职而自居，是他俩的着手点。这也是他俩迈越袁隗、袁逢的地方。

其次，汝南袁氏的家传之学是《易经》。他们善于从易理谶纬之道中寻找并形成自己一族“以袁代汉、化家为国”的理论依据，即“袁氏出陈为舜后，以黄代赤，德运之次”。袁绍、袁术都以这套理论为立业之本，并信而行之，与汉室离心离德，时刻谋求取而代之。

基于此，袁绍、袁术兄弟才会在夺权之路上比袁隗等父辈走得更远。

实际上，汝南袁隗和袁绍、袁术叔侄咄咄逼人的竞夺之势，连他们

族中的明智之士都看不下去了。袁绍、袁术的族兄袁闳就明确指出：

吾先公福祚，后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此即晋之三郤矣。

这从侧面证明，袁隗、袁绍、袁术之所作所为确是在“与乱世争权”“欲逐鹿中原”。而所谓的“竞为骄奢”，其实是袁绍、袁术的招揽士庶之策：他俩若不挥金如土、分享于众，又如何能使那些宾客、士人“争赴其庭”呢？袁闳所指的“晋之三郤”，即郤锜、郤犨、郤至叔侄三人，为春秋时期晋国豪强之士，跻身四军八卿之列，其权可以废主立威。很显然，袁闳用郤锜、郤犨、郤至叔侄三人，实际上暗喻的就是袁隗、袁绍、袁术叔侄三人。

汝南袁氏的政敌也察觉到了袁绍、袁术兄弟的种种异动。《后汉书·袁绍列传》记载：

中常侍赵忠言于省内曰：“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

老谋深算的袁隗听到这些风声后，急忙要求袁绍兄弟不可高调张扬，以免过早暴露袁氏“与乱世争权”的野心。

袁绍年轻气锐，对袁隗的劝诫不以为意。当然，他这个时候确实是有坚实底气的：他已攀附上了大将军、国舅爷何进这棵“参天大树”，无须太过忌惮宦官集团。《后汉书·袁绍列传》记载：“（袁绍）后辟大将军何进掾。”在何进这个军界大佬的扶持下，他很快做到了虎贲中郎将。

“黄巾之乱”是汝南袁氏夺权征途上的一个关键点。随着“党锢之士”纷纷解禁出仕，中原名门世族集团势力急速膨胀，已然跃居外戚集团、宦官集团之上。袁隗、袁绍叔侄为了“洗白”自家一族勾结宦官的“污点”，于是举起“清君侧、除阉宦”的旗号来收揽士人之心。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袁隗以司徒府之名义曾经敦促颍川系大名士陈寔入仕，还营救下了被宦官诬陷入狱的太原王允。他们种种施为，终于立竿见影：袁隗在另一位名流领袖杨赐死后，成了汉末名门世族集团“硕果仅存”的大佬，高踞于“万夫之望”的地位。袁绍、袁术

兄弟则在前边为他“攻城掠地”、纵横朝野。

但袁隗、袁绍叔侄三人在这时节都有一个大大的失算之处。此刻“黄巾之乱”爆发，汉灵帝下诏令各州郡可以自行招兵平乱，造成地方性割据势力从此崛起，尤以西凉武人集团最为显著。而汝南袁氏本该借机调整方略，派袁术或袁绍出任方镇、待时而动。但他们却漠然置之，扎堆儿似的留在京都里只想操控皇权。所以，到了后来他们在“十常侍之变”中急需用兵之际，却无一名宗亲子弟手握地方性兵权，反要呼召董卓入京相助，终至太阿倒持、授人以柄。

袁隗、袁绍叔侄在交好以何进兄弟为首的外戚集团之后，利用何进兄弟意图由庶族而改换门庭、晋身名流世家的根本需求，说动他们效仿当年的窦武去“清君侧、除阉宦”，以消灭名门世族集团之最大政敌—宦官集团。而袁绍兄弟给予何进兄弟最大的理由便是：铲除了宦官集团，何氏外戚集团就能如同当年的梁冀一族，在庙堂之上可以毫无掣肘地作威作福、呼风唤雨。

何进听信了袁绍兄弟的建议，“又以袁氏累世宠贵，海内所归，而（袁）绍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其从弟虎贲中郎将术亦尚气侠，故并厚待之”（摘自《后汉书·何进列传》）。

宦官集团乃是东汉皇权的政治“黑手套”，同时也是东汉皇权的最佳维护者。他们并不缺乏政治智慧，而袁绍兄弟“爱士养名、暗植势力”的举动也早就被宦官集团中的反袁者看得一清二楚。甚至袁绍兄弟后来操控何进“清君侧，除阉宦”的幕后意图亦被宦官们洞察并转告给何太后：“大将军专杀左右，擅权以弱社稷。”宦官们明面上指的是“大将军何进”，其实暗指的还有何进身后的谋主袁绍兄弟。

袁绍兄弟代表中原名门世族集团要把宦官集团连根拔除，就是在为自己今后架空皇权而扫清障碍。他们意图先联合何进兄弟铲除宦官集团以赢得大名大利，再又联合名门世族集团打压外戚集团，最后达成自家汝南袁氏“一手遮天、独揽朝纲”的终极目标。

当然，这是汝南袁氏高层最为机密的阴谋方略，外人自是无从得知。所以，曹操在听闻袁绍劝说何进借助外兵尽诛宦官的建议后，不禁

哂笑而道：

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摘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其实，曹操之讥笑，也确有几分笑错了：袁绍兄弟尽灭宦官之举确是另有深意，只不过他俩点燃了这一场大乱，却是“能放火而不能收火”，终至玩火自伤。

东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暴崩，何进与袁隗同受遗诏而为顾命辅政大臣，共录尚书事。何氏外戚集团与以汝南袁氏为首的中原名门世族集团，终于结成了同盟，对以张让、赵忠等十常侍为首的宦官集团形成了压倒性优势。从表象上看，一切正朝着袁隗、袁绍叔侄谋划的方略顺利进行。

不料，在最后关头，何进因其妹何太后的强烈反对而变得束手束脚起来。袁绍再一次强烈建议他外召各地州郡豪强带兵进京以“清君侧、除阉宦”的名义倒逼何太后下旨尽灭宦官。

何进在袁隗及其背后名门世族集团的强大压力下，只得请旨封袁绍为司隶校尉、袁术为虎贲中郎将、王允为河南尹，控制了京畿内外，“专命击断”，全权负责铲除宦党之事宜。

而袁绍在召集外兵入京的权衡思虑之中，选定了袁隗府署的故吏、时任并州牧的董卓前来相助。董卓当时已是西凉武人集团的首领之一，在朝野间颇具威名。袁绍认为借重他的强大兵力，可以有助于自己“除阉宦、谋大权”的计划彻底达成。

但是，他识人辨人的眼光确实不够精准。连与他同为何进幕府谋士的郑泰都看出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厌，若借之朝政，将恣凶欲，诚不宜假卓以为资援也”，而袁绍却不以为意。果然，董卓带兵入京之后，来了个“反客为主”，利用军事实力上的相对优势，挟持了汉帝，压制了袁隗、袁绍、杨彪、王允等各大名士卿相，打破了袁氏家族的全盘谋划，令袁隗、袁绍叔侄追悔莫及。

其实，“十常侍之变”时，顾命首辅大臣何进被狙杀，那么袁隗作为顾命次辅大臣就应该在袁绍、袁术兄弟的拱卫下站到明处，一呼百应以对付阉党。而且，大事将起，袁家的正确谋划应该是这样：由袁隗、袁绍带军去疾追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不能让宦官或其他势力集团乘隙挟持了皇权；由袁术带兵留守在后，扫除宦官余党并收揽何氏余众。

但在现实中，袁隗、袁绍、袁术反而是本末倒置、昏头昏脑地扎堆在一处对宦官们进行斩尽杀绝！反而把“挟天子以令群臣”这个核心要务甩到了脑后不顾不问！这在政治斗争中是大大的失策。

果然，董卓抢先一步赶到北芒山，将刘辩、刘协控制在了掌中，袁隗、袁绍叔侄失了先机，从此处处受制。汝南袁氏操控皇权、化家为国之大略，就这样败坏在了最后一步“棋招”之上。

而董卓“废帝立新”更是“釜底抽薪”的一记狠招。届时，连新皇帝都是董卓一手拥立的，袁隗虽然贵为太傅，有托孤辅政之权，也无法再与董卓的赫赫权势相抗衡！更何况袁隗的辅政之责的对象是原少帝刘辩，而非新帝刘协。袁隗本人作为硕果仅存的辅政大臣，就这样被董卓逼到了无名无分、缺权少势的地步！

这也是袁绍、袁术为何要遁出洛阳潜往关东联合各路州郡兵马发动勤王之役的关键。因为，汝南袁氏在京都“十常侍之变”中一步走错、满盘皆输，只有跳出局外另起异军，方能转败为胜。

可是，他们还有彻底“咸鱼翻身”的那一天吗？

笔者相信：袁绍在遁出洛阳城之际，胸中还是底气十足的—和他同行赴难的，内有荀谌、许攸、辛评、郭图等一大批才略卓异的豫州系名士。只要有英才追随，汝南袁氏终会再铸辉煌！

汝南袁氏之“袅袅余音”

汉末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之春，袁绍、袁术兄弟终于联合了十余路诸侯大军前来讨伐董卓。董卓也撕破脸皮，不顾故旧之谊，屠杀了原座主袁隗等满门老小以震慑异己之士。袁隗深谋一世，却被自己的故吏董卓反噬，可笑可叹。

但董卓对袁绍兄弟组建的讨董联军还是颇为忌惮的，最后被迫迁都长安以避其锋芒。

然而，就在此时，袁绍、袁术二人却“心怀异图”，把国仇家恨都抛之脑后，根本不思报汉复仇，反而带头在关东一域争权夺地、自立门户：袁绍巧取冀州，强占幽州，揽有河北数千里江山，直逼汉室而欲代之；袁术坐拥淮南，遥控江东，兵精粮足，直至自称“代汉之当涂高”而改旗易帜。然而他俩先后都被曹操联合荀彧等拥汉派世族集团一举荡灭。

汝南袁氏“奋其私智、以黄代赤、化家为国”之野望，至此完全化为“南柯一梦”。

《孟子·告子章句上》写道：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这诚然是对汝南袁氏一族入木三分的定论之言，历久而弥彰。

袁绍的门户集团及官渡战败缘由之浅探

在汉末前三国时期，袁绍是一个罕见的“幸运儿”。他凭借着自己“四世公侯”的家世背景，从韩馥的手中兵不血刃地赚取了当时天下的第一大州—冀州。然后，又在与幽州军阀公孙瓒的数年战争中获得了最后胜利，一举跃升为实至名归的中原霸主。其声威达到巍峰之际，连刘备代领徐州这样的事情，当时以糜竺、陈登为首的徐州官僚们都还要向远在邺城的袁绍联名禀告以求得他的认可。

然而，在历史的进程中，袁绍以坐拥河北全境、统兵数十万的雄厚之资，结果竟似一颗巨大的流星，在东汉末年的天幕上只是一掠而过，落了个身败族灭的下场，岂不令人深思？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袁绍的门户背景是“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他的依托来自汉末第一流的世族名门，所以他就是汉末世族豪门的

政治代言人。而曹操的门户背景是寒门庶族出身，他则是汉末寒门庶族的政治代行者。而在官渡一战，袁绍和他幕后的世族集团竟被曹操一举击溃，世族集团从此陷入了长期的蛰伏阶段，一直到数十年后才在河内司马氏的引领下实现复兴，并推翻了以庶族背景立国的曹魏。

我认为，陈寅恪大师的论史一向以深刻精到而著称，但在袁绍的门户集团和官渡之战的这段论述中，却显得不尽不实，其结论也站不住脚。

首先，单从袁绍的个人情况来看，《三国志·魏书·袁绍传》里是这样描绘他的："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他自己的社交圈也是"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从这些文字分析，袁绍本人确系世族名士而无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汉末世族名门的政治代言人。

如果他是汉末世族名门的政治代言人，那么像曲阜孔氏、颍川荀氏、弘农杨氏、东海王氏等天下第一流的世族名门为何都站到了曹操的身边与他坚决对抗呢？我们都知道，在官渡之战中，曹操所拥有的最大助力就来自幕后的荀氏一族。而荀氏素为儒宗荀子之后裔，是正牌儒家名门。他们居然力挺身为庶族的曹操，而力抗身为世族的袁绍，这不正说明袁绍在他们心目中并非"同路人"？袁绍又哪里能代表得了他们的政治呼声？

我们继续深挖下去，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汉末世族名门的主流共识是"拥汉匡复、重铸太平"。且不说曲阜孔氏、颍川荀氏、弘农杨氏、东海王氏等世族名门都是一直聚于许都，拱卫在汉献帝刘协的身旁，便是远在江东的张昭、隔在荆州的韩嵩、居于河北的崔琰等各地名士代表，实际上也是明明暗暗地认可和支持汉室正统的。所以，我们又要回到颍川荀氏的这个例子上来：当年，颍川荀氏的掌门人荀彧曾到邺城面见过袁绍，也曾被袁绍奉为上宾，但他还是决然弃之而去—因为，他俩的政治取向终究是截然不同的，荀彧和他幕后的世族集团是"拥汉匡复"，而袁绍则企图代汉自立。

在三国早期阶段，任何公然违背"拥汉匡复、重铸太平"这一主流共识的势力集团都会被天下各方群起而攻之，远例之如西凉董卓，近例之

如汝南袁术。鉴于此，袁绍对外遮遮掩掩，在明面上也不得已接受了许都汉献帝所赐的“大将军”封号。然而，即使是在袁绍自己旗下的集团内部，他都无法挑战汉室正统的名义。他身边最忠诚、最得力的心腹谋士们，如沮授、田丰、崔琰等都不支持他明目张胆地“跋扈专权，代汉自雄”。

有一次，袁绍甚至指使自己的主簿耿苞放出“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的风声来试探自己部下文武诸士的反应，结果竟是“议者咸以（耿）苞为妖妄宜诛”（摘自《三国志》）！逼得袁绍不得不当众斩杀耿苞来自证清白。

同时，一个“咸”字，说明“拥汉匡复”的政治呼声在河北世族集团里是何等的广泛，而袁绍在河北世族集团里企图实现“代汉自雄”又是何等的孤立！

当初，袁绍入主冀州之时，河北第一名士沮授称赞他是“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摘自《三国志》），几乎完全是站在“拥汉匡复”的立场和视角来评价袁绍的。这段话也成了一部分河北世族名士强加在袁绍身上的“形象定位”—他必须是“拥汉忠臣”，才值得他们为之奔走效力。而袁绍在早期也利用了这种“形象定位”来拉拢世族名士。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弃汉不顾、他的拥兵自重、他的废长立幼、他的桀骜犯上，都与伏膺儒教、忠于汉室的世族名门渐行渐远。表面上他看似笼络到一批世族名士，实质上他根本得不到世族名士的衷心拥戴。即使是沮授，他一向倚重有加的心腹智慧，也是因为其“叔父、母、弟，悬命袁氏”、被袁绍扣为人质而不得不为他效力的。

在官渡之战前夕，袁绍终于彻底撕下了“伪忠汉室”的面具，也彻底暴露了“篡汉自立”的野心。然而，他举目四顾，却是众叛亲离、人人疏远的局面；以“拥汉匡复”为主流共识的汉末世族名门几乎全都抛弃了他。甚至，他寄望于腹背夹击曹操的同盟刘表，也龟缩在荆襄之地，连一兵一卒都不敢发往许都！而他身边的沮授、田丰等名士更是毫不隐讳地指出他此番举兵南向许都完全是不义之行，难以获胜。沮授便讲得十分明白：

以曹兖州（指曹操）之明略，又挟天子以为资，我虽克公孙瓒，众实疲弊，而将骄主忲，军之破败，在此举也。

果然，袁绍虽有数十万精兵和冀州全境的物资后盾，在官渡一战之中，在必然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却似雪崩般一夕之间一败涂地，从此之后再也没有缓过气来，很快就湮灭在了历史里。

第五章 中原名门世族的崛起：左右历史走向的强暗流

《世说新语》记载了东汉末年中原地带发生的一件轶事：

陈太丘（指陈寔）诣荀朗陵（指荀淑），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陈寔长子陈纪的表字）将车，季方（陈寔次子陈谌的表字）持杖后从，长文（陈群的表字，为陈纪之子，陈寔之孙）尚小，载着车中。既至，荀使叔慈（荀靖的表字，荀淑的儿子）应门，慈明（荀爽的表字，荀淑的儿子）行酒，余六龙下食，文若（荀彧的表字，荀淑的孙子）亦小，坐着膝前。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

南朝刘宋时文士刘敬叔在《异苑》一书中对这件轶事也从另一角度展开了描写：

陈仲弓（指陈寔）从诸子侄，造荀季和（指荀淑）父子，于时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内有贤人聚。

这件轶事的内容和寓意都是十分丰富的。它原本讲述的是颍川郡大名士陈寔、荀淑两家聚会相访的活动。《三国志·魏书·陈群传》里称陈寔“德冠当时”“远近宗师之”。《后汉书·荀淑传》里写荀淑“莅事明理，称为神君”。他俩的孙子荀彧、陈群后来都成了“士之楷模”“国之栋梁”，其家族在汉、魏、晋三朝之嬗变中影响深远。

上述轶事所寓的深意是：自古以来，在正统学说中，只有天子皇族的言行举止才能“上应天象”。而到了汉末，以陈寔、荀淑两大名家的一场聚会，居然成了惊天动地的“星变异象”。这就意味着，清流名士们的应运崛兴，几乎可以和皇室天子分庭抗礼。

颍川荀氏和陈氏所代表的名门世族集团在经过长久的积蓄势力之后，终于在东汉之末从幕后走上了前台，即将成为支配历史走向的一股强大暗流。任何人士，包括天子和权臣，对它都只能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东汉末年的高层权力格局

东汉王朝的皇权，自开国以来，便以宗室、外戚和卿士集团（即名门世族集团的前身）为三大支柱。在那时，鉴于秦朝灭在宦官赵高之手的惨痛教训，东汉王朝早期对宦官集团是严防密备的。宦官们的职责，仅仅是处理内廷杂务而已。

帝室初建，光武帝刘秀就废了太子刘强而改立东海王刘庄为嗣。而刘庄本是“以贤不以嫡”而继位大统的，从根本上讲是违背礼法规则的。所以，他的宗亲兄弟们未必拱服于他。果然，他登基不久，其胞弟刘荆暗怀不轨，甚至勾结前太子刘强一同谋逆夺位；而后，又有光武帝与许美人所生的楚王刘英企图造反。明帝刘庄都是借着南阳阴氏、扶风马氏等外戚集团的鼎力支持，才将这些宗室藩王压制下去的。从那以后，汉明帝及其子孙均不再以同姓宗室为权力支柱，转而依靠外戚集团维护皇权。

到了汉和帝时，外戚窦氏坐大专权，喧宾夺主，威胁到了皇权。和帝得中常侍兼钩盾令郑众之助，联合宦官集团，猝然发难，推翻了窦氏一族。汉桓帝时，外戚梁氏一族复又骄纵跋扈，桓帝只得联络宦官唐衡、左绾、徐璜、单超、具瑗等人一举铲除梁氏满门上下。唐、左、徐、单、具等人晋封为“五侯”，标志着宦官集团自此崛起，成为东汉皇权之辅弼。

然而宦官集团中的人大多数操行低下，贪秽之风炽盛，常有侵渔百姓之举，终于引起四方清议之抨击。一部分士人以激浊扬清、拨乱反正为名借势而兴，他们“在朝则为廉臣，在野则为宗师”，融入了汉朝原有的卿士集团，“以行而求名，以名而立身”，渐渐形成了新的名门世族集团。例如弘农杨氏，自汉和帝时之杨震起，直至其子杨秉、其孙杨赐、其重孙杨彪，代代扬忠清之名，代代出三公之官，人脉深厚，影响巨大，集门生故吏之众力于一门，堪与权臣、巨宦而相抗衡。

宦官集团和外戚集团也不甘示弱，拼命拉拢汝南袁氏等比较圆滑投机的名门世族来反制清流派世族集团，但效果并不显著。这其中，宦官集团与名门世族集团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已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为彻底压制名门世族集团，汉末宦官集团构陷了两次“党锢之祸”，甚至杀害了“三君”窦武、刘淑、陈蕃，“八俊”李膺、杜密、荀翌、朱寓

等，“八顾”巴肃、范滂、尹勋等，令人扼腕痛惜。不过，名门世族集团最终冲破了种种束缚，日渐壮大成势，在汉末政局之中可谓举足轻重。

汉桓帝末年及汉灵帝初年，朝中已经出现了名门世族集团、外戚集团、宦官集团三股势力缠斗之现象。而名门世族集团多与外戚集团合流以同抗宦官。

但桓帝、灵帝都以宦官集团为自己最忠实的政治助手而加以维护，一直尽量调控着这三股势力之间的动态均衡。毕竟，替汉帝下“黑手”、替汉帝背“黑锅”的，多是那些宦官。汉帝若是完全抛弃了他们，难道要把自己再次置身于外戚集团和名门世族集团的操弄之下？所以，维持这三股势力的动态平衡，是汉帝的最佳选择。

可惜，天不佑汉—当汉灵帝的三方均衡之术刚刚操纵得渐入佳境之时，他却暴病身亡了！失去了最高皇权的调控，很快，宦官集团和名门世族集团相生相克的这种脆弱的均衡局面，就这样被彻底打破了。

初平、兴平年间世族集团的“独大”

在汉灵帝暴亡而至汉少帝刘辩即位的短短数十天内，外戚集团、名门世族集团和宦官集团的权力斗争进入了“你死我活、不择手段”的白热化阶段。

以国舅何进为首的外戚集团与袁隗叔侄（包括袁绍、袁术）、杨彪、王允为代表的名门世族集团实现紧密的政治联盟，甚至招来外将董卓、丁原等人，意欲内外合力以铲除宦官集团。不料，宦官集团借用狙击暗杀的方式，先发制人，反而一举将何进刺死于内廷。袁绍、袁术、王允、吴匡等人遂以替何进报仇为名率兵闯入宫中大开杀戒，屠戮所有的宦官。

（袁）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余人。

而宦官集团的首领张让、段圭等人亦被王允派来的部将闵贡逼得全部投河而死。

张让、段圭等人临死前释放了被他们胁持出宫的少帝刘辩、陈留王刘协，只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遗言：

臣等殄灭，天下乱矣。惟陛下自爱！

宦官集团虽然作恶多端，但它终究是汉室皇权的一道重要藩屏。宦官们其实只是皇权的延伸。因为外廷负责具体政务的卿士尚书们和名门世族、外戚重臣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汉帝难以依靠他们从内部彼此制衡；只有宦官单身无后，又出自寒门，汉帝才能倚用他们对抗外戚和权臣。

汉末许多名门世族利用政治特权收纳隐户，大量地逃税漏税，令汉廷财政十分紧张。汉帝也只有派出宦官以"买官钱"的名义从卿士大夫们身上"损有余而补国库之不足"。这些"脏活儿"，都是宦官集团替汉帝做下的，所以他们才被外戚集团和名门世族集团共同厌恶而除之。当然，不少宦官滥用了皇权，狐假虎威、贪污腐化、中饱私囊，也应当受到惩处。但他们整个集团被不问青红皂白地斩尽杀绝，却令汉室皇权"三分缺一"，弱化了许多。

更要命的是，在这场混乱中，何进的弟弟何苗又遭到了西凉武人集团首领董卓、董旻兄弟唆使何进的部曲吴匡等人趁乱诛杀。

董卓一派入京夺得大权后，更是反客为主、雷霆出击，鸩杀何太后，废除何太后之子刘辩的天子之位，改立单身无外戚的陈留王刘协为新帝，将以何氏一族为代表的外戚集团一网打尽。

吴匡等素怨（何）苗不与进同心，而又疑其与宦官同谋，乃令军中曰："杀大将军者即车骑也，士吏能为报仇乎？"进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愿致死！"匡遂引兵与董卓弟奉车都尉（董）旻攻杀苗，弃其尸于苑中。（摘自《后汉书·何进传》）

至此，汉室原有的权力支柱又去其一，只剩下名门世族集团在朝野内外"一枝独大"。这就是汉献帝初平、兴平年间的政治权力格局变化情况。

以袁绍、杨彪、王允等为代表的名门世族集团正欲重振朝纲、有所作为，却未料到自己在这场混战中竟是白白地替他人做了“嫁衣”—西凉武人集团居然趁乱进来横插一刀，窃取了胜利果实，夺走了朝中大权！

“是可忍，孰不可忍。”名门世族集团自然不甘受制，袁绍、袁术等逃往外面招集义军奋起讨董，杨彪、王允等则留在洛阳佯装顺从而实怀伺机狙击之念以对付董卓。

其实，跳出当时的历史格局来看，外戚和宦官两个皇权的附庸已然灰飞烟灭，只剩下西凉武人集团挡在了名门世族集团的前面。只要扫除了西凉武人集团，名门世族便能真正掌握皇权而左右时局。

名门世族集团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西凉武人集团首领董卓中了王允、吕布的“内应连环计”，遇刺身亡。一线曙光映照在了汉室君臣的心坎上。

然而，中原地域的名门世族集团在这时却暗暗发生了分化：一是以杨彪、王允、荀爽叔侄（包括荀彧和荀攸、钟繇）等人为代表的拥汉匡复派。他们不计私利，一心只以匡复汉室为己任。一是以袁绍、袁术、刘焉父子、刘表等为代表的叛汉自立派。他们坐拥兵马，暗怀异志，企图乱中谋利，取刘汉而代之。当董卓被刺死之时，袁绍、袁术身为讨董联军的盟主，却袖手旁观，并不及时入关援助汉室，而是与其他诸侯争权夺地、自相内讧。

于是，王允等人因孤立无援而被西凉武人集团的激进派反扑而亡。汉室小朝廷再次落入李傕、郭汜、张济等西凉武人首领手中，权威扫地，忧以度日。一直熬了两三年，汉献帝刘协才在拥汉派世族集团的多方谋划下逃离了长安，来到洛阳暂时栖身。

以钟繇、荀彧为首的颍川系世族内外呼应、左右运作，说服汉献帝再一次接受庶族集团首领曹操的资助，并迁都入许县，置身于曹操势力的保护之下，改年号为“建安”，希望从此获得安宁祥和之局面。

综观这一时期中原名士大夫们的立身行事之风格，例如杨彪、荀爽、何颙、王允等人物，均是“德重于才”。杨彪公开顶撞董卓而毫无惧色、何颙奋不顾身以除巨寇之患、王允苦心孤诣而安汉室之乱，这些事

例无不彰显了他们高尚的德行。

然而，杨彪徒显风骨而不能制暴，何颙谋泄却以忧而亡、王允狙杀董卓而无法抚服余寇以善后，这也说明了他们确实不同程度地缺乏治国理乱之真才。要让历史的巨轮转入建设性的轨道，只能是“数风流人物，还看后来者”了。

建安年间早期：世族集团助曹与攻袁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汉献帝刘协及东汉小朝廷终于在曹操和荀彧的扶持下稳定下来。但曹操将天子挟在身边，政治优势日胜一日，与各个地方割据派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尖锐。

本来，依照叛汉自立派首脑袁绍、袁术兄弟的想法，他们一直是企盼西凉武人集团最好把刘协和东汉小朝廷弑杀净尽，然后他们就可以用“复君仇、除逆贼”的名义公开地逐鹿中原、争夺皇权。然而，在磕磕绊绊、挣挣扎扎中，刘协和东汉小朝廷在颍川系世族集团的帮扶下，居然逃出生天，而且还在许都缓过气来，并通过曹操的军事势力重新焕发了权威。

袁术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挑战许都小朝廷的政治权威和法统。《后汉书》记载，袁术召名士张承而问道：

昔周室陵迟，则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汉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广、士人之众，欲徼福于齐桓，拟迹于高祖，可乎？

张承直接回答：

在德不在众。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虽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无度、干时而动，众之所弃，谁能兴之？

他的看法代表了汉末大多数名士大夫的主流共识：拥汉匡复，而不能叛汉作乱。

但袁术一意孤行，终究还是叛汉僭号，尊奉汉室为“伯家”，自称为“仲家”。又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与许都朝廷处处相对应。

曹操在荀彧、荀攸等拥汉派名士支持下，亲自前来征讨袁术。蕲阳一战，袁军大败，“众情离叛”。此后，袁术一蹶不振，在内外交困中呕血身亡。

袁术临死之前，曾将他“仲家”的尊号转送给他的堂兄袁绍，并希望他能光大袁氏、代汉自立。袁绍比他显然更加狡猾一些。袁绍自知汉朝四百余年的积德积威之势尚在，它的正统地位也为四方士庶所公认，遂不敢大张旗鼓地反汉叛汉，而只是针对曹操个人“胁迁省禁、专制朝政”而兴南征之役，打着“清君侧、除奸逆”的旗号杀往许都而来。

《三国志》记载，郭嘉这样评论袁绍：

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

荀彧也有近似的说法。

（袁）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

他俩都曾经在袁绍的幕府中待过，所见所识当是真实情况。从他俩的说法来看，袁绍旗下的拥袁派名士集团“寡能”“好言”“饰外”而缺乏真才实学，其战斗力并非上乘。

同时，郭嘉评论曹操身边是“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荀彧也称曹操是“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他俩在肯定曹操麾下的拥汉派名士们皆有真才实学的基础上，一致把“忠正”二字放在了首位：此时的“忠”，乃“忠于汉室”也！所以，曹操身边确实是团结了一大批坚定、务实的拥汉派名士，支持他全力讨平袁氏。

他们为了帮扶曹操顺利剿灭袁绍，还做出了周密无失而又各尽所能的分工协作：荀彧以“萧何之材”留后负责足兵足食，钟繇以“韩信之器”西出长安镇抚关中，荀攸、郭嘉以“张良之能”随军出谋划策。在他们的通力合作和不懈支持之下，曹操得以专心致志对付袁绍，终于以弱胜强、以寡胜众，一举击溃袁氏大军，取得了辉煌夺目的官渡之胜。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八月，袁氏割据势力的老巢—邺城被曹操率军攻破，标志着中原大地终于彻底落入他的手中。

而拥汉派世族集团也如释重负，认为大敌既除，汉室必当复兴。可是，没料到，一切只是“昙花一现”—曹操渐渐撕下了假面具：他提出“复古置九州”的动议，自领冀州牧，并企图吞并幽、并二州及雍州半部为私有，分明是想做第二个代汉而立的袁绍！

建安年间中后期：世族集团的易汉入魏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春二月，曹操在基本底定北方后发布手令道：

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

他这道令书背后的寓意是：一，公开承认中原名门世族集团对曹氏的强力支持和巨大功绩，把他们摆到明面上进行拉拢；二，暗示中原名门世族集团须与曹氏共定天下而劝进代汉，而曹氏必然重报之。

一年后，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之春，曹操再次“赤膊上阵”，自任丞相，废除三公，将名门世族集团中拥汉派首领杨彪和赵温先后逼退，又诛杀拥汉派名士孔融，篡汉之心暴露无遗。在他一系列强硬举措的推动下，中原名门世族集团再一次分化为拥汉派和拥曹派，壁垒分明，斗争骤起。

以荀彧、荀攸叔侄为首的拥汉派与以董昭、贾诩为首的拥曹派进行了多次较量。由于荀彧叔侄的影响力太过巨大，逼得曹操都不得不亲自出手对付他俩。曹操向荀彧送去了一个空食盒，寓意为“汉禄永终”，暗示他在该闭口的时候必须闭口。不料荀彧看似儒雅而实则刚烈，竟以自绝而亡向曹操宣示了自己毫不合作的强硬态度。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荣升魏公、加礼九锡前后，荀彧自尽逝世；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再次晋为魏王时，荀攸暴毙而亡。汉末三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名门世族颍川荀氏从此被曹魏政权“雪藏”化，直到二三十年后河内司马氏崛起之际才真正被解除禁锢。

荀彧叔侄的去世，令汉末拥汉派势力大为摧折。原本和荀彧叔侄一

道以柔性的姿态抗曹卫汉的颍川钟氏、陈氏两大世族不得不改变立场，向沛郡曹氏俯首称臣。他们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钟繇出任魏国相国之职，陈群跃居魏国御史中丞之位。

以华歆为首的平原华氏、以王朗为首的东海王氏等儒家名门先前是中立不倚的姿态。面对曹强汉弱的现实状况，他们也只得转换立场，向沛郡曹氏靠拢。

最隐蔽、最深沉的是河内司马氏家族。他们虽深受荀氏一门的大力提携，却早早地成了拥曹派，只不过在明面上从不与拥汉派发生冲突，从而为自己未来的腾挪闪转预留较大的政治空间。他们推出司马懿担任曹魏世子曹丕的中庶子，又推出司马孚担任曹操爱子曹植的中庶子，可谓“长线投资”“两面下注”，谋求在易汉入魏之后获取最大化的利益。

只有以杨彪为首的弘农杨氏依然坚持拥汉，但对曹家政权已无任何实质性的威胁。杨彪本人见到汉室大势已去，遂对外称足疾而隐居不出。其子杨修本想拥立亲汉的曹操次子曹植为嗣，以求实现其“曲线救汉”的方略，不料终被曹操诛杀而亡。弘农杨氏至此报汉无门，只得淡出政坛而潜伏之。杨彪之嫡孙杨器、从孙杨骏等人，直到司马氏当权后才又崭露头角。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及其太子曹丕终于获得了中原各州大多数名门世族的拥戴劝进，到底还是代汉成功，“以黄继炎”，易号为魏，禅位开国。

曹丕称帝时期：世族集团的全面复兴

魏朝黄初元年，曹丕登基为帝。此时此刻，其父曹操生前给他留下的满朝文官系统之中，仅有尚书张既、丁仪兄弟等寥寥数人属于寒士出身，其余的公卿大夫几乎都来自高门贵第。可以说，从建国之初起，中原名门世族集团就是撑起魏廷统治的主干力量。

而且，他们刚刚改换门庭、易汉入魏，其中究竟有多少人是真心拥曹的，曹丕的心头也没底。但为了化解前朝余怨，他还是做出了种种姿态，争取将最后一股拥汉派势力也融解掉。

《三国志》里记载，原汉廷黄门侍郎卫臻归于魏室，被任命为曹丕的散骑常侍。但他依然怀念汉室：

时群臣并颂魏德，多抑损前朝，（卫）臻独明禅授之义，称扬汉美。帝（指曹丕）数目臻曰：“天下之珍，当与山阳（指汉献帝刘协）共之”。

曹丕这一表态，证明了他对拥汉派的怀柔之术施展得相当到位。

仅仅是巧言令色，曹丕还不足以真正弥补魏室和拥汉派残余势力的裂痕。于是，曹丕又对拥汉派名士集团的领袖人物竭力拉拢。《后汉书·杨彪列传》写道：

及魏文帝受禅，欲以彪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辞曰：“彪备汉三公，遭世倾乱，不能有所补益。耄年被病，岂可赞惟新之朝？”遂固辞。乃授光禄大夫，赐几杖衣袍，因朝会引见，令彪着布单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宾客之礼。

他既以平等论交的“宾客之礼”优待杨彪，自能发挥立竿见影的作用，促成了最后一股拥汉派残余势力彻底沉寂并转化。魏室内部终于再无“杂音”。其证据便是：在曹丕开国以后，朝中从此再未发生过一起以“复汉报仇”为名的恶性政争事件。这也证明了：中原名门世族集团终于达成了基本的政治共识，认可了魏室的法统和权威。

“通雅博畅”的陈群和“聪亮明允”的司马懿以曹丕“东宫之友”的身份，被中原名门世族集团拱服为新一代领军人物。陈群为魏廷尚书令，司马懿为魏廷尚书右仆射，完全成为“万夫之望、栋梁之材”的重臣。而陈群又系荀彧之女婿、司马懿则系荀彧之得意门生，他俩共同撑起了颍川系世族的再一次辉煌，令冀州系、兖州系、青州系、雍州系等其他名士集团望尘莫及。所以，颍川系的元老钟繇能够高居太傅之位而屹立不倒，其后台正是陈群、司马懿二人。

建魏未久，陈群代表几乎所有名门世族集团的呼声，和曹丕达成了一项重大的政治交易，即建立“九品中正制”。原本名门世族集团是想更进一步取得“五等封爵制”以获取律法制度上的世袭传位之权利，但先前被曹操强硬否决，现在也只能通过“九品中正制”在人事选任要务上渐进

式“独占其利”。

溯本究源，曹操生前对名门世族集团的收揽是恩威并施、又拉又打的：立威则杀之而无忌，例如他对孔融、崔琰等人；施恩则赏之而不吝，例如他对华歆、王朗等人。而且，他还尽力起用贾诩、张既、丁仪兄弟等庶族精英来制衡名门世族集团。然而，随着丁仪兄弟的被诛和贾诩的虚位，魏室的高层权力核心圈里再无庶族分子的立足之地。名门世族集团声势高涨，曹丕也只有顺而从之，在“九品中正制”的建立上无法另立异议。

具体说来，陈群当过曹操时期丞相府的西曹掾，也是精于典选的，“群荐广陵陈矫、丹阳戴乾，太祖皆用之。后吴人叛，乾忠义死难，矫遂为名臣，世以群为知人”（摘自《三国志·魏书·陈群传》）。他提出的“九品中正制”，使曹丕无法有拒绝的理由。但曹丕还是保留了汉代的察举公推之制，与“九品中正制”双道并行而互为辅证。所以，这一时期名门世族集团也并未彻底垄断人事选任大权。

时有荐乐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指曹操）辟之。（陈）群封还教，以为模、逵秽德，终必败，太祖不听。后模、逵皆坐奸宄诛，太祖以谢群。群荐广陵陈矫、丹阳戴乾，太祖皆用之。后吴人叛，乾忠义死难，矫遂为名臣，世以群为知人。（摘自《三国志·魏书·陈群传》）

在国事政务上，名门世族集团更是对魏室的皇权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例如，曹丕虽然对“守正不挠”的直臣鲍勋甚是不满，但在陈群、司马懿联手举荐鲍勋为御史中丞时，他只有“不得已而用之”。再有，《三国志·魏书·辛毗传》里记载：

帝（指曹丕）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辛）毗与朝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见之，皆莫敢言。

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计安出？”

帝曰：“卿谓我徙之非邪？”

毗曰："诚以为非也。"

帝曰："吾不与卿共议也。"

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厕之谋议之官，安得不与臣议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虑也，安得怒臣！"

帝不答，起入内；毗随而引其裾，帝遂奋衣不还，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

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

帝遂徙其半。

尝从帝射雉，帝曰："射雉乐哉！"

毗曰："于陛下甚乐，而于群下甚苦。"

帝默然，后遂为之稀出。

在名门世族集团的约束下，曹丕虽贵为开国之君，也难以滥用权力而乱政殃民。

当然，如果皇权非要来一次"任性而为"不可，名门世族集团也是制约不了的。曹丕决意诛杀名士杨俊时，司马懿联合散骑常侍王象、荀纬等高官近贵一齐为他求情，直至"叩头流血"，依然是毫无效果。曹丕这么做，实际上是在敲打名门世族集团：这魏朝的"万机庶务"，最终还是得由朕说了才算数！

倘若不是曹丕中年暴亡，名门世族集团应该会在他的苦心驾驭下得到有效制衡而不致坐大。但可惜的是，他仅仅当政七年便撒手西去，给了名门世族集团再度膨胀的空隙。

在曹丕病重驾崩之际，名门世族集团和魏廷旁系宗室之首领曹真通力合作，竟将另一位宗亲重臣曹休排斥在顾命辅政遗诏名单之外，令他远镇淮南。这有史籍可证：

（黄初）七年，文帝寝疾，（曹）真与陈群、司马宣王等受遗诏辅

政。（摘自《三国志·魏书·曹真传》）

（文）帝寝疾，（陈）群与曹真、司马宣王等并受遗诏辅政。（摘自《三国志·魏书·陈群传》）

于是，少帝曹叡登基之时，身边就有了曹真、陈群、司马懿三位辅政大臣：两个世族代表的名额、一个宗室代表的名额，这是“二对一”的比例，足以证明名门世族集团在朝廷权力格局中“一枝独大”，连宗室势力也有所不及。

曹叡在位时期：世族集团的“异峰突起”

魏朝太和元年，二十余岁的曹叡以少主登基之初，为了笼络名门世族集团，他对朝中所有的卿士大夫全部晋爵一等，原为关中侯、关内侯者升为亭侯，原为亭侯者升为乡侯，原为乡侯者升为县侯，原为县侯者皆增邑。这种“普天同庆、利益共享”的做法，证明了魏室皇权有时候不得不依靠讨好名门世族集团才能维护其统治地位。

曹叡年纪虽少，却继承了其祖父曹操的法家衣钵，“特留意于法理”，乃“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摘自《三国志·魏书·刘晔传》）。他素以振兴皇权为己任，遂对三大辅臣分而制之：一是让曹真出镇关中，专职对付蜀汉；二是让司马懿接任其亲家翁夏侯尚的征南将军之职，以骠骑将军之位执掌南部诸军之统率权；三是只留下为人行事温文平和的陈群在身边效劳。如此之安排，可以让曹叡“临机自断、少受掣肘”。

唯一的缺憾是他把一部分兵权分割给了以司马懿为代表的从军型名士集团，打破了“非曹氏、夏侯氏而不得掌兵”的祖制。但曹叡也实在是迫不得已—曹氏内部军事人才匮乏，只有倚重于外朝的名门世族集团为之分忧解难。

司马懿拿到兵权，是中原名门世族集团趋于壮大的标志性事件。而且，司马懿拿到兵权后毫无纰漏、连战连胜，驱诸葛瑾、平定孟达、抗敌陆逊，鲜有败迹，更是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了名门世族集团在朝廷权力格局中的分量和比重，同时也使得魏室皇权被进一步削弱。

在此期间，各大名门世族的“官二代”们纷纷冒出头来，“修浮华，合

虚誉”，互相交结为朋党，以浚通其入仕为官之捷径。夏侯玄、司马师等人号为“四聪”，诸葛诞、邓飏等人号为“八达”，中书监刘放之子刘熙、中书令孙资之子孙密、选曹尚书卫臻之子卫烈等人号为“三豫”。他们代表着名门世族集团的新秀力量正在兴起。

曹叡不愿他们坐大成势，遂暗中授意让司徒董昭从外廷上奏弹劾他们，从而酿成了“太和浮华案”。司马师、刘熙、孙密、卫烈等“官二代”或贬或免，给名门世族集团造成了不小的打压。

但名门世族集团对此暂时隐忍下来，伺机待发。曹叡竭力扶持董昭、刘晔、秦朗等亲魏派人士，以此制衡名门世族集团，然而均无大效。

这一时期的名门世族集团中骨干分子的政治独立性大大增强了，犹胜于魏文帝曹丕之世。《三国志·魏书·陈矫传》里写道：

（曹叡）车驾尝卒至尚书门，（陈）矫跪问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其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帝惭，回车而返。其亮直如此。

尚书令陈矫竟能以“职有所专，君不得干”的理由挡退曹叡，令其无颜而返，可见当时的名门世族集团对魏室皇权的制约达到何等强悍的地步！

《三国志·魏书·辛毗传》里也提到，曹叡操纵中书省制衡外廷众臣之际，依然有名门世族集团中的强硬派对魏室皇权的“长臂滥伸”不满不服：

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与往来。

后来在选定谁任尚书仆射这个关键职位上，“精勤旧吏”出身的王思和“忠亮计略胜人”的辛毗同为候选人。曹叡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本着“取其效力，不贵虚名”的原则，鉴于辛毗“性刚而专”，他若在尚书仆射职位上更加令自己行诏不便，遂最终选择了王思。但即使如此，曹叡

也不得不用“贴身宿卫之要职”卫尉一官来安抚辛毗和他背后的名门世族集团强硬派。

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与往来。毗子敞谏曰：“今刘、孙用事，众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尘。不然必有谤言。”毗正色曰：“主上虽未称聪明，不为暗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与刘、孙不平，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为公而毁其高节者邪？”。

在外廷，以兵权和军功为依托，司马氏家族迅猛崛起、一日千里，赫然已成为继颍川荀门之后中原世族集团的新一代“盟主”。尤其是司马懿于关中耗死蜀相诸葛亮之后，其声望完全达到了顶点。

曹叡对此十分忧虑。他冥思苦想出来的对策却是：“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收回了司马懿的大将军职务，准备留给自己的宗亲子弟。他这一近乎粗暴的做法，恰恰在司马氏父子心底埋下了深深的“隐刺”。

天不假年，暴疾突至，三十五岁的曹叡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临终前考虑到以夏侯献、秦朗、曹肇等宗室旁系贵族为主干，由燕王曹宇牵头，组成一个顾命辅政班子。在他的这个谋划中，名门世族集团完全被排斥在外。

然而，潜力极大、积势已成的名门世族集团岂会就此屈服？其“内线”刘放、孙资站了出来，以名门世族集团为后台，与曹叡暗暗“过招”。他俩打着“维护魏室长治久安”的旗号，向曹叡发出的第一招是抬出“先帝诏敕，藩王不得辅政”的金牌遗诏，一举逼退了曹宇；第二招是点明了“委祖考之业，付二三凡士”，直接否定了夏侯献、秦朗等辅政候选人的治事能力；第三招是拿出“外内壅隔、社稷危殆”的威胁之辞来震慑曹叡。

曹叡迫不得已，只好按刘放、孙资之言修改了顾命辅政遗诏：以曹真之嗣子曹爽为大将军及首辅大臣，以太尉司马懿为次辅大臣，由他二

人辅弼少帝曹芳。

表面上，在魏廷的最高权力格局中，宗室势力和名门世族集团是平分秋色的。实际上，曹爽的才能、资历、声望，远远不及司马懿。所以，权力的天平是严重倾斜于司马氏这一边的。而这一点，终将成为后来朝局剧变的“导火索”。

魏末时期：世族集团的改天换地

幼君在位、强臣辅政，正始年间的曹魏仿佛又回到了汉末少帝刘辩时期的情景，有识之士知之、警之而无可奈何，只能寄望于两位辅政大臣能够精诚合作、拱卫帝室。

明面上，司马懿和曹爽似是联手共治、你谦我让，看不出有什么“不和”之迹；暗底下，马、曹之争已然潜流涌动，彼此为了争夺最高权柄都在网罗羽翼、积极备战。

这一时期的名门世族集团终于可以在政局中堂皇正大地发挥主导性作用了。“太和浮华案”很快就被推翻：司马师、何晏、邓飏、诸葛诞、孙密、卫烈等“官二代”在仕途上纷纷得到“松绑”，又重新活跃在了曹魏的政治舞台上；原本借以监察百官的“校事”制度也被彻底废除，卿士大夫们再也不用工作和生活在魏帝设置的处处“耳目”的监视之下了。

但名门世族集团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分化得越来越显著：政治立场上，分成了拥曹派、拥马派和中立派三股势力；政治举措上，分成了以何晏、邓飏、夏侯玄等人为首的浮华空谈派和以司马懿父子、高柔、孙礼、王观等人为首的清流事功派；学术根基上，分成了以王肃、王祥、何曾等人为首的儒学礼法派和以何晏、阮籍、山涛、嵇康等人为首的玄学放达派。

而在正始年间，贯穿时代的主线还是马、曹之争，支线则表现在浮华空谈派和清流事功派的斗争、儒学礼法派和玄学放达派的斗争。从对比的力量上来看，拥马派、清流事功派、儒学礼法派是强势的、主流性的一方；而拥曹派、浮华空谈派、玄学放达派是弱势的、支流性的一方。

最先公开挑起马、曹之争的，是曹爽一方。他和他背后所依恃的浮华空谈派以太傅之位将司马懿在朝政上“虚悬架空”，同时实施了自己“改易旧制”的揽权立威之举。

他们与名门世族集团“刀兵相见”的最核心的一条改革举措就是：削减地方行政机构，把原有的州、郡、县三级行政机构压缩成州、县两级，去掉了郡太守、郡中正、郡官署等一系列职位和人员。而郡这一级行政机构，先前多由各地名门世族把持。

曹爽和浮华空谈派强行削减了他们，却无余地安置他们，自然激起了整个名门世族集团的汹汹不满。

然而，此时的曹爽及浮华空谈派权倾朝野、一手遮天，又独断专行、骄奢淫逸，单个儿的名士大夫根本无力制约。像孙礼、王观等“刚直忠亮”的清流事功派名士与之抗争后，或贬或迁，都遭到了边缘化处置。激愤无助之下，他们只有投靠在司马懿父子身边，借助司马氏的威望和权势来斗倒曹爽及浮华空谈派。曹爽和他身边的浮华空谈派“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自己孤立了自己，自己削弱了自己，自己把所有的盟友都推到了司马氏的那一边。

高平陵事变爆发后，司马懿父子出手狠辣，将曹爽兄弟及何晏、邓飏、丁谧等浮华空谈派首领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同时，司马氏独揽大权，正式开启了以马代曹、亡魏成晋之进程。

嘉平元年，司马懿的亲家翁、东海王氏一门的族长、太常卿王肃奉诏册命司马懿为“丞相，增邑万户，群臣奏事不得称名，如汉霍光故事”（摘自《三国志·魏书·少帝曹芳纪》）。表明名门世族集团大多认可了司马氏代魏而立的正当性。但司马懿和曹操一样，选择了谦退待时，没有接受魏帝的册命。

既然名门世族集团对司马氏的代魏大业如此支持，司马懿也投桃报李：通过魏帝下诏设置州属大中正之官，“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先前每一州有数人担任州中正，而大中正则为这数名州中正之首领，专管举州上下的各级中正官，由他一人牵头负责将各类品状上呈司徒府及选曹。魏国有幽、冀、并、青、兖、徐、扬、

豫、司、荆、雍、凉等十余州，州属大中正必由各州名门世族之极盛者任之，名额也只有十余个。名门世族集团通过操纵这十几个大中正就能垄断各州的人事举荐权。司马懿这么做，进一步强化了名门世族集团的政治实权，为后世门阀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名门世族集团也自然更对司马氏感恩戴德。

司马懿死后，拥马派直接推戴司马师继父执政。魏室感到极大的威胁，由以李丰、张缉等人为首的外戚派与拥马派展开了激烈的抗争。《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记载：

（李）丰自以身处机密，息（李）韬又以列侯给事中，尚齐长公主，有内外之重。

张缉之女则为少帝曹芳之皇后。但外戚派势单力薄，很快被司马师兄弟一扫而灭。

为了震慑残余的拥曹派势力，司马师废帝立新，引蛇出洞。毌丘俭、文钦等两个地方性拥曹派势力集团果然按捺不住，闻变起兵讨伐司马氏。但司马氏“挟天子以讨不臣”，在郑袤、王肃、钟会、傅嘏、诸葛诞等拥马派名士们的鼎力支持下，迅速压平了毌丘俭、文钦的反抗，从而取得了代魏立晋的决定性胜利。

至于后面的诸葛诞之乱，其实是司马氏集团最高权力交接时的一段“内乱”小插曲。在剿灭毌丘俭后的返京途中，司马师暴亡，司马昭紧急接掌朝中大权。而诸葛诞身为司马氏的重要姻亲，资历深厚、功勋卓著，自以为地位不在司马昭之下，遂对司马昭掌权不甘不服。司马昭只得将其全力铲除，以维护司马昭一脉在司马氏集团中的领袖地位。

荡平诸葛诞之后，司马昭声威大振，后又经历云龙门曹髦事件，在舆论哗然的情形下，静默了数年。其间，由于拥曹派几乎已被剪灭净尽，司马昭非但未似当年曹操那般备受阻击，而且还多次被名门世族集团劝进加爵为公、享礼九锡。他行事慎重，对此一一拒绝。

不过，司马昭为了替将来的代魏立晋预做铺垫，他着意使自己的政治身份逐渐特殊化，由世族集团的“盟主”角色逐渐转型为“天下一人”的帝王之尊。《世说新语》里便写道：

晋文王（司马昭）功德盛大，座席严敬，拟于王者。

而朝中所有的名门世族也基本默认了他应当享用这种超乎常人的威仪和待遇。

司马昭见到名门世族集团确已尽皆归顺，这才发动灭蜀之役，取得不世之功，然后开基立晋、代魏而立。

而名门世族集团亦兴高采烈地簇拥着司马氏一同迈入了门阀雏形阶段，终于迎来了自身即将坐大成势乃至架空皇权的新时代之曙光。

第二篇

代汉之争

第六章 谁是真正的“代汉者”

东汉末年，廷失其鹿，而群雄逐之，斗智斗力，难分难解。但要真正做到改朝换代、移天易日，则必有相呼应的谶纬之说以兴舆论，然后有志有为之枭雄方可乘势而起。

古人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乱世中各方竞夺的这个“名”，其实就是引经据典而来的“谶纬之名”。有了“谶纬之名”应验于身，有志有为之枭雄才能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成功乃是“顺天应人、名实交辉”。

例如，西汉末年，“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言四处流传，王莽新朝的国师刘歆甚至深信不疑，还给自己改换新名为“刘秀”，以应此谶。不料，这道谶言最终应验在了光武帝刘秀的身上。而且，刘秀登基称帝之后，还不惜保留王莽新朝通行的货币—“货泉”，以此来彰显自己身为“白水真人”这一“谶纬之名”。他如此施为，也是意欲借此压服士民之异心，巩固自己的政权。

到了东汉桓、灵二帝之时，天下渐乱，人心思变，“代汉者，当涂高”这条谶言也应运而生。据说，这条谶言源自《春秋谶》这部典籍，而《春秋谶》现今已失传，涉及“代汉者，当涂高”的只有这样一段言语：

汉家九百二十岁后，以蒙孙亡，授以承相。代汉者，当涂高。

当时，这条谶言可谓风行天下：上至袁绍、袁术这样的名门公子，中至蜀地的术士周舒，下至西凉武夫首领李傕身边的无名女巫，都声称读过《春秋谶》、见过“代汉者，当涂高”之语。于是，各地拥兵而起的

枭雄们都打起了这条谶言的文章，企图用它来证明自己代汉自立的天道性与合理性。

第一个站出来利用“当涂高”之谶为自己夺权造势的是西凉武人集团的末代首领李傕。他请来的一个女巫牵强附会地解析谶言道：

涂即途也，当涂者，阙也。傕同阙，另极高之人谓之傕。

但女巫身份低微，她的苦心解析根本得不到名门世族集团的认可。所以，李傕也只是拿出来试探了一下朝野的风声，见朝野内外毫无反响，便不了了之了。

第二个拿“当涂高”做文章的是下邳郡人氏阙宣，自以为姓氏中有“当涂者，阙也”之寓意，正与“当涂高”相吻合，于是自称天子，兴兵起事，结果很快就被时任徐州牧的陶谦镇压了。

第三个以“当涂高”为己兆而应之的异姓枭雄可谓来历不凡，他便是出身于“四世三公”之汝南袁氏的袁术。袁术自恃高门豪族，又坐拥豫、徐、扬等三州十一郡的地盘，野心勃发，便将“代汉者，当涂高”之谶言往自己身上硬贴：“涂”即“途”也，而袁术之表字恰为“公路”，岂不正与谶言相呼应？于是，他成为汉末十八路诸侯当中第一个正式建号开国之人，以汉室为“伯家”，自称“仲家”而代之。

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摘自《后汉书·袁术列传》）

可惜，当时名门世族集团的主流共识是“拥汉匡复”。逆流而行的袁术，当然是孤立无援、自取其败。他在众叛亲离之中又遭曹操大军的猛击，终于身死国灭，化为黄粱一梦。他临死前还想把“仲家”帝号送于其族兄袁绍。袁绍虽然暗暗认可，但在明面上也不敢与“拥汉匡复”的主流共识相对抗。他终其一生，也没能像袁术那样建号自立过。

第四个真正取东汉一脉而代之的便是曹操父子。曹操晚年时已然荡定中原，独揽朝纲，“三分天下有其二”，积威积德之势已成，连江东孙权都上书称臣，向他劝进禅代之事。然而，曹操自知时日无多，便明

言："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他刚一去世，其嗣子曹丕便启动了代汉立魏之禅让大事。"代汉者，当涂高"这条谶言被曹魏用作舆论宣传。东汉最后一位太史丞许芝以谶纬之学解说：

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摘自《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而魏又与"巍"音韵相近，"巍"亦是"高"之含义，又可印证"当途高"之"高"。所以，精通文学的曹丕也欣然接受了这种解析，自以为"代汉者，当涂高"谶语应验于身，遂代汉而立、开基建魏。但《春秋谶》里声称："汉家九百二十岁后，以蒙孙亡，授以承相。"他代汉之前位居丞相，应了"授以承相"这四字；他亦可以把汉献帝刘协视为"蒙孙"。

但"汉家九百二十岁"这段话，他却一时绕不过去：自西汉开国元年（公元前202年），至东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为止，汉朝才过了四百二十二年左右，那剩下的五百年怎么搁？曹丕和他的臣下们只能无视这"汉家九百二十岁"七个字，另行编造了一个故事把这一切掩盖过去。

（汉武帝）行幸河汾，中流与群臣饮宴，乃自作《秋风》辞，顾谓群臣曰："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群臣进曰："汉应天受命，祚逾周殷，子子孙孙，万世不绝，陛下安得此亡国之言，过听于臣妾乎？"上曰："吾醉言耳。然自古以来，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摘自《太平御览》）

在这个故事里，有"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魏朝君臣巧妙地把"四百二十年而尽"的汉祚点明出来，勉勉强强地堵住了一些非议。

但朝野之间还有一部分杂音，例如曹氏宗亲大将夏侯惇就认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摘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可是曹丕哪有其父之雄才伟略去一举扫平蜀汉和江东？急功近利之下，他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至此，"代汉者，当涂高"这段谶言算是圆满实现，魏朝将长存下去，而这谶言也应当退出历史的舞台了。

谁都没有料到，仅仅过了二十余年，魏朝重臣司马懿坐大成势，司马氏如日中天，曹魏又落到了当年汉献帝时“君弱臣强”的境地。“代汉者，当涂高”之谶言再度泛起，愈涨愈高。

在马曹之争中，司马懿、司马师二人从未引用“代汉者，当涂高”谶语为己方的舆论工具去打击政敌。他们当时运用的是凉州“玄石图”里的“大讨曹”谶言。但所谓“天降奇石”之铭文，终究不如《春秋谶》这样的典籍在天下士民中更有说服力和正统性。于是，继司马懿、司马师之后，司马氏集团的第三代首领司马昭开始利用“代汉者，当涂高”来大做政治文章。

这个标志性事件之一，便是曹魏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司马师兄弟联手废帝立新，司马昭“以参定策，进封高都侯”。他的爵号“高都”二字大有深意，与“当涂高”相映成趣。其一，“当涂高”者，当涂之高处多为都邑，与“高都”之“都”吻合；其二，内有“涂高”二字，而司马昭的“高都”爵号中“都”与“涂”音韵相近，似有呼应之兆。

在司马昭获得“高都侯”爵号之后，他身边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事迹：正元元年十月，新帝曹髦登基而立；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十一月左右，司马昭进封高都侯；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正月，毌丘俭、文钦因司马师废帝立新而讨之；正元二年（公元255年）二月，司马师听从王肃、傅嘏、钟会之劝谏，抱病亲征毌丘俭、文钦，司马昭留守洛阳；正元二年（公元255年）闰二月，毌丘俭、文钦被一举荡平，司马师亦因受文鸯突袭冲帐之下而目裂出眶，疾笃而亡，临终前交权于司马昭；同月，司马昭返京执政，升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纵观这一时期，在司马昭晋封为高都侯前后的短短半年里，他便骤升而起，继兄当国，权倾朝野。这正给了司马昭强烈的心理暗示：是“高都侯”这个爵号带给了自己莫大的幸运！所以，后来魏帝多次要给他加封邑户，他都推辞不受。他对“高都侯”爵号如此之钟爱，甚至不去承袭自司马懿、司马师一脉传下的舞阳侯之爵。

那么，究竟是谁向朝廷建议给司马昭封赏了“高都侯”这个爵号呢？《晋书》及相关史籍没有明载。但笔者联系魏晋禅代的历程推测，应该是由司马昭的岳父、精通经纬易理之学的鸿儒—王肃建议的。《三国志·

魏书·王肃传》里写道：

时有二鱼长尺，集于武库之屋，有司以为吉祥。（王）肃曰："鱼生于渊而亢于屋，介鳞之物失其所也。边将其殆有弃甲之变乎？"其后果有东关之败……是岁，白气经天，大将军司马景王（指司马师）问肃其故，肃答曰："此蚩尤之旗也，东南其有乱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则天下乐安者归德，倡乱者先亡矣。"明年春，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景王谓肃曰："霍光感夏侯胜之言，始重儒学之士，良有以也。"

这说明王肃通常都在用谶纬之术推断时事、剖析要务，而他建议给自己的女婿司马昭戴上"高都侯"之爵，便是推动了"代汉者，当涂高"谶言由虚入实，为司马氏代魏夺权预做舆论铺垫。

一年零五个月后，曹魏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夏六月，魏廷再次晋封司马昭为"高都公"，拥地七百里。司马昭自知尚无功勋以承之，不愿由侯升公，仍是坚守着"高都侯"这个爵号。

又过了一年左右，诸葛诞在淮南起兵作乱，并以其子诸葛靓为人质而勾连东吴，引来外敌夹击司马昭。当时，诸葛诞拥兵十余万，东吴援军近十万，来势汹汹，震惊了整个朝野。司马昭临危不乱，调集青、徐、荆、豫等四州兵力，分取关中游军，共计二十六万人马，奉天子及太后而东征。用了近九个月的时间，司马昭便内除诸葛诞、外灭东吴军，大获全胜，一时声威大振。魏帝不得不封司马昭为晋公，加九锡之礼，进位相国。

此时，司马氏政权的"晋"之名号终于正式浮出水面。司马昭所享的高都县邑本就在并州境内，并州又名"晋"。而"晋"本身，又有"明出地上""蒸蒸日上"之意象，与"当涂高"的"高"呼应。而《易经》里"晋"卦的卦辞还有"康侯用锡马蕃庶"的词句，又与"司马氏"的"马"相辉映。《象传》又言："晋者，进也。"司马昭由"高都公"而为"晋公"，是"进而又进""高而再高"，以成"当涂"之"至高"。这一切，都是司马氏一派的数术之士借"代汉者，当涂高"之谶言来为司马昭篡魏自立的"天命攸归"做舆论上先声夺人的渲染。

然而，司马昭毕竟还是明智的。他仍然认为自己代魏绍汉的时机还

不够成熟，于是继续坚持留守在“高都侯”的爵位上不动，同时潜谋破局之举。

此后，马曹之争也终于到达了临界点：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五月，魏帝曹髦不甘皇权旁落，亲自带兵攻杀司马昭，不料反被司马昭之部曲成济当众刺死。这一弑君事件给司马昭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也无形中推迟了司马氏的篡代之业。

司马昭必须通过对外征伐以建“非常之功”，才能扭转僵局，才能抹去自己“弑帝震国”之瑕疵。而这“非常之功”只能是“吞蜀取汉”。为什么这样说呢？

当时一部分士民认为汉献帝刘协虽然禅位于魏，但昭烈帝刘备开创的季汉犹在蜀境巍然而峙。所以，曹魏算不上是真正的“代汉而立”。只有吞掉季汉，司马氏政权才堪称实至名归的“代汉者”。于是司马昭力排众议，决定“吞蜀取汉”以应谶言。

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冬，司马昭的部将邓艾、钟会先后攻入蜀汉，其主刘禅奉玺而降，季汉至此而亡。司马昭得此硕勋，便当仁不让地坐上“晋公”之位，受任大魏相国，正式启动了以晋取魏之大事。

《春秋谶》：“汉家九百二十岁后，以蒙孙亡，授以承相。代汉者，当涂高。”这段谶言又被司马氏一派的谶学之士拿来解析宣示：“汉家九百二十岁”，其实是指昼夜各算一年，为四百六十年。例如《三国志·魏书·朱建平传》所记：

文帝（指曹丕）问己年寿，又令遍相众宾。（朱）建平曰：“将军当寿八十，至四十时当有小厄，愿谨护之。”……文帝黄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谓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谓昼夜也。吾其决矣。”

算起来，从西汉刘邦开国元年（公元前202年）直至蜀国季汉灭亡之年（公元263年）为止，汉朝存世共四百六十五年，勉强应了谶言。“以蒙孙亡”，其中之“蒙孙”指的是刘禅这样的文弱之君。“授以承相”，“相”指司马昭所任之“相国”也。“代汉者，当涂高”，自然便是比“魏”更高、更大的“晋”了。《晋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阐释：

（习）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指曹操）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指司马昭）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指司马炎）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

至此，“代汉者，当涂高”这段谶言从理论到实际都已全部“应验”。司马氏用自己苦心孤诣的种种作为努力迎合这段谶言，务求“无缝对接”，丝丝入扣。他们这样处心积虑，也是想为自家政权披上“天命攸归”的“圣衣”而炫示于世人。然而，可惜的是，西晋建国五十年后便分崩离析，摇摇而坠；东晋在江南立国一百年后也寿终正寝，不再复兴。合两晋之气数而算，只有一百五十年左右，不及汉朝的一半。

从那之后，“代汉者，当涂高”谶言就这样虎头蛇尾地封冻在了历史的最深处。

第七章 曹家父子之谋

曹操“借天子以纳人心”之战略浅析

世人都称曹操能在群雄竞逐的汉末乱世里所向披靡、连战连胜，其最大的“法宝”便是他“挟天子以讨不臣”的政治战略。

诚然如此，这一点是连曹操的对手都无法否认的。不过，在笔者看来，“挟天子以讨不臣”只是曹操对外战略中“硬”的一手。他其实还有“软”的一手，可谓运用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那就是他“借天子以纳人心”之大略。

东汉末年以来，汉室天子虽已权势衰落，但它的正统名分还在，汉室王朝四百余年的积德积威之势还在。想当年一代枭雄王莽诡计多端，谋权篡位，最后亦遭身死族灭；而横绝一世的董卓，不也照样亡于一旦？汉室的正统和法统，绝非那些割据一方的诸侯所能比拟的。所以，各地名门世族集团都以高举汉室旗帜为自己立身行道之根本。“拥汉匡复”是士大夫阶层的主流共识。

在这种主流观念的影响之下，即使是皇甫嵩、朱儁、张温等战功累累的名将能臣，其才略犹在董卓之上，但汉廷一纸天子之诏便能令他们“趋之若鹜而不敢滞留”。况且似袁绍、袁术、曹操、刘表等后起之秀，其资源才略尚还未必能望其项背者乎？

回过头来再谈，曹操当时西迎汉献帝刘协，抢占先机，定都于许县，把东汉小朝廷初揽入手。但他彼时只被汉献帝授予司空之职，屈居于太尉杨彪、司徒赵温之下。曹操也不得不顾及名门世族集团的观感，不好公开利用自己司空府的旗号邀买人心。而且，实事求是地说，司空府这个旗号的含金量实在有些低，朝野间一二流的名门世族中人都未必瞧得上。你看，建安六年（公元201年）曹操以司空府的名义去征辟河内青年名士司马懿，司马懿就敢称疾不起；到了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升任丞相、独揽大权，这时候再去征辟司马懿，他就乖乖地来了。

但在曹操尚未独揽朝纲之前，他便只能通过中原世族之掌门人、汉

献帝的首席重臣—荀彧所掌控下的尚书台，运用天子的名义来大张旗鼓地招揽人才、收纳人心。

首先，汉献帝拱居于许都，这本身就是一个“吸引力之源”。曲阜孔氏一族的代表孔融、西凉武人集团中的“拥汉派”代表段煨、原幽州名士之首田畴等人，都在汉室大旗的感召下不远千里地投靠了过来。哪怕他们到了许都后会渐渐与曹操貌合神离，但至少他们不会依附在各个地方割据势力上与曹操公然为难。

其次，曹操经常利用汉廷的“征辟察纳”之权，以天子之诏的形式征辟他所需要的各类人才，用以充实自己的政治力量。例如，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左右，《三国志·魏书·华歆传》里记载：

太祖（指曹操）在官渡，表天子征（华）歆。

曹操借汉帝之手征召华歆的目的，显然是不想他为江东孙氏效力，以此削弱江东孙氏的力量。而华歆亦是闻召即行，连孙策也不敢公然强挽。而另一位著名鸿儒王朗，身为东海郡王氏一脉之代表，亦是被“太祖表征之，（王）朗自曲阿展转江海，积年乃至”（摘自《三国志·魏书·王朗传》）。曹操的这一做法，连孔融也为之称赞。

主上（指汉献帝）宽仁，贵德宥过。曹公辅政，思贤并立。策书屡下，殷勤款至。

正是在曹操的竭力拉拢之下，华歆、王朗都渐渐倒向了他的阵营。后来，在由汉入魏的历程中，华歆、王朗便成了汉魏禅让的有力推手：魏国开基建业，华歆晋位太尉，王朗荣升司徒，成为曹氏政权中的中坚力量。

再次，曹操常用汉廷的“封爵赏官”之权，以天子玺书的形式给予各地诸侯及其部下各种官爵之荣，以此分化和瓦解对手阵营的内部势力。例如官渡之战期间，刘表派遣自己府中的从事中郎韩嵩前往许都以观虚实。韩嵩临行之前便明言在先：

嵩使京师，天子假嵩一官，则天子之臣，而将军（指刘表）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则嵩守天子之命，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摘自《三国

志·蜀书·刘表传》）

果然，他一到许都，便被曹操借天子之诏拜为侍中之官，兼任零陵郡太守，并返回襄阳盛称汉廷、曹操之恩德，劝说刘表弃兵归顺。刘表迫于天子名义之所在，反倒拿韩嵩无可奈何。而吕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号，也曾经派遣陈登为使到许都替自己谋求“徐州牧”之官爵。

曹操的这一招对刘备麾下的心腹助手麋竺、麋芳兄弟也使用过。《三国志·蜀书·麋竺传》里记载：

后曹公表（麋）竺领嬴郡太守，竺弟（麋）芳为彭城相。

而且，他在表文里对麋竺极尽拉拢收买之能事。

泰山郡界广远，旧多轻悍，权时之宜，可分五县为嬴郡，拣选清廉以为守将。偏将军麋竺，素履忠贞，文武昭烈，请以竺领嬴郡太守，抚慰吏民。

只不过，麋竺兄弟都尽心竭诚地追随了刘备，没有被他借天子之诏笼络过去。

最后，曹操每逢“近攻而远交”之际，便运用天子名义对相关势力或抑或扬，抑则令其师出无名，扬则令其生骄生怠。例如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初迎献帝于许县，意欲铲除近在肘腋的吕布和袁术，为断绝他们的外援，他顺势把大将军之名位以天子诏命而转让给朔方的劲敌袁绍，满足他的虚骄之心，令他一时不好南下支援吕布、袁术。同时，他抽过身来，又以诏命公布天下，明示吕布、袁术为逆贼，从政治上完全孤立他们，然后一一而荡平之。

综上所述，曹操就是靠着这“借天子而纳人心”之大略一步一步榨干了汉廷的法统力量，直至最终实现“汉魏禅让”之大业，把最后一批汉室的遗忠遗老也拉拢过来，创造了继王莽建新之后又一“借壳上市”的改朝换代之政治奇迹。

曹丕的“分权制衡术”及其政治影响

东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冬十月，魏王曹丕在文武群臣的

大力劝进之下，接受汉献帝刘协的禅位，登基即位，君临天下。

但曹丕能够完成改朝换代，并非自身拥有足够的功业所致，而是出于其父曹操的丰功伟绩之荫泽与心腹众臣的推戴。所以，连他的亲妹妹、汉献帝的正宫皇后曹节都对他急功近利的篡代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不服。《三国演义》里对这一幕情景进行了合乎史实的演绎—曹节是这样讥骂曹丕的：

吾父（指曹操）功盖寰区，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窃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几，辄思篡汉，皇天必不祚尔！

《后汉书》里的曹节并没有骂得这么详细。

魏受禅，遣使求玺绶，后怒不与。如此数辈，后乃呼使者入，亲数让之，以玺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尔！"左右皆莫能仰视。（摘自《后汉书·卷十下·皇后纪》）

但她的言外之意却不得不令曹丕返躬自省。他作为一个在名门世族集团的鼎力支持下才坐上御座的中年皇帝，毕竟对外无开疆拓土之功，对内无惠政安民之勋，虽然顶着"开国之君"的旒冕，但实际上更像是一个坐享父荫的受成之主。新朝初建，朝野上下各个势力集团都在蠢蠢欲动，为自身争取更大的利益，酝酿着无形而又激烈的风暴。面对此情此势，自东宫谋嗣之时便能"御之以术，矫情自饰"的曹丕自然是不甘坐视，欲以周密的谋算和精巧的手法来压制各大势力集团、巩固自身皇位。

首先，曹丕深深懂得"代汉者，当涂高"这句谶言背后的真实寓意。他自己就是"代汉者"，自然对"当涂高"三字有着和臣下完全不同的理解。《韩非子·孤愤》一文中写道："当涂之人擅事要，则外内为之用矣。"作为"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摘自《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的曹丕，肯定是读过这一篇文章的。正因为他和父亲是"擅事要"的"当涂之人"，所以才会代汉成功。那么，推而广之，今日"代汉者"为"当涂高"，则他日"代魏者"也一样岂非"当涂高"乎？所以，自此时起，曹丕禅位称帝之后，处心积虑、念念在兹的，便是坚决杜绝自己的魏廷上下再度出现一个类似于父亲曹操那般"擅事要"的"当涂之人"。唯

有如此，魏室方能江山永固。而他自己琢磨独创出来的，便是一整套的“分权制衡之术”，以此防止“一枝独大”的“当涂之人”产生。

他“分权制衡”的第一步，就是在建立魏朝之后，立即废除了丞相之制，重设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职，不允许任何臣下能够“一手遮天”。对钟繇、华歆、王朗等老一辈的宿望重臣，曹丕把他们一律转升到“坐而论道、华而不实”的三公职位上去休息养老，尽量给足优待；对陈群、司马懿等颍川系新秀骨干，他又将他们安插在尚书台、御史台、九卿署等“起而行道、经纶机务”的职位上去切实效劳，赋予他们实权。这样一来，曹丕便很适当地处置好了朝臣当中“新与旧”的重大问题。

他“分权制衡”的第二步，就是处置曹魏宗室之间“亲与疏”的问题。自古以来，人们都是“亲直系而疏旁系”，而曹丕却反其道而行之。只因他在东宫世子之位时，他的最大政敌恰恰来自他的同胞兄弟。那时，他的三弟曹植以诗文绝妙而名驰儒林，丁仪兄弟及杨修竟奉以夺嗣，“（曹）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指曹操）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节选自《三国志·魏书·曹植传》）；他的二弟曹彰骁勇善战，身任关中主将，军功卓著，却又与曹植关系甚密，有结党互倚之嫌。所以，曹丕对这两位直系宗室是严加猜防的。他一登基，便将曹植、曹彰逐出京都，夺去实权，终生闲置不用。但江山藩屏，又非宗室而不可倚重。于是，曹丕对曹真、曹休、夏侯尚等旁系宗室引为臂助，因为他们在法统和名分上都不足以威胁自己的皇权。他倚用曹真、曹休、夏侯尚等人，则是为了监控外廷之大臣。以历史实践而证明，曹丕生前这一“亲旁系而疏直系”的权力制衡，还是具有一定效果的。

帝（指曹丕）复问曰：“吾梦摩钱文，欲令灭而更愈明，此何谓邪？”（周）宣怅然不对。帝重问之，宣对曰：“此自陛下家事，虽意欲尔而太后不听，是以文欲灭而明耳。”时帝欲治弟植之罪，逼于太后，但加贬爵。（节选自《三国志·魏书·周宣传》）

他“分权制衡”的第三步，乃是处置曹魏外戚集团的“远与近”问题。在先前的夺嗣之争中，曹丕的母亲卞太后一直是偏向于曹植、曹彰的，

而且登基后对他们也是维护有加。

因此，曹丕对卞氏一族等外戚集团并无获助感恩之情。他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便公然下诏：

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摘自《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从源头上堵住了外戚集团的坐大成势之路。但外戚集团毕竟也是皇权的一大助力，可以在权利共享上边缘化，但不可完全摒弃。于是，曹丕便将卞兰、卞琳等表兄弟安插到奉车都尉、步兵校尉等禁军要职上去，以显亲近笼络之意。在曹丕的谋算中，这些外戚子弟又可以用来监控曹真、曹休等在外领兵坐镇的旁系宗亲们。

曹丕“分权制衡”的第四步，则是处置曹魏政务机构之间的“虚与实”问题。他登基之初，尚书台由陈群、司马懿两位强势之士主导，对自己的皇权形成了极大的制约。例如，他对多次直颜冒犯自己的右中郎将鲍勋甚为不满，但在陈群、司马懿的联名举荐之下，他还是不得已而升鲍勋为御史中丞。于是，曹丕改易先前丞相府的秘书署为内廷中的中书省，由著名文士刘放、孙资担任主官，典掌机密，收文发诏，把尚书台的枢密之权分了过来。如此一来，中书省参谋帷幄之权渐实，而尚书台绸缪经纶之职渐虚，曹丕则居中以圣心独裁而令行禁止。到了曹魏后期，连辛毗这样的重臣之升迁，尚书台尚且不能自主，还须由中书省在内与君王议决。

曹丕“分权制衡”的第五步，乃是处置曹魏官僚集团之间“散与聚”的问题。即使陈群、司马懿是他的“东宫之友”，他也仍在这二人中间大搞“离散均衡”。比如，

时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与往来。毗子敞谏曰：“今刘、孙用事，众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尘。不然必有谤言。”毗正色曰：“主上虽未称聪明，不为暗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与刘、孙不平，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为公而毁其高

节者邪？”冗从仆射毕轨表言：“尚书仆射王思精勤旧吏，忠亮计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访放、资，放、资对曰：“陛下用思者，诚欲取其效力，不贵虚名也。毗实亮直，然性刚而专，圣虑所当深察也。”遂不用。出为卫尉。（摘自《三国志·魏书·辛毗传》）

魏廷选曹（即吏部）之职素由陈群及其亲信陈矫所垄断。而曹丕随即起用司马懿的胞弟司马孚予以制衡，不欲令陈群、陈矫利用人事选任之权以结党营私。《晋书》里写道：

时当选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旧人颇讽谕主者，便欲就用，不调余人。孚曰：“虽有尧舜，必有稷契。今嗣君新立，当进用海内英贤，犹患不得，如何欲因际会自相荐举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贵。”遂更他选。（摘自《晋书·司马孚传》）

这其中的“主者”，正是身为尚书令的陈群和身为选曹尚书的陈矫。司马孚出来公开反对，无疑是得到了曹丕的暗中授意。曹丕后又将司马孚转任内廷的中书郎、给事常侍，使他更能名正言顺地制约陈群、陈矫。所以，在这一方面，曹丕本心是希望各个势力集团散而不聚的，他作为君王方能“分而制之”。

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调控各个势力集团形成合力共同对付外敌。他在临终前决定的顾命辅政大臣名单就非常显著地凸显了他“聚内以对外”的制衡思维：那份名单上共有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四个人。他的第一层“聚”的用意是：合陈群、司马懿两位宿望重臣之力以制曹真、曹休两位旁系宗亲；他的第二层“聚”的用意则是：合曹真、曹休两位旁系宗亲之力又可反制陈群、司马懿等外臣；他的第三层“聚”的用意又是：合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四人之力以制曹植、诸葛亮、孙权等外敌。

曹丕这一套环环相扣的“分权制衡术”确实还是立竿见影、颇有成效的，至少在他生前和身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魏廷上下并没有出现一个能够“擅事要”的“当涂之人”。太子曹叡继位后，全盘接受了他这些做法，坐享这一“分权制衡”体系所带来的“红利”。然而时移势易，曹氏内部人才凋零，曹叡终其一生也未能寻觅到曹真、曹休、夏侯尚那样能征善

谋、出将入相的宗亲人才来夯实魏室皇权的支柱。同时，司马懿父子等外廷重臣的势力借着魏室无人之际日渐膨胀，直到最终突破了曹丕、曹叡父子一直努力营造和维护的“分权制衡”体系，犹如异峰突起，势不可遏。

这期间，曹叡还竭力扶持中书省官员与外廷众卿相制约，本以为他们是皇权的附庸而加以绝对的信任，却不料孙资、刘放自身就是出自郡望高门，与外廷的名门世族集团枝叶相连、息息相通，又如何能做到绝对的“互相对立”？所以，他俩才在最后关头力挺世族名门集团的首领司马懿为辅政大臣！曹叡迫不得已，在临终前拉了个平庸无能的曹爽来“对冲”司马氏，只能算是白费心机，终无所成。

《世说新语》里有一则故事，专写曹丕生前所筑的陵云台。

陵云台楼观精巧，先称平众木轻重，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常随风摇动，而终无倾倒之理。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材扶持之，楼即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

其实，那一整套错综复杂的朝廷“分权制衡”体系，就是曹丕为魏室的长久统治而苦心构造的一座“陵云台”。魏明帝曹叡苦于宗室无人，又迫于吴蜀外患，才不得不以司马氏为“大材”来扶持魏室，结果导致权力天平渐渐失衡。但他也徒叹奈何—《论语》里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曹魏宗室确无可用之材，意味着这个“本”都已经颓坏了，那么魏帝们玩弄再复杂再精妙的“分权制衡”之术，也不过是“水中捞月”“镜里摘花”罢了！

第八章 曹操为什么不做开国皇帝

建安年间荀彧及拥汉派的“反曹暗斗”

公元196年，是东汉建安元年，从这一年起，曹操亲迎汉献帝刘协迁都于许县，将汉室小朝廷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并施行“奉天子以令不臣”“借天子以纳人心”之两大方略，把自己的代汉大业一步一步推向了巅峰。

虽然在此期间，曹操于表面上对汉帝表现出了极度的恭敬和尊崇，但以荀彧、杨彪、孔融为首的拥汉派却是不易被骗的。他们和曹操展开了一次次惊心动魄而又不露声色的暗斗，多方掣肘和牵制，严重阻碍了曹操“化家为国、以曹代汉”的谋划进程。

在消灭袁绍之前，杨彪、荀彧、孔融等拥汉派对曹操是鼎力支持的。毕竟，当时的袁绍是曹操和拥汉派共同的大敌。他们只有携起手来一致对外，才能取得抗袁胜利。

官渡之战结束，袁绍大败之后，曹操志得意满，骄气勃发，企图在代汉大业上更进一步。《后汉书》记载：

（建安）九年，（曹）操拔邺，自领冀州牧。有说操宜复置九州者，以为冀部所统既广，则天下易服。

曹操正有此意，将欲从之，求问于荀彧。

荀彧的目光何等之敏锐，一下便明白了曹操的言外之意：他想以冀州为基地而拓展自己的代汉之业！想不到刚刚铲除了一个大逆贼袁绍，却又产生了第二个“袁绍”！但荀彧此刻亦不能硬行劝阻，便采用“摆事实，算细账，量得失”的方法向曹操婉言进谏。

今若依古制，是为冀州所统，悉有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邺城，海内震骇，各惧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众。今若一处被侵，必谓以次见夺；人心易动，若一旦生变，天下未可图也。愿公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楚郢，责王贡之不入，天下咸知公

意，则人人自安。须海内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摘自《后汉书·荀彧传》）

见到荀彧把利弊得失算得如此精确，曹操也只好答道：“微足之下相难，所失多矣！”于是，搁浅了复置九州的动议。

这是荀彧及拥汉派与曹操在建安年间的第一个回合，荀彧险胜一招。从此之后，他们双方的暗斗就正式拉开了帷幕。

时隔不久，曹操将提议“复置九州”的劝进功臣董昭擢拔成“千秋亭侯”，与荀彧所获得的“万岁亭侯”形成意味深长的鲜明对照，以此暗示荀彧应当从此拥曹代汉。

然而，荀彧对此保持了沉默，没有做出任何响应。

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基本上已经底定北方，终于腾出手来，意图对许都的汉室小朝廷实行“权力洗牌”。《后汉书·杨彪传》记载了他祭出的一记重招—“诸以恩泽为侯者皆夺封”，要破除拥汉派世族集团的世袭之权，削减出诸多的列侯爵位，然后由他来安插自己的亲信之士。

这一个回合中，他高举着“任人唯贤、废除冗官”的大旗，连荀彧也不能公开反对。很显然，他胜了一招。拥汉派的首领杨彪见势不妙，遂以退为进，称疾请辞，把太尉之位虚悬了出来。

曹操这个时候就应该有了“废除三公、自任丞相”的揽权之谋，但他隐而不发，还在等待着最佳的时机出手。

到了第二年，即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率军亲征乌桓，不料他最得力的谋士“智囊”郭嘉却在随行途中暴病而亡。他的死亡，极是蹊跷。郭嘉曾经根据自己的体质状况而言：

吾往南方，则不生还。（摘自《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然而最吊诡的是，他此番到了北方，反而性命不保。笔者据此推测，郭嘉应该是死于非正常的下毒暗杀，而非自然患病死亡。他的死亡，令曹操折一臂膀、损失极大，同时在客观上造成了拥汉派势力获益

最大。不过，此事到底是不是拥汉派势力或反曹派势力所为，史书没有明载，笔者于此仅作一家之言，可供一览。

就在这同一年，曹操已经决定“废除三公、自任丞相、独揽大权”。他欲行此事，必先求得荀彧等世族领袖的支持。为此，他亲上奏表，要为荀彧加官晋爵，与自己同升共荣。

昔袁绍作逆，连兵官渡。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绍既破败，臣粮亦尽。将舍河北之规，改就荆南之策。彧复备陈得失，用移臣议，故得反旆冀土，克平四州。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复若南征刘表，委弃兖、豫，饥军深入，逾越江沔，利既难要，将失本据。而彧建二策，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贵指纵之功，薄搏获之赏；古人尚帷幄之规，下攻拔之力。原其绩效，足享高爵，而海内未喻其状，所受不侔其功，臣诚惜之，乞重平议，增畴户邑。（摘自《后汉书·荀彧传》）

他这是极为高明的笼络收买之术。荀彧自然识得破，却不为所动，“深自陈让，至于十数，乃止”。

曹操向荀彧展示了自己应该展示的善意之后，接下来便是雷厉风行地推行自己“废三公、设丞相”之揽权大略了。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开始着手“废除三公”。当时的“三公”之中，太尉杨彪已经称疾而退，还留有拥汉派名士、司徒赵温。赵温自以为可将曹操长子曹丕纳入汉室台阁为人质而制约曹氏，遂征辟曹丕为自己属下的掾吏。不料，曹操突然翻脸，反手一剑，上奏指责他“私厚己之子弟，选举不实”，免去了赵温的司徒之职。至此，杨彪退位，赵温免官，三公之中就只剩下曹操这个司空在位。于是，曹操便顺水推舟，借势而上，自任丞相，位冠百僚，权倾天下。

拥汉派大臣们对此甚为不满。太中大夫孔融上奏汉帝，请求恢复古制，在京师方圆千里寰内不以其地封赐臣下。而曹操身为武平县侯，他的封邑武平县距离许都仅有三百里路程，恰巧就在这京师方圆千里寰

内，若依孔融的奏议，难不成还要他退出县邑交归汉室？

曹操暴怒之下，也顾不得孔融那圣门后裔、士林领袖的名流身份，借御史大夫郗虑之手，捏造了种种罪名，把孔融下狱处死，同时为自己南征刘表而开刀祭旗。

这是曹操和拥汉派大臣们公开决裂的开始。从这一天起，曹操基本上不再掩饰他“以曹代汉”的真面目了。应该有许多卿士大夫向曹操求情宽饶孔融，但曹操一句也没听。而荀彧也从此在史简里沉默了。

曹操拿下荆州之顺利如有神助，所以他得意扬扬，以为凭着一纸书函就能吓得江东孙权不战而降。不料，孙权却和刘备组成了联军，与他兵戎相见，毫不示弱。

赤壁之战过程中，曹操才突然发现以荀彧、荀攸叔侄为核心的智囊团竟是毫无作为，未曾向他进献一计一策！原来，拥汉派名士们为了报复他滥杀孔融、独揽大权，决定和他断绝一切实质性的合作关系。曹操感到自己被孤立了，所以他在华容道上逃出生天时，才会仰天痛呼：“哀哉奉孝（指郭嘉）！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这一个回合，曹操大输特输—失去了统一天下的最佳机会，只得含泪忍看鼎分之势渐成！

但曹操在夺得荆州后也不是没有收获。至少，在荆襄之地上，他可以招揽到一批崭新的人才为己所用，冲破中原名门世族集团的垄断。于是，荆襄名士桓阶被他选中，并任为丞相府主簿，总领万机，以此与中原名士大夫们制衡。

为了打破拥汉派士族集团对朝廷人事选任大权的垄断，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之春，曹操绕过尚书台选曹署，直接发令给各州郡。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

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摘自《三国志》）

然而，此举依然是一记“空拳”，虚而无力。荀彧本人就是“好士爱奇”之伟杰，对曹氏的用人方针并不排斥。更何况荀彧实为中原贤士大夫的至高领袖，“名重天下，莫不以为仪表，海内英俊咸宗焉”，他的影响力岂是曹操所能比拟的？曹操招来的人才，终是和江东的张昭一样“入宫则拜曹，出宫则拜荀”。

在不可逆转的时势催逼之下，曹操已经年近六旬，上天留给他的时间不太多了，他和荀彧终于走到了“图穷匕见”的关头。

不过，曹操也明白荀彧手中还有一张非常厚实的“底牌”—那就是以司隶校尉之职兼持节督关中诸军的钟繇。荀彧与钟繇同出颍川一脉，又素有通家之好，关系深厚之极。《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记载：

钟繇以为颜子既殁，能备九德，不贰其过，唯荀彧然。

可见，钟繇对荀彧之推崇无以复加。

此刻，钟繇坐镇关中，手下有马腾父子、韩遂等多股军队，在官渡之战时还能拨出二千多匹战马支援曹操，可谓举足轻重。荀彧一旦与钟繇东西联手勤王扶汉，对曹操腹背夹击，那就不堪设想了。

曹操有如芒刺在背，便将西征关中之事摆上了议程。丞相府仓曹属高柔不知其真正用意，建议道：“大兵西出，韩遂、马超疑为袭己，必相扇动。”曹操自有成竹在胸，对他的进言毫不理睬。

其实，他把钟繇的忠汉之诚真是高估了。钟繇不似荀彧，他一直在汉室和曹氏之间玩着“两面下注”的把戏：一方面他假意装病避事而让曹操对他不生疑忌，另一方面他亦暗暗利用关中势力为汉室撑腰。例如拥汉派名臣苏则当时身为武都郡太守，显然就是钟繇一手提拔的。《三国志》里记载：

（苏）则及临淄侯（曹）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

而马腾、马超父子和韩遂对曹操的敌意，应该也是钟繇暗中离间种下的。

荀彧在汉室如此危急之际，可能也想过要借用钟繇的关中兵力来制约曹操。但行事务求周密的他，亦看出钟繇其实只是关中诸军的弱势“盟主”，手下各部人马十分松散，根本拧不成“一股绳”对外出击。而曹操又用兵如神、所向披靡，纵是钟繇迫不得已拉起大旗反戈一击，只怕也是败多胜少。他只能寄望于用钟繇的这几股兵力对曹操从客观上造成几分牵制就足够了。

曹操终究还是放心不下关中，佯装以讨伐张鲁为借口而调动大量嫡系部队强行入陕夺权。实际上，他本可以命令钟繇自行率领韩遂、马超等人马南伐汉中。但他真正的用意是从钟繇手中夺走关中军权，又怎会下令让钟繇借战立功从而把军权抓得更牢呢？

钟繇也十分聪明，故意将曹操的讨张之令公开散发至雍、凉二州，顿时激得马超、韩遂等人惧而叛乱，把关中炒成了一锅“沸水”。而他则顺势让出兵权，在明面上给了曹操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

曹操对钟繇的“通达时务”是比较满意的。他把钟繇立刻转任为丞相府“前军师”的文职，同时任用夏侯渊代替钟繇屯据长安。关中的军权，终于全部落到了他的掌中。从此，拥汉派再无地方势力作为支撑。

正是在这样的时势背景下，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之冬，董昭公开跳了出来，站到前台提出了劝进曹操为魏公的奏议，向拥汉派世族集团彻底摊牌。

荀彧除了在口头上表示异议之外，毫无制约之力。

曹操荡平韩遂、马超之后，东来许都，悍然动用最后一招：借着共讨孙权的名义将荀彧强行扣在自己的幕府之中，令他无法再用汉朝尚书令的身份和职权为汉献帝效忠。

几天后，曹操带兵杀向孙权的驻地濡须口，荀彧“因病”留守寿春。稍晚，荀彧忧愤之极，服毒自尽。

第二年正月，也就是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操逼汉帝下诏，合并冀、幽、并、青、徐、兖、司、豫、荆等十四州，复为古之“九州”。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时的那个动议，在九年之后化为了

现实。

过了四个月，汉帝再次下旨：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并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

这一次，朝堂之上再没了孔融那清越激昂的声音和荀彧那岸然卓立的身影。

董昭：曹魏幕后的真正“孤臣”

古人入仕大多追求成为国之“良臣”。刘向在《说苑》一书里对“良臣”进行了定义。

虚心白意，进善通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功成事立，归善于君，不敢独伐其劳。如此者，良臣也。

当然，“良臣”人人愿当，那么“孤臣”呢？在“良臣”的基础上，该大臣若是“处众以默、立身以晦、受谤无怨、忠君无悔”，那就是真正的“孤臣”。这样的“孤臣”，又有几人愿当？他们在外人心目中甚至可能会被视为“奸佞之徒”，但他为主君所做的贡献和业绩却是无形而巨大的。

这样的“孤臣”在历史上不乏其人：西晋的开国元勋贾充，他被世人共称为“奸佞之臣”，对他冷嘲热讽、风言风语。贾充如此取怨于众，只因他在当年云龙门事变时指使成济刺死了魏帝曹髦，替主君司马昭背了“黑锅”，也由此而为非司马系的礼法之士所不容。然而，在司马氏看来，贾充便是忠于司马家而甘冒奇险的“孤臣”，所以对他倚重有加，厚任他为尚书令、鲁郡公，“禄赐常优于群官”，还在多次政争中为他“保驾护航”。

其实，在曹魏一朝，也有一位类似贾充的“孤臣”，但是他比贾充“孤”得更加彻底，几乎将自身所有的贡献和业绩淹没在了史简深处。他，就是董昭。

董昭出身于山东济阴董氏一脉，并不属于汉末的名门望族之列。他早年被袁绍辟为参军，凭其英勇之识、机变之才，一直做到了巨鹿太守、魏郡太守，在袁绍帐下可谓“春风得意”。然而好景不长，袁绍集团

内部党争激烈，令他受陷而堕。原来，袁绍仅因董昭的弟弟董访在袁氏的政敌张邈手下效劳，便听信谗言，不分青红皂白地迁怒于董昭。董昭只得遁身而出，云游中原，欲择主而事之。

应该说，董昭和袁绍当时的盟友曹操相识已久。他对曹操的看法是：

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曹今虽弱，然实天下英雄也，当故结之。（摘自《三国志·魏书·董昭传》）

这一看法，使他从心底里把曹操视为自己的未来之主。当然，也不排除是曹操派来了“暗线”和他接上了头，令他在外围帮助曹操打开僵局，以实现其“迎天子以讨诸侯”的大略。

董昭暂时栖身在河内郡军阀张杨的麾下，说服张杨与曹操交好，并通过张杨上表推荐曹操为兖州牧。在做成这一功劳之后，他又借机遁走，来到汉献帝身边当了议郎。

当时汉献帝已返回洛阳旧都，却身处杨奉、韩暹等军阀的控制之下。而董昭则自觉地当起了曹操的“代言人”，替曹操作书与杨奉示好，以此换取曹操入京面圣。《三国志·魏书·董昭传》对此过程进行了详细描写。

（董）昭以（杨）奉兵马最强而少党援，作太祖书与奉曰：“吾与将军闻名慕义，便推赤心。今将军拔万乘之艰难，反之旧都，翼佐之功，超世无畴，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宁，神器至重，事在维辅；必须众贤以清王轨，诚非一人所能独建。心腹四支，实相恃赖，一物不备，则有阙焉。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

奉得书喜悦，语诸将军曰：“兖州诸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国家所当依仰也。”遂共表太祖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

曹操获赏，遂入朝谢恩，而实则欲将汉帝迁入自己掌握下的许县，不想再受杨奉、韩暹等人的牵制。董昭对此大力支持，并建议曹操与杨奉交涉时不要先谈许县，而是假意声称将御驾迁入鲁阳以便供运粮食。

杨奉为人“勇而寡虑”，认为鲁阳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中，于是不曾怀疑，就答应了曹操。不料，曹操将汉献帝迁出洛阳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入驻了许县，彻底遁出了杨奉的势力圈，从此可以毫无掣肘地实施其“奉天子以讨不臣”之大略了。对董昭的种种贡献，曹操也迅速给予回报：擢升他为河南尹，官秩为真二千石。

此刻，袁、曹之争也已然达到了临界点。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秣马厉兵，意欲南下讨伐曹操。曹操也不甘示弱，以兵屯守官渡。与此同时，他故意通过汉献帝公开下诏免去袁绍所领的冀州牧职务，把袁绍的宿敌董昭一举提拔为冀州牧。在这一刻，董昭就成了曹操用来恶心袁绍、刺激袁绍的“工具”。他这一招果然有效，确实刺激到了“智不制情”的袁绍。袁绍一怒之下，不顾田丰、沮授等人的“持重之议”，在“备未周全”的情况下便仓促南来与曹操“孤注一掷”地对决。

董昭虽然被曹操如此利用以对敌，他却没有半句怨言，任由曹操尽心施为。他已经和曹操站在同一阵线了，斗倒袁绍是他俩共同的目标。就算曹操要拿他的人头去迷惑袁绍，他应该也是心甘情愿的。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攻取邺城，讨袁之役大获全胜。这时，董昭很知趣地让出了冀州牧这个重要职位，并请曹操自领而居。《三国志·魏书·荀彧传》里写道：

或说太祖宜复古置九州，则冀州所制者广大，天下服矣。

这个“或”是“某人、有人”的意思。根据史书前后的逻辑，这个“某人”应该就是董昭。他进言曹操，准备“复古置九州”，把冀州之域扩大，吞并幽州、并州及雍州之半部，然后封为曹氏的私有领地。

但这一动议，很快便被朝中拥汉派领袖荀彧识破并劝阻。谁都看得出来，曹操刚平邺城，就迫不及待地独占冀州、吞并他州，这不是要成为第二个“袁绍”吗？！此时，曹操也考虑到自己“拥汉灭袁”的口碑还不能自毁，代汉夺权的时机远未成熟，于是“寝九州议”，退让了下来。不过，他对董昭的表现还是满意的，隔了两年左右，便提拔董昭为“千秋亭侯”，与荀彧所领的“万岁亭侯”相映成趣。也许，他如此之施为，是向荀彧暗示：董某人的拥曹代汉之功，与你荀令君的定乱安国之勋在本尊眼

里是不相上下的！你应该懂得，本尊此时此刻心目中的头等大事，就是“代汉立曹”！

其实，在这个时候，“拥汉匡复”还是汉末名门世族集团的主流共识，朝廷上下的文武百官也大多数是倾向于汉室中兴的，董昭站出来拥曹易帜需要很大的勇气。毕竟，拥汉派势力太大，他们的反击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可是，董昭还是硬挺了下来。

这一挺，就挺到了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之冬。这一年，关中已被底定，荆州也入囊中，曹操可谓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代汉夺权的时机基本成熟了。董昭终于越众而出，向曹操进言封建五等爵位制。

后（董）昭建议：“宜脩古建封五等。”太祖（指曹操）曰：“建设五等者，圣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今明公耻有惭德而未尽善，乐保名节而无大责，德美过于伊、周，此至德之所极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难化，甚于殷、周，处大臣之势，使人以大事疑己，诚不可不重虑也。明公虽迈威德，明法术，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与人，宜稍建立，以自藩卫。明公忠节颖露，天威在颜，耿弇床下之言，朱英无妄之论，不得过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陈。”（摘自《三国志·魏书·董昭传》）

他这一举动顿时在朝野上下掀起了轩然大波。面对拥汉派众臣的汹汹来攻，他丝毫未曾退缩，并代表拥曹派集团公开站到风口浪尖上与荀彧进行笔战。

昔周旦、吕望，当姬氏之盛，因二圣之业，辅翼成王之幼，功勋若彼，犹受上爵，锡土开宇。末世田单，驱强齐之众，报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复襄王；襄王加赏于单，使东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录功，浓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内倾覆，宗庙焚灭，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栉风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群凶，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刘氏奉祀。方之曩者数公，若太山之与丘垤，岂同日而论乎？今徒与列将功臣并侯一县，此岂天下所望哉？（摘自《三国志·魏书·董昭传》）

这一场暗战并未持续多久，随着荀彧在前往寿春协助曹操征讨孙权的途中暴卒而画上了句号。半年后，曹操升为魏公，享九锡之礼，居群臣之首。

曹操晋爵加礼之后，依照常理，全力推进此事的董昭功不可没，也应该随之而受重赏。但实际的情况却是：董昭在后面的七八年间居然一直是“不升不赏”、原地任职，于朝堂之上几乎成了一个“透明人”。原来，他首倡劝进曹操晋公加爵，间接逼死了拥汉派领袖荀彧。而荀彧的门生故交遍布天下，他的至交好友是钟繇、崔琰、毛玠，他的女婿是陈群，他的关门弟子是司马懿，而华歆、郗虑、王朗等名士都是他举荐入仕的，一个个身居高位，几乎都是董昭不得不为之深深忌惮的“大佬”。如此情势之下，董昭为了避免变成汉、曹之争的“牺牲品”，只能“屏息敛迹”，夹起尾巴做人，在朝野上下隐身自保。正由于此，他又哪敢去外面炫耀自己劝进曹操的功绩？他缄默了如此之久，久得连他自己都以为曹操父子已经忘掉了自己所做的贡献了。然而，他的唇舌之间，依然没有对外泄出半句怨言。

终于到了东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十月，曹操之嗣子曹丕代汉登基、称帝临朝改元黄初。他并未忘记董昭的拥曹之功，一即位便拜他为大鸿胪。大鸿胪只是与董昭先前的谏议大夫官秩相当。表面上，董昭似乎没有加官。但他的爵位却进了一级，由千秋亭侯升为右乡侯。须知，曹丕的左膀右臂陈群、司马懿二人，此刻也是颍乡侯和安国乡侯。至少，在曹丕心目中，董昭和陈群、司马懿一样，亦是自己值得信任的忠良之臣。

董昭不顾自己年过六旬，仍是兢兢业业地随同曹丕南征北战，一路上出谋划策、言无不尽。曹丕对他也报以殊遇，赐其弟董访为关内侯，以悦其心。

虽是如此，在朝堂上下，董昭却因当年劝进曹操之事而“臭名远扬”。《三国志·魏书·苏则传》里写道：

（董）昭尝枕（苏）则膝卧，则推下之，曰：“苏则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董昭“归善于君，揽恶于己”，换来的是他终身极难升任清望之官，也始终不能位居要津。曹丕一想提拔他，便有风言风语而袭之，于是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搁浅”。但董昭依然缄默着，仿佛这一切都在他的包容之中。

数年之后，曹丕驾崩，新帝曹叡继承大统。他即位之初，便发现朝中那些“权二代”私相结交、彼此吹捧，形成“浮华交会”之风，并影响到尚书台选曹的人事操作。在曹叡看来，他们不务正业、沽名钓誉、贪权逐利，用之则名不副实，不用则浮言四起，对自己的皇权造成了隐性的威胁，于是决定大加整治。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突然重用起董昭来，一下把他提拔为主管人事选任大权的三公之一：司徒。董昭多年的苦心贡献似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然而，和他的祖父曹操当年封董昭为冀州牧一样，曹叡是推出董昭来替自己“干脏活”的。想整治“浮华交会”之风，就必须要选用最佳的执行者。这些“修浮华、合虚誉”的“权二代”个个来头不小：何晏是曹操的养子，且贵为帝婿；夏侯玄是先帝曹丕生前好友夏侯尚之嗣子，又系大司马曹真之外甥；司马师为司马懿之嗣子，又与夏侯玄为姻亲；刘熙是中书监刘放的儿子；孙密是中书令孙资的儿子；卫烈是选曹尚书卫臻的儿子—朝中其他臣子谁敢站出来得罪他们？

曹叡思来想去，觉得只有董昭才是堪当此任的最佳人选：他资历深厚，可以压服“权二代”背后的父辈势力；他无派无系，才能不被各方势力所牵制；他“臭名昭著”，应该也不在乎自己身上再被多泼几盆“污水”。但，董昭自己会答应接下这桩“苦差”吗？

此时的董昭已经年过七旬，他本可不必再来蹚这一池“浑水”了。然而，曹叡一纸诏下，他终是挺身而出，替曹叡揽下了这桩“脏活”。曹魏太和四年（公元230年），董昭拖着老病之躯，义正词严地发出了那道《陈末流之弊疏》。

凡有天下者，莫不贵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虚伪不真之人者，以其毁教乱治，败俗伤化也。近魏讽则伏诛建安之末，曹伟则斩戮黄初之

始。伏惟前后圣诏，深疾浮伪，欲以破散邪党，常用切齿；而执法之吏皆畏其权势，莫能纠擿，毁坏风俗，侵欲滋甚。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台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至乃相谓："今世何忧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罗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当吞之以药而柔调耳。"又闻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职，家人冒之出入，往来禁奥，交通书疏，有所探问。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虽讽、伟之罪，无以加也。

曹叡收到此疏，立刻顺水推舟痛下重手，将那些"权二代"或贬或迁，狠狠地教训了一番，让他们规矩了很长一段时间。而这场被后世称为"太和浮华案"的"始作俑者"—董昭，则再次被各方势力集团推到火炉之上备受煎熬。毕竟，他出面得罪的，可是一大批名门世族啊！

然而，曹叡还没来得及力挺董昭对抗群臣—他就溘然辞世了！这位任劳任怨地为魏朝背了一辈子"黑锅"、干了一辈子"脏活"的孤忠老臣，就这样撒手西去了！他留下了一地的骂名，却只有曹魏的三代主君才能明白他真正的贡献之所在。

董昭死后，曹叡亲笔赐予他"定侯"的谥号。根据谥法所载，"纯行不爽曰'定'、德操纯固曰'定'"。曹叡真是他的知音，懂得他这一生都是为了魏室在孤独地"纯行不爽""德操纯固"，所以给了他这个盖棺定论的佳评。只不过，董昭已逝，满朝上下还有谁会像他这样尽心不贰地忠于大魏呢？这个问题在曹叡的心底始终萦绕不息，一直纠结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贾诩：三国时期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曹魏开国的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刚刚登基的魏帝曹丕当众公布了第一批人事选任的诏书，排名首位的当朝太尉居然是那个多年来闷声不响的原太中大夫—贾诩！不禁惊翻了一大堆文武百官。

当这个消息传到千里之外的江东时，孙权也忍不住笑了。他的这个"笑"是"讥笑"的"笑"，讥笑"中原无人"。

然而，到了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贾诩竟被一部分史学家和读者大肆吹捧，甚至被称为“谋略鬼才”“曹魏帝国的幕后推手”。这就未免太过夸张了。当然，他那种“明哲保身、随机应变”的韬略和能力似乎也呼应了某一股社会思潮，而这股思潮的名称，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

实际上，纵观史籍，贾诩只是汉末三国时期诸多谋士当中并不特别冒尖的一个。他早年能够功成名就，多半凭借的是他的平台和运气；他晚年能够位极人臣，大半又靠的是曹丕的滥赏“作秀”。像司马懿那样的真才实学，像诸葛亮那样的远见卓识，像陆逊那样的文韬武略，认真分析起来，他其实一样都没有。

在入仕早期，贾诩最主要的平台是西凉武人集团。西凉武人集团内部十分缺乏谋略型人才，而贾诩有西凉第一智士阎忠所谓“（张）良、（陈）平之奇”的赞誉和加持，很顺利地就做到了讨虏校尉的职务。当年董卓遇刺后，西凉武人集团群龙无首，王允又昏头昏脑地下了“绝杀令”，逼得“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等欲解散，间行归乡里”。而贾诩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身为西凉诸校尉之一，与李傕、郭汜等同席共议，说服他们来个“绝地反击”，杀回长安。后世竟对他这一计赞扬有加、吹嘘不已。

但在笔者看来，他此举不过是顺势而为、触机而发，引动西凉诸将“困兽一斗”罢了！其中的算计得失如此之分明，以李傕、郭汜等人之政治头脑尚能接受，又何难之有？他只是激发了他们“孤注一掷”的勇气罢了。当然，贾诩亦颇有自知之明，在李傕等人攻下长安后要重赏他时，他认为自己是“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硬是推辞不受。这并非他真的过谦，而是他确实知道自己那时候不过是“矮子群里当高人”，李傕、郭汜他们恰巧被自己以利害得失说动了而已。他这一计，尽管弄得中原神州从此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可他本人的利益却得到了最大化的保全和拓展。在他眼中，这便足够了。

贾诩后来东奔西走，为了跳出动乱的“旋涡”，又在建安年间说服西凉大将张绣在曹操最需要外援助力的关头归降了曹营。他这一计对时机的拿捏确实比较精准。不过彼时钟繇坐镇关中，也将马腾父子和韩遂等人说服而归顺了曹操，一样是立功赫然。相比之下，他的计策并不算多么出类拔萃。但贾诩借张绣降曹之事，又在曹操那里狠狠地捞了一大

把，官拜执金吾，封爵都亭侯，食邑数百户。

到了曹操的身边，在“谋士如云”的曹氏幕府之中，贾诩“黔驴技穷”“江郎才尽”的原形很快就暴露无遗了—“泯然众人矣”。对此，我们可以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来研判：曹操一向是赏罚分明、毫不阿私的，在他手下，有功者则必赏、有过者则必罚。贾诩早在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之时便投到了曹操的阵营中。曹操当时很大方地封赏他为“都亭侯”、位居执金吾。然而，二十年过去了，直到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之春曹操去世，贾诩仍然是挂名“都亭侯”、官居太中大夫，食邑未增一户，秩位未进一级。而且，在曹操私属的封国魏宫里，其相国是钟繇，其御史大夫是华歆，里面居然也没有贾诩的位置。由此可见，这二十余年间，贾诩在曹操手下的表现，真称得上是“平平无奇”四个字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这一现象：也许，在这二十余年许都小朝廷里拥曹派和拥汉派的明争暗斗之中，贾诩为了绝对地保全自己，于是绝对地严守了中立。所以，曹操就是想赏他，亦无法可赏吧？

可贾诩毕竟是谋士，是“以谋为生”“以谋为业”的。他也给他的主君们出过不少计策。从他的这些计策来看，他的谋略生涯有三个特点，即“三有余而三不足”。

其一，他应变有余而前瞻不足。在长安之乱时，他能因势利导说服李傕、郭汜等西凉诸将“绝地反击”以保命，这是他的应变之才超乎常人。但打下长安之后，他却难以制约西凉武将们的恣意妄为，也无法说服他们跃出思维的“井底”而实施“奉天子以制关东”之大略，最后闹得君离臣散、鸡飞狗跳，这便是他前瞻性不足，不能未雨绸缪而占据主动。故而，他自身最终也被时势所驱动，似浮萍一般游移而出，随遇而安，却难以独树一帜而争雄天下。

其二，他精明有余而高明不足。《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记载了他这样一条故事：

是时将军段煨屯华阴，与（贾）诩同郡，遂去（李）傕托煨。诩素知名，为煨军所望。煨内恐其见夺，而外奉诩礼甚备，诩愈不自安。张

绣在南阳，诩阴结绣，绣遣人迎诩。诩将行，或谓诩曰："煨待君厚矣，君安去之？"

诩曰："煨性多疑，有忌诩意，礼虽厚，不可恃，久将为所图。我去必喜，又望吾结大援于外，必厚吾妻子。绣无谋主，亦愿得诩，则家与身必俱全矣。"诩遂往，绣执子孙礼，煨果善视其家。

可见贾诩在对人性的洞察和对利弊得失的算计之上是何等的精密！然而，纵览史册，荀彧有建议曹操"奉天子以讨不臣""借天子以纳人心"之大略，诸葛亮有建议刘备"联孙抗曹、跨有荆益、两线作战"的"隆中对"之奇计，司马懿有建议曹操"军屯兴国"之长策和"联吴制关、借人驱敌"之巧计，所以他们三人皆能高瞻远瞩而推转历史之巨轮。而贾诩呢？仅有明哲保身之小计小谋，终无济世安民、拨乱反正之宏图大猷！

其三，他保守有余而进取不足。据史书所记，贾诩一生中针对曹魏集团谋求对外扩张之全局性建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汉末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

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摘自《三国志·魏书·贾诩传》）

第二次是在曹魏黄初年间：

帝（指魏文帝曹丕）问（贾）诩曰："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

对曰："攻取者先兵权，建本者尚德化。陛下应期受禅，抚临率土，若绥之以文德而俟其变，则平之不难矣。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议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用兵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将，故举无遗策。臣窃料群臣，无备、权对，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为当今宜先文后武。"

他这两次进献的计策之主旨皆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裴松之针对他的第一次建言已经做了非常精辟的评论。

（贾）诩之此谋，未合当时之宜。于时韩（遂）、马（超）之徒尚狼顾关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亦已明矣。彼荆州者，孙、刘之所必争也。荆人服刘主之雄姿，惮孙权之武略，为日既久，诚非曹氏诸将所能抗御。故曹仁守江陵，败不旋踵，何抚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将此既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藉荆楚楫棹之手，实震荡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然则魏武之东下，非失算也。诩之此规，为无当矣。

其实，贾诩第二次在黄初年间的建言亦是如此：曹丕伐吴，并非是他的部将之中没有诸葛亮、陆逊那样的英才，其失利之关键在于曹丕本人好战而不善战、刚愎而又自用，当然是劳而无功。他若大胆建议曹丕放手任用臧霸、曹休、夏侯尚等人，令他们各当一面、各尽所长，必能大有斩获，又岂会在伐吴之役中郁郁而归？

其实，深究下去，我们可以发现：裴松之只看到了贾诩之计“未合当时之宜”的一面，而未洞彻贾诩献上此类“保守之计”的真正用意。贾诩念念以自保门户为重，深知“无过便是有功”。他表面上建议曹操父子以“不战而胜”为上策，说得是冠冕堂皇，而实则是让曹操父子“不战则无错，无错则无咎，无咎则不迁怒于己”。

归根到底，他如此进言，还是为了巧妙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这也符合他一贯的处世风格：“多言则多失，少言则少失，不言则不失。”他宁可在曹操父子面前说得四平八稳、滴水不漏，亦决不破格出奇、授人以柄。就凭这一点，贾诩堪称三国时期最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正是靠着这一份精致的利己主义作风，他才在魏宫夺嫡之争达到最激烈的关头精准出手，隐在幕后以刘表父子、袁绍父子之事例警醒曹操，为自己未来的主君曹丕献上了一份“大礼”。所以，曹丕刚一登基便回报了贾诩的暗助之功，立刻将他从亭侯升为了乡侯，从虚职升到了高位，还实打实地增邑三百户。

然而，贾诩如此之作为，终究是“功在一人而不在天下”，故而才被

孙权讥笑为“沐猴而冠、德不配位”！

官渡之战幕后的“无间道”

汉末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是曹操势力集团荡定中原、称雄天下的关键一战。袁绍兵强马壮、粮足械备，拥众十余万，远远胜过曹操的三四万兵卒。然而，最终的结局却是曹操以弱胜强、转危为安，率兵狙袭乌巢，一举击溃了整支袁军。

《三国志》里是这样夸赞曹操的：

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公（指曹操）破（袁）绍，天下莫敌矣。

简直把曹操吹嘘得天花乱坠、出神入化。难道这一切真是曹氏集团神机妙算、出奇制胜所致吗？

通过深入剖析《三国志》里留下的“草蛇灰线”式的各种史料，我们可以推断出：官渡之战的大胜，其关键在于曹方运用了“无间道”和“反间计”，从情报战入手，乘隙击败了袁方。

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情形，《三国志》在描写官渡之战初期袁绍一方的兵力实况是：

众数十万，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率，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许都汉室的太中大夫孔融和尚书令荀彧之间便有了一场“神奇”的对话，其准确度堪与数年后南阳茅庐里的刘备和诸葛亮之“隆中对”比肩。我们可以称之为“孔荀对”。

（建安）太祖（指曹操）既破张绣，东擒吕布，定徐州，遂与袁绍相拒。孔融谓（荀）彧曰：“（袁）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

彧曰："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许）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擒也。"（摘自《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笔者之所以认为这段"孔荀对"很神奇，是因为荀彧的每一句答语都在后来的现实中完全应验了：

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绍；颜良、文丑临阵授首；田丰以谏见诛：皆如彧所策。

莫非荀彧真的是未卜先知、百发百中、算无遗策的"神人"？

这个世界上，当然没有什么"未卜先知、百发百中"的神人。荀彧再聪明再睿智，也不是神人。他能够谋算得如此精准，只能证明他有着极为可靠的情报渠道。而这一切的答案，就隐藏在这段"孔荀对"里，但需要细细地剖析方能有所发觉。

"孔荀对"的第一条内容，是孔融提出了"（袁）绍地广兵强"，乃其"殆难克乎"的因素之一。而荀彧的答复是"绍兵多而法不整"，所以不足为惧。确实，袁绍的军队因缺乏法纪之约束而比较散漫，这已是袁、曹双方的共识。袁绍自己一方的骨干谋士沮授也称袁军是"上盈其志，下务其功""将骄主汰"，有"骄兵必败"之深忧。兵骄则备荒，备荒则法不肃，法不肃而易溃乱。果然，在战争末期，当袁军乌巢粮仓被曹操阻袭之际，袁军主将张郃、高览猛攻曹军大本营而始终不能得手；而乌巢粮仓少顷被曹操一举拿下之后，消息传到大本营前线那边，张郃、高览顿时斗志尽丧，立即便归降了曹方，而袁绍的主力部队受此波及则是一溃千里。袁绍的十余万精兵就这样"雪崩"式地垮掉了。不能不说荀彧的这一答辩确有先见之明。但这亦是荀彧以常理而推断，郭嘉、荀攸等人皆有同样之看法，还算不上"神奇"。

第二条内容，孔融提出了"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也是袁绍"殆难克乎"的因素之一。荀彧的答复是："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擒也。"荀彧的看法也是依常理而断：颜良、文丑虽是勇猛，但曹营这边亦有关羽、张绣、张辽等猛将，以勇敌勇，倒也不怕。果然，

在后来的白马之战中，颜良于阵前被关羽一刀斩杀；而文丑亦在延津之战中坠入荀攸的“饵敌”之计，为乱军所诛。荀彧在这一点上的论断，似乎也称不上“神奇”。

第三条内容，也是最关键的内容，孔融和荀彧的对答才是最为“神奇”、也最为蹊跷的。孔融提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也，任其事；（袁绍）殆难克乎！”荀彧是这样答复的：“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许）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

对比前面两条对话内容的思维逻辑来看，荀彧在这三条对答之上便显得超乎常理了。依前所言，针对孔融所提“田丰、许攸之智”，他应该回答：“我方亦有荀攸、郭嘉、贾诩之智以敌之。”针对孔融所提“审配、逢纪之忠”，他应该回答：“我方亦有夏侯惇留守之忠以敌之。”可是，在现实情景中，荀彧却没有这样回答，而是非常具体地描绘了一个富有画面感的推断：田丰刚而犯上，定会为气度偏狭的袁绍所不容，不容则必弃；审配或逢纪不顾大局，一定会借贪墨之事紧逼身为袁军谋主的许攸，而许攸则必会归降曹氏。

这一切就很值得细细推敲了。

第一，荀彧的第三条对答及推论与前两条内容的视角站位毫不相同，是立足于袁营自身内部的情形来研判的。他的隐性依据就是袁营内部的剧烈党争。在袁绍的手下，一直存在着多个朋党派系：许攸系南阳郡人氏，是豫州系朋党的首领；田丰是巨鹿郡人氏，审配是魏郡人氏，是冀州系朋党之骨干；逢纪虽是豫州人氏，却又与审配甚为交好。他们彼此之间争权夺利，平时便暗斗得十分激烈。而袁营内部这种朋党交争的具体情况，应该只有袁营内部的重要人员才能了如指掌。而荀彧身为袁氏之外敌，远在许都，竟能对其内部这一切情形知晓得一清二楚，岂非“神”哉？岂非怪哉？

第二，官渡大战在即，袁营内部原本是应该一致对外的。依常理而言，许攸在前线时时刻刻陪侍着袁绍，哪里有余暇去贪墨贿赂乎？他的家人又能打着他什么样的旗号去贪财违法呢？而审配在后方留守，又何

至于非要抓捕许攸家人入狱判罪不可？难道是他嫉妒许攸在官渡前线会因谋立功，所以才在后边非要把他拉下马来不可？故而，他一拿到许攸家人犯法的“把柄”，便不顾一切地狠下重手了？如此看来，他确是“专而无谋”，“无谋”到“打草惊蛇”了：他在后方抓了许攸家人，却置前方作战的许攸于何地？不知不觉之中，他替袁绍把许攸逼到了绝路之上！—所以，这里边必定有某个神秘人物在适当的时候将许攸家人贪赃违法的“重磅炸弹”或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了“专而无谋”的审配，然后造成了一连串“蝴蝶效应”事件的发生。但最蹊跷的是，身在千里之外的荀彧居然在事先便预料到了这一戏剧性事件的发生及其后续影响，轻松自然得就像一个熟练的编剧在解说自己的“剧本”一样。

正所谓：“物反常，则必有因。”在这重重疑云之中，一个名字浮出了水面—荀谌。他是荀彧的兄长，同时也是袁绍南征而来的三大谋主之一。他本和田丰、许攸齐名，然而却在“孔荀对”之时从孔融的口中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荀谌，字友若，陈群曾经评论：

荀文若、公达、休若、友若、仲豫，当今并无对。

他一早就投附在袁绍幕府之中，并替袁绍出面说服原冀州牧韩馥主动向袁氏献出了冀州。凭着这一份实打实的大功勋，奠定了他在袁府的谋主地位。

（公孙）瓒遂引兵而至，外托讨董卓，而阴谋袭（韩）馥。（袁）绍乃使外甥陈留高幹及颍川荀谌等说馥曰：“公孙瓒乘胜来南，而诸郡应之。袁车骑引军东向，其意未可量也。窃为将军危之。”馥惧，曰：“然则为之奈何？”谌曰：“君自料宽仁容众，为天下所附，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临危吐决，智勇迈于人，又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谌曰：“渤海虽郡，其实州也。今将军资三不如之势，久处其上，袁氏一时之杰，必不为将军下也。且公孙提燕、代之卒，其锋不可当。夫冀州天下之重资，若两军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将军之旧，且为同盟。当今之

计，莫若举冀州以让袁氏，必厚德将军，公孙瓒不能复与之争矣。是将军有让贤之名，而身安于太山也。愿勿有疑。”馥素性恇怯，因然其计……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赵忠故舍，遣子送印绶以让绍。绍遂领冀州牧。（摘自《后汉书·袁绍传》）

荀谌身居袁营，而荀彧身在曹方，也符合汉末以来世家大族“两面下注、长线投资”的惯用方略。只不过到了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左右，曹、袁之争进入关键阶段，荀谌必须在其间做出最后的抉择。很显然，荀谌最终投向了曹操。而荀彧在“孔荀对”中的这个“剧本”，其实就是荀谌所提供的。所以，孔融在评论袁绍身边的智计之士会很自然地“漏掉”荀谌这个名字，那是因为他早就成了自己人。同样，整个“孔荀对”中所有的蹊跷之处，也因荀谌投曹而变得无比清楚了。

笔者认为，隐藏在“孔荀对”幕后的事实真相应该是这样的：在官渡之战即将最后对决的前夕，荀谌暗中投向了曹操一派。他在临行前留下了后招，将许攸家人严重贪墨违法的“把柄”适时透露给了许攸的政敌审配、逢纪，于是引爆了“许攸叛逃”事件。毕竟许攸亦和曹操有故旧之交，确实具有通曹的可能。而以袁绍“外宽而内忌”之心性，也难免不会对许攸滋生猜疑之念。袁府之中党争极烈，许攸稍遭疏离则必然难保善终。所以，许攸只有叛逃而出，投奔了曹操，并给曹操带去了令袁军致命的情报。

在《三国志》中，对这件事情的真相还有一个辅证。《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记载：

太祖（指曹操）保官渡，（袁）绍围之。太祖军粮方尽，书与（荀）彧，议欲还许以引绍。彧曰：“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太祖乃住。

在这段话里，荀彧斩钉截铁地断言“必将有变”，与他之前对孔融所讲的“（许）攸必为变”，可谓同出一辙、互相呼应。他让曹操坚持在最后关头稍待数日，其实等候的就是审配发难而致许攸叛变。果然，一切

如他所言，全部应验了。许攸一叛变，带来的便是袁军各部队的虚实底细和乌巢粮仓的情报！掌握了这些关键情报，曹军自能避实就虚、出奇制胜、所向披靡！

这一出“大戏”的编剧，诚然只有十分熟悉袁营内情的荀谌才能担当。况且，以袁绍“多疑而内忌”之心性，他本也容不下荀谌的弟弟荀彧效忠汉廷与曹操的，终究会迁怒于荀谌。荀谌亦只好“见几而作”，顺水推舟，就地“埋雷”，然后遁入了曹营，坐待后续一系列“蝴蝶效应”事件的发生。

他的“无间道”任务圆满完成之后，荀氏一门不想因他而背负“收留叛主之徒”的污名，一定是安排了他归隐山林、不问世事。所以，他才会突然消失在史简深处。

但曹魏上下永远都记着他这一份特殊功勋：既不能报之于其人之身，便报之于其人之后。故而，荀谌的儿子荀闳一入仕就担任了曹丕的太子文学掾之近职，颇受亲用，并最终做到了魏朝的黄门侍郎之高位。曹丕还在《与钟繇书》中夸赞荀闳的文风是“荀闳劲悍，往来锐师，真君侯之勍敌，左右之深忧也”。

他在夸奖荀闳的同时，是否也想起了他的父亲荀谌，曾经也是口才出众、笔锋无匹，以三寸之舌而拿下了整座冀州？曾经也在官渡之战中步步设计，令袁绍臂助尽失，直至一败涂地？而今，斯人却“事了拂袖去，深藏功与名”，只留下一个沉默而神秘的背影令人无限怀念。

第九章 “天下之定，彧之功也”—— 儒圣荀彧

《左传》有言：（襄公）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

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

穆叔未对。

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

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世禄世卿、代代显宦”是自古以来士庶百姓在现实生活中最为着意的追求。但以贤者的视角来看，它们终是远远不及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流芳百世、天长地久。唐代鸿儒孔颖达是这样解析“三不朽”的：

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三不朽”，即是三千年来中国仁人志士追求自身生命圆满的三项最高目标。然而，在那么多的高人贤士当中，能够同时实现这三大目标者，实为屈指可数。便是在后世追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孔子，毕生之中也仅在立德、立言上有所建树，而于“立功”则郁郁乎未能得志。

可以这么说，在荀彧之前，“三不朽”目标于儒生而言，算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仿佛只能存在于书简中。其实代汉立新的王莽也曾经接近过“三不朽”之境界，可惜他的后半生却因自己的作为“华而不实、大而无当”全部搞砸了，成了一个莫大的笑话。

荀彧能够实现“三不朽”，则是自有其大本大源的。他的先祖荀子便是儒家事功派的大宗师，其门下亲传弟子李斯辅佐秦始皇扫除六国、一

统天下，厥功至伟，而荀彧本人素来深受家学之熏陶涵育，毫无凡夫俗儒之迂钝浅薄，年纪轻轻就被人们誉为“王佐之才”—这也可见他的才能之出类拔萃了。既是“王佐之才”，他想建功立业，又有何难哉？

《易经》有云：“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以荀彧的职业生涯来看，他堪称“唯深也，唯几也，唯神也”之三达德的大贤。他的一生只当过颍川郡主簿、汉廷守宫令、曹操幕府司马、汉廷尚书令等四个职务。这些职务都是辅佐性的。而荀彧却在这四个职务上建立了张良之勋、萧何之业，令曹操也由衷地赞叹道：

天下之定，（荀）彧之功也！

荀彧的德行、功业、建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细细讲述。

知人料事，洞若观火

东汉末年，战火方起。荀彧遁归颍川故乡，“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乡人多怀土犹豫……（董）卓遣李傕等出关东，所过虏略，至颍川、陈留而还。乡人留者多见杀略”。他这一预测祸福的能力确实是“洞穿七札”。

避居袁绍主政的冀州邺城之后，袁绍待荀彧以“上宾之礼”，并准备予以重用。然而，荀彧见他“外忠而内奸，外宽而内忌”，终不能成大事，立刻弃之而去，选择了在当时看似忠勇勤王的曹操。曹操终于得到了他，大悦道：“吾之子房也。”

荀彧归入曹操麾下没多久，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南下征讨陶谦之际，曹操原部下张邈、陈宫突然谋反，引入吕布作乱。

（吕）布既至，（张）邈乃使刘翊告（荀）彧曰：“吕将军来助曹使君击陶谦，宜亟供其军食。”众疑惑。彧知邈为乱，即勒兵设备，驰召东郡太守夏侯惇，而兖州诸城皆应布矣。时太祖悉军攻谦，留守兵少，而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惇至，其夜诛谋叛者数十人，众乃定。（摘

自《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荀彧在这一事变当中反应之敏锐、及时、到位，堪称雷厉风行、立竿见影，须臾之间便弭危难于无形。

同时，豫州刺史郭贡也率兵马数万人来到鄄城之下，意图不明。

或言与吕布同谋，众甚惧。（郭）贡求见彧，彧将往。（夏侯）惇等曰："君，一州镇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贡与邈等，分非素结也，今来速，计必未定；及其未定说之，纵不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将怒而成计。"贡见彧无惧意，谓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与程昱计，使说范、东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摘自《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荀彧准确地把握到了郭贡的心理动态，所以能够"单骑赴会而无畏无惧"，实在是大勇大谋，非庸常之文士所能比拟。

可见荀彧目光如炬，确有知人之明、先见之明与料事之明。他"因明而生智""因明而生勇"，故能在纷纷复杂的万机庶务之中持重而应，所料无有不中，所行无有不成。

算无遗策、功济于时

汉末兴平元年左右，曹操刚刚稳定了兖州后方，见到徐州牧陶谦暴亡，便起意去夺徐州，荀彧（公元194年）进行了劝阻：

荀彧入谏曰："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兰，若分兵东击陈宫，宫必不敢西顾，以其间勒兵收熟麦，约食畜谷，一举而（吕）布可破也。破布，然后南结扬州，共讨袁术，以临淮、泗。若舍布而东，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虚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卫可全，其余非己之有，是无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将军当安所归乎？且陶谦虽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惩往年之败，将惧而结亲，相为表里。今东方皆以收麦，必坚壁

清野以待将军。将军攻之不拔，略之无获，不出十日，则十万之众未战而自困耳。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弃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权一时之势，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愿将军熟虑之。”

曹操听从了他的建议，专心致志经营兖州，终于彻底巩固了大后方，所以才能在诸侯交战中进退自如、游刃有余。

在抚定兖州作为根据地后，荀彧做出了一生最关键的建言，劝说曹操西迎汉献帝刘协入许定都，实施“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之宏图，从而在四方诸侯中占据了政治制高点和战略主动权，令袁绍、袁术等割据势力处处受制，落于下风。

扫除袁术、吕布之后，荀彧又建议曹操布好三面格局，然后北上抗击袁绍：立基于兖、豫二州，以钟繇稳住关中西翼，以臧霸等人稳住青州东翼，以夏侯惇留守许都，而由曹操亲临官渡阻挡袁绍。

而在官渡大战之前，荀彧与孔融的一番对话，显示了他对平北灭袁已有绝对的信心与把握。

从荀彧的答辩来看，他是深得科学思维方式之真谛：“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

南宋名士陈亮曾讲：

所贵乎谋夫策士者，为其能审料敌情以释人君之忧也。

对照此言，荀彧可谓完全做到了。

求贤若渴，树人自补

《三国志》里称荀彧“领典枢机，好士爱奇”。他既身为国之辅政，自然对人才选拔极为重视。而且荀彧识人辨才，确是独具慧眼、鲜有人及。

郭嘉素来不治行检、不与俗接，而荀彧举他为幕府谋主，果然是神机妙算；杜畿一向简傲少文、孤岸自立，而荀彧举他为河东太守，果然是“在职十六年，常为天下最”。《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荀彧别传》记载：

荀彧前后所举者，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

曹操也深深赞道：

荀令君之进善，不进不休。

对真才实学之士，荀彧自是倾心相待，无不称平。而且他也从不滥举、乱任无能之辈。《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荀彧别传》道：

其在台阁，不以私欲挠意。彧有群从一人，才行实薄，或谓彧：“以君当事，不可不以某为议郎邪？”

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来言，众人其谓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类此。

正是在荀彧的大力栽培之下，中原名门世族集团的主干得以成熟壮大。他举荐的钟繇、陈群来自颍川系，华歆来自青州系，王朗来自兖州系，杜畿来自关中系，辛毗来自冀州系，各地人才济济一堂，难免会有摩擦。然而，荀彧“折节下士，坐不累席”，以自己的谦和包容之量，团结了各大派系的名士大夫。二十年间竟无一起朋党内斗之事发生。曹操能够后顾无忧，东征西战，正是完全得益于此。这与袁绍阵营内部朋党交争、效率低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曹操集团也正是在荀彧去世之后，才开始日渐分裂、内力涣散的。拥汉派和拥曹派的内斗，爆发了吉本、耿纪、韦晃等汉臣狙杀曹府长史王必之事；新秀派和宿旧派的暗争，爆发了丁仪兄弟以“文字狱”暗害崔琰、毛玠等老臣的恶性事件。而这一切，大大耗损了曹氏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同时，这一切在荀彧生前是绝无可能出现的。

兴文倡学，重铸太平

在荀彧看来，济世安民、拨乱反正的关键不仅在于武功隆盛，还在于文治斐然。《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荀彧别传》记载，荀彧曾向曹操进言：

今公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六礼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

也正是在荀彧的劝谏下，曹操在自己的丞相府里设置了文学署，又设立了文学掾、文学属等官职。“博学洽闻、伏膺儒教”的司马懿就是第一任丞相府文学掾。

有这样的专职专人专管此事，汉末的典章文学事业，终于蓬勃发展起来：一方面，曹操、曹丕、曹植、王粲、陈琳、阮瑀等文豪诗英，理明词畅，文质彬彬，“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摘自南朝梁刘勰《文心雕

是时征役草创，制度多所兴复，彧尝言于太祖（指曹操）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绩，教化征伐，并时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犹举民能善教训者，叔孙通习礼仪于戎旅之间，世祖有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之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今公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六礼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显制度于当时，扬名于后世，岂不盛哉！若须武事毕而后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彧从容与太祖论治道，如此之类甚众，太祖常嘉纳之。（摘自《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龙·时序》），精品佳作层出不穷，风流韵味历久崭新；另一方面，王朗、王肃、孙炎、董遇、薛夏等儒士高贤，历注经传以发明，采会同

异以出新，使义理之学昌明于世、普及于众。

卓然立节，身后渊流

官渡之胜后，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之际，曹操上了一份情真意切的奏表，为荀彧请功：

臣闻虑为功首，谋为赏本，野绩不越庙堂，战多不逾国勋。是故曲阜之锡，不后营丘，萧何之土，先于平阳。珍策重计，古今所尚。侍中守尚书令彧，积德累行，少长无悔，遭世纷扰，怀忠念治。臣自始举义兵，周游征伐，与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发言授策，无施不效。彧之功业，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陛下幸许，彧左右机近，忠恪祗顺，如履薄冰，研精极锐，以抚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勋。

荀彧自称“无野战之劳”，不愿受赏。曹操又亲笔写信给他：

与君共事已来，立朝廷，君之相为匡弼，君之相为举人，君之相为建计，君之相为密谋，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战也，愿君勿让。

荀彧这才接受了万岁亭侯的爵赏。但他没有料到曹操这是一招“先予后取”之术：曹操如此推崇于他，是希望他尽萧何之职、竭张良之智，为自己接下来的代汉大业主动效力。然而，当曹操提出“复古置九州”之动议，准备扩大自己身为冀州牧所占的地盘，并为下一步荣升魏公预做铺垫之时，荀彧却站出来温言软语地劝阻了他。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荀彧和曹操在未来的政治取向上分道扬镳。其实，笔者倒认为荀彧并非愚忠于汉。

他先前每次在激励曹操时，从来都是以汉高祖、光武帝为楷模而寄望于他的，在心中已然暗中期许曹操能成为第二个汉高祖、光武帝。如果曹操似汉高祖、光武帝一般肃清万里、总齐八荒了，那么他代汉而立是水到渠成、当之无愧的，荀彧也自当顺从。

如果曹操生前不能吞吴灭蜀、一统四海，那他就不能丢掉汉室正统这面大旗，当以“虚君实相”之模式继续平定天下。曹操一旦强行篡汉，

则是对“奉天子以讨不臣”大略的破坏，荀彧亦唯有阻之。

在现实中，曹操急功近利、不择手段的举动，让荀彧深深地失望了。曹操刚一打下河北，就迫不及待地要做第二个袁绍了！心急火燎地给自己戴上“称王称霸”的冠冕！他如此躁动，是对“奉天子以讨不臣”战略的偏离，只会令自己离千秋帝业越来越远。在这一点上，荀彧之真知灼见，无愧于“张良重生、萧何再世”之美誉，而曹操却确实有憾于“汉高祖”之寄望。既然以曹操之根底，只能成就霸业，又与袁绍何异？袁绍尚且不能长久，曹操又何以突破这个极限？

在沉思之中，荀彧停住了一切继续扶持曹操的动作。只因曹操配不上帝业，那么他也无须向曹操空费文韬武略了。

他回过头来，只想在朝廷之中培植新的栋梁之材以济世安民。钟繇已经替他公开宣称：“非圣人不能致太平。”曹操肯定不是“圣人”，他无法像光武帝那样“身致太平”。那么谁才行呢？“雅好人伦典籍”的司马朗曾经讲过：

伊（指伊尹）、颜（指颜回）之徒，虽非圣人，使得数世相承，太平可致。

于是，心有灵犀的他，从此全力栽培司马朗那个“聪亮明允、刚断英特”的二弟司马懿成为“颜回”之大材，向他传授治世之心法，使他茁壮成长，并渐渐取代自己成了这个时代未来的“命世之英”与“万夫之望”。

后来，司马懿及其家族果然不负他之所望，平吴吞蜀，总齐八荒，成就了真正的帝业。而司马懿本人对荀彧是敬佩之极也感谢至极。他时常说：

书传远事，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

他在掌权后一手提拔荀彧之子荀𫖮做了散骑侍郎，并将女儿嫁给了荀彧的孙子荀霬为妻室，以回报荀彧当年的栽培辅导之恩。

直到数十年后，司马懿挟高平陵事变之胜而成为第二个曹操时，他

在最后关头仍然遵循着荀彧当年给曹操的建议：

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

始终没有接受魏廷颁下的相国之尊、郡公之爵和九锡之礼。

光耀千秋，万古流芳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之冬，荀彧逝世于寿春。

噩耗传来，《后汉书》记载：“帝（指汉献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宴乐。”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文学家曹植写了一篇极为真切的文章来悼念他。

如冰之清，如玉之洁。法而不威，和而不亵。百僚士庶，欷歔沾缨。机女投杼，农夫辍耕。轮结辙而不转，马悲鸣而倚衡。

百年之后，裴松之对他做了最客观的评价，历久而称真。

夫欲翼赞时英，一匡屯运，非斯人之与而谁与哉？是故经纶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动于崄中，至于大亨，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岂非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

所以，当荀彧去世之后，汉廷上下奉献给他的谥号为“敬侯”。确实，普天之下，谁人不对荀彧之高才硕德敬而戴之？一个“敬”字，足以让荀彧光耀汗青！

在此，笔者亦送上一首短诗，向“一代完人” 荀彧致以崇高的敬意：

扶汉匡曹皆为民，底定中原立伟绩。

超凡入圣三不朽，流芳百世成传奇。

世之论者，多讥（荀）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陈氏此

评，盖亦同乎世识。臣松之以为斯言之作，诚未得其远大者也。彧岂不知魏武之志气，非衰汉之贞臣哉？良以于时王道既微，横流已极，雄豪虎视，人怀异心，不有拨乱之资，仗顺之略，则汉室之亡忽诸，黔首之类殄矣。夫欲翼赞时英，一匡屯运，非斯人之与而谁与哉？是故经纶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动于崄中，至于大亨，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岂非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摘自《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第三篇

英雄莫问出处

第十章 刘备创业史

刘备集团“帮派化”特征及其转轨之浅述

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评论道：

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

曹操、孙权兄弟之用人方略，笔者在此不做申论。唯有刘备用人聚贤之“以性情相契”，可谓是准确地说到了刘备势力集团内部人事架构的根本特征—“帮派化”。

自古至今，便有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传说，经久不息。而在《三国志》里，也称“先主（指刘备）与（关、张）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这些故事和传说，非常具体地描绘了刘备集团帮派化的形态：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几乎是以平等的合伙入股方式进行壮大的。从这个初始性的组织形态出发，刘备集团后来的发展历程一直都深深打上了“帮派化”的烙印。

在早期，刘备的这种“帮派化”组织还是比较有凝聚力的。刘备两次在徐州牧任上遭到严重挫败，张飞和关羽都对他不离不弃。关羽甚至放弃了曹操的竭力拉拢，“过五关，斩六将”，也要跑到刘备身边并肩打拼。

但是，刘备集团这种“帮派化”特征也让中原世族名门对他们疏而远之：世族名门希望投身于中的是“以礼法相维”的正规组织，例如曹操治

下的许都小朝廷，而绝不会是刘备集团这种“以性情相契”的帮派组织。即使中途曾经有陈群、袁涣等名士大夫在刘备帐下效力过，他们出于文化底蕴及门户背景的差异，也无法与刘备集团进行深度融合，最后只能分道扬镳。而且，刘备的核心组织架构里，在中原争霸的时候，居然一直都缺少了“萧何”这个代表世族名门的角色。没有萧何，刘备集团又怎能吸引世族名士们为之效劳呢？

到了中期，刘备显然很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为此，他做出了改造“帮派化”组织架构的第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自己主动屈驾三顾茅庐，请来诸葛亮这样优秀的外部人才，出任自己集团的“萧何”，为自己的“帮派化”组织注入新鲜血液。

他的改造行为立刻遭到了关羽、张飞的不满和排斥。

先主曰：“善！”于是与（诸葛）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摘自《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虽然刘备终于将诸葛亮拉进了集团核心并确立了应有的地位，但“桃园三人帮”中的关羽、张飞还是在不少场合表现出了明显的排外性。建安末年，当刘备进位汉中、大封“五虎上将”之时，关羽公开跳出来对与自己比肩的马超、黄忠等新进将领表示了轻蔑和异议。在表面上，他是针对自己仅得“五虎上将”的名号与职位不满，而在实质上则是对刘备以“君臣等级关系”取代桃园三人帮的“兄弟（伙伴）同盟关系”有所不满。至少，关羽肯定认为自己不应该屈居于“前将军”的位号，而应该挂衔太尉、司空等三公之兼职。

后来，在刘备的示意下，前去授予关羽“前将军”位号的钦差大臣费诗在劝说关羽时，明确点了“王（刘备）与君侯（关羽）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这番说辞完全符合关羽的心理预期，于是他不再“闹事”了。刘备给出这番说辞的同时，还附带给了他一根大大的“胡萝卜”—“假节钺”的特权，这就让关羽的“伙伴同盟关系”得到了实打实的授权认可。刘备这种半姑息半纵容的行为，将会为蜀汉集团带来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果然，关羽为了凸显自己在刘备阵营中的特殊地位和面对其他“五虎上将”的优越感，利用“假节钺”的特权，先斩后奏，在各方面条件都不够成熟的情况下，悍然发动了襄樊之役。

在这场战役中，关羽自恃其地位特殊，倨傲自大，甚至逼反了刘备的妻弟麋芳。麋芳尚且如此受辱，其他士大夫在关羽那里又会是什么待遇呢？这是不言自明的。

而刘备、诸葛亮也无力远程遥控关羽在建设性的轨道上稳步前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像一匹几乎脱缰的野马在荆棘林中左冲右突。

终于，“最后一只靴子”应声落地：关羽遭到曹操、孙权的腹背夹击，败走临沮，被擒身亡。刘备集团在东翼的军事基地几乎全部沦陷。

关羽之死，荆州之失，其实是刘备集团“帮派化”问题副作用的密集体现。但关羽倘若不死，且还夺取了许都，囊括了中原，建下了不世之功业，那他带来的问题似乎更大。试想一下，面对大功在身而又兵权在手的关羽，凭着“桃园三人帮”的特殊地位，谁还制衡得了他？那时候，休说诸葛亮，便是刘备也拿他的骄横跋扈没辙！万一刘备不在了，关羽岂不是蜀汉集团里真正的“一枝独大”？

关羽死了，以此为契机，刘备集团“帮派化”转型的问题终于摆上了桌面，从根本上开始得到解决。

与关羽同样骄悍难驭的刘备养子刘封，在因私怨逼反孟达、丢掉东三郡后，单身逃回成都请罪。诸葛亮却以“易世之后终难制御”的理由劝说刘备将其处决了。这是蜀汉集团“帮派化”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标志事件：为了保护刘备一系的皇权稳定，任何宗亲关系、任何“伙伴同盟关系”都必须做出牺牲。

然而推动这一转型过程的主要人物，就是诸葛亮。其实，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刘备集团内部的文官领导人，诸葛亮很早便洞察到了刘备集团“帮派化”问题带来的一系列危害。他明白一个政权组织若要长治久安，只能是“以纲纪相维”来取代“以性情相契”，以君臣等级制度来取代伙伴同盟关系。早在入蜀之际，诸葛亮就拿出了实际行动来拨乱反正。

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指诸葛亮）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摘自《三国志·诸葛亮传》）

他的这套举措明面上针对的是原益州牧刘璋赖以立足的益州士人集团，暗地里也针对刘备集团本身的"帮派化"组织问题。他在成都把"以纲纪相维"的理念贯彻下来了，搭成了新的组织架构，那么张飞、关羽之流若是入川任职，也只能接受这种制度体系的制衡。

（诸葛）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法正谏曰："昔高祖（刘邦）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原缓刑弛禁，以慰其望。"

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数年过去，时移势变，张飞死于非命，刘备又因夷陵之败而薨于白帝城。当年"桃园三结义"形成的帮派化核心成员均已去世。此时此刻，诸葛亮亦以顾命首辅大臣的身份一跃而为蜀汉集团的真正掌门人。他大权在握之下，放开手来拨乱反正、肃清纲纪，自然是再无掣肘。

根据史书记载，第一个撞到诸葛亮"律法之刃"上的是廖立。廖立本是刘备集团中才能堪与庞统比肩的荆州派要员。他仗着自己的资历，"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而实际上，廖立身居内廷要职—长水校尉，已是相当级别的高官。他后来和关羽一样口无遮拦，竟对诸葛亮的北伐方针和用人方略进行公然指责。诸葛亮

毫不手软，立刻以“坐自贵大”的罪名把他废为庶人，流放到了汶山郡。

后来，来敏、李严等人或恃才自傲，或恃位争权，全被诸葛亮依律一一剪除。从此，蜀汉集团“上下俨然、纲纪分明”，成为三国之中皇权集中程度最高的国家。以至于诸葛亮死后，坐拥雄兵、资历深厚的大将魏延企图作乱，却落得单骑受死、无人跟从。而像姜维这样的军事强人，在蜀汉的严律明令之下，也不敢像魏国的司马懿父子一般坐大成势、威胁皇权。

“侠帝”刘备

汉末三国时期，风云涤荡，群雄逐鹿，神州大地到处充满了竞技的平台和磨炼的契机。只要身负才学者，均可崭露头角：或以三寸之舌，或以满腹经纶，或心算而智取，或勇武而力争，或一言可定天下安，或一语可搅四海动，或一剑可斩上将首，或一计可使江山倾。

但遍观《三国志》之典籍，取偌大一部《魏书》为例，里面记载有数百名公卿大夫，如陈群、崔琰、卢毓，几乎全是名门出身、世家背景。而仅有贾诩、张既、蒋济等寥寥数人来自寒门庶族。可见，汉末以来，各地诸侯纵有巨大的人才需求量，然而治下绝大多数的职务和爵位还是由世家子弟们所垄断。

故而，能于寒士之中脱颖而出者，极为难得；再又能于寒士之中雄视百代者，更是凤毛麟角。而蜀汉昭烈皇帝刘备就是这一流寒士当中的不世之杰。

我们把刘备归为寒门庶族，实则毫无争议。他虽然顶着一个“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裔”的名号，但到了他这一辈时，不过是一介平民。他的祖父只当过范县县令，他的父亲也只是郡县小吏。他自己“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古有“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刘备已然沦落到身为小商贩一流的境地。

在三国之雄当中，曹操虽是出身于宦官之家，但宦官集团正是汉末最有权势的阶层之一。所以，曹操年纪轻轻便能出任洛阳北部尉、顿丘令、议郎、济南相等显官要职。而孙权则是典型的“权二代”，父亲孙

坚、兄长孙策替他奠定了厚实的江东基业，他一接任就是官秩二千石以上的讨虏将军之职。

相比之下，只有刘备背景最薄、起点最低，他事业上的第一桶金是由张世平、苏双两个商人赞助的。借着这一桶金，他拉起了一支二三百人的小队伍，与黄巾军拼死拼活才立下战功，却只当了一个小小的安喜县尉。他的前半生，一直是在下密县丞、高唐县尉、平原县令等四百石左右的官职上兜兜转转、翻翻滚滚。

若是其他庸常之士，早已在这坎坎坷坷的长期折腾中磨灭了斗志、销光了理想，就此沉沦下去。而刘备则全然不是这样。他一路意气风发，一路高歌奋进，一路披荆斩棘，一路屡战屡败，终于功分三国、登坛称帝。那么，他这一份强大的精神底蕴是从何而来呢？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早年的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同时“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这完全是一副“市井侠士”的形象。《史记》也是这样描写他的先祖刘邦的：

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

由此可以看出，刘备真的继承了汉高祖刘邦的精神底蕴—“豪侠之气”，浑身流淌着侠士的血液。这一点，是刘表、刘虞、刘璋等其他文绉绉、虚晃晃的同姓诸侯所不能比拟的。而刘备敢与吕布、袁术、曹操等枭雄们逐鹿中原，所凭恃的也全是这一股畅快淋漓、挥洒自如的“侠气”！

因为这一股“侠气”，所以他面对机遇，能够“以命相搏”。《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遇贼于野，（刘）备中创佯死，贼去后，故人以车载之，得免。”

因为这一股“侠气”，所以他交结人士，能够“以义相合”。《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

刘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

故而，多年以后，一代名相诸葛亮仍在《出师表》里念念不忘：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指刘备）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指刘禅）也。

因为这一股“侠气”，所以他不屑于以计赚人，而能“以理相服”。孔衍《汉魏春秋》记载：

刘琮乞降，不敢告（刘）备。备亦不知，久之乃觉，遣所亲问琮。琮令宋忠诣备宣旨。

是时曹公在宛，备乃大惊骇，谓忠曰：“卿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语，今祸至方告我，不亦太剧乎！”

引刀向忠曰：“今断卿头，不足以解忿，亦耻大丈夫临别复杀卿辈！”遣忠去，乃呼部曲议。

或劝备劫将琮及荆州吏士径南到江陵，备答曰：“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乃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

因为这一股侠气，习凿齿才会盛赞他：

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

我们可以这么说，刘备是继刘邦之后的又一位“侠帝”。他不像司马懿那样藏身在体制内以阳谋暗算而“移天易日”，他一辈子都在自己所厌弃的曹魏体制外真刀真枪地杀开一条血路来“顶天立地”。他的所作所为，令“历世著名”的徐州陈氏一族之首领陈登也对之充满钦佩：

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刘备字玄德）。

我们还可以这么说，汉末鼎分诸雄之中，得国最正者，莫过于刘备。刘备既无曹操父子“代汉自立”之异志，又无孙权兄弟“借人成资”之歧念，三顾茅庐以取英杰，自立自强而成大业，所以蜀汉君臣始终亲如

一体而无纲纪之乱。

到了三国终局之际，曹魏有“高平陵之变”，孙吴有“两宫夺嫡之祸”，而蜀汉直至灭亡的最后一刻，连蜀帝刘禅都已俯首投降了，还有姜维、蒋斌等忠臣义士投袂奋起、为国捐躯、九死不悔！

关羽之骄，蜀汉之殇

三国时期盛产英雄和名士，而且他们所达到的成就之高是后世人才难以企及的。在这其中，除了蜀相诸葛亮被民间各派推崇为神机妙算的“智圣”之外，还有一位名将也被三教九流之徒推上了神坛。他，就是关羽。

到明清时期，关羽已被神话为“武圣人”和“财神爷”的化身。他甚至得到了历代官方的礼仪认可—他的关帝庙，是除皇室之外唯一可以拥有“二龙戏珠”图饰的祭祀场所。而“龙”这个权力图腾，在古代寓意着什么，是不言自明的。

可是，关羽身后的滔滔荣誉，并不能掩饰他生前的重大败迹。《三国志》里评价他“刚而自矜，以短取败”。说具体一些，就是指关羽因骄致败、痛失荆州，使蜀汉的国策“隆中对”方略成为一纸空言。这个咎责，是关羽终身的重大瑕疵。

当然，也有部分读者会觉得这个评价对关羽不太公平。毕竟当时关羽是在以弱抗强，于寡不敌众的情形下还取得了“水淹七军、活捉于禁、攻克樊城”的大捷，后来又是被曹操集团和孙权集团联手绞杀的。因此，关羽可谓虽败犹荣。

但是，从当时的各方情势与实力对比来看，关羽身在荆州，坐拥江陵数郡，“外拓虽不足，自守则有余”。况且，蜀汉最高统治集团交给关羽的根本任务是“固守荆州”而绝非“妄兴北伐”。关羽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之际发动襄樊之役，完全是对自己这一根本任务的“本末倒置”。

而造成这一“本末倒置”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关羽的骄傲自负。关羽骄矜到自以为可以“孤掌而鸣”，自以为可以倚仗一己之力来实

现“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隆中对东进方略！

当然，关羽之骄傲自大，在他自己看来，也许是有资本的。宋代兵策名著《何博士备论》中讲：

夫以功就天下者，常有强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骄兵。臣非故强也，恃勋赏之积而卒至于强；兵非故骄也，恃战役之勤而卒至于骄。

关羽多年追随刘备出生入死、建功立业，又有“桃园三结义”的帮派伙伴关系，他在刘备集团内部恃骄而为是有着坚实底气的。在这方面，连刘备集团文官之首诸葛亮甚至都不敢轻易捋他的“虎须”。

关羽的骄气，在自守荆州的前几年还没有过多地表露。那时候，江东集团的西翼主将鲁肃出于“联刘抗曹”的大局需要，对他在荆州的种种挑衅行为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包容。但关羽可能反倒认为是江东集团怕了他的武力，丝毫没有从内心深处意识到隆中对方略里“东和孙权以抗曹操”的重要性。

直到刘备征取汉中、大封“五虎上将”之际，关羽的骄气才彻底爆发了，他对马超、黄忠的傲视之情，可谓是溢于言表。

（关）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比谁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摘自《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先主为汉中王，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摘自《三国志·蜀书·费诗传》）

虽然最终在诸葛亮、费诗的劝说下，关羽一时抑制住了自己的骄气，没有酿成公开化的冲突。但关羽终究是明服而暗不服的。他为了彰显自己比马超、黄忠更为骁勇和优秀，终于不顾实际情况，先斩后奏，利用“假节钺”的便宜之权，悍然发动了“襄樊之役”。

在史书记载中，没有刘备、诸葛亮对襄樊之役的任何表态。而且，刚刚经历过汉中争夺战的刘备、诸葛亮亦是喘息未定，实在无力再从荆州方面对曹魏进行单翼作战。所以，基本上刘备集团最高层对关羽的这一场军事突击行动是既难以提供后勤支持，又难以增补投放兵力。而关羽也分明是没有和刘备、诸葛亮在事先充分沟通、协调的。他的“襄樊之战”，几乎是孤注一掷的冒险行动。

就是在荆州集团内部，关羽也未曾整合好绝大多数部属的思想和力量来发动这场战役。傅士仁、麋芳、潘濬等地方实力派人物，对这场即将发动的襄樊之战，都抱有不同程度的犹豫和质疑，但在关羽的“咄咄”虎威之下，他们选择了沉默。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的这场虎头蛇尾的襄樊之战，从根本上便是关羽一个人推动起来的。

在这场战役中，关羽的骄气毕露无奈，表现在他的极度轻敌之上：一是对盘踞中原十余年的曹魏集团的极度轻敌，二是对虎视在侧的江东孙权集团的极度轻视。

首先，在关羽与曹魏荆襄集团作战初期，他得天时之利而“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争樊城，一时威震华夏，险些吓得曹操要迁都。这也进一步滋长了关羽的骄气，让他头脑发热，难以冷静。

然而，曹操身边谋士如云、良将如雨，其综合实力之强绝非关羽所能匹敌。在谋略层面，曹操接受了司马懿的献计，启动了“联孙制关”之方略，“许割江南以封（孙）权”，与孙权腹背夹击关羽；在军事层面，曹操调遣大将徐晃赴临襄阳驰援，同时他自己也亲率二十四营劲旅殿后而发。这一下，仅有区区数万兵马的关羽如何抵挡得住？他此刻迅速回防江陵、南郡等地，应是上上之策。可是，从他背后射来的“暗箭”，已经令他难以回头了。

射来“暗箭”的，正是孙权集团。孙权集团利用了关羽的骄气，对他进行了全方位的麻痹蒙蔽和欲擒故纵。

孙权集团的第一招是先让吕蒙装病返回建业，使关羽误以为“眼中钉”已被拔除而防备生懈。

（吕）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摘自《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孙权集团的第二招则是故意换上貌似文弱的陆逊来代领吕蒙之职，对关羽示以谦卑，屯守陆口要塞，先行布局筹备。

（陆）逊至陆口，书与羽曰：“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廪良规。”又曰：“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昔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赵之略，蔑以尚兹。闻徐晃等少骑驻旌，窥望麾葆。操猾虏也，忿不思难，恐潜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傥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览逊书，有谦下自托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逊具启形状，陈其可擒之要。（摘自《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孙权集团的第三招，便是孙权亲自出马，假意表态亲领雄师以助关羽北伐中原，而实则取道来袭关羽。

（关）羽围樊，（孙）权遣使求助之，敕使莫速进，又遣主簿先致命于羽。羽忿其淹迟，又自已得于禁等，乃骂曰：“狢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摘自《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孙权集团这一整套“组合拳”下来，关羽误以为他们个个不足为惧，遂将本境南部的兵力撤走大半，导致后方空虚，被吕蒙以“白衣渡江”之计一举抄底偷袭。

至此，在曹、孙两派的腹背夹击之下，关羽进退两难，不得不收敛骄气，连呼东三郡的刘封、孟达等火速来援。但东三郡的实际情形却十分严峻：孟达最为圆滑，已经看出关羽败局难挽，肯定是不想为此而虚

掷自己的私家兵；申仪、申耽兄弟亦是“墙头草”，关键时刻顶不上用。唯有刘封是刘备集团的骨干成员，他在道义层面上是最应该驰援关羽的。但刘封与关羽的关系又不甚融洽，而且他也是骄悍成性，所以他选择了袖手旁观。

就这样，曾经不可一世的“战神”关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最后败走麦城，被擒身亡。

纵观襄樊事件本末，我们可以发现，每到关羽一方遭到暗算狙击的紧要关头，竟无一名得力谋士站出来为关羽出谋划策，防患于未然。曹操身边有司马懿、蒋济，孙权身边有吕蒙、陆逊，关羽身边又有什么名士呢？整个襄樊之役，似乎都是关羽自断自行、自负其咎。史书称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正是戳中了关羽的性格要害，因为“善待卒伍”，关羽故能似李广一般将兵一心、可战可捷；因为“骄于士大夫”，所以关羽刚愎自用，有贤而不敬，有才而不用，无法集思广益，在骄横之路上越来越偏、越走越远。

一个“骄”字，使关羽身殁麦城、荆州尽失，也使蜀汉东翼基地全无，从此只能偏居割据，难以问鼎中原。

关羽之骄，实乃蜀汉之殇！

第十一章 陈登：以武立业的名士先驱者

汉末建安初年之际，中原的政治势力格局基本已经定型：袁绍、袁术凭家世而拓业，吕布、刘备仗勇武而割据，孙策、孙权兄弟占地利而定基，曹操挟天子正统而崛起。这一阶段的主线是“大吞小”“强吞弱”，零散而小股的地方性势力从此亦基本上难成气候。

在这样日渐固化的势力格局版图之中，绝大多数的名流之士已然失去了独立发展的外部空间：孔融、陈群等人投靠了许都的曹操，田丰、沮授等人依附了冀州的袁绍，张范兄弟和许汜等人也被迫归入了袁术麾下。他们只能成为“依人成资型”的僚臣，而难以自立一方。即使以司马懿兄弟之博学多才、能文能武，却也唯有在曹操幕府之中身任掾吏。

然而，在这诸多名士当中，只有下邳陈登“以文入武”“以战立业”，终至雄踞东南、崛立一方，成了当时名士大夫里边的“异类”。雍容座谈、华而不实的许汜之流称他是“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其背后的缘由，只是这些清谈之徒对陈登的奋发有为“羡慕嫉妒恨”罢了。

《后汉书》记载：陈登出身下邳盛族，其陈氏一门“历世著名”，其祖父陈球贵为太尉，其父陈圭身居沛国相，其叔父陈瑀位居扬州刺史。而陈登本人亦是“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济民之志。博览载籍，雅有文艺，旧典文章，莫不贯综”。（摘自《三国志·魏书·陈登传》）

陈登家族在汉末时期最先效力的对象是陶谦。他们起初也只想“依人而成势”，定位于辅臣僚吏。可惜，陶谦年老不堪，并无余力去拓展大业，最终在内外交困中去世。他临终之际，却将徐州牧之印转授给了外来将领刘备。

此时，刘备却故作姿态地谦让了起来，素来敬服刘备“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的陈登亲自出马，和刘备之间有了一场铿锵震耳的对话。

下邳陈登谓先主（指刘备）曰：“今汉室陵迟，海内倾覆，立功立事，在于今日。彼州殷富，户口百万，欲屈使君抚临州事。”

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寿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内所归，君可以州与之。"

登曰："公路骄豪，非治乱之主。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功于竹帛。若使君不见听许，登亦未敢听使君也。"（摘自《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在这番对话中，陈登是代表徐州系本土世族集团和刘备交涉的，谈吐之间有理有据、不卑不亢，尽显其"湖海之士"之本色，令刘备甚为欣赏。多年之后，刘备还向刘表称赞道：

若元龙（陈登字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造次难得比也。

尽管陈登有心辅佐刘备在徐州打出一个新天地来，可惜当时群敌环攻，吕布、袁术等枭雄实力雄厚，刘备终是势单力薄，不到一年就被赶出了徐州。粗鄙无文、有勇乏谋的吕布及并州系武将集团强占了徐州。

陈登对吕布自然是不屑一顾的，只因他兵强势大而不得不佯装顺从。但暗底下，陈登已经联系上了在许都"奉天子以讨不臣"的曹操，准备内外呼应共取吕布。曹操对陈登亦十分重视，"拜（陈）登为广陵太守，临别，太祖（指曹操）执登手曰：'东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阴合部众以为内应"。

陈登终于有了朝廷的任命书作为自己的政治保障，可以名正言顺地自立门户了。《三国志》记载：

（陈）登在广陵，明审赏罚，威信宣布。海贼薛州之群万有余户，束手归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爱之。登曰："此可用矣。"

他建立起一支属于自己的独立嫡系武装力量，从此在徐州一域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后来，曹操亲来下邳征讨吕布时，也需要他的兵力为助。陈登率军为讨吕先锋，打得吕布焦头烂额，竟至拿陈登的三个弟弟为人质来要挟他退兵。陈登执意不挠，毫不屈服，进围日急。

最后，在陈登的大力协助下，曹操将吕布彻底荡定。陈登也因功晋爵，似东汉马援一样受封为伏波将军，终于在已经固化的中原势力格局

版图中冒出头来，成了持节一方的封疆大吏。

他的突然崛起，首当其冲而受到威胁的便是江东孙策兄弟。孙策意欲在袁曹交战之际狙袭许都，第一步需要解决的就是陈登。加上陈登“甚得江淮间欢心”，又有“吞灭江南之志”，孙策视他为“卧榻之虎”，非得除他不可。《三国志》记载：

孙策遣军攻（陈）登于匡琦城。

贼初到，旌甲覆水，群下咸以今贼众十倍于郡兵，恐不能抗，可引军避之，与其空城。水人居陆，不能久处，必寻引去。

登厉声曰：“吾受国命，来镇此土。昔马文渊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灭群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为邪！吾其出命以报国，仗义以整乱，天道与顺，克之必矣。”乃闭门自守，示弱不与战，将士衔声，寂若无人。

登乘城望形势，知其可击。乃申令将士，宿整兵器，昧爽，开南门，引军诣贼营，步骑钞其后。贼周章，方结陈，不得还船。登手执军鼓，纵兵乘之，贼遂大破，皆弃船迸走。登乘胜追奔，斩虏以万数。贼忿丧军，寻复大兴兵向登。登以兵不敌，使功曹陈矫求救于太祖。

登密去城十里治军营处所，令多取柴薪，两束一聚，相去十步，纵横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称庆，若大军到。贼望火惊溃，登勒兵追奔，斩首万级。

连续两次击溃孙军来犯，陈登可谓声名大噪，威震江东。他若是继续在徐州深耕细作、日渐坐大，难保不会取孙策兄弟而代之，成为曹操新的心腹之患。而曹操自知以功以德均不足以镇服陈登，遂对他猜疑日盛。

其实，曹操应该也曾想过用自己的谯沛系将领夏侯惇、曹仁、夏侯渊等人来代替陈登收服江东。然而，北边官渡对峙正急，他始终无法抽出谯沛系将领去处置江东。同时，他又十分担忧陈登坐大成势，于是不顾一切，借着孙策暴亡、孙权继位、江东暂安之机，以缓和与江东孙氏之关系为明面上的理由，强行把陈登迁转到东城郡担任太守，远离了他

的基业之地—广陵。

当陈登迁转之时，“广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随登，老弱襁负而追之”（摘自《三国志·魏书·陈登传》）。面对此情此景，曹操自然是又忧又喜：忧的是陈登果然才能出众，久必为患；喜的是自己见几而作，制敌于无形，终于把陈登“雪藏”了。

而陈登何等聪敏，亦洞察到了曹操心底深处的种种谋算。他自知再也无法展翼凌空，不久之后便郁郁而终。

但曹操很快就后悔了—他这种自剪羽翼的做法终于造成了严重后果：失去陈登制约的孙氏势力在后面的几年里急剧膨胀，拓展了六郡之地，一直将势力的前锋逼近了荆州外围，并最终联合刘备集团在赤壁把曹方打得溃不成军。

陈登个人虽然壮志难酬、怀才不遇，但他拥军持节、独当一面的经历，却揭示了整个时代的一股大趋势：名士大夫终将领军掌权、出将入相，作为新兴势力登上历史的前台，而且这一进程终究是不可阻挡的。在他之后，魏国的贾逵、司马懿，蜀汉的诸葛亮，东吴的陆逊，纷纷持节而起、挥师而战，凭借军功武力改写了各方的政治格局。从这一点而谈，他其实并非许汜口中的“异类”，而是这个时代以武立业的名士先驱者。

在后世千百年间，陈登更是成了“豪杰之士”的代名词。辛弃疾、陆游等文人墨士皆以他的事迹为楷模，激励着自己昂扬有为。

明代著名诗人高启有一首名为《念奴娇·策勋万里》的佳词写得极好。

策勋万里，笑书生骨相，有谁相许？壮志平生还自负，羞比纷纷儿女。酒发雄谈，剑增奇气，诗吐惊人语。风云无便，未容黄鹄轻举。

何事匹马尘埃，东西南北，十载犹羁旅？只恐陈登容易笑，负却故园鸡黍。笛里关山，樽前日月，回首空凝伫。吾今未老，不须清泪如雨。

这首佳词中，“只恐陈登容易笑”，成为对每一位在逆境中奋起的有志之士的一个强有力之鞭策。

第十二章 承父兄之业的东吴之主孙权

孙权用人立国的“得”与“失”

明末史学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讲过：

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吴介其间，皆不敌也，而角立不相下：吴有人焉，足与诸葛颉颃；魏得士虽多，无有及之者也。

他认为，正是孙权富于知人之明，选用顾雍、陆逊等人为群臣领袖，这才奠定了江东鼎立之业近六十年的坚实基础。所以，《三国志·吴书》记载：

魏文帝（指曹丕）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

直接证明了孙吴旗下人才济济，令强敌也不敢轻易侵犯。孙权本人曾言：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驳致纯，不惟积乎？故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

他是这么说的，在实践中大部分时间也是这么做的。故而，他凭借自己的知人之明、用人之才，“举贤任能、各尽其心”，这才抗魏拒蜀、卓然而立，实属难能可贵。

但孙权用人立国，既有其四大长处，又有其四大弊病：在创基立国的早期、中期，他的长处发挥得多、弊病克制得住，所以群策群力、屡战屡胜；到了晚年，他的长处发挥得少、对弊病克制不住，就出现了“两宫夺嫡”“朋党交争”“立嗣之危”等各种败笔。

在此，笔者一一剖析。

首先，我们来详细谈一谈孙权早年用人立国的长处。

选贤用能，以“准”见长

江东基业既定，而国之首辅最为重要。孙权舍张昭而任顾雍，足见其选贤之精准。他自己说得对：

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指张昭）性刚，所言不从，怒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

他认为张昭性刚而固执，是非太过分明，难以容人之异议，亦难以谅人之小过，会激化群臣内部矛盾。而顾雍为人宽厚沉稳，“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能所任，心无适莫”。这展现了他的公平性。同时，顾雍“于公朝有所陈及，辞色虽顺而所执者正”。又展现了他进言、办事的灵活性与原则性结合得较好。所以，他选对了顾雍为相，以致政令平和、刑赏宽简，使国之根基立于厚实之地，非浅局薄德之袁绍、袁术可比。

在对外征伐之上，他选任的三位西翼主将：鲁肃、吕蒙、陆逊，亦是各有千秋。当与刘备集团联手抵抗曹操之时，他选用“临事不苟”的鲁肃，以大局为重，调和了刘备集团和孙吴集团的矛盾，令曹操在外无隙可乘；当与刘备集团不得不因重大战略利益而刀兵相见之时，他又选用“筹略奇至”的吕蒙，以白衣渡江之计一举拿下荆州，巩固了江东的整体利益；当与来势汹汹的刘备硬碰硬接之时，他又选用文武双全的陆逊，以持重而伺机，用“火攻”之策击溃了刘备四十余座连营。由此可见，孙权对于在什么时机、什么地方应该使用什么样的人才来克敌制胜，一向是谋算得十分精到的。在这一点上，他丝毫不亚于曹操和刘备。

任人授权，得“专”而彰

陆机曾作《辨亡论》评价孙权道：

推诚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权之我逼。

实际上指出了孙权在任人授权方面素来是放手使用、专一不疑的。

例如《三国志·吴书·孙皎传》里记载：

后吕蒙当袭南郡，（孙）权欲令（孙）皎与蒙为左右部大督，蒙说权曰：“若至尊以征虏（指征虏将军孙皎）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

蒙。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此目前之戒也。”权寤，谢蒙曰：“以卿为大督，命皎为后继。”禽关羽，定荆州，皎有力焉。

又如《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写道：

时事所宜，（孙）权辄令（陆）逊语（诸葛）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刘）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

他这样做的效果就是：以专人而行专职，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牵绊，最大限度地提高办事效率。

另外，当有人从中行谗离间之时，孙权亦能洞明无疑、不受欺蔽。《三国志·吴书·诸葛谨传》记载：

时或言（诸葛）瑾别遣亲人与（刘）备相闻，（孙）权曰：“孤与子瑜（诸葛瑾字子瑜）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

他还大胆起用诸葛瑾，“迁左将军，督公安，假节，封宛陵侯”，使诸葛瑾以下的流寓派士族们从此安下心来，共保江东。

育才培基，由“勤”而成

孙权创立吴基，以“用众力、用众智”对抗魏、蜀，本着“人一己百”的原则多方培育各类人才以充实军国之用。

例如《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引用《江表传》记载：

初，（孙）权谓（吕）蒙及蒋钦：“卿今并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

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

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潘眉注曰：是时谢承《后汉书》尚未成，吴主所谓“三史”指

《史记》《汉书》及《东观记》也）、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事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指曹操）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邪？”

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后鲁肃上代周瑜，过蒙言议，常欲受屈。肃拊蒙背曰：“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

在三国君主之中，亲自教导臣下阅书开智者，孙权可谓第一人。而且，他不单是在卿士大夫的个体化培养上痛下功夫，对江东本土化士族的群体化栽培也是不遗余力。《世说新语》里写道：

吴四姓旧目有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

“张、朱、陆、顾”四大士族都是吴郡人氏，都是孙权的同乡，对稳固孙氏基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这四大士族与中原名门世族自有其深远渊源不同，基本上都是孙权以皇权一手拱托而起的：

顾氏一族以顾雍为首，只有其曾祖父顾奉一人当过汉朝颍川郡太守，他的家族是在易汉入吴之后才兴盛起来的；

张氏一族以张温为首，其祖上未有高高厚名，从他的父亲张允担任孙权幕府的东曹掾起，他的家族才在仕途上崭露头角；

陆氏一族以陆逊为首，其祖陆纡曾任汉朝城门校尉，其父陆骏曾任九江县都尉，发迹得比其他三大士族较早较好一些，但他的家族后来达到“一门出二相、五侯、十余位将军”的鼎盛状态也是在易汉入吴后实现的；

朱氏一族以朱桓、朱据为首，其祖上更是寂寂无闻，他们完全是凭借部曲武力追随孙权南征北战而以军功发家旺族的。

由此可见，这江东本土四大士族先前休说“四世三公”，就连中原名门世族“三世二千石”的基本标准也未达到。他们的勃然而兴，均由孙权

全力促成，授任陆逊、顾雍为丞相之荣，又提拔张温为选曹尚书，放手使用朱桓、朱据为方面大将，并带动他们的子弟嫡亲大面积地入仕吴室。这才使四大士族形成了吴国政权的四大支柱。

并且，他们在迅猛发展的过程中，还自觉地塑造出了“文”“武”“忠”“厚”的独特门风，令吴主“取文则用张、举武而用朱、纳贤则用陆、行厚则用顾”，深度影响了吴廷人事选任之导向。

吴国若能一直以此四大士族为根底而拱卫皇权，岂非与东汉一朝相媲美乎？

可惜，后来张氏一族因卷入“暨艳一案”被废，剩下的“陆、顾、朱”三大士族又遭“两宫夺嫡”之祸而牵连受挫，使得江东元气大伤。但也亏了陆氏一门后续有陆凯、陆抗等匡济时艰，与孙吴国运相始终：直至陆抗死后，司马氏才能乘隙灭吴。这亦可以归功于孙权生前孜孜不倦的育才培基之举。

奖赏激励，以“实”为本

孙权对有功有为的臣下通常是不吝赏赐、毫无迟滞的。他素不以虚荣而鄙人，专以实惠而服人。

例如《三国志·吴书·全琮传》记载：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将关羽围樊、襄阳，（全）琮上疏陈羽可讨之计，（孙）权时已与吕蒙阴议袭之，恐事泄，故寝琮表不答。及禽羽，权置酒公安。顾谓琮曰：“君前陈此，孤虽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于是封阳华亭侯。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又记载：

（陆）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果冲（曹）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两，军资器械略尽。休还，疽发背死。诸军振旅过武昌，（孙）权令左右以御盖覆逊，入出殿门，凡所赐逊，皆御物上珍，于时莫与为比。

在吕蒙袭取荆州之后，《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写道：

以（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蒙固辞金钱，（孙）权不许。封爵未下，会蒙疾发，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所以治护者万方，募封内有能愈蒙疾者，赐千金。

以（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蒙固辞金钱，（孙）权不许。封爵未下，会蒙疾发，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所以治护者万方，募封内有能愈蒙疾者，赐千金。时有针加，权为之惨慽，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唶，夜不能寐。病中瘳，为下赦令，群臣毕贺。后更增笃，权自临视，命道士于星辰下为之请命。年四十二，遂卒于内殿。时权哀痛甚，为之降损。

试想，若遇到这样一位奖励十分到位、体贴细致入微的伯乐型领导，谁会不尽心竭力为之效忠呢？

综上所述，孙吴政权在三国鼎立中能够始终屹立不倒，继曹魏、蜀汉之后直至最终一个被灭国，完全在于孙权以各种手法“用贤任能、各尽所长、各得其所”，将“人和”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这才撑起了江东顶上的这一片天空！

但是，随着晚年他对身后之事焦虑愈多，他的用人行事变得愈发烦苛，对臣下的猜疑防制也愈加严重，终于酿成“两宫夺嫡之争”和“三大士族俱废”之大错，为孙吴政权亲手埋下了种种隐患。

总结起来，他在晚年的用人方略上存在着“四大弊病”。

信用酷吏而压敛臣权

孙权在开基建吴之后，一时自以为外无大敌、内政平和，遂开始着意贪求强势皇权，对臣下的职权多方侵蚀。

他仿效曹操，大张申、韩法家之术，设置“校事府”，提拔各类酷吏，对臣下百般牵制。《三国志·吴书·顾雍传》写道：

久之，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吕）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顾）雍等皆见举白，用被谴让。

《三国志·吴书·潘濬传》也记载：

时校事吕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顾雍、左将军朱据等，皆见禁止。

吕壹等人其实只是孙权用以压敛臣权的政治“黑手套”。他在晚年启用这些酷吏，完全是为了打压公卿大夫而扩张吴室皇权。像魏国内部陈矫竟敢据理抗君、孙礼竟敢违旨行义等现象，孙权是决不容忍类似情况出现在自己吴廷之上的。但酷吏们“擿抉细微、吹毛求疵、重案深诬，辄欲陷人以成威福”（摘自《三国志·吴书·步骘传》）等劣行也进一步恶化了孙吴的君臣关系，造成政局动荡，容易引发内讧外患。

宽于武将而苛于文臣

孙权在对待文臣与武将两个群体时，所采用的手法是迥然不同的。他对武将较为偏重，故而对他们的违法乱纪之举多有宽纵，甚至是不闻不问。《三国志·吴书·朱桓传》记载：

（全）琮以军出无获，议欲部分诸将，有所掩袭。（朱）桓素气高，耻见部伍，乃往见琮，问行意，感激发怒，与琮校计。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综为督，综意以为宜尔。”桓愈恚恨，还乃使人呼综。综至军门，桓出迎之，顾谓左右曰：“我纵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语综使还。桓出，不见综，知左右所为，因斫杀之。桓佐军进谏，刺杀佐军，遂托狂发，诣建业治病。权惜其功能，故不罪。

《三国志·吴书·吕范传》记载：

（吕范）其居处服饰，于时奢靡，然勤事奉法，故（孙）权悦其忠，不怪其侈。

《三国志·吴书·潘璋传》写道：

（潘璋）性奢泰，末年弥甚，服物僭拟。吏兵富者，或杀取其财物，数不奉法，监司举奏，权惜其功而辄原不问。

但对待文臣儒官，孙权往往则是执法从严、毫不手软。例如《三国志·吴书·张温传》记载：

（孙）权既阴衔（张）温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盛，众庶炫惑，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会暨艳事起，遂因此发举。

实际上，张温一介文吏，无兵无权，仅有虚名在外，又无违法犯罪之迹，孙权却以“莫须有”之罪名加之，实属滥权。《三国志·吴书·陆绩传》又写：

孙权统事，辟（陆绩）为奏曹掾，以直道见惮，出为郁林太守。

孙权只因怕了陆绩“直道而行”，就把他远放郁林郡，可见他的容人之量终是不广。《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又写道：

（虞）翻性疏直，数有酒失。（孙）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也！”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醉徒之语，确无分寸，但也不必太过较真。然而孙权却抓住这些醉言醉语，将虞翻流放外地，难逃“严苛”之名。

他宽纵武将，后来造成各地“私家军”泛滥，而令皇权难有依托；他苛待文臣，后来酿成“两宫夺嫡之争”与“三大士族俱废”等恶性事件，使名士大夫与吴廷离心离德，终至皇权孤立而溃。

蔽于私爱而暗于大体

晚年的孙权很少有壮年之际的冷静与清醒，时常被自己的私欲蒙蔽了头脑。他的长女孙鲁班，人称“全公主”，腹有权谋而居心不正，因与太子孙和及其母王夫人有隙，遂“欲废太子、立鲁王（孙霸）”。像她这样怀有私怨而介入立嗣之争的人，除了坏事、添乱、火上浇油，又有何用？孙权稍为理性一些，本应该是对她拒而远之，不留给她任何兴风作浪的机会。可是，孙权却溺于私爱，因孙鲁班为自己的“掌上明珠”，遂丝毫不加节制，对她言听计从，受谗而枉害太子孙和，动摇国本，酿成“两宫夺嫡之祸”。

《三国志·吴书·孙和传》记载了孙鲁班谗害孙和母子的全部过程。

是后王夫人与全公主（孙鲁班）有隙。（孙）权尝寝疾，（孙）和祠祭于庙。和妃叔父张休居近庙，邀和过所居。全公主使人觇视，因言太子不在庙中，专就妃家计议，又言王夫人见上寝疾，有喜色。权由是发怒，夫人忧死，而和宠稍损，惧于废黜。

在这期间，孙权不加核实便轻信了孙鲁班的所有谗言，可谓昏聩已甚。

同时，在他身边，执掌机密要务的吴国中书令孙弘亦是一个“佞伪险诐”（摘自《三国志·吴书·张休传》）之徒，在“两宫夺嫡之争”中先后谗害了东宫派张休、朱据等大臣；在接受孙权遗诏辅政之后，他又想除掉同为辅臣的诸葛恪而专权独裁。孙权晚年竟与此等奸徒为伍，不疑不弃，反倒信任有加，又如何不会种下无穷后患？

重于流寓而轻于本土

自开国以来，孙吴政权本有三大支柱：一是宗亲派武将集团，以孙静、孙贲、孙辅等及其子孙为主干；二是外来流寓派士族集团，以周瑜、张昭、诸葛瑾父子、吕据父子等为主干；三是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以陆逊、顾雍、朱据、张温等四大士族为主干。

在孙权掌权的早期，外来流寓派士族集团是他的政治后盾，所以才有“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的说法。到了中晚期，孙权大力推行“吴室政权江东化”的方略，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渐渐成了他的权力支柱。这时候，“内事不决问顾雍、外事不决问陆逊”成为他的政治常态。

直至孙吴赤乌年间，孙权有鉴于曹魏政权被中原名门世族集团“喧宾夺主”的现实状况，唯恐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也会坐成大势，于是刻意挑起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两宫夺嫡之争”，将“陆、顾、朱”三大士族卷了进来，然后借宗亲派、外戚派（指孙鲁班和她背后的步氏家族、全氏家族）等两大势力集团之手狠狠予以打击，逼死陆逊、流放顾谭兄弟、赐死朱据，使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元气大伤，从而导致吴廷的权力格局严重失衡。

孙权原来很武断地认为：外来流寓派士族集团根基单薄，易于操控，所以要重点扶持；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根深叶茂，难以制约，所以要重点防范。但他没料到自己刻意压下江东本土派集团，又强行推举外来流寓派集团登上历史前台的中央大位，却终是难以制衡以孙峻、孙綝堂兄弟为首的宗亲派集团侵吞皇权，并导致少帝孙亮被无过而废的恶性事件发生。他“重流寓而轻本土”，令吴室的权力根基“本末倒置”，一直内乱频频、难得安定，祸莫大焉！

历史上任何一位英主明君，无论是秦皇汉武也罢，还是唐宗宋祖也好，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孙权亦不例外。在早年，他曾是“仁而多断”的明君；然而到了晚年，他却成了“苛而多猜”的昏君。在早年，他曾是“好侠养士”的英主；然而到了晚年，他却成了“好杀嫉士”的庸主。这是令人非常惋惜的。

不过，他用人立国，既有“四大长处”，又有“四大弊病”，可算是为后人提供了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永远值得后人借而鉴之以扬长避短、励精图治。

孙权晚年立嗣顾命问题之探隐

裴松之深研孙吴历史，认为：

袁绍、刘表谓（袁）尚、（刘）琮为贤，本有传后之意，异于孙权既立（孙）和而复宠（孙）霸，坐生乱阶，自构家祸，方之袁、刘，昏悖甚矣。

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笔记》中亦言：

惟大帝（指孙权）号称贤主，而太子（孙）和被废之际，群臣以直谏受诛者，如吾粲、朱据、张休、屈晃、张纯等十数人，被流者顾谭、顾承、姚信等又数人，而陈正、陈象至加族诛，吁，何其酷哉！自是宫闱之衅，未有至此者也。

他们都看出了孙权晚年“坐生乱阶、自构家祸”，而且牵涉面极广，在“昏悖”“酷烈”的表象之下似乎又深藏用意，令人有些捉摸不透。

《三国志·吴书·孙和传》里引用殷基的《通语》里记载：

初（孙）权既立（孙）和为太子，而封（孙）霸为鲁王，初拜犹同宫室，礼秩未分。群公之议，以为太子、国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于是分宫别僚，而隙端开矣。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

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分别看清孙和的“东宫党”和孙霸的“鲁王党”各自的名单：“东宫党”这边，有陆逊、顾谭、朱据、诸葛恪、滕胤、施绩、丁密等高官；“鲁王党”那边，有步骘、全琮、吕岱、吕据、孙弘等要员。在这两份名单当中，“鲁王党”这些骨干成员于“两宫夺嫡之争”中无一人受损，均是全身而退；而“东宫党”这些重臣，却是多遭孙权的严厉制裁—陆逊被孙权遣中使逼责而死，顾谭及其兄弟被流放交州，朱据先贬出京而后被半途追杀，惨不忍睹。

但我们研判一下陆逊、顾谭、朱据这三人的门户背景，却发现他们均出身于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并在该集团中为首领人物。于是，一个明确而惊人的答案跃然而出：原来，孙权故意借着这一场“两宫夺嫡之争”，引诱“陆、顾、朱”江东三大本土士族出头参与，然后对他们分而削之、压而抑之。对这个结论，三国史学家们几乎俱有研究，而且其中还不乏精深之见解。

不过，大多数的三国史学家只是止步于这个结论，却不曾“透过现象洞察本质”：对孙权为什么要在立嗣之争中专门打压江东本土派势力、为什么其他派系的首领们却能全身而退、为什么后来又赐死鲁王孙霸以及“两宫之争”结束之后的后续立嗣进程状况等一系列问题并未深入剖析，而只是用“昏悖”“酷烈”等评价性词句给孙权晚年立嗣顾命之重大问题草草画上了句号。

笔者则认为，孙权晚年的立嗣顾命之所有举措背后皆蕴含着精密而深远的政治谋算。孙权当时已年届七旬，掌权执政五十余年，目睹了刘备“白帝托孤”、诸葛亮剪除李严、魏文帝“嘉福殿顾命”、魏明帝临终托

孤、司马懿与曹爽争权内讧、“高平陵事变”等一系列事件，遂以它们为龟鉴，结合吴国自身的现实权力格局情势，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对立嗣顾命之大事做出了种种动态化布局，力求面面俱到、万无一失。然而，俗话讲：“人算不如天算。”孙权虽然殚精竭虑、费尽心机，终因现实时势的急剧变化，让他的所有布局都一一落空了。

而这一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的演变过程，笔者在此尽量贴近史实地描绘出来，以供读者探而索之。

孙权于赤乌八年至赤乌十三年的立嗣布局

孙吴赤乌八年（公元245年），正是孙和与孙霸“两宫夺嫡之争”进行到如火如荼的时候。但他俩万万没有料到，超然在上的父皇孙权早已对这一场立嗣之争和本末底细洞若观火，并有了全新的想法和谋划。

《三国志·吴书·孙和传》里引用殷基的《通语》记载：

（孙）权患之，谓侍中孙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乱？”于是有改嗣之规矣。

孙权已然明白：如今“两宫夺嫡之争”既然如此激烈，孙和立则孙霸一派必危；反之，孙霸立则孙和一派亦危。毕竟孙和、孙霸都是自己的儿子，孙权还是希望他们两不相危。而使他们“两不相危”，孙权就只能将他们“两不得立”。那么，便只有“改嗣”—改立第三个东宫候选人为太子。后世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这样做的：他把参与夺嫡之争的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双双废除，改立第三者晋王李治为嗣，以维护宗室的手足相安。

同时，孙权觉得“两宫夺嫡之争”的战火既然已经燃烧起来了，倒也不妨把它看作一个重要的契机—一个对朝廷原有的权力格局展开“大洗牌”的契机。

在“两宫夺嫡之争”前的孙吴高层权力格局情况是这样的：宗亲派武将集团、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外来流寓派士族集团三股势力共同撑起了吴室皇权。可是，孙权观察到曹魏内部的中原名门世族集团已经急剧膨胀到威胁皇权的地步，这让他触目惊心。他反观本国的内部情形，察

觉到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也在暗暗坐大—“陆、顾、朱、张”四大家族的子弟姻亲几乎遍布吴廷上下，潜在势力极大。于是，孙权对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产生了极为强烈的猜忌之心。他不想见到第二个吴国的“司马懿”出现，便借着这一场“两宫夺嫡之争”的契机，实施了自己狙击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的谋略。

其实，“鲁王党”的势力原本十分脆弱，根本不能与“东宫党”相比。而孙鲁班、全琮夫妇作为外戚派势力代表，是孙权默许他们加入“鲁王党”的第一股势力。而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越骑校尉吕据、中书令孙弘等名将要员，若无孙权的暗中授意，也是不可能无故支持鲁王孙霸的。孙霸本人也拿不出什么条件可以“蛊惑”他们。所以，归根到底，这都是孙权隐在幕后自导自演的一出“大戏”。

这出大戏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孙权以明面上的“两宫夺嫡之争”为陷阱，以孙和、孙霸两个儿子为“诱饵”，以孙鲁班、全琮父子和旁系宗室孙弘、孙峻等人为“黑手套”，以步骘、吕据、吕岱等其他派系重臣为助手，实施了一场对江东本土派首领们“定点清除”的残酷围剿。在这场无形的围剿中，陆逊被逼死、顾谭兄弟被流放、朱据被赐杀，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实力大损，再也无法参与吴室最高“权力游戏”的角逐。

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出顾雍的长孙、顾氏一族的新秀骨干顾谭所遭受的打压来进一步说明孙权的用意。顾谭在“两宫之争”中的职位是太常之官。太常之官是吴廷一个关键性的职位。孙吴名臣潘濬就曾经担任过太常卿，众人皆以为他必将接替顾雍出任丞相。《三国志·吴书·潘濬传》就写道：

黄门侍郎谢厷语次问（吕）壹：“顾公（雍）事何如？”壹答：“不能佳。”厷又问：“若此公免退，谁当代之？”壹未答厷。厷曰：“得无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语近之也耳。”厷谓曰：“潘太常常切齿于君，但道远无因耳。今日代顾公，恐明日便击君矣。”壹大惧，遂解散雍事。

而今，顾谭身居太常之位，明显是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所青睐的候选接班人。到了“两宫夺嫡之争”的尾声，孙权却将他流放交州，把他的太常之位转授给了身为帝婿的滕胤。而滕胤后来果然以外戚派代表的身

份入列新帝辅政班子。这一系列的动作，将孙权竭力打压江东本土派势力的用意表现得毕露无余。

祖父（顾）雍卒数月，（顾谭）拜太常，代雍平尚书事。（摘自《三国志·吴书·顾谭传》）

最后，孙权用步骘取代了陆逊的丞相之位，用吕据取代了朱据的骠骑将军之职，又以流寓派士族集团新秀骨干诸葛恪为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陆）逊领荆州事”。（摘自《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在这一次吴室最高阶层的“权力大洗牌”中，江东本土派势力被完全踢了出去。

当然，孙权也不是百分之百地信任其他派系的大臣们。他为了试探诸葛恪的忠心，以“贬黜朋党”为名，将投附孙霸的诸葛恪之长子诸葛绰交付给他，“令更教诲”。而诸葛恪也毫不含糊，立即鸩杀诸葛绰以自证忠节。对此，孙权甚为满意，于诸葛恪的倚重之情愈来愈盛。

当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遭到严重摧残后，孙权于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初就“紧急刹车”，制止了“两宫夺嫡之争”。鉴于鲁王孙霸野心勃发、不择手段地害兄夺位，孙权狠下心来将他赐死。“鲁王党”的一些小角色，例如杨竺、全寄、吴安、孙奇等，全被孙权诛杀，当作是对拥护正统的礼法派人士们的一个交代。同时，太子孙和也被幽禁而废。

此刻，究竟立定谁为嗣君，成了朝野上下最为关注的重大问题，牵动着吴室诸臣的政治神经。

孙权于赤乌十三年冬至太元二年的立嗣布局

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十一月左右，在太子位空悬了两个多月之后，孙权做出了这一生最为重要的一个决断：立年仅八岁的幼子孙亮为东宫太子。

在此之前，他仔细思量了一番。在他的皇子当中，还有孙奋、孙休及孙亮三个可以入列东宫候选人。但孙奋为孙霸之胞弟，素来暗怀野心，选他就等于选孙霸，所以他被第一个排除出局。孙休个性沉稳，但他的母族从来不为孙权所宠信，而且孙休之妻又是朱据的女儿，与江东

本土派士族集团关系甚密，所以孙权也不会选他为嗣。那么，最后的候选人就只剩下孙亮了。

孙亮太过年幼，这是他最大的劣势。可是孙亮背后有孙鲁班等人的全力支持，其妻又为全琮的侄儿全尚之女，是外戚派集团所中意的东宫人选。且孙亮的母亲潘夫人出自罪人之家，与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毫无瓜葛，背景十分单纯。综合种种考虑，孙权只得立他为嗣。

但是确立孙亮之后，孙权始终还是放心不下的。不久前发生在曹魏的“高平陵事变”强烈地触动了他。他感觉自己若是立定孙亮为嗣，就极有可能让“高平陵事变”这样的悲剧在吴廷重演！毕竟，“主少国疑”“主少臣强”，是历朝历代灭亡之覆辙啊！西汉末年幼帝在位，结果被王莽篡了大位；东汉末年幼帝在位，结果竟酿成董卓之乱。这些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令孙权再一次犹豫了、动摇了。

太元元年（公元251年）十一月，孙权得了风疾。在重病中，他意识到原太子孙和并无过错，于是想召回孙和重新改嗣。

此时，以孙鲁班为代表的外戚派集团和以孙峻、孙弘为代表的宗亲派集团已经与孙和变成了死敌，怎会允许他复立太子之位？！他们一齐向孙权施加压力，逼迫孙权停止妄想，仍以孙亮为嗣。

这个时候的孙权，实际上已是重病在床，根本无法正常行使皇权。他纵有自己的独立之见，也难以落实。于是，召回孙和之事无疾而终。孙权最后一次扭转大局的努力归于失败。

他卧病在床，无力改变和无力制约的事情还有很多：孙鲁班、孙弘等人为了防止孙亮的母后潘氏坐大争权，于是联手暗杀了她，使孙亮愈发依赖自己的姻戚—全氏一门。皇权的根本已然岌岌可危。

孙权既已明白确立孙亮为嗣之事实不可逆转，他只有接受现实，苦心孤诣地谋求建立起一套最优化的权力制衡体系，为孙亮提供一个合适的辅政班子。

第一，他最终确定了诸葛恪为首辅大臣。擢拔诸葛恪为首辅，孙权是经过反复思量的。他也嫌过诸葛恪的性格“刚狠自用”，但先前原太子

孙登临终遗表里，就将东宫所交之友中的诸葛恪列为首位，称他为“才略博达、器任佐时”。又加上宗亲派首领孙峻大力推荐，再结合诸葛恪杀子以明忠的表现，孙权终于决定他为顾命首辅大臣，并出任太子太傅。

第二，为了防止诸葛恪权势过重，孙权又以宗亲派首领孙峻、孙弘和外戚派代表滕胤三人共为辅政大臣，以“三对一”的方式来制衡诸葛恪。

第三，为了提高辅政班子的广泛性及忠诚度，孙权最后又调取了出自大内宿卫体系的吕据为末位辅政大臣，由他出任孙亮的太子右部督，专职贴身护卫孙亮。至此，孙权为幼帝孙亮搭建的辅政班子完全成型。

即使如此，他依然不能完全放心。为了从外部制约整个辅政班子，孙权使出了最后一招：以藩王居外而拱卫帝室。他“立故太子（孙）和为南阳王，居长沙；子（孙）奋为齐王，居武昌；子（孙）休为琅琊王，居虎林”（摘自《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这三位成年藩王全被安插到“江滨兵马之地”。依照孙权的构思，他们可以在吴室危急的关键时刻举兵入京勤王护驾。

完成了这四步布局，孙权自觉已经做到了吴室权力制衡体系的极致。到了这时，他才感到自己似乎可以安心地去世了。

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刚一驾崩，他这一系列繁复而又细致的身后布局很快就“散架”了。

孙亮登基后的遗留问题及皇权危机

孙权在确定诸葛恪为首辅大臣之际，就很清醒地认识到他有着“刚狠自用”的缺点，不适合入相辅国。但在孙峻等宗派集团首领的竭力保举之下，他只得勉强俯从了。

其实，诸葛恪“刚狠自用”这个缺点，如果放在他还是一方将领时，也不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若是他此刻已然坐拥相权，那么这个缺点便容易恶性膨胀、流为大患而害人害己。

果然，幼帝孙亮刚一登基，诸葛恪刚一执政，他就引发了两起恶性

事件。一是他不经讯问，便以强硬手段擅自处决了另一位辅政大臣、中书令孙弘。或许孙弘真有对诸葛恪不利的想法，但诸葛恪对他的处置亦应该如同他的叔父诸葛亮处置李严一样依其罪状及供词而免官禁锢即可。他的“以暴制敌、擅杀天下”，开启了后边吴国辅政大臣“自相残杀”的先河。

二是他为了便于自己独断专行，公然违背孙权的遗诏，把齐王孙奋、琅琊王孙休等两位藩王从“江滨兵马之地”调离。《资治通鉴》里写道：

（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乃徙齐王（孙）奋于豫章，琅琊王（孙）休于丹阳。

这期间他又唯独漏掉了原太子孙和，让他继续留在长沙，显得有些不公不平。孙鲁班、孙峻等曾经反对孙和为嗣的人们难免会联想到：诸葛恪先前在“两宫夺嫡之争”中拥立过孙和，且又是孙和之妃张氏的舅舅，他如此厚待孙和，莫非另有企图？从此，诸葛恪在朝廷内外于无形中为自己树立了不少政敌。

而且，更令朝臣们心生忌惮的是，自孙弘死后，诸葛恪在整个吴国辅政班子里便成了彻彻底底的“一枝独大”：滕胤和他是儿女亲家，他俩是天然的“政治同盟”；吕据又和他同属流寓派士族集团，不会与他为难。而剩下的唯一一个宗亲派代表孙峻又只是武卫将军，手头仅有为数不多的禁军，远远不及诸葛恪坐拥雄师。所以，长此以往，诸葛恪必将发展成为吴国的司马懿。

本来，在这套辅政班子之外，还是有一股强大的势力—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可以制约诸葛氏的。“陆、顾、张、朱”四大家族只要有一两位精英代表入列辅政班子，吴国的最高权力格局就不会偏倚失衡。但孙权生前自毁长城，刻意将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排斥疏远，又怨得谁来？

《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里记载孙权当年曾经公开评论过曹丕的“嘉福殿托孤”之事而道：

闻任陈长文（指陈群）、曹子丹（指曹真）辈，或文人诸生，或宗室戚臣，宁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专，则其事乖错。如昔

张耳、陈馀，非不敦睦。至于秉势，自还相贼，乃事理使然也。又长文之徒，昔所以能善守者，以（曹）操笮其头，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耳。逮（曹）丕继业，年已长大，承操之后，以恩情加之，用能感义。今（曹）叡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陷怼，转成嫌贰。一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离刺转相蹄啮者也！强当陵弱，弱当求援，此乱亡之道也。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这段评语结果竟在他自己身后的吴国辅政班子里完全应验了：诸葛恪独掌大权不久，在对魏国的合肥新城攻坚战失败后威名顿损，加之他隐隐暴露出复立原太子孙和的企图，被孙峻、孙亮采用行刺狙杀的手法除去；孙峻执政没几年也暴病而亡，临终却将首辅大臣之权擅自转授给自己的堂弟孙𬘭；滕胤、吕据等人不甘不服，准备联手废掉孙𬘭，反被孙𬘭借机铲除。孙𬘭专制朝政之后，又对吴主孙亮不恭不敬。孙亮按捺不住，意欲联合孙鲁班和全氏一族消灭孙𬘭。不料，又被孙𬘭反扑成功，孙亮遂被废除天子之位。至此，孙吴高层权力内斗达到了极端恶劣的地步。孙权生前的顾命托孤之布局被打得粉碎。若不是孙𬘭仅有二十六岁，资历太浅、功德太薄、民望太低，他肯定会成为吴国的司马师、司马昭。

尽管孙吴后来有了孙休意外崛起而稍稍做了些许拨乱反正之举，但吴国已是因为频繁而激烈的权臣内斗而几乎耗尽了元气，终于如同江河日下，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覆亡。

那一年，江东有童谣纷纷泛起：“庚子岁当头，青盖入洛阳”；那一年，吴国末帝孙皓走投无路，只得亲笔向逼临石头城下的晋军写下了求降书；那一年，在孙吴卫国的最后一战中，却全然没了江东本土世家精英们的挺身而出。而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二十八年前孙权那份临终时的顾命辅政大臣名单之上：他缺掉了最关键的几个姓氏。

第十三章 三国时期的官场选任特点

三国时期的官场盛产各类人才，但它终究不是脱离现实的“真空地带”，也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特殊之处。在那个时代，有人因为懂得这些特殊之处而如鱼得水，也有人因为不懂这些特殊之处而步步维艰。无论是雄才大略的曹操、刘备、孙权，还是聪明睿智的诸葛亮、司马懿、陆逊，他们都只能在这些特殊之处中腾挪翻转，争取以最巧妙的技巧来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最大化。

“九品中正制”的正反面

汉末三国时期，“乡举里选”“察举征辟”等人事选任制度和魏朝所建的“九品中正制”都是并轨执行的。在所有的官方文章中，“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是主旋律，是大书特书的，也是不容置疑的。曹操率先垂范，提拔了一大批才能出众的精英，从而使自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政治形象深入人心。

而与之相对应的“任人唯亲”“为人择官”则是众所唾弃的，是不许通行的。连汉末尚书令荀彧那样的高官显要，也不敢轻易擢选自己身边的亲随侍从来“示人以私”。

可是，魏国名臣、太中大夫杜袭却公开讲破了当时人事选任制度背面的另一个让众人心照不宣的特点：

惟贤知贤，惟圣知圣，凡人安能知非凡人耶？

所以，司徒府也罢，选曹署也罢，中正官也罢，他们自然是“贤人”，否则他们怎么去选“贤人”呢？这也就是说，你若当了官，便不“贤”也得“贤”了，这样你才可以“举尔所知”。所谓的“惟贤知贤、惟圣知圣”的另一层含义就是“惟亲知亲、惟故知故”。《后汉书》记载：

南阳阴修为颍川太守，以旌贤擢俊为务，举五官掾张仲方正，察功曹钟繇、主簿荀彧、主记掾张礼、贼曹掾杜佑孝廉，荀攸计吏，郭图为吏，以光本朝。

后来，荀彧担任汉廷尚书令后，举荐钟繇为司隶校尉、侄儿荀攸为尚书之官。而且由于杜佑和他是同郡乡亲，荀彧又举荐了与杜佑同宗的杜袭出任曹操的军祭酒。庙堂之上，连世称“好士爱奇”“不以私欲挠意”的荀彧亦是如此选任人才，又何况德行在他之下的众多卿官呢？

实际上，“九品中正制”也好，“乡举里选制”也好，三国官场选官用人的真正特点就是：在对外的政治口号上要高喊“任人唯贤”，而且一定要高调、高调、再高调；但于暗底下的实际操作中却在大多数的时候遵循着“任人唯亲”，当然最好是像荀彧举荐荀攸一般选用“亲而且贤”的人才为官入仕。如此便可以更有效地堵住“悠悠众口”了。这样的做法，《世说新语》有一则故事可作辅证。

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其妇出诫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既至，帝问之，允对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校，为称职与不？若不称职，臣受其罪。”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允衣服败坏，诏赐新衣。

“以行而求名，以名而立身”的真相

《三国志·魏书·杜畿传》注引《杜氏新书》称：

（李）丰砥砺名行以要世誉。

《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亦称：

言事者以（诸葛）诞、（邓）飏等修浮华、合虚誉。

从这些词句，我们可以总结出汉末三国时期士人们当官入仕的主要方法是：“以行而求名，以名而立身”，即：必须要以自身的德行、事迹和才艺表现而迎合当时的主流舆论，争取获得一定的名气，方能脱颖而出、步步高升。

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就是王祥的“卧冰求鲤”故事和时苗的“去官留犊”故事。

父母有疾，（王祥）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

雀炙，复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幕，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焉。（摘自《晋书·王祥列传》）

这便是王祥以“孝”行而求到“孝廉”的故事。

（时苗）又其始之官，乘薄軬车，黄牸牛，布被囊。居官岁余，牛生一犊。及其去，留其犊，谓主簿曰：“令来时本无此犊，犊是淮南所生有也。”群吏曰：“六畜不识父，自当随母。”苗不听，时人皆以为激，然由此名闻天下。（摘自《三国志·魏书·时苗传》）

这便是时苗以廉行求得“清廉”之美名的故事。

他俩的“事迹”，可谓时人之中立名造势最为成功的案例。所以，王祥一路做到了大司农、太尉、太保等高官；而时苗也做到了太官令、郡中正、典农中郎将等显职。

这就是汉末三国时期士人们改换门庭、衣紫佩金的着力点：以行扬名，立竿见影。但人人俱有孝廉之行，人人都会花样百出，你若无人脉背景加以提携，便只能将自己的孝廉之行做得出人意表、做得尽人皆知，哪怕是刻意作秀，也定会为上官所赏识。说到底，不会“包装”自己言行的士人，在汉末三国时期想要出人头地，那真的是难上加难。

从某个角度而言，这种应仕模式其实比后世只做“表面文章”的科举考试更为务实可观，也更富有技术含量。

不贿不礼，官路不顺

在汉末时期的官场上，以“人情往来”的名义向上官行贿送礼是必不可少的。但上官亦非愚蠢，你若明面上送礼行贿，必难成功。所以，将行贿送礼磨炼成一门“巧之又巧”“妙之又妙”的技术活儿，就成了朝廷各级官吏的“必修课”。

在这方面，蜀汉叛将孟达的父亲孟他便做得十分精妙。《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三辅决录》中记载：

（汉）灵帝时，中常侍张让专朝政，让监奴（掌管家务的奴仆）典护家事。（孟）他仕不遂，乃尽以家财赂监奴，与共结亲，积年家业为

之破尽。众奴皆惭，问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许诺。时宾客求见（张）让者，门下车常数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后到，众奴伺其至，皆迎车而拜，径将他车独入。众人悉惊，谓他与让善，争以珍物遗他。他得之，尽以赂让，让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

孟他只为求官而来，并不看重钱财。他对自己佯装为张让贵客而骗来的钱一分一文也没敢中饱私囊，而是全部交给了张让。张让也非庸常之人，他所看重的则是孟他对自己的不欺不瞒，觉得孟他完全可以出任方州担当自己在外藩捞钱的"黑手套"，于是才提拔他做了凉州刺史。

《三国志·魏书·张既传》注引的《魏略》中另一则故事讲道：

（张）既世单家，为人有容仪。少小工书疏，为郡门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门寒，念无以自达，乃常蓄好刀笔及版奏，伺诸大吏有乏者辄与之，以是见识焉。

张既的行贿手法就是"以小谋大""积渐成势"。他利用上官们贪图小便宜的心理弱点，很巧妙也很隐蔽地将贿礼送了出去。最终，上官们觉得礼足意满，便将他推荐出去当了孝廉、茂才。张既就此把官儿越做越大，直至官拜凉州牧、爵封西乡侯、食邑四百户。

所以，即使在汉末三国时期，士人们也切勿以为天下吏治澄清便无孔可入。你看，张既、孟他之流别出心裁、巧妙而为，甚至是在一代雄主曹操的治下，依然能够以礼"开道"、官运亨通。

上虽伪饰，下必投机

古时，上官们几乎都很矫情，他们越是在明面上强调不能做某些事情，而实际上在暗底下可能却非常欢迎下属替他们做那些事情。

对这个现象，下层官吏们切莫存有侥幸心理，只能是"勿问上之不欲，但问己之不行"。《三国志·魏书·王思传》里有一则故事就给我们很生动地上了一堂"活课"，其主要角色是曹魏嘉平年间的弘农郡太守刘类，他"外托简省，每出行，阳敕督邮不得使官属曲修礼敬，而阴识不来者，辄发怒中伤之"。

这件轶事还告诉我们：在当时的官场内部，许多事情永远是“表里不一”的。

我们可以再通过《三国志》中另外一位大名士杨俊的遭遇来加深印象。

（魏文帝曹丕）车驾南巡，未到宛，有诏百官不得干预郡县。及车驾到，而宛县令不解诏旨，闭市门。帝闻之，忿然曰：“吾是寇耶？”乃收宛令及太守杨俊。

杨俊和宛县令没有主动做好迎驾工作，信了“有诏百官不得干预郡县”的虚文，末了竟遭斩首之刑，你说他俩是冤枉不冤枉呐？

两面下注，长线投资

汉末三国时期是旷日持久的大乱世。在这样的乱世谋生存求发展，尤为不易。其中各个家族为使自身长久安全，通常会使用“两面下注、长线投资”的深远方略。而且，这样的实例可谓是不胜枚举。

汝南袁氏一族自汉末以来，为免宦党政争之害，一方面使偏房庶子袁赦净身进入禁省，官居中常侍；另一方面又使嫡传子弟袁隗、袁逢等从政于朝，位列三公。这样一来，他们外有袁隗、袁逢以清流面孔而坐镇，内有袁赦以近宦之权而暗助，所以能做到“累世台司、富贵绵绵”。甚至在两次波及千百户名门世家的大规模“党锢之祸”中，袁氏一门也仍是安若磐石、毫发未损。

再如颍川荀氏，自命为“荀子之后”，素为儒林之冠；他们族中亦是做了两手布局，荀彧全力辅佐曹操以安汉平乱，其兄荀谌则为袁绍之谋主而纵横河北，然后居中择全胜者而决之。

河内司马氏也是如此施为：司马懿出任魏国太子曹丕之中庶子一职，而其弟司马孚则出任曹植之平原侯府的中庶子。他俩各为其主、各尽其忠。所以，在魏宫立嗣之争中，无论是曹丕还是曹植最终胜出，其实都影响不了司马家族左右逢源之大局。

琅琊诸葛氏之绸缪部署更是高明之极，一门三杰分魏、蜀、吴三

国，彼此遥相呼应；诸葛亮在蜀汉位居丞相，名重天下；其兄长诸葛瑾在东吴官居大将军，身领豫州牧，亦是非比寻常；其族弟诸葛诞则在魏国官拜征东将军，节制淮南，独立成势。他们一族之布局如此恢宏深远，委实令人咋舌。

而诸葛亮之侄、诸葛瑾之子诸葛恪一家又在东吴"南鲁两宫"之争中各自入注：诸葛恪拥立太子孙和为嗣，他的长子诸葛绰则为鲁王孙霸之心腹，父子二人均可谋利上位。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这些世家大族的谋划和做法有违"从一而终"的道义。毕竟，乱世之间风险莫测，保全族人整体利益为上。在家族内部实行宗亲子弟"多元化投资"，既是一种宽容，更是一种难得的明智。

"有权就能任性"

"权大于法""权大于理"是三国官场的通例。《三国志·魏书》记载，魏文帝曹丕因为治书执法官鲍勋多次对他"唱反调"，并且多次顶撞得他下不来台，心头极为不满，遂借小小过失给鲍勋扣了一个"指鹿为马"的大帽子，要把他置于死地。

但廷尉署认为鲍勋罪不至死，于是以司法为武器，和曹丕所代表的皇权展开了一场激烈异常的较量。

《三国志·魏书·鲍勋传》写道：

（魏文帝）诏曰："勋指鹿作马，收付廷尉。"

廷尉卿高柔看到皇帝扣了这么大一顶"帽子"下来，只得适度逢迎了一下。

廷尉法议："正刑五岁。"

想让鲍勋服五年苦役就算了。不料，他手下的廷尉署"三官"，即"廷尉正""廷尉监""廷尉平"三名属官却联署驳回了高柔的意见。

依律罚金二斤。

高柔无可奈何，便将他们三人的驳回意见上呈给了曹丕。

曹丕一见，勃然震怒。

（鲍）勋无活分，而汝等敢纵之！收三官以下付刺奸，当令十鼠同穴！

直接以诛杀之刑来威胁这些司法官员。

高柔展现出了自己的担当：“固执不从诏命。”于是，曹丕使出最后的“撒手锏”—

帝（指曹丕）怒甚，遂召（高）柔诣台；遣使者承旨至廷尉考竟（鲍）勋，勋死，乃遣柔还寺。

当时，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等一大批高官重臣与高柔一道向曹丕求情赦免鲍勋。曹丕尽皆不许，终是处死了鲍勋。

这就是三国时期“强权压倒律法”的一个明证。曹丕身为一国之君，知法枉法，以权压法，为各州郡执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在这样的专制环境之中，即使是像高柔一样刚正不阿的直臣，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知恩图报”背后的权权交易

汉末三国时期，官场里有一种秘而不宣的内部规则：官员之间彼此提拔对方的亲戚子弟，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道德口号之下进行人事举荐上的权权交易。

这样的例子很多：汉末灵帝时期，司马防曾任洛阳令之职，举荐曹操当了洛阳北部尉，使曹操顺利地迈出了仕途的第一步。后来，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左右，曹操位居司空，有了开府置吏之权，便辟召司马防之长子司马朗做了自己幕府中的僚属，并最终官至主簿。到了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左右，曹操升为丞相，又辟召司马防之次子司马懿当了府中文学掾。

汉献帝建安末年，曹操府中曹丕、曹植两兄弟立嗣之争十分激烈。太中大夫贾诩在关键时刻力挺曹丕正位东宫，并为他出谋划策而暗助之。曹丕后来代汉称帝，一登基便任命贾诩为太尉之尊，增邑封侯，毫不吝惜。

司马懿早年深受汉末尚书令荀彧大力拔擢之恩，后来他官居太尉，大权在握，不顾颍川荀氏因当年拥汉反曹而有禁锢之嫌，硬是一手将荀彧之子荀顗越级提拔为散骑侍郎之官，让他一步就跨进了朝廷中枢之职。

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权权交易”是儒家“有恩则必报，不报则不义”之理念的一种具体表现。它既不违法，也不越矩，反而为时人所津津乐道。

高官们的必学绝技：“爱士养名”

“爱士养名”这个词语摘自《后汉书·袁绍列传》：“（袁）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通常而言，汉末三国时期的达官显贵，都或多或少地懂得礼遇那些名士。因为，那些名士就是“活的广告招牌”。他们在朝野间专门替达官显贵们吹捧夸赞，提升达官显贵们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只有善待名士，才能使自己的名气好起来—这是大多数达官显贵们的潜在共识。

曹操、孙权、司马昭等这样的首脑人物自不必说，他们手下的僚吏几乎全是名流之士，自然会为他们极力鼓吹。在朝野间，即使是曹真、张郃、李典等著名武将，也颇为懂得如何去“爱士养名”。

《三国志·魏书·曹真传》记载，魏明帝下诏公开称赞大司马曹真是“内不恃亲戚之宠，外不骄白屋之士”。可见，曹真平素就是一副“平易近人”的姿态，善于拉拢名流之士为自己传扬美名，而不致遭到魏明帝及其近臣们的猜忌。

《三国志·魏书·李典传》记载：

（李）典好学问，贵儒雅，不与诸将争功。敬贤士大夫，恂恂若不及，军中称其“长者”。

以一介武将而获“长者”之誉，李典礼敬贤士之成效确为显著。

《三国志·魏书·张郃传》写道：

（张）郃虽武将而爱乐儒士，尝荐同乡卑湛经明行修，（魏明帝）诏曰：“昔祭遵为将，奏置五经大夫，居军中，与诸生雅歌投壶。今将军外勒戎旅，内存国朝。朕嘉将军之意，今擢湛为博士。”

张郃把自己的同乡儒士举荐入朝，实际上是向名士阶层极力示好，不希望被他们视为武夫而轻鄙之。而且，他凭借这一举动，不仅为自己获得了生前的佳誉，还争取到了身后的美名—他死后被名士们评谥为“壮侯”。《谥法》称：“威德刚武曰壮，胜敌克乱曰壮。”于兵败木门道、中箭身亡的张郃而言，这既是美谥，更是佳评。

而与之相反的例子则是吴质、关羽和贾充。倘若你不善待士人，不仅你生前的美誉得不到，就连你身后的骂名也难以洗脱。吴质虽然身为魏文帝的宠臣、司马懿的亲家翁，又官至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可谓位高权重。但他得罪过魏国名门世族集团的首领陈群，临终时竟然被“有司”（指有关部门）评谥为“丑侯”。《谥法》中有“怙威肆行曰丑”。这些名士大夫也真是把吴质贬损到家了。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载，关羽生前“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所以他死后亦遭评谥为“壮缪侯”。《谥法》中有“名与实爽曰缪”，暗指关羽的武功、才能是名不符实的。看来，关羽在蜀汉士大夫阶层里的口碑确实是不太好。而张飞生前“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故而他死后获谥为“桓侯”。《谥法》中“辟土服远曰桓，武定四方曰桓，克敌服远曰桓”，是实实在在的美谥。这想必大部分要归功于他平日里的“爱敬君子”了。

晋朝开国之相贾充的遭遇更为尴尬。本来，贾充素来“颇好进士，每有所荐达，必终始经纬之，是以士多归焉”（摘自《晋书·贾充传》）。但他位极人臣，却“无公方之操”，又指挥死士弑杀过魏少帝曹髦，还得罪过朝中其他派系集团的不少人士。所以，他死之后，敌对派中的名士们便评谥他为“荒公”（贾充的爵位是公爵）。《谥法》里称：“好乐怠政曰荒，昏乱纪度曰荒。”这对贾充可是大大的贬斥。幸好，贾充生前也养

了不少喉舌之士，他们站出来为贾充正名显功，要求和蜀相诸葛亮一样评谥为“武公”。《谥法》中：“威强睿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这可是无可置疑的美谥。双方交锋之下，最后由晋帝司马炎亲自拍板，方才定了贾充之谥为“武公”。看来，贾充生前若无养士之功，死后必遭恶名之辱。

说到底，“爱士养名”背后的真实逻辑就是：得罪谁都可以，但就是不能轻易得罪那些握有笔杆子的文士儒生。

“权二代”的成才捷径

在汉末三国时期，名门世族集团日渐崛起。他们后嗣的“权二代”“官二代”等人自然拥有比常人子弟更为优厚的各种资源，因而在求学或求仕之上亦是顺风顺水、路路亨通。

《三国志·魏书·曹纯传》注引《英雄记》中写道：

（曹）纯字子和。年十四而丧父，与同产兄（曹）仁别居。承父业，富于财，僮仆人客以百数，纯纲纪督御，不失其理，乡里咸以为能。好学问，敬爱学士，学士多归焉，由是为远近所称。年十八，为黄门侍郎。

曹纯是兼“官二代”“富二代”于一身，具有宦官子弟与沛郡世家的双重人脉背景。所以，他在锻炼军事能力时，有“僮仆人客以百数”的家兵、家将作为操练演习之用；他在学习典籍文章时，又能请来诸多学士“一对一”上门教授，并获得学士们的“美誉”口碑；他入仕从政之时，年仅十八便一举登上了黄门侍郎之位，其仕途起点不知高出那些庶族子弟多少倍！有这样的各种铺垫，曹纯自是一日千里，以曹氏“虎豹骑”统领之职而做到高陵亭侯之爵，声威振于天下。其子曹演也官至曹魏的领军将军。须知：曹纯受封高陵亭侯之爵时，尚书令荀彧也才仅为万岁亭侯！

《后汉书·郑泰列传》记载：

郑泰字公业，河南开封人，司农（郑）众之曾孙也。少有才略。灵帝末，知天下将乱，阴交结豪杰。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

足，名闻山东。

郑泰身为“官二代”，坐拥良田千金，自能散财于众以求名誉，果然一出仕便身任内廷侍御史，跻身高层权力圈之中。

据此而论，汉末三国时期确是人才济济，英豪辈出。但他们中间大多数皆拥有“权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等背景关系，这就等于他们在起点之初就拥有了丰富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及文化资源。所以，他们大多能够“文武兼备、出将入相、大有所为”，亦是不足为奇了。

第四篇

三分归晋

第十四章 揭司马懿为什么会是最后的赢家

真实的司马懿：儒枭·隐雄·全才

在人才辈出、群星荟萃的三国时代，比起个性鲜明的曹操、高风亮节的荀彧、八面玲珑的贾诩、志气雄远的诸葛亮、英姿倜傥的周瑜等英雄奇士来，司马懿无疑是一个神秘得有些乏味的异数。

他像一匹孤狼一样游移于汉末建安年间，又如一座奇峰一样平地崛起于曹魏黄初、太和、青龙、景初等年间，最后更是在曹魏正始、嘉平年间浓墨重彩地给自己描下了“一鸣惊人”的大手笔！所有的人，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司马懿，原来竟是整个三国最后的也是最大的赢家。

自古以来，司马懿都被人们指斥为“野心家”“阴谋家”的代表。“老奸巨猾”“老谋深算”，几乎是他从古到今都难以摆脱的个人标签。

然而，仅仅凭着“野心家”“阴谋家”这两个称号，就可以给司马懿盖棺论定了吗？赵高、董卓、李林甫等这一流的贪权嗜利、祸国殃民之辈，能和司马懿相提并论吗？司马懿在他生前，可是实实在在的“伊尹”“周公”形象啊！他清廉刚正、才能出众，可是朝野公认的—曹植就曾经这么称赞他：

魁杰雄特、秉心平直。威严足惮、风行草靡。在朝廷则匡赞时俗、百僚侍仪；一临事则戎昭果毅、折冲厌难。

他的政敌丁谧、毕轨等也不得不承认：

司马懿有大志而甚得民心。

如果司马懿所开创的晋朝没有在后来没落得那般惨淡，如果“八王之祸”“永嘉之乱”的悲剧没有发生，司马懿在中国历史上所享有的荣誉至少应该不会比隋文帝杨坚差。司马懿其实是替他那些无能的后代背负了太多的骂名。

平心而论，就单从司马懿本人一生的所言所行、所作所为来看，他几乎是没有多少遭人指摘之处的。在他漫长的一生之中：像曹爽一样浮华奢侈、败国乱政之举他没有；像曹丕一样劳师动众、急功近利之举他没有；像曹操一样弑后逼君、猎取九锡之举他也没有。我一直认为，虽然曹操自称“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其实，他这个“周文王”，当得还不及司马懿这般圆融、到位。

在我看来，司马懿算是古代从政之士的一个完美典范：儒家经典中“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成功模式，完全被他演绎得无人能及！《晋书》上称他“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你能说他修身做得不好？调教出了司马师、司马昭这样两个足以“子承父业、继往开来”的麟儿，你能说他齐家做得不好？兴军屯而积粮，拔俊杰而备用、建纲纪而立威，取邓艾于农琐，引州泰于行伍，委以文武，各善其事，你能说他治国做得不好？扫平内敌、壮大国力，给子孙们奠定“肃清万里，总齐八荒”的坚实基础，你能说他平天下的功夫不够？

具体而言，司马懿的身上有三重特色是十分鲜明的：儒枭、隐雄、全才。

司马懿是货真价实的儒枭。而且，他绝不是王莽那样“为儒而儒”的偏执狂。《晋书》上称他“伏膺儒教”“常慨然有忧天下心”，这总让我联想起另一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学政治家范仲淹。但范仲淹的功业哪里堪与司马懿相比？他力抗西夏元昊而无功，推行“庆历新政”而不终，徒有济世之心而乏理乱之才，不如司马懿远甚！司马懿开创的晋朝初年也曾出现过有“天下无穷人”的“太康之治”—虽然它来得短暂，但也是司马懿“爱民而安，好士而荣”的施政纲领在他后代手中的贯彻和落实。司马懿的一些只言片语更是透出了浓浓的一股儒家雍雅气息。

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宜弘以大纳，则自然安乐。

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亦这样评价：

司马懿执政，而用贤恤民，务从宽大，以结天下之心。于是而自缙绅以迄编氓，乃知有生人之乐。

这是对司马懿的儒道治国进行了肯定。

我们还可以看出，司马懿的许多举措都打上了深深的儒家烙印：他一生最为推崇的人，不是武功盖世的曹操，而是一代儒宗荀彧；他的亲家翁，是曹魏著名鸿儒、经学大师王肃；追随他一道剪除曹爽的政治盟友，如高柔、王观、孙礼等都是海瑞一样的忠臣雅士。即便是在殄灭曹爽一党之时，他也是以儒道为标尺来拿捏着分寸的：夏侯令女割鼻明志守节，鲁芝护主尽忠而甘愿受法，尽管他们是敌对一方，却都受到了司马懿的嘉奖与宽待—夏侯令女的事迹还被写进了《晋书·列女传》，而鲁芝后来则一直做到了晋朝的镇东将军、阴平侯。这比起袁绍器小量狭、恼羞成怒而滥杀臧洪、陈容等义士的荒悖之举来，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但同时，司马懿刚重凌厉的枭雄本色亦是不可轻掩：该狠则狠，该猛则猛—他对辽东公孙氏割据势力的连根拔除，对曹爽和王凌等政敌的赶尽杀绝，完全没有了脉脉温情，纯然一派肃杀森严之气。儒枭就是儒枭，再怎么儒化，他的人格底蕴还是枭雄之质。

司马懿是深不可测的隐雄。什么是“隐雄”？“隐雄”就是指将韬光养晦、沉潜笃实之功做到登峰造极的枭雄。他的雄心壮志，决不弱于曹操、刘备、孙权等乱世枭雄当中任何一人；他的真才实学，也决不次于郭嘉、诸葛亮、周瑜等俊杰奇士中任何一人。但为了在合适的时机“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他便自觉而主动地完全把它们隐藏起来，收入“鞘”中，伺机而动。

在隐忍潜伏的同时，他还善于未雨绸缪、见招拆招，运用“四两拨千斤”的巧妙手法及时消除各方面的威胁与危机：当曹操对他深怀猜忌之时，他察言观色、审时度势，连忙抓住机会表示“汉运垂终，殿下（指曹操）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孙）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一段劝进之言，便立刻说到了曹操的心坎里，一跃而任丞相府的心腹要职—主簿、军司马、长史！

当魏明帝曹叡临终前对他疑虑重重之时，他虽身在辽东却以“人臣无私施，推美归于上”的方法向曹叡表达了自己的绝对忠心，从而保住了自己的顾命辅政大臣之位。

司马懿真的是一位“踏平坎坷终成大道”的隐雄：为了彻底实现自己“肃清万里，总齐八荒”的大志，他数十年如一日地蛰伏隐忍着，暗暗磨砺着自己的锋芒、强化着自己的实力，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边疆之远，始终是那样稳居若泰山地顶住了来自对手、来自命运的一次次打击与挫折。“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的卑琐生涯，未能磨灭他有朝一日掀天揭地的勃勃雄心；陈矫、高堂隆等政敌的明攻暗算，于他而言亦不过是秋风过耳，不值一提；面对小辈曹爽的欺侮和排挤，他也是装出一副逆来顺受的模样……

这一切，都源于他心理素质的无比坚韧与无比强大！喜怒哀乐悲忧惊惧，所有的一切情绪，在他胸中被调控得深沉如海、波澜不生！

他无畏无恐，当刺客的利剑就抵在自己的喉结上，他却依然扮成风痹之状而“坚卧不动”—须知那一年，他才三十岁！

他无怒无嗔，当诸葛亮送来“巾帼之辱”而激得帐下诸将个个火冒三丈之时，他却依然笑称这是在夸赞自己用兵“静如处子”！

他无喜无纵，无论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和胜利，都不会让他稍稍麻醉，他总是继续埋下头来冷静沉着、苦心孤诣地把握着大局、规划着未来……

司马懿就是这样一位隐雄：韬晦隐忍之功堪称出神入化，七情六欲完全做到了收放自如，理智和意志是他最有力的武器。

最后，他是一位集张良帷幄之智、萧何匡济之贤、韩信用兵之能于一身的全才。

在经国远略方面，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之秋，他进献了趁刘备与孙权交争江陵之际乘隙吞蜀的妙计，可惜曹操没有采用，失去了统一天下的一个良机。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之冬，稳坐许都、联吴制蜀、翻云覆雨的方略是他给曹操建议的，结果“武圣”关羽被干掉

了，诸葛亮的“隆中对”被彻底破坏了。

在内政实绩方面，军屯兴国、通漕淮南、开垦陇西等宏图是在他手底完成的，这些后来成了魏国真正强大的关键。

在军事作战方面，西擒孟达、东拒诸葛、北平公孙、内夷曹爽、外袭王凌，神略独断，征伐四克，更是他的赫赫战功。他的军事才能之高超，令吴国国主孙权也不得不为之畏服：“司马懿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

的确，像他这样一个合枭将、贤相、策士三才为一体的全能型高手实在是古今罕见。而且，他最高明的一点是—身负大本大源、大器大材，随时准备着接受命运的考验与挑战！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之下，需要突出自己哪一方面的能力以脱颖而出，他一向对此算计和把握得十分精确！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汉末三国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大时代里悄然无声而又不可遏制地勃然崛起、后来居上！

儒枭、隐雄、全才，是司马懿整个人格形象的三面侧影。朱元璋是“枭而不儒”，刚猛有余而文治不足；王莽是“儒而不枭”，有心复古而无力治今；张良是“隐而不雄”，清虚自持而避权弃世；曹操是“雄而不隐”，锋芒毕露而处处树敌；诸葛亮是“全而不才”，面面俱到而样样不精；曾国藩是“才而不全”，为将则常败而为相则迂钝。他们每一个人比起司马懿来，似乎都缺了那么一点。所以，你不能不承认，司马懿堪称空前绝后的一个奇迹。所以，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从儒生变为开国之君的枭雄，他就是司马懿。

无论后人如何刻意抹黑，司马懿本身所散发出来的奇光异彩，永远也不是历史的尘垢所能掩蔽的。你越走近他，就越会深深地感到：假如有合适的机缘、合适的环境、合适的自我激励，原来一个人内在的潜力居然能够如同火山一般喷发到这么高、这么远、这么强！

司马懿的登顶之路

司马懿是三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如果没有他，三国纷争的历史大概不会那么快就结束，也许还会再演绎数十年；如果没有他，

大晋王朝顺应民心的统一大业，也不可能那么水到渠成、来得轻轻巧巧。是他，上承魏之强盛，下启晋之统一，成就了秦皇汉武那样的丰功伟业，将天下万民从乱世争战之中解救出来。所以，他堪称“命世之英，非常之雄”。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处。《晋书》上称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在笔者看来，最能凸现司马懿善于实现自己人生“逆袭”的，便在“聪明多大略”这五个字上。以史书资料为依据，让我们来看一看司马懿是如何施展他的聪明才智在自己的事业之路上登峰造极的。

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在封建社会，一个人事业上的建树，主要在政治、军事方面；而在政治、军事方面有所建树，则全凭个人与上级的关系如何。所以，根据司马懿辅佐的四个君主，可以大致将他的人生规划分为四个阶段：魏武帝时期、魏文帝时期、魏明帝时期、魏少帝曹芳时期。而我们就可以从这四个时期分阶段来观察司马懿的人生规划。

魏武帝时期

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魏武帝曹操的个性特色与为政风格。《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上称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同时又“持法峻刻，诸将有计谋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雄猜之主”。

另外，曹操在自己的用人导向上存在着严重的“既重才，又忌才；既用人，又疑人”的双重性。他很看重部下的才能和实力，但又不允许部下的才能与实力超出他和他的后人的可驾驭范围。《三国志》上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例：荆州少年周不疑，年十七，少有异才，聪明敏达，曹操欲以女妻之，周不疑不敢当。曹操爱子曹冲，亦有过人之智，可与周不疑相比。后曹冲夭折，曹操心忌周不疑，欲除之。曹丕以为不可，曹操曰：“此人非汝所能驾御也。”遂遣刺客杀之。这一事例，完全证明了曹操用人路线的“双重取向”。

司马懿对曹操这种用人导向是认识得很深刻的。当年他出山任职时

因不满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的逆臣行径，“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在曹操慕其名想把他收罗到帐下时，他假扮患“风痹”之症作为推辞的理由，并且还以“坚卧不动”的高超演技骗过了曹操派来刺探虚实的人。但骗得了一时，骗不过一世。曹操当了丞相之后，再次敦请司马懿出仕，而且明确地发出了“若复盘桓，便收之”的威胁。这时候的司马懿，自知不足以与权势显赫的曹操相抗衡，只得“惧而就职”。君已无礼于先，臣又怎能忠事于后？！显而易见，在这种极其被动的情况下，司马懿虽已加入曹操阵营之中，却很难马上发挥其过人的抱负与谋略。

即便进了丞相府，司马懿也是很不安全的。《晋书·宣帝纪》上记载：

魏武察帝（指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

可见，曹操对他的猜忌之深，达到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步。

司马懿这时的人生“逆袭”第一个重点便是“韬光养晦，瞻前顾后，明哲保身”。他决定用自己的务实和苦干换取曹操的信任，“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是啊，任何一位君主，看到有这样公而忘私、废寝忘食、尽心尽力的臣子为自己效忠，又怎会产生叵测之心以制之？曹操在最后终于接受了司马懿的效忠，并对他进行了提升，所以他能从当初刚入丞相府的“文学掾”（文牍之官）一直做到丞相府主簿。

但在明哲保身的同时，司马懿丝毫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历练。这是他这段时期人生历程的第二个重点。他在当时的丞相府中找到了两个榜样—荀彧和曹操。应该说，在丞相府的历练过程中，他时时处处都在学习这两个榜样的长处。但司马懿注意到了这一点：荀彧作为高明的谋略家，他的长处仅仅局限于运筹帷幄之中，发展的空间太狭窄，始终只能隐在幕后，而无法驰骋疆场，登上历史的大舞台。而曹操不同，他就是一个“能谋能战”的大枭雄，他的发展空间就比荀彧更广阔。从注意到这一点开始，素怀“治国平天下”大志的司马懿学会了有计划、有步骤的自我锻炼，使自己逐步完善成为集曹操、荀彧二者之长于一体的“文武双

全、出将入相”的真正强者。

最后，我们来谈司马懿在魏武帝时期人生规划中，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一笔了—扶助曹丕成为太子。《晋书》上讲他：

魏国既建，迁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

儒家学说里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司马懿为了摆脱处于中层官僚的命运，直接在曹丕身上痛下苦功，只要将在夺嫡之争中处于劣势的曹丕推上太子宝座，他就可以成为辅佐元勋而进入魏国最高统治阶层。于是，他想了种种策略，挫败了曹丕的政敌—曹植一党的攻击，终于使曹丕登上了太子之位。而这一步棋的成功，直接影响了司马懿的一生。从此，他逐渐迈进了魏国的最高统治阶层。

这一时期，从司马懿初入丞相府时算起，到魏武帝逝世时为止，他为了“一跃而起、一飞冲天”而整整耗去了十二年的时间。

在这十二年里，可以看出司马懿的人生规划完全遵循儒家立身处世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司马懿牢牢把握住了儒家之道的核心环节—“修身”。只有“修身”功夫做得实、做得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才不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修身”这一课题，在司马懿看来，又可具体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八个字，也就是“识时务”：根据时势的需要，密切联系实际情况，以治国平天下之大志为导向，扎实锻炼自身各方面的能力，随时准备接受命运的考验与挑战。他最高明的一点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下需要突出自己哪一方面的能力以脱颖而出，他一向对此算计得十分精确。领导需要他做好文牍事务，他就埋首案几，把文章典籍整理得井井有条；领导需要他当人事干部，他就悉心观察，为曹府精挑细选各类人才；领导需要他做军事参谋，他就绞尽脑汁，为领导出谋划策、设计多端。所以，司马懿能在魏武帝时期悄然无声而又不可遏制地崛起。

他的平步青云，也真正印证了《荀子》里那段名言：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魏文帝时期

到了魏文帝曹丕时期，司马懿才真正迎来了他顺风顺水的人生阶段。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春正月，司马懿当时刚满四十岁，汉丞相、魏王曹操于洛阳病逝。当时魏王府外有前来夺权的曹彰问罪之师，内有诸路兵马暴乱之迹，而曹丕则远在邺城留守，汉室遗臣们也有蠢蠢欲动之相。其情势可谓岌岌可危！《晋书》上讲得十分明白：

及魏武薨于洛阳，朝野危惧。

司马懿在这个紧要关头毅然挺身而出，“纲纪丧事，内外肃然”，用自己的卓异才识镇住了危机四伏的时局，稳定了人心，并说服汉献帝正式册立曹丕为丞相、魏王，并和夏侯尚一道安全护送曹操的灵柩返回邺城。

他这出显身手之举，更是进一步赢得了曹丕的信任和重用。当曹丕一立为魏王，立即封他为河津亭侯，并转任丞相长史，成为魏王府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这时，司马懿已消除了魏武帝时处处受到压制的威胁，可以大显身手。他先是策划了以魏代汉受禅的“大略”，后又为魏文帝南征而“留守许昌，内镇百姓，外供军资”，并被魏文帝称为“萧何”之材。魏文帝病重时，仍不忘封他和曹真、陈群为顾命辅政大臣，并诏太子曹叡：

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

显而易见，司马懿已跻身于曹魏政权最高决策者的行列。

现在我们可以来分析司马懿这段时期的人生“亮点”：首先，曹丕能当太子、能做魏帝，出力最多、功劳最大的，应属司马懿（史书上虽没有清楚地描绘司马懿的种种谋略，这更显出了他的“阴”和“深”）。而曹丕本人对司马懿亦是非常感激，所以司马懿用不着再畏惧君主的猜忌了。加之，曹丕给了他宽松的发展环境和广阔的历史舞台，这对他“成大器、胜大任”来说，是一种极佳的铺垫。

但曹丕一向喜欢耀武扬威、好大喜功，自己并无军事才能，又爱征战杀伐。于是，在武事方面，司马懿不敢暴露自己的真才实学，任由这个虚荣心极强的君主去大出风头。他埋下头来，扎扎实实担负起了尚书台右仆射的重任，在文政方面做到了有所建树。这时候的司马懿还不想锋芒毕露，显得有些低调，这是有原因的：虽说曹丕对他极为信任，但在军事大政方面，他还是偏向于倚重自己的曹氏宗亲，例如曹真、曹休、夏侯尚等。而司马懿也没有必要急于显出掌握兵权的意图—“先安内，后取外”，毕竟尚书台主官之职，对司马懿而言，亦可算是不错的平台。

司马懿立身行事的特长，我们这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目光远大，计谋深沉，遇事主动，办事缜密，滴水不漏，毫无瑕疵。所以他能在曹丕时期稳打稳扎地真正崛起，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曹丕死时，司马懿四十八岁。在曹丕为帝的七年里，司马懿迎来了崭露头角的辉煌时期，并在此期间成了朝中颍川系世族集团的首领。但这七年里，他的舞台还不够广阔，他只是默默地在后方夯实着魏室的基业。但司马懿已不甘于隐在幕后了，他准备着走上历史前台大展身手。而这一机遇很快就要到来。

魏明帝时期

公元227年，魏太和元年，曹丕的儿子曹叡登基为明帝。他给了司马懿表现军事才能的机会。当时，东吴孙权率领数万雄师围困了魏国的江夏城，并派大将诸葛瑾、张霸攻打襄阳城。司马懿立刻率军出击，大败吴军，诸葛瑾逃走，张霸被斩。司马懿这一赫赫战功，立刻得到了回报，他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

至此，司马懿有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和军队，可以开府治事，培植自己的力量。作为曹丕“东宫四友”之一的老臣吴质也在曹叡面前称赞他：“忠智至公，社稷之臣”，司马懿的威望，日渐隆盛。

魏室最得力的宗室大臣曹真死后，司马懿开始在魏国军政界独领风骚。魏明帝对他的放手任用，更加有利于他文韬武略的进一步发挥。在魏明帝时期，他从一个谋臣顺利转型为一个充满戏剧色彩的武将。他深

藏不露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在明帝当政的十三年里，南平叛臣孟达，西拒诸葛亮，北摧公孙渊，招招见血封喉、凌厉之极，连吴国国主孙权也不得不为之惧服：“司马懿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

司马懿这时人生规划的重点是：用显赫的军事业绩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利用“养寇以自重”的策略来慢慢蚕食魏室的军政基业。

应该说，这时候的司马懿目光并没有局限于维护魏室的一国之安，他早已开始着手实施“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平一天下”的大志与大略。他少年时代便“慨然有忧天下心”，到了接近老年时才终于获得了“为天下解忧，为万民解困”的机遇和条件。这个历程，他苦心经营了三十多年！

首先来看司马懿军事上精彩的第一笔—旬月之间擒灭叛臣孟达。他是精于使用急行军和潜行军的大师，当他陡然从天而降兵临上庸城下时，孟达还在做他的春秋大梦呢！于是，可怜的孟达便被他迅速而有力地一下扫平了，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这可以看出司马懿的用兵特色：静则隐于九地之下，令人无从发觉；动则发于九天之上，令人猝不及防。而从他与明帝论兵时自言：“凡攻敌，必先扼其喉而捣其心”，更见他善于集中优势兵力直攻敌之要害。所以，他往往是不发则已，一发必中，殄敌于鬼神莫测之际。

但为什么到了与诸葛亮对阵时，他又不采用这种敏捷、果决、刚猛的战术呢？这正是笔者要讲的—他人生规划的重点并不是一味炫耀军事才能，他要着手实施“扫平吴蜀，一统天下”的大略了！

下面我们来仔细分析诸葛亮和司马懿的祁山之战。这是一场持久战，司马懿从五十岁打到五十六岁，整整打了六年，打出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盛誉，也打出了司马懿“扫平三国、统一天下”的雄厚资本。

受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影响，人们总以为司马懿军事才能不如诸葛亮，处处被诸葛亮牵着鼻子走。然而根据史书记载来看，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要弄清他俩在祁山之战的真正目的。诸葛亮的战略目的

很简单：攻下中原，消灭曹魏，光复汉室。司马懿的战略目的就复杂多了：挫败蜀军进攻；积蓄力量，取曹魏而代之；养兵千日，伺机统一天下。

这多重性质的战略目的，让司马懿在表面上显得似乎有些被动。但根据自己的战略目的，他第一步做到了维持现状的平衡战略：一方面防止诸葛亮获得大的优势，对魏国和自己造成致命威胁；另一方面又不能击溃诸葛亮，还要保持诸葛亮的攻击力。

“空城计”这个故事自然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的虚构，但它也确实从侧面暗喻了司马懿的这个平衡战略—所以，他宁可被部下称为“畏蜀如虎”，也不愿冲进西城小县抓住诸葛亮。真要是抓住了诸葛亮，司马懿就只能重复历代功臣“兔死狗烹”的戏剧性命运了。

第二步，司马懿实施了“偷天换日”的篡位战略。在祁山之战期间，他慢慢树立了自己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并肃清了军中的异己分子，重用牛金、郭淮等忠于自己的将领，夯实了自己的军权基础。我们可以通过后来的历史来验证，当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叛魏之时，魏国大臣很少有站出来反抗的，甚至史书上都是寥寥几笔带过。曹氏政权如同纸屋一般一下就崩溃了，这个量的积累可不是司马师、司马昭当时所能造就的，应该是司马懿从掌握军政实权开始就着手为儿子们做好的铺垫。

第三步，司马懿已在祁山之战中开始积蓄“扫平吴蜀、统一天下”的资本了。他指挥大军与诸葛亮对峙，大战必避，小战必迎，以实战练军士，以实战养军威，成功地建立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为将来消灭吴蜀、统一天下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而魏国后期抗吴灭蜀的大将郭淮、胡遵、邓艾等人才，就是司马懿那时在祁山之战中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

第四步，司马懿已着手历练自己事业的继承者—他的儿子司马师与司马昭。他让两个儿子参与到祁山之战中，接受血与火、生与死的锻炼，为他俩将来顺利继承自己“一统天下”的事业做好了充足的素质准备。

这四步高招，是司马懿在祁山对峙中真正的事业，也是他这段时期

人生规划中的神来之笔。虽然他在和诸葛亮的对抗中，似乎没有取得表面上的胜利，但他的所有战略目的都达到了。这便是他的最大胜利—更何况他还拖死了积劳成疾的诸葛亮。

诸葛亮死后没多久，司马懿刚一返回朝廷，又被曹叡派往辽东攻打公孙渊。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远征战役，但用兵如神的司马懿只率四万人马，“往百日，返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彻底扫平了公孙渊，巩固了魏国的后方。

而这时曹叡已身患笃疾，一场朝廷权力交接战又拉开了帷幕。司马懿煞费苦心安插在明帝身侧的“内应”—魏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拼死力争，将远在万里之外得胜归来的司马懿再一次推上了顾命辅政之位。至此，身为“三朝元老”的司马懿重返魏国政坛，新的征程在他脚下延伸开来。虽然这时司马懿已年满六旬，但他雄心不减当年，积极准备着继往开来、再创辉煌。吴国、蜀国此刻才深深感到了司马懿的巨大威胁，然而一切都晚了，他们国中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与司马懿对敌了。

魏少帝曹芳时期

魏少帝曹芳时，司马懿已站到了权力的顶峰。这个时候能够阻止他大展雄才的人已经没有了。他挟“四朝元老”之威望，负“伊尹、周公”之才德，谁也不敢和他的远见卓识相抗。他在魏国军政大事上的每一次决策和行动，都是完美无缺的。

但另一个顾命辅政大臣曹爽却害怕司马家族终有一天会垄断朝政。于是他用了“欲抑先扬”之术，敬事司马懿如父，推举他为“太傅”，外示尊崇，而实则夺了他的政务大权。

司马懿处空名而无实权，一晃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里，他处处示弱，隐忍不发，静观其变。果然，曹爽志得意满之后走向了狂悖与淫慢。他作威作福，秽政横行，以致大臣离心、物议沸腾，魏国国势也渐趋衰弱。

这是司马懿无法忍受的。他可以忍受曹爽夺权，也可以忍受曹爽胡作非为，但他绝不能忍受曹爽毁掉他辛辛苦苦为魏国夯实的“一统天下”的大业根基。他为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的大志已不懈奋斗了四十多

年，怎么可能让无知小儿曹爽来阻断！

于是，“高平陵事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曹爽一派被司马懿用雷霆手段一举摧灭。

司马懿在最后处置曹爽时，用了“斩草除根”之法，将曹氏宗亲剪灭殆尽。这一举措甚至招致了他的好友蒋济的反对。但他必须这么做。只有不留后患，才能保证朝局的稳定啊！况且，司马懿已走上了一条与曹魏政权决裂的不归之路。

公元251年，曹魏嘉平三年，司马懿已经七十三岁了。他在除掉最后一个政敌王凌后，病死于洛阳，真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司马懿临终前，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叫到榻前说：

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尝怀恐惧。吾死之后，汝二人善理国政，慎之！慎之！

对于司马懿所言的“慎之”，也许有两层意思可以理解：其一是让二子善理国政，不可以心生异志；其二是让二子善保国政，不可轻易托付他人。但是无论司马懿本人有没有异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通过他的不懈经营和艰苦努力，已经为后人的事业创造了最佳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条件。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和司马昭分别被封为大将军和卫将军，总领尚书机密大事。从此对于曹魏而言，皇帝之势微而国家之势强，军政大权，尽归司马氏专断。

山海争水，水必归海，非海求之，其势顺也。（摘自《刘子》）

继司马懿之后，呈现在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面前的天下大势，可谓“居高视下，势如劈竹”。他们所要做的，只是顺流而下，去完成历史所赋予的某种必然。

公元262年，魏将邓艾偷渡阴平、奇袭成都得手。次年，蜀后主刘禅降魏，至此，蜀汉政权历二帝，前后四十二年，终于宣告结束。

公元266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魏主曹奂禅位，司马炎登基，改国号为晋；公元280年，司马炎进讨吴国，吴主孙皓降晋，吴国灭亡。

从而结束了魏蜀吴三国之间长达六十年的混战局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分归晋”。

最后，笔者认为，司马家的夺权登顶功绩介于霍光与曹操之间。司马懿因三朝托孤而取得霍光之位，同时他也有军功在身，自己也建立了权力网络。他比霍光更有自立之本。到了他儿子司马师兄弟手里，他俩大权在握，内有荡平淮南之勋，外有灭蜀取汉之功，堪以比肩曹操。所以，司马家能够彻底成功。

总结

司马懿是一个集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权谋家于一身的儒家奇才。当然，这是他成功之后，人们给他定的性质。

人们会说，儒家以“忠孝”为本。司马懿本就不是魏之纯臣，也不尽忠于曹氏，怎么还能说他是儒家奇才呢？其实，儒学的根基是一个“仁”字。司马懿除魏之苛政、抚民于安乐，这不是“仁”吗？司马懿消乱世之纷争，统一天下，拯万民于战火之中，这不是“仁”吗？—“仁”比“忠”更大呀！这才是真正的儒者应持的观点。

因为仁者无敌，所以司马懿无敌。

司马懿从一个有志有才的青年，到一个内政军事名满天下的奇才，再到一个治国平天下的英雄。这完全应归功于他的人生谋略做得完美无缺。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机遇期里，他总能把握住最佳时机出手，而且一抓就是硕果累累，这是难能可贵的。

更可贵的，是他能忍—明末著名哲学家王夫之曾言：“忍者，至刚之用，以自强而持天下者也。忍可以观物情之变，忍可以挫奸邪之机，忍可以持刑赏之公，忍可以畜德威之固。”而司马懿人生“逆袭”过程中最璀璨的亮点，就是他苦心孤诣的“忍功”：坚百忍以图功业之终成。一个“忍”字，贯穿了司马懿的整个人生奋斗历程；一个“忍”字，造就了司马懿。

司马懿早年的“多岗位”锻炼及成效

人的能力完全是从先天遗传而来的吗？不一定。人的能力完全是由后天学习而来的吗？也不一定。人的能力是在立足于自身禀赋之上再扎扎实实地锻炼出来的。

晋宣帝司马懿出将入相、文武双全，运计若张良，治国同萧何，用兵似韩信，御下如曹操，是一位超群出众的全才型枭雄。但观览史书，我们可以发现他终究不是“生而知之、不学而成”的神人。他的这些能力，完全是从苦心孤诣的锻炼学习中获得的。

少年时代的司马懿，确实有着过人的天赋。河北儒林清流之首崔琰评价他：“聪亮明允，刚断英特。”他的同郡名士杨俊，素有知人之明，赞誉他为“非常之器”。《资治通鉴》里称他：

少聪达，多大略。

可见，司马懿自幼便是早慧型奇才，在好学善思方面实为禀赋不俗。

俗谚说：“玉不琢，不成器。”在司马氏严谨务实的家风熏陶之下，司马懿各方面的潜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掘和发挥。即使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乱年代，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亦是充当了严父明师的角色，“教训诸弟，不为衰世解业”。《晋书·司马孚传》里也写道：

与兄弟处危亡之中，箪食瓢饮，而披阅不倦。

司马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自然是努力上进，造诣不凡。

很快，他的聪慧之誉远播四方。河内郡官署立刻送来辟书，将司马懿召为本郡的上计掾。这是司马懿从政入仕的第一个岗位。东汉时期，郡国上计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许多能臣干吏都是在这个职务上锻炼出来的。“上计”职事自战国时期已有渊源：各国地方长官，每年年初要把自己辖区的户口、垦田、赋税等各项预算数目写在木券上，上报国君，并把木券割分为二，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到了年终，官吏必须到国君那里去报核。国君根据右券亲自考核，或由丞相协助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对相关官员予以“升、降、赏、罚”。

到了汉代，“上计”职事更加具体化了，是由地方长官定期向上级呈送上计文书，禀报本地治理情况。县令或县长于年终之际召上计吏将本县户口、垦田、钱粮、收入、狱讼状况等项目编制为计簿（亦名“集簿”），呈送郡国。根据属县的计簿，郡国内设的上计掾再统计起来，编制出全郡的计簿，由郡守或国相审定后上报朝廷。朝廷据此而核定各地郡守、国相之政绩，予以“升、降、赏、罚”。

司马懿出任本郡上计掾，证明他确是精于计算的干练之才。同时，司马懿也在上计掾这个岗位上锻炼出了自己“数字化管理”的卓越能力。东晋史学家干宝称他“行数术以御物”，诚为不虚。数十年后，他以六旬之龄、太尉之尊远征辽东公孙氏时，魏明帝问他：

往还几时可定战局？

司马懿胸有成竹地回答：

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

果然，后面的战事进程一如他之所料，分毫未差。而如此精确的谋算背后，却是他在上计掾之职上年复一年的锻炼和巩固而成的。

而且，上计掾一职，令司马懿对军国经济之道深有心得。《晋书》里写道，后来他建议曹操“广开军屯，且耕且守”，令魏朝“务农积谷、国用丰赡”。晚年他坐镇关中时，“穿成国渠，筑临晋陂，溉田数千顷，国以充实”。其源流均来自于此。

在此，我们可以看出，作为高门儒士出身的司马懿，对这样的卑职琐务毫不嫌轻，这是难能可贵的。在东汉一朝，西凉名将皇甫规也曾任过本郡上计掾，堪与司马懿交辉于一时。

这时，远在许都的曹操听闻了司马懿于河内郡上计掾任上的优异表现，深感人才难得，便来书征辟他到自己的司空府效力。司马懿却称疾而拒之。

又过了几年，曹操升任丞相，再一次召他担任府中的文学掾职务。司马懿难以推辞，只得就职。他这个崭新的岗位—“文学掾”里的“文

学”，不单单是后世所理解的“文学艺术”，而是汉代察举科目“贤良文学”里的“文学”，实际上包括了以“经学”为本的内容。汉代官方将“经学”造诣视为选举人才之范本，而非后世的书画辞赋之技。司马懿身为丞相府文学掾，具体的职事应该是负责各州郡明经通学之士的选拔、考核及服务。

那么，以司马懿之学识，他配不配得上这个新岗位呢？《晋书》里写他：

博学洽闻，伏膺儒教。

《太平御览》也引用虞预所著的《晋书》评论他：

上（指司马懿）虽服膺文艺，以儒素立德，而雅有雄霸之量。

这说明他在经学上的造诣确实相当高。他后来在劝谏曹操远征西蜀时，讲了一句“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的箴言，它就是自《易经》中引用而来的。而司马懿晚年所作的《述怀诗》：

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

全诗铿锵激越，文采斐然，可谓“华而且实”。所以，深通国典、畅晓诗文的司马懿出任文学掾，自然是才符其职的。在这个岗位上，他和四方汇聚而来的文人雅士们广为交游，取长补短，打成一片。所以，曹丕、陈群等士人精英才会与他深交为友，并以文化为纽带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而且，东海郡儒林高第王朗、王肃父子才会对他高看一眼，和他司马氏结为“门当户对”的姻亲。

由于他在丞相府文学掾上做得有声有色，很快又被许都朝廷调升为汉献帝身边的黄门侍郎兼议郎。这个新岗位有助于他深度参与当朝军国大事的谋划、研讨与决策。在此过程中，他进一步提高了人生站位，拓宽了政治眼界。如果说先前的上计掾职务会让他变得精明干练，那么黄门侍郎兼议郎这个职务就能使他变得高明深邃。在这个岗位上，他平时接触到的都是朝中三公九卿之流的高官大臣，对他拓展自己的人际关系亦是大有裨益。

文学掾、议郎（黄门侍郎）这两个岗位都是“坐而论道”的务虚之职，可以让司马懿的宏观思维水平得到大大提高。但如果司马懿一直在这样类似的岗位上长久地待下去，他的发展空间便会严重受限，至多也不过是成为光禄勋、太中大夫等一类的清望之官。

不久，司马懿的职位生涯又发生了转折—他重返丞相府，担任了东曹属之职。东曹署是丞相府内主管人事选任的机构，其主官为东曹掾，其副官为东曹属。司马懿身为东曹属，职权“由虚入实”，辅佐东曹掾崔琰、毛玠等人“执掌铨衡、总齐清议”，令四方人才各得其所。而崔琰、毛玠都是知人甚明的奇士，做到了“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归高，天下称平”。司马懿在他俩身边潜心学习，也练出了一对知人善任的“火眼金睛”。他后来能识邓艾于寒微、举王昶于庸常、待州泰以虚席，便是得益于此。

相比之下，蜀相诸葛亮就没有经过“东曹属”这一职的历练，在选才用人上始终不甚高明：一则任马谡而溺其短，二则用杨仪而败于躁，三则驭魏延而不得法。他在这一方面，终究是远远不及司马懿的。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左右，司马懿从丞相府东曹属之职转任主簿，并随同曹操西讨张鲁。主簿相当于丞相府的秘书长，专管文书往来、印鉴出纳之事。丞相府本就是全天下机务信息交集之枢纽，而司马懿在主簿岗位上也得到了内外各类信息之辨识、权衡、归纳、推演等技巧磨炼。他做到了能够“见常人之所未见、谋常人之所未谋、断常人之所未断”。在平定汉中的战役过程中，他第一次在军事要务上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

当时，与他持有相同意见的，唯有淮南第一智士刘晔。可惜，曹操未能采纳，失去了一次统一天下的大好机会。但司马懿也凭着这一“非常之计”，深得曹操之青睐与倚重。他觉得司马懿足智多谋、才堪大用，再一次提拔他为丞相府的军司马。

丞相府军司马，是丞相曹操在军务上职级最高的辅弼之官，掌管军谋、军纪、军备等庶务。同时，它也是司马懿的职业生涯由文入武的关键一步。先前的司马懿只是一直在文官圈里兜兜转转，较少接触到戎事军务。倘若他始终不曾涉足军界，那么最多也就和陈群、王朗等人一样做到“文臣之极、司徒之尊”而已。但正是司马懿出任军职，使其“出将入相，允文允武”的政治定位得以有力凸显。司马懿超越了贾诩、陈群、荀彧而成为一代人杰的地方，正在于此。

司马懿在军司马岗位上妙招迭出，建树非凡。同时，他表现得兢兢业业，“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但更令曹操对他刮目相看的，是他的“每与大谋，辄有奇策”。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之冬，关羽北上讨曹，围曹仁于樊城，又水淹七军、活捉于禁，威震华夏。曹操欲迁都于河北而避其锋芒。司马懿进言建议曰：

（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

曹操采而纳之，依计而行。孙权果然配合曹方以“白衣渡江”之策狙袭公安，并擒杀关羽。司马懿这一“联孙制关”之计，终是大获成功。

至此，司马懿的“多岗位”锻炼终于结出累累硕果，一位“全才型”枭雄就此基本成熟。对比之下，三国时期的其他几位人杰在职业训练上都不如司马懿全面而扎实：诸葛亮早年只担任过刘备的“军师中郎将”和“军师将军”两个职务，陆逊早年也只担任过孙权的“讨虏将军府”东西曹令史、海昌县屯田都尉、孙权“帐下右部督”等三四个职务。很显然，诸葛亮的岗位锻炼多集中在军界，负责军事参谋和后勤供应，但在用人行政、治国安民方面有所欠缺。而陆逊的职位基本上是“文武兼备”，既当过讨虏将军府东西曹的官员，在识人选贤的本领上有所磨炼，又当过独当一面的军尉、独立指挥过小规模的军事战争。所以，他的岗位锻炼比诸葛亮更为完善，但是比司马懿还是稍有不及。

最后，我们可以这么说，司马懿在易汉入魏之后所担任的尚书仆

射、御史中丞、骠骑将军、太尉、太傅等一系列高官要职，并取得了震古烁今的文治武功，其实不过是他早年多个岗位的“升级版”履新罢了。

第十五章 开启西晋的司马家族

“奸雄”司马昭的另一面

“路人皆知”的一代“奸雄”司马昭，其实在历史中还有另外一副真实的面貌。他虽然城府极深、心狠手辣、计谋多端，同时却也不乏仁者情怀、高士气度和雄豪风骨。而且，他上承父兄之志，下辟晋国之业，内平诸葛诞，外破吴军，一步一步推动魏蜀吴三国从分裂割据而重归大一统，取得了傲视当世的靖乱之功，令人称绝。也正是看到司马昭曲折入微的成功之路，我们才能对魏晋嬗变、三国一统背后的历史密码有所感悟。

那个著名的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让司马昭在民间成了“野心家”“阴谋家”两个名词的代言人。然而，司马昭真的只是靠着野心和阴谋便能驾驭群雄、荡平巴蜀、威服江东吗？一个被羊祜、杜预、邓艾等忠臣义士拥戴终身的司马昭，只因篡夺了魏柄，真的就应该被历史固化成“野心家”“阴谋家”的脸谱？

更多好书分享关注公众号：sanqiujun

篡位的野心、谋逆的阴谋，其实并不能涵盖司马昭异彩纷呈的个性与作为的全部内容。时至今日，我们观史阅人，也不必再受“唯道德论”的束缚了。历史上真正有所建树的开国创业之君，谁人手中没有沾上鲜血和肮脏？隋文帝杨坚从他的亲外孙手里公然窃取了大周天下，这并不妨碍他以“开皇之治”而名垂千古；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弑兄夺位、逼父交权，这也毫不影响他开创的“贞观之治”誉满天下；就是魏武帝曹操，杀孔融、篡汉统、剪伏皇后、挟汉献帝、自立魏公，一桩桩做得甚至比司马昭更为出格，但史学界对他平定北方、统一中原的功绩至今仍是津津乐道。后世之人强加给司马昭的那副陈腐而又僵化的“野心家”“阴谋家”的脸谱，也确实到了该被摘弃的时候了。

于是，在《晋书》里，在《三国志》里，在《资治通鉴》里，我们看到了司马昭真实而丰富的另一面：是他主持废除了屯田客制度，把魏国数十万户被强制执行军事化管理的屯田客们解放成了自耕农身份的编户庶民，让他们摆脱了沉重的赋税和劳役；是他主持制定了《晋律》，

削除烦琐冗杂的律条，“去其苛秽，存其清约”，并注入了儒家人文关怀的理念，深深影响了三百多年后的隋唐时代；是他在打下寿春城后，一举赦放了十多万名叛兵，对敌国的降卒也是“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和曹操采取的“围而后降者不赦”之屠城暴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是他最先垂范提倡了“清、慎、勤”为官三达德，为后世考核官德树立了具体而切实的衡尺。著名史学家习凿齿对司马昭赞不绝口，称他是“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

《晋书·唐彬列传》描写了司马昭求贤爱才的一则小故事。

（唐）彬忠肃公亮，尽规匡救，不显谏以自彰，又奉使诣相府计事，于时僚佐皆当世英彦，见彬莫不钦悦，称之于文帝（指司马昭），荐为掾属。

帝（指司马昭）以问其参军孔颢，颢忌其能，良久不答。

陈骞在座，敛板而称曰：“彬之为人，胜骞甚远。”

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论于胜。”

因辟彬为铠曹属。

帝问曰：“卿何以致辟？”

（唐彬）对曰：“修业陋巷，观古人之遗迹，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

帝顾四座曰：“名不虚行。”

他日，（司马昭）谓孔颢曰：“近见唐彬，卿受蔽贤之责矣。”

从司马昭的音容笑貌之间，他“乐善好士”“忠肃宽明”（摘自《三国志·吴书·毌丘俭传》）的政治形象可谓跃然纸上、可亲可敬。而这样的司马昭，才是真实的、全面的、立体的。

但他“行满天下有怨恶”的遭遇，也引发了我们对这样一个深层次问题的关注：弑君犯上的司马昭，赫然将他的篡位之心闹得“路人皆知”了，为什么他却能够摆脱王莽、董卓等权臣“先谋逆而后失败”的宿命

怪圈而开基建业、平蜀立晋呢？历史以深刻的理念内涵、生动的真实故事、明晰的情节告诉了我们：

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曹）丕、（曹）叡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摘自《襄阳耆旧记·张悌传》）

所以说，司马昭父子兄弟能够篡位建国成功，实在是基于他们为“民心所归”。那么，魏国朝野的士民究竟是想拥护名义上居于正统而实际上骄奢淫逸、贪秽横行、腐朽没落的魏室皇族还是欢迎名义上处于僭越而实际上却励精图治、简政为民、宽惠清廉的司马昭兄弟呢？在历史上，他们已经用实际行动给出了无声的答案—“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而四方不动”。

当然，司马昭在历史上名誉不彰、功绩不显，多半也是由于《晋书》对他“语焉不详”而造成的。他被《晋书》如此淡化及虚置，亦是自有其背景原因的。

我们来看一下《晋书》中关于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等父子三人的有关记录。

关于司马懿的—

帝（指司马懿）即防（指司马防）之第二子也。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南阳太守同郡杨俊名知人，见帝，未弱冠，以为非常之器。尚书清河崔琰与帝兄朗善，亦谓朗曰“君弟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摘自《晋书·宣帝纪》）

关于司马师的—

景皇帝（指司马师）讳师，字子元，宣帝长子也。雅有风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誉，与夏侯玄、何晏齐名。晏常称曰“惟几也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摘自《晋书·景帝纪》）

关于司马昭的——

文皇帝（指司马昭）讳昭，字子上，景帝之母弟也。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封新城乡侯。（摘自《晋书·景帝纪》）

大家发现其中的蹊跷了吗？《晋书》在人物本传里对司马懿有“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非常之器”“聪亮明允，刚断英特”等定评记录，对司马师有“雅有风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誉”等定评记录，唯独对司马昭竟然不置一词、不评一语！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晋书》成书于唐初，是由唐太宗李世民亲自过问，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高官名士共同编撰而成的。《晋书》的谋篇布局、选材用笔、人物定性等，都深深体现了当时唐朝统治集团的文化意志。

其实，司马昭之所作所为，在唐初是有一个“典型”人物与之“交相辉映”的。这个“典型”人物不是别人，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他俩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二人俱为有功有为之宗室次子，都是非正常式继位为嗣的；二人政治生涯上均有重大“瑕疵”，司马昭于云龙门外“甘露之变”中负有弑君之骂名，李世民于玄武门内“两宫之争”中有杀兄逼父夺位之“逆举”；二人皆有不世之功以为根基，司马昭灭蜀取汉、开基立晋，李世民东征西战、荡定中原。不少人士一读到司马昭的故事，就会很容易联想到李世民之所为。李世民和他背后的“智囊团”肯定不想他被人们视为第二个“司马昭”，于是从史事源头上对司马昭轻描淡写、虚化处置，以求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政治联想。

这才是司马昭在史简中“面目模糊”“盖棺难论”的真正原因。可惜，他的熠熠光芒，终究不是某些人能够刻意掩蔽的，也终究会绽放在有识之士的洞烛之下。

“战神”司马昭是怎样炼成的

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是这样公开评价晋景帝司马师、晋文帝司马昭兄弟二人之军政成就的：

景（晋景帝司马师）、文（晋文帝司马昭）继之，灵武冠世，克伐

贰违，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极，功格皇天，勋侔古烈。

他在这段评价中，其实最着重夸奖的还是司马昭。毕竟在司马氏崛起的历程中，司马师御驾亲征而行的只有一次大战役，就是荡平毌丘俭、文钦之乱而已。在司马家两兄弟之中，司马师通常是坐镇京都，而唯有司马昭是在外东征西战、屡立战功的。“灵武冠世”四个字，是对司马昭实至名归的赞誉。

三国后期群英之中，司马昭堪称最为杰出的军事奇才之一，毕生鲜有败绩，可谓一代“战神”。那么，司马昭是怎样成为“战神”型奇才的呢？

第一，他有着深厚的家学本源。司马昭的父亲是司马懿。司马懿本身就是一位堪与诸葛亮、陆逊相匹敌的军事奇才。他在三十岁出仕之前，应该曾和胡奋一样以白衣领职，随同父亲司马懿南征北战，在第一线战场上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在此基础之上，他应该也得到了父亲在军事斗争上的言传身教，并颇有心得，具备了“大将之材”的全部素质。

第二，他在三十岁左右时出任洛阳典农中郎将，得到了将自己的理论知识“实战化”吸收的机会。典农中郎将是负责军屯事务的将官。而屯田的农丁又是前线战士的后备力量，他们的职责是“且耕且练”。既然身为典农中郎将，司马昭手下必然拥有一支军队，数量不一定很多，但也是足够司马昭拿来锻炼自己的军事才能了。所以，司马昭在这个职位上，肯定指挥训练过部下的屯田兵。这样一来，他的独立作战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锻炼。而且，司马昭非常善于收服人心，他废除了约束屯田农丁们的苛细制度，让他们按时耕作训练而不乱加赋役，于是“百姓大悦”。

第三，司马昭在数年后再升一级，出任“征蜀将军”之职。他能得到这个职位，其实是曹爽和其父司马懿进行政治交易而来的：曹爽让司马昭参与征蜀，实际上是意欲换取司马懿对他征蜀立功的大力支持，其中也有将司马昭扣为人质的意味。司马懿答应派司马昭参与征蜀，则是暗中叮嘱他在征蜀之役中伺机而动，发挥阻挠曹爽派系的绝密作用。

司马昭在征蜀将军的位置上，终于可以独立对敌作战了，也表现出

了镇定自如、举重若轻的大将之风。在此期间，蜀将王林率兵前来乘夜偷袭他所负责的营寨。他却临危不乱，坚卧不动，按兵不出，以自己高深莫测的“空城计”令王林进退维谷，只得撤走。此后，司马昭亲身实地观察了四周地形，向主将夏侯玄劝谏道：

费祎已据险拒守，进不获战，攻之不可，宜亟旋军，以为后图。

夏侯玄、曹爽认可了他的建议，急忙撤退，在半途上果然遭到费祎等蜀军狙袭伏击，苦苦死战才脱离困境。这是司马昭第一次亲自带兵独立参战，表现得可圈可点，在军界可谓崭露头角。

第四，嘉平年间，曹爽集团全军覆没，司马氏独揽朝纲。此时，司马昭再度升任安西将军，持节屯守关中，取得了一系列军功佳绩。《晋书·文帝纪》记载：

蜀将姜维之寇陇右也，征西将军郭淮自长安距之。进帝（指司马昭）位安西将军、持节，屯关中，为诸军节度。淮攻维别将句安于麹，久而不决。帝乃进据长城，南趣骆谷以疑之。维惧，退保南郑，（句）安军绝援，帅众来降。

这一场战役中，司马昭展示了自己精彩异常的作战手法：“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相比之下，与他同处雍凉战场的主将郭淮就显得在军事指挥上稍为僵化、有所不及。

第五，嘉平四年（公元252年）之冬，魏吴之间爆发“东兴之战”。司马昭以安东将军之职兼任监军，与征东将军胡遵、镇东将军诸葛诞一道进攻东兴。不料，魏军竟遭丁奉、吕据等吴将狙袭，乱阵而溃。这是司马昭平生唯一一次的参战失利。事后他被兄长司马师问罪削爵。

但这样的责罚，于司马昭是很不公平的。当时他职在监军，只管军纪军风，本官又为安东将军，居于胡遵的征东将军、诸葛诞的镇东将军之下，并未在现场指挥部卒作战。所以，他只是替胡遵、诸葛诞这两位司马氏部下的老臣宿将背了“黑锅”而已。这个败绩，算不到司马昭的头上。

不过，司马昭经历此事之后，对自己“驾驭不力”的缺点深以为非，

转变为“严格执法、令行禁止、铁腕无情”。后来，他在率众讨伐诸葛诞时，“将军李广临敌不进，泰山太守常时称疾不出，并斩之以徇”。常时本是他的乡里旧识，他仍对其执法不贷，可见他对军风军纪的极力维护。这也成了司马昭用兵行阵的一大特色。

第六，司马昭在东兴失利被削爵之后，再度转任关中，代行征西将军之职，与蜀军、叛羌多次作战，取得累累战功，终于受奖复爵。在关中任上，他渐渐摸清了以姜维为首的蜀军之战略战术，例如：

蜀将姜维又寇陇右，扬声欲攻狄道。以帝（指司马昭）行征西将军，次长安。雍州刺史陈泰欲先贼据狄道，帝曰：“姜维攻羌，收其质任，聚谷作邸阁讫，而复转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诸羌，为后年之资耳。若实向狄道，安肯宣露，令外人知？今扬声言出，此欲归也。”维果烧营而去。（摘自《晋书·文帝纪》）

同时，他还有针对性地做出了一系列强而有力的反制，其特点为“出奇制胜、乘虚而攻”。所以，他后来才会自信满满地对外宣称：“取蜀如指掌。”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之秋，司马昭已然继兄执政，大权在握，终于以统揽全局之魄力，将“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出奇制胜”的十二字方略贯彻到伐蜀之役当中。《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记载：

（司马昭）乃下诏使邓艾、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余人，（邓）艾趣甘松、沓中连缀（姜）维，（诸葛）绪趣武街、桥头，绝（姜）维归路。（钟）会统十余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入。

他的布局有轻有重、有虚有实、有呼有应，非常高明，周密无失，甚至连他的父亲司马懿也略逊一筹。毕竟，曹操、司马懿都没有像他这样远程遥控指挥作战过，更谈不上“决胜于千里之外”了！

最难能可贵的是，面对意外的战局变数，司马昭仍能指挥若定、绝地反击。在伐蜀之役中，诸葛绪的中路军未能截住姜维，使蜀军主力遁回剑阁关；钟会的东路军也随即受阻于蜀山天险之下。灭蜀之战顿时陷入停滞僵持的阶段。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司马昭及时调整战略，力排退兵之众议，拍板同意了邓艾提出的“阴平道奇袭”之策，终于取得灭蜀之

役的全面胜利，为司马家代魏而立夯实了无与伦比的功业根基。

乱世之中，唯有以武力才能扫除群雄、一统天下，还百姓一片安宁。司马昭尽其天赋之才，持节掌兵二十余年，屡战屡胜，所向无敌，终于成为三国后期一代“战神”。他的这一份军事才华，丝毫不亚于后世的唐太宗李世民。而大晋王朝，也在他的累累战功铺垫之上雄拔而起，“三国归一”的曙光至此触手可及。

司马兄弟凭何驾驭宿将旧臣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权臣去世之后，通常都由其子弟继位掌权，我们对这一群体称为“权二代”。然而，血缘和家世背景可以传承，能力和威望却无法继承。“权二代”们要想不负所传并后来居上，实属极难。例如西汉重臣霍光死后，其子霍禹、其女婿邓广汉、其侄孙霍山虽然手握大权，却仍被汉宣帝一击而溃，满门尽灭；再如汉顺帝时的辅政大臣梁商死后，其嗣子梁冀继任大将军，专横独断，一手遮天，甚至胆敢鸩杀汉质帝，后来也被汉桓帝联合宦官集团一举铲除，三族俱夷。所以，“权二代”当中能够真正掌权传世并且更上层楼者，堪称凤毛麟角。

而司马师、司马昭两兄弟便是将家族权位持续推升直至登峰造极、别开生面的“权二代”佼佼者。

曹魏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八月，司马懿在除掉生前最后一个政敌王凌之后，溘然去世。但他留给司马师、司马昭二人的，并不是一副轻松的担子。他俩继父掌权之际，外有蜀汉、东吴两大劲敌虎视眈眈，内有曹氏余党伺机而动，可谓危机四伏。在此，司马兄弟着力于整合朝野上下的拥马派势力一致对外，便是当务之急。

可是，面对父亲留下的宿将旧臣之班底，司马兄弟暗自忖度之下，也不免有些忐忑：那些宿将旧臣当中，既有资历深厚的元老派，例如郭淮、王昶、何曾；又有战功卓著的新秀派，例如邓艾、王基、石苞、州泰；还有坐拥豪门的故交派，例如钟毓、钟会、傅嘏、陈泰。他们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精英能臣，或才高气傲，或居功自负，确是不易顺服也不易驾驭。

然而，司马兄弟采取了明明暗暗一系列的举措，最终还是做到了“内服群臣、外慑吴蜀”，直至开基建业，亡魏成晋。

那么，他俩是如何达成这一目标的呢？笔者纵观史籍，认为他俩的成功之道有三，缺一不可。

第一是司马兄弟善用扎实的军功战绩来稳固自身的根基。他俩在父亲司马懿逝世时，俱为四十岁左右，正值壮年，加之二人先前有协助司马懿平定曹爽之功，所以朝中的拥马派势力便以他二人为“周武王”“周公旦”，推戴他俩辅政当国。

基于曹爽一党的“乱作为、乱改制”而触怒既得利益集团的前车之鉴，司马师刚执大权，便坚持对内垂拱而治，并不刻意去搅动朝局。《晋书·景帝纪》里写道：

或有请改易制度者，帝（指司马师）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诗人之美也。三祖典制，所宜遵奉；自非军事，不得妄有改革。”

但在对外征伐立功方面，司马师却显得十分热衷。他和司马昭都明白：身逢乱世，只有军功在手，才能真正揽权成功。所以，当吴国太傅诸葛恪前来东兴筑城建堤以示进犯之际，司马师急于立威，拒绝了傅嘏“且屯且侵以应东吴”之计，而是传诏命令诸葛诞、胡遵、王昶等将领三道并发，共击吴军。由于诸葛诞是司马氏的姻亲、胡遵是司马懿在关中时的旧部，故而他俩所领的东路军算是司马氏的嫡系部队。司马师为防万无一失，甚至派出司马昭担任监军前去督战。不料，诸葛诞、胡遵二人所领的东路军竟在东兴之战中轻敌失利，导致“三道伐吴”之策完全破产。

司马师不得已，又再令雍州刺史陈泰发兵去讨胡立功，结果反而惊反了雁门、新兴二郡的胡人。这一连串的军事受挫，使司马师的威望几乎降到了冰点。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蜀汉姜维率师数万而围魏之狄道，向魏国发起了挑战。司马师急忙起用司马昭到长安代行“征西将军”之职，和陈泰一道挡退了姜维。然后司马昭留在关中专心致志地扫除姜维临撤之前埋在曹魏西翼的“暗桩”—叛羌之敌。《晋书·文帝纪》里记载：

“会新平羌胡叛，帝（指司马昭）击破之，遂耀兵灵州，北虏震詟，叛者悉降。以功复封新城乡侯。”司马昭取得的这一战绩是令人瞩目的，以至于后来朝臣们向他劝进晋公时还盛赞道：“前者明公（指司马昭）西征灵州，北临沙漠，榆中以西，望风震服，羌戎东驰，回首内向。”

司马昭的赫赫战功辉映到庙堂之上，令司马师的政绩也为之增光添彩。他借此完全稳住了司马氏在朝廷上下的至高权位。同时，司马兄弟的分工协作制度就此建立。

内事不决有子元（指司马师），外事难办有子上（指司马昭）。

这也是后来魏少帝曹芳为何要借平乐观阅兵之际暗杀司马昭的缘故。只因司马昭是在外面拱卫司马师稳坐庙堂的“倚天长剑”，不除他则不足以制胜。

接下来，司马兄弟平毌丘俭、灭诸葛诞，一时战功彪炳、声威大振，完全在军界拥有了实打实的决策权和遥控权，可以“居重驭轻”“以内制外”。王昶、邓艾等宿将旧臣自然是乖乖臣服，不敢不逊。这一点，连魏文帝曹丕这个资历更老的“权二代”也是比不上他俩的。曹丕好大喜功而又稍输武略，拥兵数十万伐吴却劳而无功，半途中甚至还遭到敌人狙袭而丢了仪仗。依此而论，他又怎能驾驭得了那些宿将虎臣？又谈何跨山横江、一统八荒？

第二是司马兄弟善用高超的政治手段来笼络臣下之心。在礼贤下士方面，司马兄弟可谓屈尊降纡、推心置腹，堪与三顾茅庐、爱才如命的刘备并肩。例如，原征南将军王昶是司马懿的得意门生，对司马氏执政亦有暗助之功。司马师掌权之初身为“抚军大将军”，为安抚资历深厚的王昶，便借圣旨给了王昶一顶“征南大将军”的高帽子，让他的职级与自己持平，以此为“尊老敬贤”之意。王昶自是对他这一举动“感恩怀义、奉之终身”。他的儿子王浑、侄儿王沈后来都成了晋朝的开国功臣。

在纳谏采言方面，司马兄弟可谓屈己从理、来者不拒，堪与从善如流、海纳百川的唐太宗媲美。当毌丘俭之乱爆发时，司马师身负眼疾不便出行，但在王肃的劝说下，依然能够闻警即起、带病南征，丝毫无滞，明快如风。而老将王基在讨伐诸葛诞时，对司马昭的谏言近乎冒

犯，甚至在战场上违抗司马昭的谬误之令而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

司马昭对他亦是事之如师，毫无芥蒂，并公开剖白道：

凡处事者，多曲相从顺，鲜能确然共尽理实。诚感（王基之）忠爱，每见规示，辄敬依来指。

这是何等博大的政治胸怀！王基既受此宽容礼敬之殊遇，又如何不向司马兄弟报以忠勤兢业之实效？

诸葛诞反，（王）基以本官行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时大军在项，以贼兵精，诏基敛军坚垒。基累启求进讨。

会吴遣朱异来救诞，军于安城。基又被诏引诸军转据北山。基谓诸将曰：“今围垒转固，兵马向集，但当精修守备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险，使得放纵，虽有智者不能善后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与贼家对敌，当不动如山。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于势大损。诸军并据深沟高垒，众心皆定，不可倾动，此御兵之要也。”书奏，报听。

大将军司马文王（指司马昭）进屯丘头，分部围守，各有所统。基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文王敕军吏入镇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尽，昼夜攻垒，基辄拒击，破之。

寿春既拔，文王与基书曰：“初议者云云，求移者甚众，时未临履，亦谓宜然。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志，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擒贼，虽古人所述，不是过也。”（摘自《三国志·魏书·王基传》）

在聚合内外方面，司马兄弟可谓同甘共苦、重情重义，堪与侠气逼人的汉高祖刘邦相仿。当曹髦云龙门之变时，司马昭的心腹贾充迫不得已指使成济刺死了魏帝曹髦。彼时舆情汹汹、满朝哗然，连司马昭平素的至交好友陈泰都逼他交出贾充而杀之以塞天下之公议。但司马昭勇于担当，决不“甩锅”，决不退缩，硬是顶住偌大的压力保住了贾充，并借此向朝野上下展示了自己亡魏成晋的决心。从维护羽翼巩固内部而言，

司马昭此举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比起曹操父子将劝进魏公的孤忠之臣董昭迫于舆论压力而“雪藏”十余年来，司马昭维护并重用贾充的做法更容易换来部下的誓死尽忠。

第三是司马兄弟善用严明的法纪之术来整合上下、务实高效。当年司马懿远征辽东，围敌欲攻，时逢霖雨，久下不止，平地水深数尺。诸军行走极为不便，纷纷向司马懿建议移营居安，但司马懿见到围垒尚未竣工，若众将士就此舍劳取逸，则大功难成，于是执意不许，明令诸军敢言徙者必重惩。都督令史张静不顾法令仍来劝言，遂被司马懿当众斩杀，方才稳定了军心，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他的这种做法深深影响了司马师、司马昭两兄弟。

司马师执政之初，从事中郎李憙便评论他“以法见绳”，令人“畏法而至”，不敢不从。他征讨毌丘俭时，问计于名士刘陶，发现刘陶答复之际模棱两可，企图在曹、马之间当骑墙派，遂铁腕出击，把刘陶贬官而死。他如此举动，自是欲以严刑重典震慑朝中的中间派而为己所用。

司马昭继兄掌权之后，亦是执法如山、毫不宽待。他出兵扫平诸葛诞时，“将军李广临敌不进，泰山太守常时称疾不出，并斩之以徇”（摘自《晋书·文帝纪》）。在伐蜀的誓师大会上，将军邓敦发出“蜀未可讨”的杂音，司马昭仍是毫不手软地杀之以立威。在他看来，只有以铁的法纪锻炼出来的军队，才是最有战斗力的。他和父亲、兄长一样，坚持“严以正法”，这才使自己的部队可以“长驱越险、所向披靡”，令吴蜀之敌望而生畏。

综上所述，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就是凭着这三大手法轻松自如地驾驭住了一大批拥马派的宿将旧臣，从而成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继承者。而司马氏代魏立晋的雄图霸业，也最终在他俩的手上实现了节节攀升、铸造辉煌！

司马氏发动“高平陵事变”的底气

曹魏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少帝曹芳前往拜谒位于高平陵的魏明帝曹叡之墓，辅政大臣、大将军曹爽及其兄弟皆随驾同行。

不料，他们前脚刚出京门，司马懿父子后脚就发动了事变，以永宁宫郭太后的名义发出懿旨，封闭了各个城门，火速占据了武库，分发各类武器给自己的亲信部属。同时，令司徒高柔持节代理大将军之权，控制了原由曹爽所亲领的禁军营地；令太仆王观代理中领军之权，控制了原由曹爽之弟曹羲所领的中军营地。然后，司马懿派人追奏于曹芳，谴责曹爽“有无君之心”，罢去曹爽兄弟的官职、兵权，“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奏毕，他携太尉蒋济率兵亲临洛水浮桥，以应万一。

曹爽兄弟闻变，如遭雷击，在惊疑失措之中，相信了司马懿的免罪承诺，不顾桓范、鲁芝、杨综等亲信和僚属的劝阻，选择了束手降服，乖乖认输。不久，他们连同自己的党羽，全被司马氏劾以大逆不道之罪而诛杀，俱夷三族。

司马懿父子从此独揽朝纲、权倾天下，再也无人掣肘，迈上了亡魏成晋的霸业之路。

不少人士认为司马家一夕之间“剑走偏锋”夺权成功，似乎胜得太过轻易，而曹爽兄弟则完全是被司马氏“忽悠”住了，所以才会自取其败。宋代史学家叶适就发出了惊诧之问：

嘉平之役，极是异事。曹氏造基立业，虽无两汉本根之固，然自操至此已五六十年，民志久定；司马懿再世受遗，信非忠贞，何遂盗夺！而况虚位无权，势同单庶，一旦人主在外，闭门截桥，截取事柄，与反何殊？此至愚者所不敢为，懿号有智，而披猖妄作，自取族灭，然竟以胜，一异也。（摘自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七《魏志》）

但是我们纵观史籍，周览本末，认真剖析，就会发现：行事素以“稳、准、狠”见长的司马懿父子发动这场惊心动魄的事变，实际上是有着周密的筹备和坚实的底气的。所以，他们才一击必中、一招制敌，

迫使曹爽一派束手认输、无力反击。

第一，从正统法理的比较优势上讲，司马懿比曹爽稍胜一筹。粗粗一看，曹爽手中握有少帝曹芳这张“王牌”，可以“奉天子以讨不臣”，似乎占了上风。然而，司马懿本身是先帝钦定的顾命辅政大臣，有“清君侧、除奸佞”的天然职责和权力依据，再加上司马懿手头拿到了永宁宫郭太后全力支持他所作所为的凤诏，能够“挟太后而抗天子”。而且，郭太后确实是遭遇过曹爽仗势欺凌的。《晋书·五行志》记载：

魏齐王正始六年（公元245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是时，曹爽专政，迁太后于永宁宫，太后与帝相泣而别。连年地震，是其应也。

这些事实其时已为天下士民所共见，曹爽的“无君之心”昭然若揭，郭氏和曹爽矛盾已然公开化。所以，司马懿取得郭太后凤诏以“便宜行事”，根本不是胁迫而来，相反正是郭太后自愿授权而为之。那么，曹爽挟少帝以反抗，又有多少人不是认为他竟把少帝当作傀儡了呢？这样的“挟天子以讨司马氏”，曹爽集团从起先一出手就落了下乘，也不会具有多大的政治感召力。

第二，从中枢群臣的支持度上看，司马氏是远超曹爽一派的。由于曹爽先前重用何晏、邓飏、李胜等浮华空谈派，乱改旧典、滥兴秕政，且又骄奢淫逸、胡作非为，早已为朝廷的大多数公卿大夫所不满。例如，大将军府长史孙礼本是由魏明帝亲下遗诏留在曹爽身边辅佐他的，但曹爽嫌他“亮直不挠”，不便于自己独断专行，竟违背先帝遗诏将他外放了出去。又如少府卿王观掌管内府宝库，曹爽一派贪得无厌、多有干求，且又忌惮王观守法不从，于是把他调任太仆，借机中饱私囊。曹爽一派种种作为，堪称“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引起众怒，连孙礼都公开请求司马懿站出来“主持公道”、制衡于他。故而，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时，自太尉蒋济、司徒高柔等人以下大多数重臣宿士都站到了他这一边。而曹爽那边，却只有一个大司农桓范出于乡里旧谊而遁出城来帮他，其势何等之孤！

第三，以四方州镇之军方势力的实际情况而预估，曹爽一派亦是孤掌难鸣，不足以与“出将入相、故吏遍布”的司马懿相对抗。《资治通鉴》里写道，桓范“劝（曹）爽兄弟以天子诣许昌，发四方兵以自辅”。

似乎是一条妙计。然而，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形来分析，曹爽若是真以天子之诏征发四方州镇之兵相助，恐怕是“一厢情愿”、难有响应。其时四方州镇大将的名单是这样的：执掌西翼大军的是征西将军夏侯玄；执掌南部诸军的是征南将军王昶；执掌东翼大军的是征东将军王凌；执掌北部诸军的是征北将军程喜，其下属的并州刺史是孙礼、冀州刺史是裴徽、幽州刺史是毌丘俭。

在明面上，曹爽唯一可以倚用的助力，只有夏侯玄一人，因为他俩有表亲之好、手足之旧。但夏侯玄身边却有一位司马氏的旧部、前将军郭淮—他在雍凉二州威望极高、人脉极广，而且与司马懿关系匪浅。在正始年间曹爽一派擅自发起的征蜀之役中，郭淮多有异议并以实际行动表示了强烈的抵制，是曹爽一党的对立派无疑。《三国志·魏书·郭淮传》记载：

（正始）五年（公元244年），夏侯玄伐蜀，（郭）淮督诸军为前锋。淮度势不利，辄拔军出，故不大败。

其中“辄拔军出”四个字，将郭淮的“不合作”态度毕露无遗。夏侯玄有他掣肘，又怎能调动得了关中兵马东来支援？

征南将军王昶，则是司马懿实打实的“死党”。他目前的一切地位和建树，几乎都是司马懿一手栽培而出的。《三国志·魏书·王昶传》里记载：

青龙四年（公元236年），诏“欲得有才智文章，谋虑渊深，料远若近，视昧而察，筹不虚运，策弗徒发，端一小心，清修密静，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无限年齿，勿拘贵贱，卿校以上各举一人”。太尉司马宣王以（王）昶应选。正始中，转在徐州，封武观亭侯，迁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

倘若司马懿的“清君侧”之令一下，王昶必会如影随形、闻声而动，北上相助。他在襄阳发兵，比任何一方州镇都能更快地抵达洛阳或许昌。

征东将军王凌，出于太原王氏一脉，与司马朗、司马懿有故旧之交，而又门户背景相同，应该也是倾向于支持司马懿的。况且，他与曹

爽的关系十分僵化，曹爽曾经起用过乡里旧交文钦来制衡他。《三国志·魏书·文钦传》记载：

（文钦）后复以淮南东门将，转为庐江太守、鹰扬将军。王凌奏钦贪残，不宜抚边，求免官治罪，由是征钦还。曹爽以钦乡里，厚养待之，不治钦事。复遣还庐江，加冠军将军，贵宠逾前。

所以，王凌对曹爽肯定是心怀怨忌，在这一场“高平陵事变”中是不可能站到他同一阵线的，而文钦想帮曹爽抗御司马氏，却也始终飞不过王凌这一关啊！

至于程喜、孙礼、裴徽、毌丘俭四人，均是地处偏远，手头兵马较为稀少，在这场博弈之局中无足轻重、缓不应急。程喜的门户背景与政治立场在史书中显得模糊，在此可以不论。但孙礼、裴徽、毌丘俭三人，在高平陵事变当中的“站队”倒可以浅议一下。孙礼本身就和曹爽积怨已深，曾经向司马懿当面强烈请求他出来“主持公道”、制约曹爽。所以，他对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是绝对支持的。而裴徽与司马氏同属名门世族集团，各种利益关系和政治诉求基本趋同，且裴氏一族又与司马家关系甚佳。裴徽的侄儿裴秀后来成为司马氏最密切的心腹之一。毌丘俭则在征燕之役中当过司马懿的部属，对司马懿自是拱服。故而，他俩于“高平陵事变”中的立场至少是中立不倚的，但决不会主动支持曹爽。三位刺史的政治态度既是如此，身为征北将军的程喜自然也被掣肘和影响，导致他最有可能的选择是游移观望。曹爽从他这里，依然借不到半分力道。

这样分析下来，曹爽兄弟在四方州镇当中可谓是孤立无援，又怎敢采取桓范的建议去“自讨苦吃”“自费力气”？

第四，从双方所拥有的嫡系人才资源来比较，司马氏比曹爽一派更是胜出许多。司马氏这边人才济济，各有所长：抛开司马懿、司马孚和诸位并肩同行的元老重臣们之巨大影响力不论，司马懿的嗣子司马师身任中护军，“雅有风采，沈毅多大略”，一夕之间召集三千死士赴难而作，连何晏都称赞他“惟几也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其次子司马昭“忠肃宽明、乐善好士”，极有人脉，曾经担任过征蜀将军，有处变不惊之武略；其侄儿司马望曾任平阳郡太守，“宽厚有父风”，而行军打

仗则“威化明肃”……这些司马氏的壮年新秀，绝非曹爽兄弟这一批不亲庶务的“纨绔子弟”所能相比的。他们手头虽有一个“智囊”桓范，但又如何敌得过司马家这边“父明子贤、羽翼丰满、群英荟萃”？

第五，从实战斗争的手段上看，司马氏已然掌握先机，随时可以“收网”，令曹爽一派措手不及。曹爽兄弟此刻仅有屯田兵数千人作为侍卫，战斗力较弱。而司马懿已经控制住洛水浮桥，手中又有数万禁军步骑，行动如风，迅捷如电。曹爽一旦有所异动，司马父子必会雷霆出击、疾驰而至—届时，曹爽他们还未赶到许昌，已被司马氏父子包抄在手、无处遁逃！更何况司马氏又扣住了曹爽一派的三族亲戚作为人质施以要挟，所以曹爽他们很难突破这层层牵绊而决裂反击！他们只要露出丝毫犹豫，就是司马氏的绝佳战机。

从这五个方面而言，曹爽兄弟确实是被司马懿父子压制得死死的，所以他们冥思苦想了整整一个夜晚后才认输投降了。

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曹爽兄弟如果奋起一搏，胜负犹未可知。而曹爽只是贪恋“栈豆”才自寻死路的。实际上，政治斗争具有“你死我活”的残酷性，曹爽又不是初涉宦海的政治新人，怎么会不清楚这一点呢？他在几年前，以太傅之位架空司马懿、以征蜀之役谋取大名、逼迫郭太后迁入永宁宫、毁坏中垒中坚营以削弱司马师的势力，拳拳有力，招招见血，显出了他的决断和魄力。在高平陵事变中，他的智力和胆魄又未下降；依常理而论，他倘若觉得自己还能拼出一线胜机，就决不会束手降服的。

只不过，司马懿父子布局周密、处处扎实，真的是令曹爽兄弟感到无隙可乘，所以他们才会就地投降。当局之人以切身之利害而做此决断，总比我们这些局外之人应该更来得明晰切实一些。换了你我和曹爽易地而处，你认为你会有第二个选择吗？后来的王凌不也是落到了和曹爽一模一样的境地了吗？他又是如何选择的？这还需要明说吗？

司马氏的“姻亲网”及其政治作用

马克思曾经讲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般而言，大多数的政治权谋家就是依靠编织各种关系、发展各种关系、利用各种

关系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的。而姻亲关系，则是他们所有的可资利用之社会关系的“重中之重”。例如，历代皇室通常都要借助以后族、妃族为主的“国戚”来维护统治；而汉末以来的世家大族则必须凭借姻亲关系来增加自身的政治助力。

同样，河内司马氏在以马代曹、亡魏成晋的过程中，极力拓展姻亲范围，编织出一张巨大而坚韧的“关系网”，使自己的政治势力如虎添翼、四通八达，可谓立竿见影、效果显著。在此，笔者对这一问题力作研探，以供引玉赐教。

第一，我们来看司马懿本人的姻亲关系。司马懿的正妻张春华之门户背景不详。她的父亲是粟邑县令，至少应该在庶族之流。河内郡素有以汉桓帝时之司徒张歆为首的张氏一门，堪称郡望，其孙张范、张承俱为著名高士。张春华与他们同为一姓，似也不乏此种可能。这样一来，她的家族倒也和当时的司马氏“门当户对”。不过，张春华并非以知书达礼见长于世，而是以她的刚毅果决之风甚为司马懿所倚重。

宣帝（指司马懿）初辞魏武之命，托以风痹，尝暴书，遇暴雨，不觉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见之，后（指张春华）乃恐事泄致祸，遂手杀之以灭口，而亲自执爨。帝由是重之。（摘自《晋书·后妃列传》）

世人或许认为张春华行事未免太过冷酷，然而依当时的情势而断，她“舍一婢而护全族”亦有不得已之处，不可深责。且张春华严于内教，为司马懿培养出了司马师、司马昭两个“麟儿”，于司马氏一族实是贡献巨大。她的外侄山涛后来也成为司马氏集团的骨干成员。司马昭甚至将驻在邺城监视曹魏宗室的重任交付于他。

司马懿的妾室伏夫人，出身于汉末的顶级名门—山东伏姓一脉，应是汉献帝正宫皇后伏寿的同宗之亲。伏氏一族与曹操有血海深仇，所以司马懿在曹操生前是绝不敢纳伏夫人为妾的。应该是到了黄初年间，曹丕为安抚汉室遗忠而大力推行“汉魏相融”之政策，这时司马懿才纳了伏氏为妾。他纳取伏氏，更深层次的用意是和朝中潜伏下来的拥汉派势力搭上关系，以备未雨绸缪之用。伏氏一门之中，伏完是汉室帝婿，其妻为汉桓帝长女阳安长公主；其女伏寿是汉室皇后，在汉廷上下有着深厚的影响力。司马懿与伏氏联姻，定会获得曲阜孔氏、颍川荀氏等拥汉派

名门望族的暗中追随，成为司马家坚实的政治后盾。

第二，我们再看司马懿嗣子司马师的姻亲关系。司马师的第一任妻子夏侯徽，是魏文帝曹丕“东宫之友”、征南大将军夏侯尚之女，其母又为曹魏大司马曹真之妹。司马师娶到夏侯徽，自然有助于自己顺风顺水、飞黄腾达。而司马家凭着这一层姻亲关系，至少可以缓冲来自曹魏宗室当权派的疑忌与排挤。所以，司马懿才能在亲家翁夏侯尚死后迅速接掌他生前的征南大将军之全部军权，“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有与夏侯家的这层姻亲关系，司马懿才能顺利突破魏室“非曹氏、夏侯氏不得执掌方面军权”的规制束缚而拿到第一份兵权，否则他只能和陈群一样被困在文官之职上难以抽身。

而夏侯徽本人对司马家的直接和间接贡献都是十分巨大的。她“雅有识度，帝（指司马师）每有所为，必预筹划”（摘自《晋书·景帝纪》），堪称司马师的贤内助。然而，马、曹之争刚萌初兆，夏侯徽便被司马氏鸩杀。《晋书·后妃列传》里记载：

后（指夏侯徽）知帝（指司马师）非魏之纯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公元234年），（夏侯徽）遂以鸩崩。

有史学家认为青龙年间夏侯氏一族势力不小，司马家是不敢对夏侯徽下此毒手的，所以史书记载有误。笔者却认为，在曹魏青龙年间，夏侯家最大的靠山曹真早已死去，其族中嗣子夏侯玄又深为魏明帝曹叡所不喜[《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记载：“（夏侯玄）尝进见，与皇后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不悦形之于色。明帝恨之，左迁为羽林监。”]，夏侯家的势力日渐衰弱，司马家对他们谈不上有所忌惮。

而且，我们回到“青龙二年（公元234年）”这个时间点上，来看一看当时司马氏与魏廷内外的互动关系：在青龙二年（公元234年）八月，司马懿终于耗死了蜀相诸葛亮、挡退了蜀军，大功告成，可谓踌躇满志。司马氏的荣耀在这一年秋冬之际攀上了最高峰。

这时，司马懿的职位为魏室大将军，又拥有“假黄钺”之重权，若再加上此番退蜀之功，应当是丞相、郡公一流的重赏才行。然而，司马懿从内廷的“暗线”那里探得的消息竟然是：魏明帝曹叡准备将自己从大将

军职务上挪开，迁为虚位无权的太尉（太尉的官级低于大将军），一步一步使自己淡出军界，使司马氏的势力在关中渐渐削弱。（《资治通鉴》记载："青龙三年（公元235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

曹叡的这番举措，在司马家看来，实属忘恩负义。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肯定也会为之愤愤不平，并一时控制不住，可能在夏侯徽眼前泄漏了出来。夏侯徽没料到司马懿父子竟是这般表里不一的臣子，自然也就为魏室的安危存亡而忧虑不已。

司马懿父子察觉她的异样后，为了维护司马氏表面上为魏廷"尽忠不贰"的政治形象，只得暗暗将她灭口除掉。这，也许才是夏侯徽之死的真相。夏侯徽的死去，一方面令司马家从此缺少了一部分政治助力，再也不能缓冲与魏室宗亲当权派的关系，导致司马师后来在"浮华太和案"中被波及受贬；另一方面又使司马家就此斩断了牵绊，可以放开手脚筹划代魏大计了。

司马师的第二任妻子吴氏，是魏文帝曹丕"东宫四友"之振威将军吴质的女儿。吴质在朝中是司马懿的坚定同盟派，他曾向曹叡称赞司马懿"忠智至公"，乃"社稷之臣"也。但他又指责尚书令陈群"非国相之才，处重任而不亲事"，还公开羞辱过曹真和董昭，得罪了不少高官显贵。所以，吴质死后，竟被朝廷赐谥为"丑侯"。谥法有云："怙威肆行曰丑。"可见，那些反吴人士对他的贬损实在厉害。司马师自然不好再因娶嫁吴氏而冒犯那些反吴恨吴的豪门权贵，遂与她离婚。不过，二十年后，司马师独掌大权时，还是给自己这位曾经的岳父吴质平了反，改谥他为"威侯"，表达了自己与吴氏那场婚姻"始好不终"的歉意。吴质的儿子吴应也得到司马氏政权的另眼相待，在易魏入晋后官居尚书。

司马师的第三任妻子羊徽瑜，是典型的世家名媛。她背后的泰山郡羊氏一族乃是连出九世二千石之高官的豪门，其外祖父为汉末著名高士蔡邕，其后母为大名士孔融之女，具有深厚之极的文化背景。司马师利用羊氏一族的广泛影响力，可以在儒林清流中左右逢源、求名得名。而羊徽瑜的胞弟羊祜"博学善属文"，"忠亮纯茂""经纬文武"，誉流域外、德服江表，后为司马氏拟定灭吴大计，堪称旷世逸才。羊祜之堂弟羊琇、羊瑾，均为司马氏麾下之能臣，替司马氏立有汗马功劳。

第三，司马师的二弟司马昭之正妻王元姬，亦是出自儒家高第。她本人聪慧明敏，“苟有文义，目所一见，必贯于心”（摘自《晋书·后妃列传》），对司马氏集团多有襄助。

她的祖父王朗，位居司徒，“高才博雅”，素为儒林之冠。她的父亲王肃足智多谋，实系司马氏之“智囊”，在平定毌丘俭之乱、辅助司马昭上位等各种关键时刻多次佐弼司马氏转危为安。司马氏为了回报他，甚至将“中领军”这样重要的职位交付给他。而且，司马懿父子发动高平陵事变后，王肃职为太常，第一个站出来主持拥戴司马懿为丞相，礼仪一如霍光之故典。这对拥马派势力起到了重大的引领作用。

时钟会以才能见任，后（指王元姬）每言于帝曰：“会见利忘义，好为事端，宠过必乱，不可大任。”会后果反。（摘自《晋书·后妃列传》）

另外，在魏明帝年间，司马氏通过王朗的三公辟举之权，收揽到了一大批精英人才。《晋书·郑袤传》记载：

司空王朗辟（郑袤）为掾，（郑）袤举高阳许允、扶风鲁芝、东莱王基，朗皆命之，后咸至大位，有重名。

这里面的郑袤、鲁芝、王基，后来全成了司马氏集团的骨干之臣。

第四，司马懿第三子司马干的正妻是满氏，系曹魏名将满宠的女儿。司马懿的五子司马伷之正妻是诸葛氏，为曹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的女儿。原本司马氏的军权根基之地在于关中的雍、凉二州和南翼的荆、豫二州；而东翼的徐、扬二州一直是游离于司马氏的掌控之外的。司马氏和主军淮南的满宠、诸葛诞双双结亲联姻，其用意是不言自明的：司马家就是意图借助他俩在东翼的军界影响力为自己的代魏大业“保驾护航”。

第五，司马懿的长女南阳公主嫁给了荀彧的孙子荀霬、次女高陆公主嫁给了杜畿的孙子杜预。荀彧为汉末一代儒宗，又是颍川系世族集团的首领；杜畿为汉宣帝时与霍光同朝辅政的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后裔，家学渊源深厚，是清流事功派的杰出人物。司马懿与他们结为秦晋之好，

显然是希望汲取他们背后之势力集团的政治能量为自己所用。而杜预，确实在后来积极参与了晋朝的伐吴之役，并取得了辉煌战果。

综上所述，司马懿父子所构建的“姻亲网”，充分实现了曹魏内部各方势力集团的交融平衡，周密而又坚实；往远而观，有京兆杜氏、山东伏氏、颍川荀氏、泰山羊氏等久远世族；揽近而察，有昌邑满氏、琅琊诸葛氏、河内张氏等新兴名门；以文而论，有山东伏氏、东海王氏等儒林高第；以武而论，有沛郡夏侯氏、琅琊诸葛氏等将苑源流。司马氏对他们“博采广纳”“唯才所宜”，利用他们背后所代表的势力集团，共同拱起了司马家代魏而立的大业。

第十六章 魏晋嬗代背后的“制度之争”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亲笔撰文褒扬晋朝开国建基，是“诞膺天命，握图御宇，敷化弘道，民以佚而代劳，世以治而易乱。绝缣纶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约，俾浇风而反淳......通近代之不通，服前王之不服。祯祥显应，风教肃清，天地之功成矣，霸王之业大矣”。在他看来，晋承魏统、平一三国，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当时士庶百姓之幸事。

而现代不少读者认为晋朝建立后没多久便出现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所以对晋朝评价不高，甚至低于曹魏。但是，依据史料而断，在当时的百姓万民眼里，晋朝代魏而立、吞吴灭蜀、总齐八荒，绝对是众望所归、无人不服。

王凌之子王广是司马氏集团的政敌，当他父亲王凌起兵反抗司马氏之际，他却是这样评论司马氏集团的：

凡举大事，应本人情。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指何晏）虚华不治，丁、毕、桓、邓虽并宿望，皆专竞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之或哀，失民故也。今司马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摘自《资治通鉴》）

从他这段话语中可以看出，自曹魏正始末年司马懿父子发动“高平陵事变”获胜并大权在握之后，司马氏集团改曹魏之“失民”而为己之“恤民”、改曹魏之“乱政”而为己之“惠政”，历经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代而与魏室相竞，在用人、行政、律法、典制等各方面推陈出新、革弊兴利，成效显著，以优而胜。正基于此，司马氏方才换取到了士庶百姓的衷心拥戴，直至名正言顺、水到渠成地代魏立晋。

司马氏选贤用人更加精细化

王广评论司马氏“擢用贤能，广树胜己”，说明司马氏极端重视人才，也完全继承了曹操“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同时，司马

氏继往开来，将选贤用人之事务精益求精、更上层楼。

魏国建立之后，朝廷曾经修正了曹操时期“唯才是举，不论德行”的荐举制，改为“有本可寻、有据可核”的九品中正制，将官德放在了首位。

但是，如何细化落实官德的标准，自魏文帝、魏明帝而至曹芳时期，魏室的尚书台选曹及司徒府都始终未能制定出来。而这个重要的问题，直到司马昭兄弟执政时期方才得到了圆满解决。

《三国志·魏书·李通传》注引王隐的《晋书》写道：

昔侍座于先帝（指司马昭），时有三长吏俱见。临辞出，上（指司马昭）曰：“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

司马昭兄弟执政当国，坚持以“清、慎、勤”为取官之“三达德”，树为朝廷上下推贤进士的具体标准，并深刻影响了后世千百年。宋代学者吕本中就在《官箴》一书里写道：

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

清朝康熙皇帝亦多次亲笔御书“清、慎、勤”三字而遍赐京师各部堂及各行省督抚之官以励之。

而在实际庶务中，司马氏亦是落实了“清、慎、勤”三达德之标准，选拔了李熹、鲁芝、山涛、羊祜、刘毅、傅玄等一大批清官能吏，济济满朝、令士庶百姓尽得其惠。

律令施政“副众心之所求”

曹操立魏当途，一向遵循的是“乱世用重典”的法家手法。《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记载：

太祖（指曹操）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

读到这个故事时，当我们在为曹操的“执法严明、不阿权贵”而拍手称快之际，却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细节：其实，大权阉蹇硕的叔父仅仅是犯了宵禁，便被曹操毙于杖下，是否未免太过苛酷了？

《史记·李广列传》里写道：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依《汉律》，那时的李广犯了宵禁也只是被扣在亭舍滞留了一个晚上。然而到了曹操手底下，竟成了“杖刑而毙”？由此可见，曹氏重刑过滥、恃强越度，是他固有的行事之风。

而正是在曹操以身作则的带动和影响之下，曹丕、曹叡等人基本上都坚持了他的法家严酷之术，而未做到与时俱进、与民为安。曹丕以私怨而滥杀鲍勋、曹叡以校事而苛察百官，都是曹氏法家严酷路线的流弊。所以，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才在《读通鉴论》中评论道：

曹操以刻薄寡恩之姿，惩汉失而以申、韩之法钳网天下；崔琰、毛玠、钟繇、陈群争附之，以峻削严迫相尚。士困于廷，而衣冠不能自安；民困于野，而寝处不能自容。故终魏之世，兵旅亟兴，而无敢为萑苇之寇，乃蕴怒于心，思得一解网罗以优游卒岁也，其情亟矣。

司马氏集团当国掌权之后，却一反前轨，为收揽民心，令贾充、郑冲、荀顗等大臣在汉律的基础上修订法律，他们的具体做法有：“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避免滥刑于众；“省禁锢相告之条”，破除魏室先前密网般的“校事特务统治”；“轻过误，老、少、女人当罚金、杖罚者，皆令半之”。对犯有轻罪的老人、少年及女性等弱势群体，施行罚金或杖刑时，一律减半处置；“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正式以礼教训导取代了刑名之偏枯，以礼为法，以德治民。当然，司马氏这些举措也有时难免会流于形式、流于虚仪，但的确充满了儒家化的人情味儿。

（司马昭）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陈群、刘邵虽经改革，而科网本密，又叔孙、郭、马、杜诸儒章句，但取郑氏，又为偏党，未

可承用。于是令贾充定法律，令与太傅郑冲、司徒荀顗、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及吏部令史荣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辨《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宫》《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摘自《晋书·刑法志》）

据此，王夫之评论司马氏集团“用贤恤民，务从宽大，以结天下之心。于是而自缙绅以迄编氓，乃知有生人之乐”。公开肯定了他们的律法条令比曹魏集团更加宽和、更加进步、更加优越。

废除屯田制，解放屯田客

曹操在汉末击破“黄巾军”后，把流民安置起来，大力推行民屯制、军屯制，以此富国强民，颇有成效。他的这两大举措被曹丕、曹叡等一直贯彻了下来，成为魏国的国策。

关于曹魏民屯制的渊源由来，《晋书·食货志》里写得非常清楚。

汉自董卓之乱，百姓流离，谷石至五十余万，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黄巾，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议。魏武乃令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于是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

关于曹魏军屯制的渊源由来，《晋书·宣帝纪》中记载分明。

（司马懿）迁为军司马，言于魏武（指曹操）曰：“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纳之，于是务农积谷，国用丰赡。

实质上，民屯、军屯都是曹魏政权对所屯之民、所屯之军的一种超

负荷之剥削。他们在政治身份上比编户自耕农更为低贱，在赋税负担上比编户自耕农更为沉重；他们只是客居在官田上的佃户，所以又被称为“屯田客”。民屯的具体情况是：每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之官以监管之，其上则置典农都尉、典农校尉、典农中郎将等专职将官，实行军事化管理制度；其租田收成与官府按比例分成，借用官牛耕地者年终收成为“官取六分而民留四分”，使用私牛耕地者年终收成为官民对分。屯田客是强制性被束缚在所屯之田上的，不能随便迁移。军屯的具体情况则是：以州郡所属的士兵屯田耕作，每六十人为一营，战时则上阵，闲时则劳作，所获收成全部交给军库。

在曹魏的早期和中期，民屯制、军屯制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对国家政权的巩固也贡献颇大。魏国东征西战而无乏粮之忧，皆赖于此。到了曹魏后期，朝廷法纪荒弛、贪腐渐炽，民屯制和军屯制都已发生了“异化”：屯田客和屯田兵身上的负担愈来愈重，屯田客收成分配比例竟达“官八民二”，而屯田兵所上缴的收成则大多被将官们中饱私囊。不少地方的屯田客、屯田兵甚至忍无可忍，揭竿而起以为反抗。

同时，随着司马氏集团对外扩张的进度越来越顺利，以司马昭为首的明智之士觉得无须再依靠过度压榨屯田客们及屯田兵们来达到富国强军的目的。他们对民屯制、军屯制均做出了适当的修正。例如司马氏的亲信裴潜在典农中郎将任上“奏通贡举，比之郡国，由是农官进仕路泰”。司马师、司马昭也尽量采取措施减轻屯田客、屯田兵的负担以示宽宏之政。

对司马氏的这些作为，东吴名相张悌曾经作了精辟的评价：

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曹）丕、（曹）叡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摘自《襄阳耆旧记·张悌传》）

到了吞并了蜀汉后的曹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之冬，司马氏集团终于祭出“大招”：由司马昭亲自主持，“罢屯田客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摘自《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数十万家

屯田客从此解放为编户自耕农，分官田而为私田，削重赋而为常税，耕种积极性重新高涨起来，这才形成了晋朝初期“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的盛世局面。

至于军屯制，待到晋武帝司马炎一统六合之后，也被彻底废除。《晋书·山涛传》写道：“吴平之后，帝（指司马炎）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那些屯田兵自然也全部转为编户自耕农，得到了较好的安置。

五等封爵，收服士心

汉末三国初期，中原名门世族集团日趋壮大。他们在增进自身政治权力方面的呼声也愈加高涨。这一点，连以曹操为首的谯沛军事集团也不敢忽视。曹操亦曾公开表态：“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

不过，中原名门世族集团已经把持了汉廷和曹魏集团上下各级绝大多数的职位，但他们依然还不够满足。因为，再高级的官位，亦是具有流动性的，而且是不可世袭的。唯有爵位，可以传嗣子孙、代代获益。

名门世族集团自以为对曹操南征北战、披荆斩棘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应当享有特殊的待遇。汉朝政论家贾谊在他的《治安策》一文里深刻揭示了名门世族集团的这种政治呼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见君之几杖则起，遭君之乘车则下，入正门则趋；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弃市之法，然则堂不亡陛乎？”

就在这种政治执念的驱动之下，董昭代表拥曹派世族集团向曹操提出了恢复儒家旧典所载的五等封爵制，并推戴曹操为最高层级的“郡公之爵”，把曹操的“周公”名分彻底坐实。其余各位卿士大夫则分享侯、伯、子、男等爵位。

五等封爵制的出处，确实都在儒家的经典里明明白白地写着。《礼记·王制》记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五等。”《孟子·万章下》写道：“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从中可以看出，唯王者、天子方可以制禄爵而分五等。而董昭等提出恢复五等封爵制的“明话”就是期望曹操从爵位上给予“从龙之臣”们坚实的保证，而背后的“潜台词”则是指受爵之臣们必将一致拥戴曹操为“王者”“天子”。说白了，这是董昭代表拥曹派世族集团与曹操所做的一场极为重大的政治交易。

在汉朝近四百年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异姓之臣被封为公爵。即使是汉高祖时期的开国元勋们，萧何仅为酂侯、张良也仅为留侯。当然，汉朝也有唯一一个被封了公爵的异姓之臣，他就是后来篡汉自立的西汉外戚首领—王莽。他的爵位便是“安汉公”。曹操一旦决定接受公爵之封，他代汉御宇的野心就从此大白于天下了。

曹操也很明智，当时便很委婉地答复了董昭：“建设五等者，圣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在他心目中，他还是以为自己暂时没有这个资格去建设五等封爵制。

董昭和他身后的拥曹派世族集团并不甘心，再一次向曹操发起劝进。他在明面上是这样劝说曹操的：“明公虽迈威德，明法术，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与人，宜稍建立，以自藩卫。”他在暗底下又这样逼迫以荀彧为首的拥汉派大臣：“今曹公遭海内倾覆，躬擐甲胄，周旋征伐，芟夷群凶，使汉室复存。比之前者数公，若泰山之与丘垤，岂同日而论乎？今徒与列将功臣，并侯一县，此岂天下所望哉！”

曹操终于答应了董昭及背后拥曹派世族集团的劝进，晋升为魏公，拥十之地为藩域，开启了以曹代汉的第一步。

但曹操及其子孙后来对董昭及拥曹派世族集团还是大大的食言了。曹操只恢复了一个公爵的爵位，却没有相呼应地建立起侯、伯、子、男等其他四等体制。在他的魏国及后来的魏朝，官爵体系仍然是“县侯、乡侯、亭侯、关内侯、关中侯、关外侯”等六个层级。而他手下的卿士大夫最多也只是获得了乡侯之封。司马懿西拒诸葛、南定孟达、北平公孙，才得到了一个舞阳县侯的爵位。拥曹派世族集团期望通过“五等封爵制”来实现“利益均沾”的企图彻底落空了。他们敢怒不敢言，只把董昭骂得灰溜溜的。这也是后来拥曹派世族集团最终与曹魏政权离心离德，并倒向司马氏阵营的关键原因之一。

到了魏朝少帝曹髦在位时的甘露元年（公元256年）之夏，司马氏集团坐大成势、权倾天下。中原名门世族集团意识到一次新的改朝换代之重大机遇已然到来。他们再次向司马昭提出真正恢复五等封爵制，并推举司马昭为高都公，地方七百里，且加礼九锡。

司马昭自觉威信不足，坚决拒绝，固辞不受。

在两年后他荡定淮南诸葛诞之乱时，中原名门世族集团又一次劝进司马昭升为晋公，拥八郡之地以为藩域。司马昭再次拒绝。

直到司马氏集团吞并蜀汉、大功告成之际，司马昭才终于接受中原名门世族集团对自己关于晋公的劝进，并在三个月后迅速升为晋王。

中原名门世族集团的政治呼声也终于获得了司马昭的回应—

（咸熙元年）秋七月，帝（指司马昭）奏司空荀顗定礼仪，中护军贾充正法律，尚书仆射裴秀议官制，太保郑冲总而裁焉。始建五等爵。（摘自《晋书·文帝纪》）

司马昭这样做，是出于“绍汉自立、比隆周室”的政治追求，将自身政权与中原名门世族集团结成稳固持久的“命运共同体”。因为，除了司马氏之外，谁也不会拿出如此优厚的条件与名门世族们分享了。

当然，司马氏集团对此番所建的五等封爵制实施了改进，使其无法威胁到皇权的长治久安：各大世家在获得五等之爵时，只能拥有相对应的名号和食邑，而毫无临民治土之实权。

无论如何，在笼络人心方面，司马氏还是比曹魏诸帝更为大气，更为开明的。中原名门世族集团终于实现了“利益均沾”，并将自身的政治利益和司马氏政权从此牢牢维系在了一起，可谓“一荣俱荣、一枯俱枯”。实际上，以西晋、东晋两朝一百五十余年气运而论，司马氏政权都极少遭到来自名门世族集团的强势篡夺。真正取代司马晋的，是以寒士起家的刘裕集团。

结语

综上所述，司马氏集团在代魏绍汉、自立新朝的过程中，通过与曹魏展开“制度之争”，“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对世族、庶民、军户等三大阶层全部施以“利益均沾”，同时获得了他们的一致拥戴，所以能够顺顺利利地改朝换代、一统四海。

但司马氏集团在出台一系列“让利于下”的宽惠政策之时，并未将根深蒂固的“旧弊”彻底清除：对吏治的宽纵不肃、对奢靡之风的放而不收、对清谈之习的驰而不导，使得新朝建立之后却未实现“隆惟新之化”，隐患四伏，毫不知警。

而晋朝关于“九品中正制”之流弊、关于门阀之危机等另外一些深层次问题，则要等到三百多年后隋唐时代才能真正解决。这一切，终究是晋朝无法跨越的历史局限性，可悲可叹之余却也无须深责。

第十七章 寿春之役：三国归一的前奏曲

在前三国历史中，汉末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堪称三国鼎立的前奏曲：刘备集团和江东孙氏集团联手挡退了曹操集团，“铁三角”互制互成的势力格局逐渐形成，最终定型为了曹魏、蜀汉、东吴三方鼎峙的局面。

而能与“赤壁之战”如此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相比的，便是曹魏少帝曹髦时期甘露二年（公元257年）爆发的“寿春之役”。其时，魏将诸葛诞作乱寿春，叛国自立，外联孙吴，企图割据一方。而蜀汉姜维又在关中遥相呼应，以求乘隙获利。但他们全被司马氏集团一举荡定：诸葛诞兵败遭杀，孙吴“全家军”“朱家军”均受重挫，姜维也劳而无功、郁郁而返。这一切，都显示出了司马氏集团凌驾于蜀汉、孙吴之上的绝对实力优势，为即将到来的三国归一之大势敲响了有力的晨钟。

“寿春之役”的起因

很多读者会认为寿春之役的始作俑者诸葛诞是拥曹反马之士。其依据乃是《魏末传》里的一条史料：

贾充与（诸葛）诞相见，谈说时事，因谓诞曰：“洛中诸贤，皆原禅代，君所知也。君以为云何？”诞厉色曰：“卿非贾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负国，欲以魏室输人乎？非吾所忍闻。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充默然。

但裴松之曾言：“《魏末传》所言，率皆鄙陋。”不足为信。

而实际上，诸葛诞为司马昭之弟司马伷的岳父，属于司马氏姻亲派集团之大佬，先前曾经协助司马师平定过毌丘俭、文钦之乱，和司马氏一族关系甚为密切。况且，在司马师当年废帝立新、权压魏室之际，也丝毫未见诸葛诞有任何拥曹反马之言行。所以，他起兵反对司马昭，只能是另有企图，而绝非拥曹代魏。

《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里记载：

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冬，吴贼欲向徐堨，计（诸葛）诞所督兵马足以待之，而（诸葛诞）复请十万众守寿春，又求临淮筑城以备寇，内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诞有自疑心，以诞旧臣，欲入度之。

这里点明了诸葛诞的企图："内欲保有淮南。"他为什么要蓄意"保有淮南"呢？笔者认为，他对司马昭素来怀有两大"心结"，所以不得不力求割据自保。

"心结"之一：他当年在与东吴诸葛恪交锋的东兴之战中因瞎乱指挥而致损兵折将，最后由当时的监军司马昭代替自己背了"黑锅"，而今司马昭成了司马氏集团的掌门人，诸葛诞担心自己会遭到司马昭的报复清算。

"心结"之二：他在扬州任上"赏赐过度，有犯法者，亏制以活之""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摘自《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

这种培植私人势力的极端化做法，已经触犯了司马氏集团的政治底线。无论此时的司马昭，还是先前的司马师，都不可能容忍他如此"结党营私"。同样，诸葛诞心里也十分明白：自己千万不能离开寿春，自己一旦被调离寿春，且不说自己今后再也不能安享"土皇帝"的富奢日子，而且必将面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严峻局面。所以，他也暗暗下定决心：一旦司马昭有所异动，自己便拉下脸皮兴兵自立！

《世语》记载，贾充代司马昭去寿春城巡察过诸葛诞之后，回禀司马昭时根本没有谈及诸葛诞忠魏与否，而是重点指明了诸葛氏具有割据淮南的实力，不可小觑。

（诸葛）诞再在扬州，有威名，民望所归。今征，必不来，祸小事浅；不征，事迟祸大。

司马昭这才决定抛出司空之位，以明升暗降之法把诸葛诞"调虎离山"。他这也是对司马氏集团内部异己势力的一次自我"清洗"，而绝非剪除拥曹代魏之徒。

这还可以从司马昭后来在讨伐诸葛诞时所调遣的诸将情况中看出：

他所任用的全部是王基、石苞、州泰、胡烈等异姓将领，司马氏其他宗亲派将领几乎一个也没起用。《晋书·文帝纪》记载，他只调了自己的弟弟司马亮一人而已。而司马亮随行出征，也只是因为他官居“东中郎将”，于东线战场乃职责之所在，不得不相从。

在另一边，诸葛诞接到司马昭以诏书形式征调自己为司空的命令后，知道双方彻底“摊牌”的关头已经到来，他的一系列反应是：

（诸葛）诞被诏书，愈恐，遂反。召会诸将，自出攻扬州刺史乐，杀之。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遣长史吴纲将小子（诸葛）靓至吴请救。（摘自《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

（诸葛）诞被诏书，愈恐，遂反。召会诸将，自出攻扬州刺史乐

从这些举动可以分析出，诸葛诞其实为预防这一天的到来早已绸缪备至，完全不似王凌、毌丘俭等人那般仓促行事。他“内储军粮、外联吴军”，以寿春城为据点，以逸待劳，以守伺机，几乎可谓万无一失，就准备着让司马昭铩羽而归。

司马昭的全盘谋划

面对诸葛诞在淮南专擅坐大的情况，司马昭毫无姑息之念。他并非不知道强征诸葛诞入京的后果，但他依然非常强硬地发出了征调诏书。这是因为：他早已成竹在胸，要借用诸葛诞的人头来做自己立威天下的“祭品”。从这一点而言，诸葛诞其实是被司马昭强行“逼反”的。

当诸葛诞叛乱的消息传来，《晋书·文帝纪》记载：

议者请速伐之，帝（指司马昭）曰：“诞以毌丘俭轻疾倾覆，今必外连吴寇，此为变大而迟。吾当与四方同力，以全胜制之。”

乃表曰：“昔黥布叛逆，汉祖亲征。隗嚣违戾，光武西伐。烈祖明皇帝乘舆仍出，皆所以奋扬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暂临戎，使将士得凭天威。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

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东征，征兵青、徐、荆、豫，分取关中游

军，皆会淮北。师次于项，假廷尉何桢节，使淮南，宣慰将士，申明逆顺，示以诛赏。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司马昭对荡平诸葛诞之役已经有了两个心理准备：一是打大仗、打硬仗；二是打持久战、打攻坚战。既然不能在旦夕之间了结此役，他反而显得不慌不忙、从容不迫。毕竟，司马氏集团的综合实力对诸葛诞一方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有了这样的底气，司马昭准备放开手脚，谋划着将这一场平叛之战打出响当当的口碑来，并作为展现司马氏集团超强实力以威慑四海的标志性战绩。

从这个目标出发，司马昭和他的“谋士团”认真选定了自己的战略性构思蓝本。而这个蓝本，就是那位“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而曾与司马师齐名的玄学放达派名士首领夏侯玄所写的《乐毅论》。虽然夏侯玄先前已经作为司马家的隐性政敌早被除掉了，但他这篇代表着后三国时代军事战略思想最高水准的绝妙文章《乐毅论》仍然在魏国上下发挥着深远影响。司马昭和他的谋主钟会，曾经都是夏侯玄的“粉丝”。他俩基本上都是以这篇文章的精神主旨来指挥寿春平叛之役的。

司马昭和钟会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夏侯玄的《乐毅论》确实写得理明而词畅、高瞻而远瞩，实为用兵伐敌之至高龟鉴。

世人多以乐毅不时拔莒即墨（为劣是以叙而）论之。夫求古贤之意，宜以大者远者先之，必迂回而难通，然后已焉可也。今乐氏之趣，或者其未尽乎？而多劣之。是使前贤失指于将来，不亦惜哉？观乐生遗燕惠王书，其殆庶乎机，合乎道以终始者与？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业于至公，而以天下为心者也。夫欲极道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必致其主于盛隆，合其趣于先王，苟君臣同符，斯大业定矣。

于斯时也，乐生之志，千载一遇也，亦将行千载一隆之道，岂其局迹当时，止于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乐生之所屑；强燕而废道，又非乐生之所求也。不屑苟得则心无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则举齐之事，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夫讨齐以明燕主之义，此兵不兴于为利矣。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迩矣；举国不谋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于天下矣；迈至德以率列国，则几于汤武之事

矣。

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弊，使即墨莒人，顾仇其上，愿释干戈，赖我犹亲，善守之智，无所之施。然则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义也，任穷则从，微子适周之道也，开弥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使夫忠者遂节，通者义著，昭之东海，属之华裔。我泽如春，下应如草。道光宇宙，贤者托心。邻国倾慕，四海延颈，思戴燕主，仰望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虽淹留于两邑，乃致速于天下。不幸之变，世所不图，败于垂成，时运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则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齐之士流血于二城之间，侈杀伤之残，示四国之人，是纵暴易乱，贪以成私。邻国望之，其犹犲虎。既大堕称兵之义，而丧济弱之仁，亏齐士之节，废廉善之风，掩宏通之度，弃王德之隆，虽二城几于可拔，霸王之事，逝其远矣。然则燕虽兼齐，其与世主何以诛哉？其与邻敌何以相倾？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城拔而业乖，岂不知不速之致变哉？顾业乖与变同，由是言之，乐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从后面的战役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司马昭和他的“谋士团”“战将团”几乎完全是遵循着《乐毅论》中“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举国不谋其功”“除暴不以威力”的原则去实施执行的。司马昭就是要把寿春之役打成一场举世瞩目的“仁义之战”“德攻之战”，令吴、蜀二方为之折服。

确定好《乐毅论》为战略指导思想后，司马昭便开始着手布局围剿诸葛诞了。

大将军司马文王（指司马昭）督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众，临淮讨之。（摘自《三国志·魏书·诸葛诞》）

在他亲自出马之前，麾下大将王基“以本官行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已然率领先锋部队抢先赶到寿春城下，结栅设垒，连营立阵，准备围而攻之。

诸葛诞却固守城中，并未发兵迎击—他在等候东吴援军的大举到来。

孙吴君臣的内外谋算

在诸葛诞的计划当中，东吴援军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助力，可以在危急关头协助自己守住淮南并割据自立。

然而，在现实中，东吴高层内部微妙而复杂的情势却终究令他大失所望了。

此时，东关的头号权臣是大将军孙𬘭。他是由故辅政大臣孙峻临死前私相授受而掌握大权的。所以，孙𬘭在吴廷内部一直缺乏足够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本来，诸葛诞来降、曹魏爆发内乱，是孙𬘭借助对外立功以巩固自身权位的一个契机。孙𬘭如果抓得住并利用好这个契机，于他本人自是大大有利。然而，孙𬘭本人的文才武略较之先前的孙峻远远不及，更谈不上是司马昭的对手—诸葛诞来降这个契机，于他而言，便成了“火中取栗”。

而且，在孙𬘭的背后，幼帝孙亮聪敏多才，一直谋求亲政主事，已然怀有利用此番北援之战削弱孙𬘭私人势力的意图。孙𬘭想必对此亦有所察觉，为了自保安全，不愿也不敢将自己嫡系的“孙家军”投入前线虚耗受损。所以，他后来对北援之战始终是持消极态度的。

就是在这重重谋算之中，面对诸葛诞的紧急求援，孙𬘭最初只派了以全端、全怿为首的“全家军”和文钦、唐咨等“外降军”共三万人马北上援助。

全端、全怿、文钦、唐咨等人杀到寿春城外围之后，正逢司马氏部将王基在合围寿春。他们无暇多想，自恃后援必至，遂全部突围入城，为诸葛诞加油打气。不料，他们刚进寿春城内，司马昭亲统的二十余万大军便火速赶到。《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记载：

（司马昭）使（王）基及安东将军陈骞等四面合围，表里再重，堑垒甚峻。

完全把诸葛诞、全端、全怿、文钦、唐咨等紧困城内，统统“包了饺子”。

在这个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东吴方面本应当全力以赴与诸葛诞内外呼应，腹背夹击司马氏大军。可是，孙綝为了保全自己的私人势力，又只派出以大都督朱异为首的三万名“朱家军”再度北援寿春，授予他“解围退敌”之责。

同时，孙綝自己却留驻大军于镬里，傍靠巢湖，作壁上观，分明就是随时从水路而遁逃回吴的姿态。

《江表传》记载，吴主孙亮对孙綝此举甚为不满，私下斥责道：

孤前敕之（指孙綝）使速上岸，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

孙綝违旨滞留，是担心孙亮“借刀杀人”。但他亦从此失去了扭转寿春战局的绝佳机会。毕竟，朱异再厉害、“朱家军”再骁勇，仅凭区区三万人马，在二十余万司马氏大军面前，又能折腾得出什么“浪花”来？

蜀汉集团的呼应及受挫

司马昭在围剿诸葛诞时，从关中西翼抽调了一部分兵力东来使用。这一消息被蜀汉主将姜维侦知。他认为如今魏生内乱，有可乘之机，于是率领数万人马火速杀出骆谷，直抵魏国沈岭长城之下。

然而，魏国西线主将司马望与邓艾早有防备，亦火速驰援而到，利用沈岭长城“积谷甚多而城防甚固”的优势，将姜维大军牢牢挡住，不能前进分毫。

姜维多次发起挑战，而司马望、邓艾一如司马懿当年对付诸葛亮那般，始终坚守不应。

双方一直对峙到诸葛诞最终被破灭之时，姜维方才退兵而去。

姜维的无功而返，从侧面证明了司马氏集团确实实力强大，完全可以两线作战、两线取胜，蜀汉在这一次“诸葛诞之乱”中尚且不能撼动司马氏集团，长此以往终是自身难保。

司马昭挑起寿春之役的深层次用意

真正的大谋略家是善于抓住热点事件“举一反三”“隔山打牛”的。司马昭在这一场寿春之役中也是另有深意的。

首先，他以“寿春之役”为契机，对司马氏集团能否彻底掌控魏国朝野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试验。他挟天子、太后两宫亲征出行，还一同带走了尚书台、中书省等枢要部门，这便是完全抽掉了后方拥曹派人士借机作乱的政治“底牌”。以此而论，他自是不会落于当年曹爽兄弟拜谒高平陵而致留守无人的窘境。同时，他亦检测到：在长达近九个月的远征寿春之过程中，魏廷上下安若磐石，居然没有爆发一起反马恶性事件。司马昭应该满意了：这说明司马氏集团对魏室的掌控确实是强而有力的，已经达到了“无懈可击”的水准。

其次，他借号令四方共讨寿春之机，用以及时观测各地将官对司马氏的忠诚度，并相应地予以任免赏罚。例如，在他的征战动员令发出之后，泰山太守常时称疾不出，将军李广临敌不进，显然对司马氏怀有二心。司马昭也毫不含糊，“并斩之以徇”，拿他俩的人头来开刀祭旗。

而曾为曹爽府中司马官的名将、荆州刺史鲁芝（其时已归附司马氏），却表现得十分积极。《晋书·鲁芝列传》记载：

诸葛诞以寿春叛，文帝（指司马昭）奉魏帝出征，征兵四方，（鲁）芝率荆州文武以为先驱。

司马昭对此看在眼里，自然会对他投桃报李。后来，寿春之乱平定之后，司马昭公然将鲁芝“进爵武进亭侯，又增邑九百户”。他赏罚分明、奖惩到位，使司马氏集团组织内部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净化。

最后，司马昭利用寿春之役作为一个“活”的竞技平台，让部下诸将同台“比武”，各展所长，各尽所能。而他则中立于外，从战争中分辨人才，从战争中考验人才，从战争中锻炼人才，从战争中发掘人才。他自己也由此做到对各位将官、谋士的长短优劣了然于胸，今后使用起来也能“才职相符、名实不爽”。

司马昭集团在战役中“亮点纷呈”

寿春之役初起，司马昭虽然在宏观层面做出了“围城而下”“不战而

胜”的决策，但他手下大多数部将在执行这一宏观战略时还是坚持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实战中处理得比较灵活机动。这一方面做得最好的，便是司马氏集团的干将王基。

王基是最先赶到寿春城下布局设围的魏将。他身处战场第一线，对战事的主动权把握得比较到位。司马昭当时率领大军还远在项城，担心王基因兵力不足而为诸葛诞、文钦、唐咨、全端等人所挫，遂下诏让他“敛军坚垒”“不可轻易交锋”。王基根据实地情况做了两手准备：一边在敛军固守的同时，一边也在加紧收揽城外的各个战略要塞，始终不让敌军有隙可乘。

到了吴将朱异率着大军驰到安丰城之际，司马昭并不清楚东吴到底派了多少援军前来交锋。为了稳妥起见，他又诏王基率部放弃营垒、转据北山以藏锋。王基却认为：

今围垒转固，兵马向集，但当精修守备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险，使得放纵，虽有智者，不能善后矣。

决定继续留守诸处要塞，并上奏给司马昭。

今与贼家对敌，当不动如山。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于势大损。诸军并据深沟高垒，众心皆定，不可倾动，此御兵之要也。（摘自《三国志·魏书·王基传》）

司马昭采纳了他的建议，放手任他所为。这一次，他俩都赌对了：东吴果然只派了这三万吴军前来续援（文钦、唐咨、全端等人是第一批东吴援军），孙綝等大部人马根本没有上岸尾随。司马昭进据丘头，所率二十六万大军各有所统，分部围守，牢牢地套住了寿春城，然后终于可以从容自若地实施他的“围而后下、不战而胜”的大战略了。

在寿春包围战的过程中，魏军强硬派首领石苞、王基等人多次请求强攻猛打。司马昭都一一拒绝了，他给出的答复是：

（诸葛）诞之逆谋，非一朝一夕也，聚粮完守，外结吴人，自谓足据淮南。（文）钦既同恶相济，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损游军之力。外寇卒至，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将

使同戮。吾当以长策縻之，但坚守三面。若贼陆道而来，军粮必少，吾以游兵轻骑绝其转输，可不战而破外贼。外贼破，钦等必成擒矣。（摘自《晋书·文帝纪》）

在定下这一套计谋之后，司马昭一方面仍令王基、陈骞等固守营垒，以防诸葛诞、文钦、全端等纵兵突围；另一方面则令石苞、州泰、胡烈等骁将率轻骑奇兵在外围专攻吴国的援军。

《晋书·文帝纪》记载：

吴将朱异帅兵万余人，留辎重于都陆，轻兵至黎浆。监军石苞、兖州刺史州泰御之，异退。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袭都陆，焚其粮运。苞、泰复进击异，大破之。异之余卒馁甚，食葛叶而遁，吴人杀（朱）异。

《三国志·吴书·孙𬘭传》写得更加详细。

（孙𬘭）复遣（朱）异率将军丁奉、黎斐等五万人攻魏，留辎重于都陆。异屯黎浆，遣将军任度、张震等募勇敢六千人，于屯西六里为浮桥夜渡，筑偃月垒。为魏监军石苞及州泰所破，军却退就高。异复作车箱围趋五木城。苞、泰攻异，异败归，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诡道袭都陆，尽焚异资粮。𬘭授兵三万人使异死战，异不从，孙𬘭斩之于镬里。

孙𬘭自己懦弱无能，却“委罪朱异，擅杀功臣”，造成吴军内部人心大乱、士气低落，也意味着东吴再无余力与司马氏集团硬抗。

朱异被杀的消息传入司马昭耳中，他立即极为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寿春之役大转折的一个关键点，并做出了正确研判：

（朱）异不得至寿春，非其罪也，而吴人杀之，适以谢寿春而坚（诸葛）诞意，使其犹望救耳。若其不尔，彼当突围，决一旦之命。或谓大军不能久，省食减口，冀有他变。料贼之情，不出此三者。今当多方以乱之，备其越逸，此胜计也。（摘自《晋书·文帝纪》）

为了迷惑寿春城中的敌军，司马昭“因命合围，分遣羸疾就谷淮北，廪军士大豆，人三升。钦闻之，果喜。帝愈羸形以示之，多纵反间，扬

言吴救方至。诞等益宽恣食，俄而城中乏粮”（摘自《晋书·文帝纪》）。

与此同时，司马昭的谋士钟会也施展“反间计”，促使寿春城中的敌军从自身内部分化瓦解。《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记载：

初，吴大将全琮，孙权之婚亲重臣也。琮子怿、孙静、从子端、翩、缉等，皆将兵来救（诸葛）诞。怿兄子辉、仪留建业，与其家内争讼，携其母，将部曲数十家渡江，自归文王（指司马昭）。（钟）会建策，密为辉、仪作书，使辉、仪所亲信赍入城告怿等，说吴中怒怿等不能拔寿春，欲尽诛诸将家，故逃来归命。怿等恐惧，遂将所领开东城门出降，皆蒙封宠，城中由是乖离。

而诸葛诞的部将蒋班、焦彝等人也看透吴军“外救不至，众无所恃”，只能是坐困愁城、白白等死，随即叛变而出，投降了司马昭。

诸葛诞、文钦等人终于意识到再拖下去只有被活活困死，决定奋死一搏，于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正月，“诞、钦、咨等大为攻具，昼夜五六日攻南围，欲决围而出。围上诸军，临高以发石车火箭逆烧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伤者蔽地，血流盈堑。复还入城，城内食转竭，降出者数万口”（《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

这一次突围失败后，诸葛诞和文钦、唐咨等更加窘困。文钦劝说诸葛诞为了节省军粮而将他的手下北方将士全部遣送出城，只留下来援吴军一齐死守城池。诸葛诞怎会舍得自剪羽翼？于是与文钦嫌隙日深，一怒之下杀了文钦。文钦之子文鸯、文虎二人不得已只有逃出城来，归降了司马昭。

因为文鸯当年在毌丘俭之乱中惊吓过司马昭的兄长司马师并使其目裂而亡，司马氏幕府中人尽皆建议司马昭将他二人诛除以复仇。司马昭却抛下私怨，决定利用文鸯二人的归降来示信于敌军，达到“瓦解敌之军心”的目的。《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记载：

大将军（指司马昭）令曰：“钦之罪不容诛，其子固应当戮，然鸯、虎以穷归命，且城未拔，杀之是坚其心也。”乃赦鸯、虎，使将兵数百骑驰巡城，呼语城内云：“文钦之子犹不见杀，其余何惧？”表鸯、虎为将

军，各赐爵关内侯。城内喜且扰，又日饥困，诞、咨等智力穷。

到了此时刻，司马昭明白此战最终对决的关头已然到来。他亲临一线指挥作战，“见城上持弓者不发，谓诸将曰：‘可攻矣’”。于是，魏军四面进兵，同时鼓噪登城，寿春城内城外竟是无人反抗。

诸葛诞窘急至极，没料到自己居然落得如此孤立，偷偷丢下唐咨等吴将，单身乘马，与自己的侍卫队企图从小城门突围而逃。在半途中，他却遭司马昭幕府之司马胡奋率军截杀，夷其三族。而唐咨等人亦只有弃械而降。

至此，寿春一役，司马昭及其部属群策群力，谋无不中，大获全胜。他以二十六万之众彻底击溃二十余万之敌，历时近九个月，战争范围波及魏、蜀、吴三国，终于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了最大的战绩，堪称光武重生、曹操再世。

他在这场战役中用兵如神，以王基、陈骞打“攻坚战”，以石苞、州泰打“游击战”，以钟会打“文宣战”，以文鸯兄弟打“心理战”，各种妙计层出不穷、应变无方，展现了后三国时期缤纷多彩的高超战争艺术，值得后世引以为鉴。

司马昭的战后安置及其深远影响

曹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二月，司马昭在拿下寿春城、消灭诸葛诞之后，本想调遣诸将轻兵深入，大举南下，招迎唐咨等人在吴境的亲信子弟，乘隙直取东吴。

这时，王基站出来劝谏。

昔诸葛恪乘东关之胜，竭江表之兵，以围新城，城既不拔，而众死者太半。姜维因洮上之利，轻兵深入，粮饷不继，军覆上邽。夫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今贼新败于外，又内患未弭，是其修备设虑之时也。且兵出逾年，人有归志，今俘馘十万，罪人斯得，自历代征伐，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指曹操）克袁绍于官渡，自以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摘自《三国志·魏书·王基传》）

司马昭权衡之下，认为他所言可取，再一次听从了他的建议，休兵不动。

在安置降兵降将方面，司马昭亦是从宽从仁，毫无苛酷。一是对吴军的安置，及破寿春，“议者又以为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宜悉坑之。大将军以为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吴兵就得亡还，适可以示中国之弘耳。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摘自《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二是对诸葛诞旧部的安置，“其淮南将吏士民诸为（诸葛）诞所胁略者，惟诛其首逆，余皆赦之”。三是对各个降将的安置，“拜（唐）咨安远将军，其余裨将咸假号位”。“表（文）鸯、（文）虎为将军，各赐爵关内侯”。

对司马昭的种种举措，后世史学家习凿齿深为叹服。

自是天下畏威怀德矣。君子谓司马大将军（指司马昭）于是役也，可谓能以德攻矣。夫建业者异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穷武之雄毙于不仁，存义之国丧于懦退。今一征而擒三叛，大虏吴众，席卷淮浦，俘馘十万，可谓壮矣。而未及安坐，表王基之功；种惠吴人，结异类之情；宠鸯葬钦，忘畴昔之隙；不咎诞众，使扬士怀愧，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当之哉？

他挟淮南全胜之威回朝，魏帝曹髦只得以晋公之爵、相国之尊、九锡之礼迎赏于他。司马昭却坚持“守谦让之实”，固辞不受。但任何人都清楚，他以晋代魏、一统八荒，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罢了。

其实，我们中立而客观地来看待这场后三国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寿春之役，会发现司马氏集团也从中暴露出了一些重大的隐患问题；在此役中，王基、石苞、州泰等累有战功的干将们绝大多数的年纪都比司马昭本人还大，基本上都是司马懿、司马师时代遗留下来的军事班底。这显示出司马氏集团军事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较为严重。司马昭通过这场大战役并没有选拔出多少年富力强的新秀人才。他的弟弟司马亮在战争中竟遭失利免官。只有钟会一人在出谋划策方面表现突出，成了他的智囊臂助。但这毕竟掩盖不了他麾下新秀匮乏的事实。

直到数年后他发动灭蜀之役时，王基、州泰等皆已先后去世，而他所能任用的主要还是邓艾、诸葛绪这样的老将。至于杜预、胡烈等军中新秀，才在那个时候渐渐冒出头来。

相反，倒是东吴这边，孙綝、朱异及其他吴将几乎均遭挫败，而陆逊之嗣子、“陆家军”之首领陆抗却脱颖而出，在局部战争中战绩颇丰。《三国志·吴书·陆抗传》记载：

（孙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魏将诸葛诞举寿春降，拜（陆）抗柴桑督，赴寿春，破魏牙门将、偏将军。

这说明：吴国虽败，但也不乏新秀俊才。江东的半壁河山，终有陆家军可以倚为栋梁。司马氏集团固然兵强马壮、粮丰械足，但要一举吞灭吴蜀，亦非一朝一夕而可达成。

但即使如此，司马昭在“寿春之役”以宽受降、以仁待敌的做法也让吴、蜀二国的士大夫阶层有所感触。所以，在后来的岁月里，蜀汉、东吴都在战败之后皆因信服司马氏的宽大为怀而先后举国降服，而不是死抗到底。

第十八章 文立：由蜀入晋之“第一智臣”

当代知名学者仇鹿鸣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一书中指出：司马炎开创的晋国高层权力集团是由中原名门世族精英为主干的，他们几乎垄断了朝廷上下的人事选任大权，而且彼此以血缘、姻亲、郡望、乡谊为纽带，具有极为强烈的排外性。而邓艾仅仅是出身寒门庶族，因其立下赫赫战功而跃居太尉，便遭这些世族精英联手绞杀、几近灭门。

然而，在晋初权力最高层的显要位置上，却屹立着一位来自被征服之地域的“异类”—他就是原蜀汉尚书、时任晋国散骑常侍的文立。

文立原籍为蜀汉巴郡临江县人氏，是土生土长的益州系士族精英，在中原一域毫无人脉。和他同仕成都的蜀汉督军裴越，出自河东郡裴氏一族，其父裴儁为原魏国尚书令裴潜之胞弟，本人为现晋国尚书令裴秀之从弟，他在中原晋廷的人脉背景可比文立雄厚太多了。然而，终裴越之一生，只做到了晋室议郎之职。而文立却在晋国朝廷一路飞黄腾达，竟做到了散骑常侍、卫尉等上品要职。可见，文立在晋廷的“登龙”之术堪称运用得炉火纯青，甚至突破了门户背景的制约和降臣身份的限制，实在是难能可贵。

其实，纵观文立在晋国仕途如此顺遂的背后，还是有脉络可寻的。他首先是拥有一位能在晋国仕途上对他带来莫大助力的“好老师”：谯周。谯周当年劝说刘禅归顺司马氏，可谓“通达时务”，司马氏自然也对他这一份效忠之诚投桃报李—《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记载：

时晋文王（指司马昭）为魏相国，以（谯）周有全国之功，封阳城亭侯。

谯周本人在蜀中曾任“典学从事”“总州之学者”（摘自《三国志·蜀书·谯周传》），又被陈寿誉为“词理渊通，为世硕儒，有董（指董钟舒）、扬（指扬雄）之规”，影响力颇大。而文立正是他门下首徒。《晋书·文立传》记载：

（文立）师事谯周，门人以（文）立为颜回。陈寿、李虔为游夏，

罗宪为子贡。

有了这样一层师门渊源，司马氏对文立自会青睐有加。

文立对他这位师父的“资源”开发十分到位。他师父谯周是以“顺天应运”而扬名中原的。文立利用这一点，将谯周刻意“神化”以彰显自己的价值。《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记载：

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夏，巴郡文立从洛阳还蜀，过见（谯）周。（谯）周语次，因书版示（文）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者谓司马也，月酉者谓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指司马昭）果崩。

初一看，我们会十分佩服谯周的“未卜先知”，认为他有如“神人”。然而细细一想，这则故事却十分蹊跷：谯周本人从未见过司马昭，怎会突然想起给远在洛阳的司马昭“算命”？他“算人之死”，于常人尚且有犯忌讳，何况是司马昭？而且，他为什么还要留下手笔刻意炫示于人？笔者以为，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文立本人于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夏天在洛阳亲眼观察过司马昭，感到他的气色并不太好，于是返回汉中与师父谯周相见，二人约定联手上演一幕“大戏”给司马氏君臣好好看一看。他让师父谯周装作口齿不清，然后写下“典午忽兮，月□没兮”的“预言”，这个“月□”，可能是“月酉”，可能是“月戌”，也可能是“月亥”，然后待时而奏。果然，司马昭在当年八月病逝，文立就马上呈进谯周“典午忽兮，月酉没兮”这段“谶言”，便有了“先见之明”的美誉。而司马昭身为盖世之雄“应运而逝”，亦被魏国上下视为“天命奇谭”，反而不为犯忌。最巧妙的是文立还留了后招：让谯周装聋作哑，如果晋廷认为此举犯忌而来追问，谯周则以“哑”而塞责，让人抓不到把柄；如果晋廷认为此举不犯忌而反有赏，那么文立就可以站出来宣传师父谯周的“奉天知命”“未卜先知”，从而使谯周和他二人大获其利。幸好，以司马炎为首的晋室高层集团也需要用谯周师徒编造的这段“谶言”来神化司马昭为“天定之雄”“命世之英”。所以，司马氏集团对此大加炫扬，为未来以晋代魏大做舆论铺垫。而文立和谯周自然也是“造神”有功之臣，引起了司马炎的高度重视。他这一表态认可，谯周的“失语”之症就突然痊愈了，还和前来探病的陈寿畅谈无阻，以“孔子再世”而自命，并一直安安稳稳地活到了晋室泰始六年（公元270年）之冬。

不过，这一桩以“谶言”而“造神”司马昭的事件终局之后，最大的获益者并不是谯周，而是文立。文立作为谯周门下的“颜回”，如此忠诚于大晋，很快便被司马炎下诏为梁州首任别驾从事，协助晋廷安抚蜀汉士庶。

再聪明再伶俐的臣子，要想在仕途上实现“跨越式”发展，也是需要合适的机遇的。当时司马炎刚刚登基即位，缺乏自身的嫡系人事班底，在元老派和宗亲派的双重挤压下，不得不“循规蹈矩”、低调而为。而且，元老派和宗亲派在朝廷各结朋党，晋国绝大多数的臣僚已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党争。司马炎肯定不会从涉足党争的臣子当中寄予心腹之任，只会“另起炉灶”，选择几个“孤臣”来做自己的政治“白手套”—此刻，文立以外来降臣之身应运而出，便被司马炎纳入了视野。他平步青云的机遇就此到来。

然而，这时的司马炎对文立的政务能力还不够了解。为了进一步考察他的真才实学，司马炎便将文立放到济阴郡太守的职位上去“以观成效”。

文立在蜀汉时期已是官拜尚书、掌领机务，区区一个济阴太守在他手中做来，又有何难哉？一两年间，文立在济阴郡任上“政事修明”的美誉便日渐升隆，司马炎对此甚为满意，再加上文立在先前“神化”司马昭一事上的贡献，于泰始三年（公元267年）将他选为自己嫡嗣司马衷的太子中庶子。

为了平衡朝中各派势力，司马炎先已选了元老派重臣李憙为太子太傅，再以齐王司马攸为太子少傅，但对太子中庶子一职却显然颇费了一番思量。太子中庶子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职位。居此职者，一般而言，非亲臣子弟，即为国之栋梁。例如曹丕的太子中庶子是司马懿，孙权嫡嗣孙登的太子中庶子为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其后，司马懿、诸葛恪等人都成了本国的顾命辅政大臣。从这一职务的授予，可见司马炎对文立确是非常器重的。

文立自然也懂得司马炎挑选自己为太子中庶子，是另有深意的。在西晋初年，司马炎之太子司马衷的“不慧”之名已是传遍朝野上下。而中原本土派的名门世族集团中各个派系也对太子东宫的僚属可谓是众目所

瞩，都想安插自己方面的人手进去探察虚实。在司马炎看来，倘若司马衷的东宫僚属选人不当，向外面“跑风漏气”、泄密传谣，岂非“引狼入室”？深思远虑的司马炎认为抛开中原本土派名门世族集团的各个派系，从外来降臣当中选择一个与中原本土派毫无瓜葛而又才能不俗的名士文立出任太子中庶子，应是最为“保险”的。一来，他根基浅薄，只能依附皇权才能立足晋廷，易于控制；二来，他在中原“人生地不熟”，也不易卷入朝中本土派的朋党“旋涡”。

在明白了这一切之后，文立便留在司马衷身边兢兢业业地辅导教诲他，以自己的满腔学识为司马衷开发智慧。尽管收效甚微，司马炎却发现了他的忠勤不倦，于是称赞他“任事东宫，尽辅导之节”，把他视为自己的嫡系亲信。

随着岁月的疾驰，司马衷的“不令”之迹终难掩盖，“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为嗣”。同时，齐王司马攸又素有盛誉，成为可与太子司马衷夺嗣的最强竞争者。

此情此势之下，司马炎开始着手培植司马衷东宫一系的势力网络。他认为文立“忠贞清实，有思理器干”，又不似荀勖、冯𬘘等人在朝中嚣张跋扈、惹人非议，于是把他提拔到散骑常侍之位上，成为自己的心腹智囊。

文立这时也非常明白自己正是靠了晋廷的齐王攸夺嫡之争而平步青云的。他身处朝中多个派系势力的“环伺”之下，唯有紧附皇权，谨言慎行，如履薄冰，丝毫不敢授人以柄。他行事之小心翼翼，竟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他的至交好友程琼“雅有德业”，完全可堪举荐为国之用，而文立为了避嫌，居然无一语以上呈御前。凭着这一举动，他得到了“广休（文立字广休）可谓不党矣”（摘自《晋书·文立传》）的公论，更为司马炎所倚重。司马炎正是看中了他的“无朋无党”，才会授予他更大的职权。

随着文立在司马炎心目中越来越受信任，他在朝中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司马炎甚至将一些重要将臣的人事任免问题也拿来咨询文立，文立通常表现得可圈可点。《晋书·唐彬传》记载：

益州东接吴寇，监军位缺，朝议用武陵太守杨宗及（唐）彬。武帝以问散骑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财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财欲可足，酒者难改。"遂用彬。

其实，文立早已摸清了司马炎的心思：唐彬本是先帝司马昭在世之时所欣赏的名臣，又与太尉陈骞等交好，来历不凡，司马炎肯定是要重用他的。而司马炎此时故意拿出和文立同郡的杨宗与唐彬相提并论，显然是在考验文立是否"忠诚孤直"。文立回答得十分巧妙：他并不谈论唐、杨二人的长短优劣，而是指出二人不同的嗜欲来请"圣裁"，既不落于"阿顺上意"之名，又能模棱两可留有余地。果然，司马炎心领神会，以"财欲可足，而酒者难改"的理由选定了唐彬。实际上，益州监军主管军风军纪，选任一个酒鬼固然不妥，而改任一个贪官又岂能正身肃法？司马炎和文立的这番君臣对话，只让后人看到深深的权谋，而毫无启示价值。

咸宁年间齐王攸的夺嫡之争达到最激烈的关头，文立突然被司马炎抬举到了卫尉的要职上。卫尉之职，列为九卿之首，执掌皇宫内外警卫之庶务，通常是非宗室、外戚而不可充任的。司马炎将他如此转任，显然是为了在与齐王司马攸的激战中以备万一。而文立以自己的才识竟使得朝野上下对他这一任命毫无异议—"中朝服其贤雅，为时名卿"（摘自《三国志》）。这一点，令人委实叹服：文立需要表现得多么圆融练达，才会被晋朝那么多的势力集团共同认可啊！

《晋书》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时西域献马，帝（指司马炎）问（文）立："马何如？"（文立）对曰："乞问太仆。"帝善之。

这是司马炎对他应变之才的又一次考试，与汉文帝追问丞相陈平决狱、钱谷之事一样。陈平当时回答："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文立和他的答复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了大臣之风与卿相之器。通过这次考试，司马炎更加坚定了把文立树为太子司马衷之"柱石重臣"的决心。

此时的文立兼任梁、益二州之大中正，"铨衡平当，为士彦所

宗”（摘自《华阳国志》），已经成为益州系世族集团在洛阳晋廷的政治代言人。而他亦正准备着全力协助司马炎在与齐王攸的谋嗣之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然而，那么聪明圆通的他，那么左右逢源的他，却在大决战的前夕—咸宁末年莫名其妙地暴病身亡了！老天爷轻轻一抹，就将他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啊！

他和那位“典午忽兮，月酉没兮”的司马昭一样，费尽了心机，却难逃宿命：在抵达了仕途的巅峰之际，也同时冲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

文立的骤起与骤亡，说来也并不意外。只可惜，益州系士族们从此便在晋朝的最高权力层中失去了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